Ancient Chinese Armour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刘永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ncient Chinese Armour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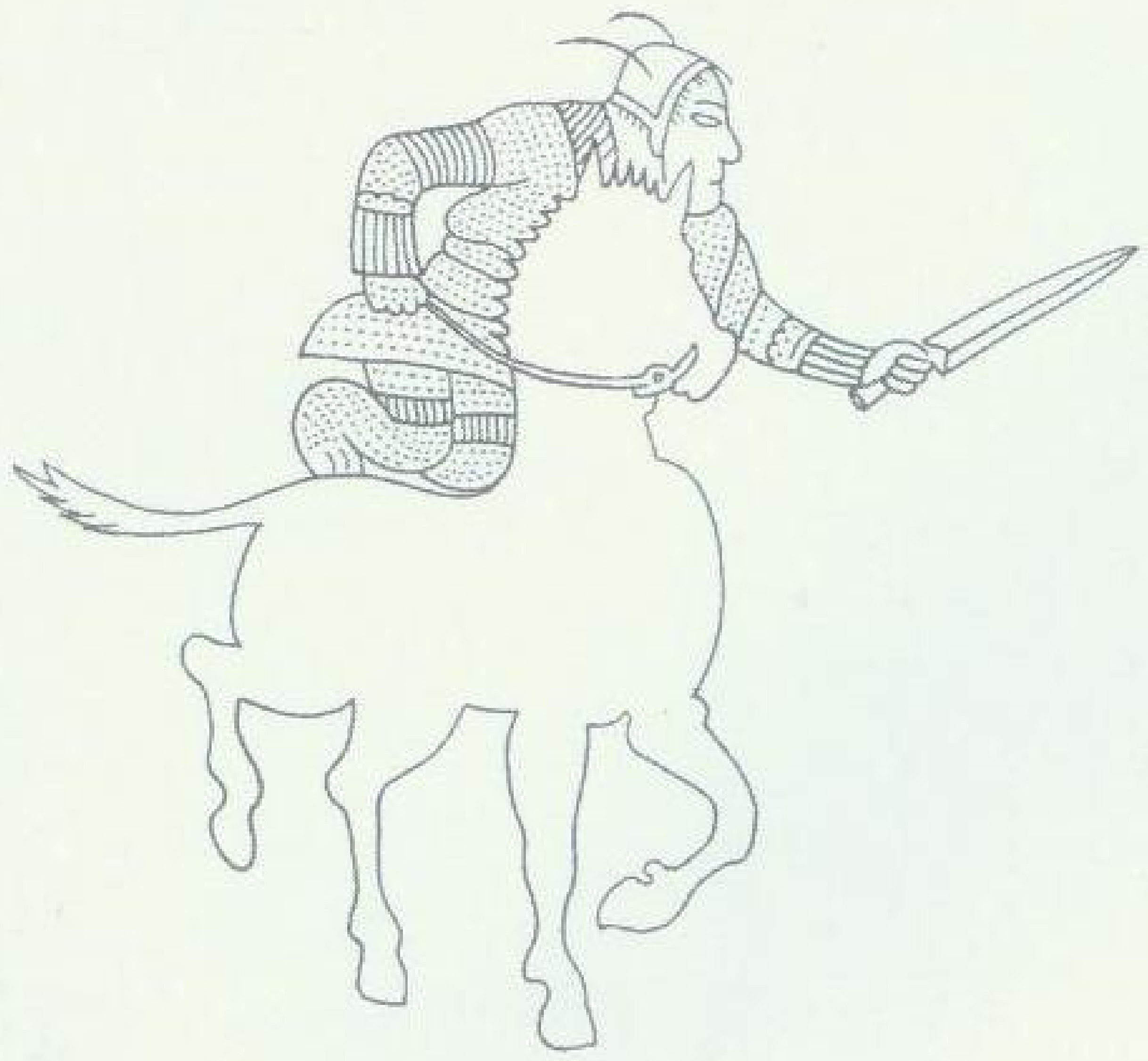
刘永华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序

中国是衣冠古国。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服饰画廊中，军戎服饰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迟迟起步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尚未系统地整理这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一般人对于中国古代武士穿着的印象多半来自传统戏曲舞台，或者寺庙里的四大金刚；为数不多的几本中国古代服饰史著作留给军戎服饰的空间，也是极其有限的。我们需要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专著，否则将愧对古人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慷慨馈赠——如像秦始皇陵兵马俑这样举世罕见的古代军戎服饰宝库。

军戎服饰也就是军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它自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如防身、御寒等。此外，它又有审美价值，由此创造了一个个不同时代的威风凛凛的武士形象。但是，仅仅从实用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服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说，服饰是一种符号。因此，我们面对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一个有待接受者加以读解的文本。解释要有代码。在所有的服饰中，军服的代码是最为明确的和严格的，军服是军事集团的制服。任何制服都是群体的标志，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它属于“社会分类学”。军服表示军事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区别，以及军事集团内部的组织状况和等级系统。由于军事活动需要高度的组织性，军服是完全被制度化了的。如果说现代的时装突出的是个人编码的话，那末军服的编码是完全独立于个体之外的。从这点来看，军服是最为符号化的。研究军戎服饰自然要研究穿着军戎服饰的制度。但是仅仅根据这一代码来读解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本，不只体现一种代码。由于军戎服饰处于多重文本交织的关联域中，它必然受到诸多代码系统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宗教的、习俗的、审美的，等等。因此，对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读解必须使其与文化中的其他文本相参照，更确切地说，与同时代人的行为相参照。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隐蔽在文本底层的意识形态结构，才能发现在繁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意义的统一性。当然，达到这一步得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任何学术研究在其起步阶段必须占有材料，加以识别、归



纳和分类。不进行形态学的研究，搞清词法与句法，那是难以深入到语义学层面的。刘永华在《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企图进行的，正是这项基础工作。

本书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进行了历史性的系统描述。迄今为止，它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史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本书材料丰富，论述严谨，图文并茂，插图精美，很有分量。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先后共跑了二十二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名胜古迹和考古发掘地，其中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汇聚了丰富的图像资料，而且多数是作者根据实物、塑像亲手绘制的，数量多达400余幅。此外，作者还为每一个朝代的军戎服饰绘制了复原图。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深厚写实功底的画家，故其绘制的复原图和插图不仅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而且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而这是一般服饰史专著所望尘莫及的。

作者刘永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现为该院副教授和舞台美术系副主任。他的专业领域是舞台设计。过去他曾协助周锡保教授绘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插图，后来又参与大型画册《中国民族服饰》的编绘工作。1986年，中国军事博物馆委托他设计战国、唐、宋、清几个朝代共7件古代武士的蜡像，由此激发了他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意向。此后，他不断地搜集有关资料，1991年得到了上海青年学术基金的资助，终于使他完成了这本著作。

胡妙胜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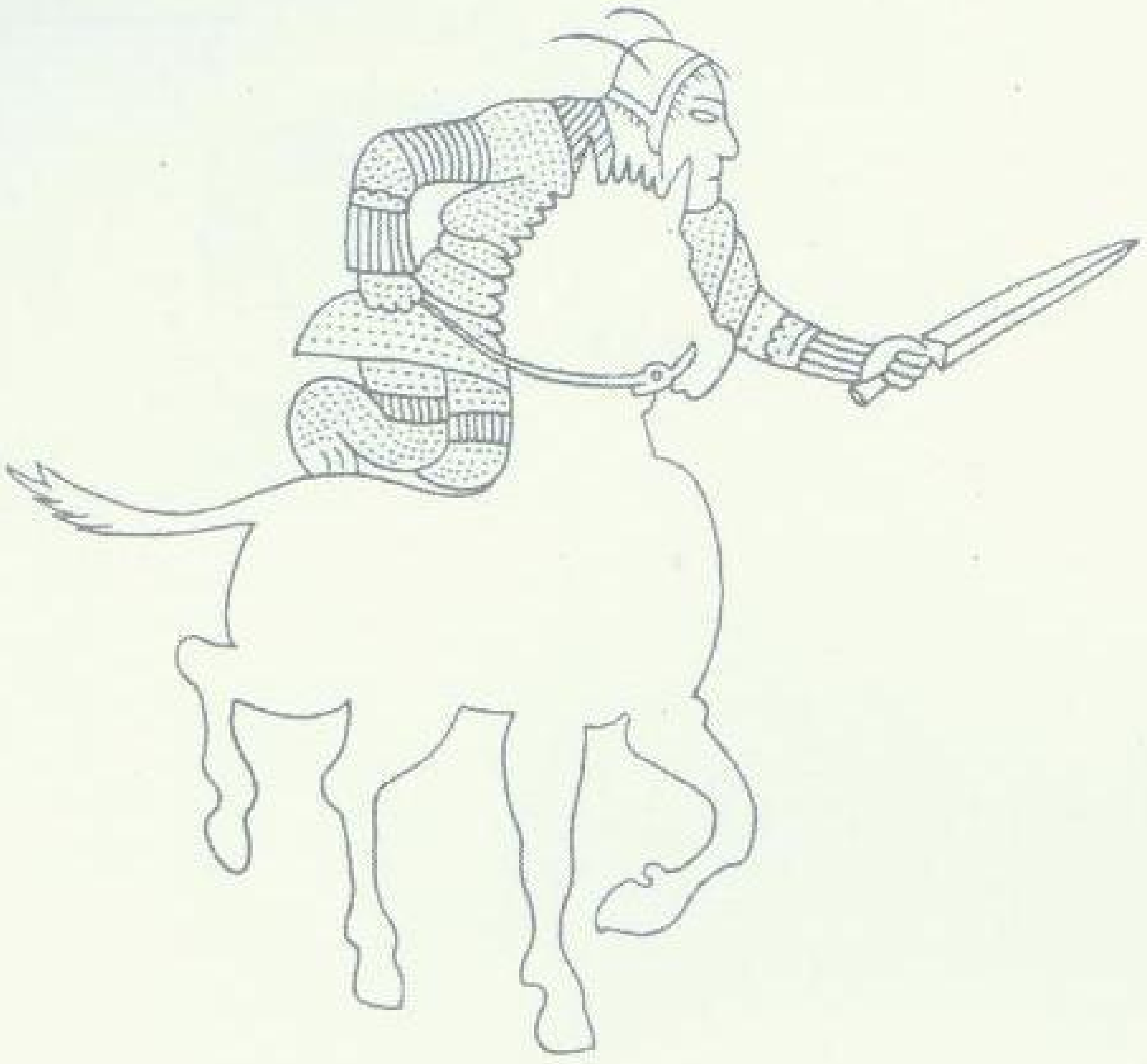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件珍藏至今还鲜为人知的瑰宝，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

军戎服饰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军服。现代的军服相对比较单纯，主要由服装和表明军衔、军种的标识组成；而在古代，则至少包括两大类型的服饰：一是戎服，一是防身护体的甲胄。戎服是军人在军营内和日常生活中穿着的便服，武官除这类服饰外有时还要加上一些表示官职的官服。甲胄是军人作战时用于防护的装备（有时在一些重要典礼上也使用），如根据它的制造材料和作用来分类，应属于兵器一类。但因为甲胄是穿戴在军人身上的，直接影响到军人的服饰造型，所以它又是军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军队作为政权的支柱，在国家政治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朝历代的帝王、政治家无一不对军队的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这其中自然包括督造、制定最能发挥军队战斗力、便于指挥的军戎服饰和服饰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是比较系统、规范的服饰，这种系统和规范的程度，能体现出历代的战争、军队的建设和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

军戎服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有的体现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和封建帝王的个人好恶，有的则是受了当时文化艺术及审美倾向的熏陶，在整个社会风俗、时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些具有特点的服饰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从宫廷到民间，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幼都喜欢服用的流行时装。少数服饰还曾为前后几个朝代连续采用，流行时间达一千多年，直到今天，在现代服装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所以军戎服饰还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变异与进步。

同时，生产和制造戎服甲胄，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封建社会，是一项很重大的经济活动。一般都由皇室和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直接经营、掌管、布署，他们有权征调和指挥最有技术的工匠和最优良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军备生产一般能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不仅具有了解古代军事史的价值，而且具有探索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历史的重要价值。



研究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的，其重点集中在甲胄方面，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兵器研究的范畴来进行的。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给甲胄的研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所以迄今为止，对甲胄的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相比之下，对戎服的研究则要薄弱一些。这些年来虽然发表了不少关于深衣、腰带、发式等方面的论文，但都有局限性，而且刊载这些论文的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杂志，读者面比较窄。再加上这些文章又分别登载在各期、各种不同的杂志、文集上，因此，对这部分研究成果知之者甚少。而几本已出版的古代服饰史著作，对军戎服饰的介绍也比较简略浅显。这种现象与军戎服饰的漫长历史相对照，显得很不相称，因此可以说军戎服饰的研究至今还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园地。

我是七年前由于一项偶然的设计任务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当时只是受到强烈的兴趣爱好的驱使，才“初生牛犊不怕虎”地闯进了这座学术殿堂。几年来，在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编成的这本书，只能作为一部抛砖引玉之作，期望它的面世能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注意和兴趣，共同把军戎服饰的研究深入下去。

由于各方面知识水平有限，本书一定有不少疏漏或谬误，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书中有很多由我绘制的复原图，都是根据出土实物或参照古籍文献的记载，经过考证后进行的，手法写实，目的是想加深读者对历代军戎服饰的印象，或者提供一些形象的参考以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如有不确之处，也请一并予以指正。

作者

目录

序
1
前言
3
商代
1
西周
9
东周（春秋战国）
13
秦代
23
汉代
35
魏晋时期
49
南北朝
61
隋代
75
唐代
83
五代十国
107
宋代
115
辽
135
金
143
西夏
151
元代
155
明代
169
清代
191
附录
一、历代铠甲的形制图解
203
二、唐宋时期的甲胄制造技术
205
三、唐宋时期的甲胄制造技术
209

商代武士复原图

衣、裳、舄根据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青铜像和石边璋线刻人像复原，胄采用江西新干县商墓出土实物，甲参考安阳殷墟遗址遗迹，兵器参照《中国古代兵器图集》，惟弓上的铜弓柲安装法保留了笔者个人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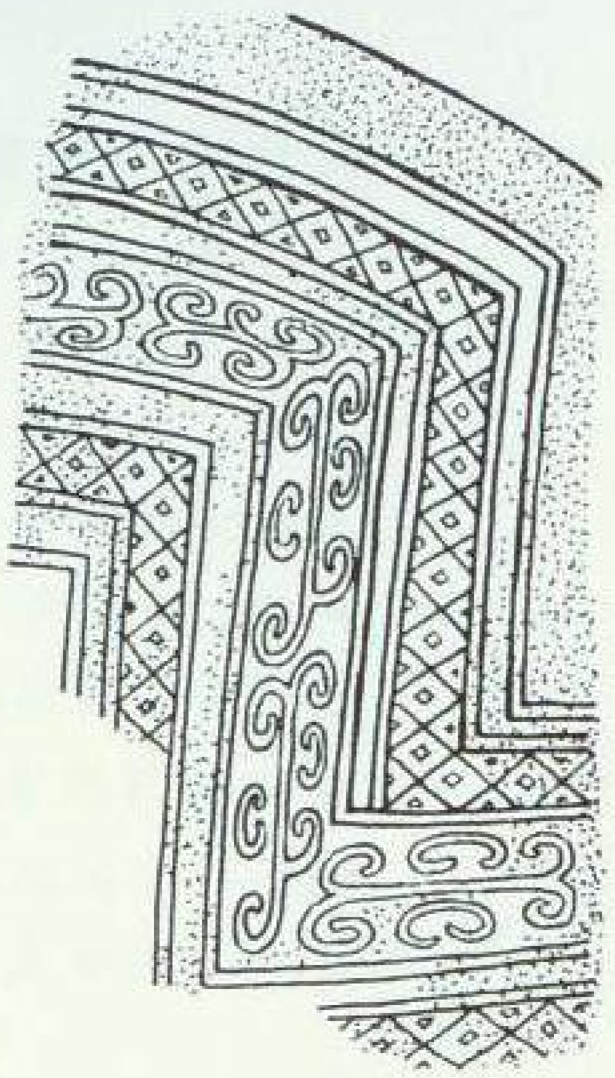


图 A—1 商代皮甲片残迹，录自（日）林己奈夫《中国殷周时代之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72 年出版。

A—1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青铜胄，上为饕餮纹胄，下为圆葵纹胄，见《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七期图版 34。

A—2 江西新干县商墓出土青铜胄，江西省博物馆藏。

商代

（约公元前 17 世纪至约公元前 11 世纪）

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遥远年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开始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区域内繁衍、生息，考古学上称他们为“北京人”。北京人在漫长岁月的进化过程中，通过与自然界的斗争，逐步学会和掌握了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技能，其中包括缝制衣服。

1927 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古人类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骨针，据此推断，山顶洞人在一万八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用兽皮缝衣服了。至于用皮革做甲衣来保护身体，《史记》上说是帝杼“作甲者也”（《夏本纪》）。杼是夏代（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七代君，因此甲似乎在夏前期（约公元前19世纪前后）就已经有了。而《管子·地数篇》则说甲是蚩尤发明的，并“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是青铜冶炼的发明者。这种说法把甲和青铜兵器的出现，又推前了几千年。究竟哪种说法比较可靠，现在尚无法确证。

1935 年在河南安阳侯家庄 1004 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了商代的皮甲残迹，出土时皮革已腐烂成粉末，只有甲面用黑、红、白、黄四色漆彩绘的图案纹理仍遗留在土上。残迹的最大直径均在40厘米左右，据此认为是整片的皮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比较可信的一个实例，时间可以推定为商代后期（图 A—1）。

与皮甲残迹同时出土的还有 140 顶左右的青铜胄，它们和兵器放在一起。铜胄都是用范浇铸的，合范的缝在胄的正中间，胄顶有竖立的铜管，用于安插羽毛之类的缨饰，胄的左右两边和后脑部向下延伸，用以保护耳、面颊和后项。胄的剖面为○形，表面都经过打磨，但是里面却很粗糙。这说明胄的里面是有织物或皮革做内衬的，否则不堪使用。除了安阳出土的铜胄外，近年在江西新干县大泽洲乡商墓也出土了一顶青铜胄，造型与安阳的略有不同，花纹和制作比安阳的更为精美，这是南方地区发现的第一件青铜胄（彩图 A—1、2）。

由于殷商前后的甲，既没有较为完整的实物出土，又没有发现其他的资料可作参考，因此很难描绘出当时的甲的形象，只能根据现在还保存有实物、本世纪初还在使用的一些原始状态的甲进行推测、想象。这种原始甲胄有两个实例，一是30年代云南傈僳 族使用过的皮甲，这种皮甲用两块长约一米的长条形生牛皮相叠、缝合而成，在约三分之二处开挖一条舌形缝，沿剖开的缝将三分之一的皮革向下折而做成胸甲，另外三分之二的皮革与竖起的舌形做成保护后脑、项的颈护和背甲（图A—2）。使用时，将头套入孔内，前后两片用带在腋下系牢（图A—3）。二是台湾兰屿耶美人用藤条编织而成的藤甲，形如现代的坎肩，穿时在胸前用麻绳系扎。为了增强防护效能，还在藤甲的表面蒙上鲀鱼皮，胄也是用藤条编成的（彩图A—3、A—4）。这两种原始甲胄的制作方法都很简陋，而安阳发现的皮甲残迹，从甲面的彩绘花纹来看，应该比这两种甲胄制作要考究，技术要进步一些。胄的出土实物较多，进行复原比甲要可靠得多。

商代有没有戎服，现在尚无形象资料可以证实，但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商代卜辞进行分析和推测，至少在商后期已经具备了。

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随着氏族部落的不断兼并，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商代的卜辞曾记载一次出兵的人数可达三千至五千，多时曾到一万三千人，并“王作三𠂤(师，商朝军队的基本单位)，右、中、左”（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到武王伐纣时，“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史记·周本纪》，七十万人，现代学者认为是十七万之误）。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又是几支部队配合行动，如果没有统一的服装，指挥起来必定十分困难。

再从商朝军队的组织成分上看，也能发现戎服存在的可能性。商军的主干是由贵族王室的全体成员（贵族包括商王族的本族成员与低于王族的子族阶层成员）组成，师中的士卒则由居住在商都及周围地区的自由民担任。自由民是商军的基本来源，奴隶也有从军的，但只能服杂役，不能编进师中。根据这种情况，徒兵和杂役没有戎

图A—2 云南傈僳族皮甲

图A—3 云南傈僳族皮甲穿戴示意图

A–3 台湾耶美人原始藤甲背面

A–4 台湾耶美人原始藤甲胄穿戴示意复原图

服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作为师的这部分军人，特别是王族成员，必定有较统一的“兵事之服”。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知道商代戎服的形制，可有一点能基本确定，即这种戎服必定是上衣下裳制。

上古之人为了遮羞蔽体，先在下体前后围以毛皮，是谓蔽前蔽后，后又把整张毛皮中间开孔，套入头中做成上衣。骨针发明后，开始用它把蔽前蔽后两片连缀缝合起来，形成下裳。裳就是现在的裙子，这种衣裳据说到黄帝时“始去皮服布”(《魏台访议》)，并“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经·系辞下》)，成为古代服饰的最早形制。

这一点能从1986年在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的一座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身上的服饰得到证实（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见彩图A—5）。这尊像铸造精美，除面部、手的造型比较夸张外，其余各部细节都很真实，衣服上的花纹图案和系衣用的绳带、衣纽都刻勒得十分清晰，是非常难得的服饰研究参考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人下裳左右下垂的燕尾形衣裾，与徐州狮子山和陕西咸阳出土的汉代兵马俑上的袍服样式十分相似，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汉代和战国时期的袍服曲裾正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也出土过一些玉雕、石雕人像，其衣服也是上衣下裳制（图A—4）。因此可以基本肯定，戎服在当时不可能出现其他新的形制。

我们的祖先，历来没有修剪头发的习惯，认为发肤是受之父母，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无论男女都要辫发，发辫梳好后，还要用簪笄把它盘起来，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首、冠饰。

A–5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坑出土商代青铜立人像，四川省博物馆藏。像高二米，头戴花形冠，束回纹额带，后脑额带下有二个斜方形孔，原来可能插有笄，上穿V形领左衽上衣，衽边似有钮束衣，衣领处有带，从背后绕过左肩斜横胸前系于右腋后。下着裳，裳后两侧垂有燕尾形尖角。衣、裳上都有阴线刻的花纹，衣上为龙纹，裳上为回纹和异兽纹。小腿上戴有脚镯，耳上有孔，原来可能戴有耳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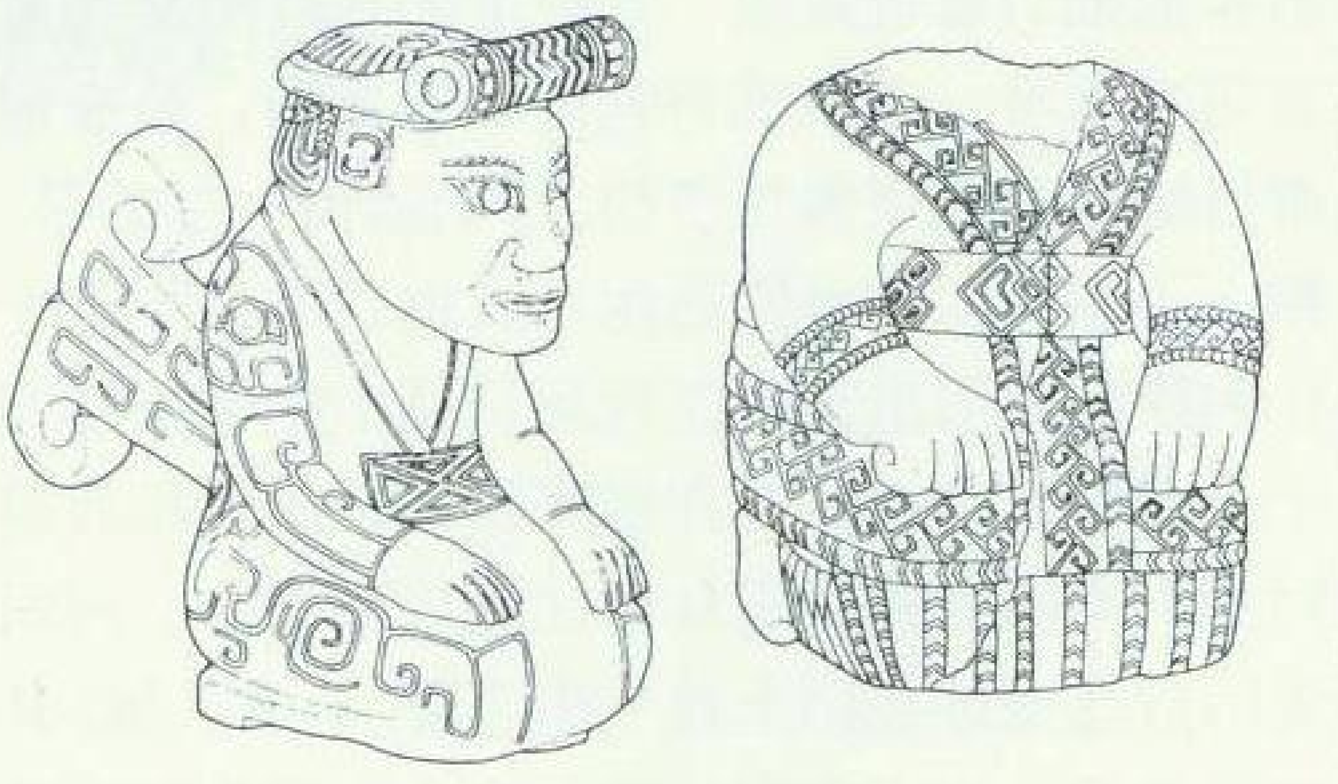


图 A—4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雕（左）、残石雕（右）人像，安阳殷墟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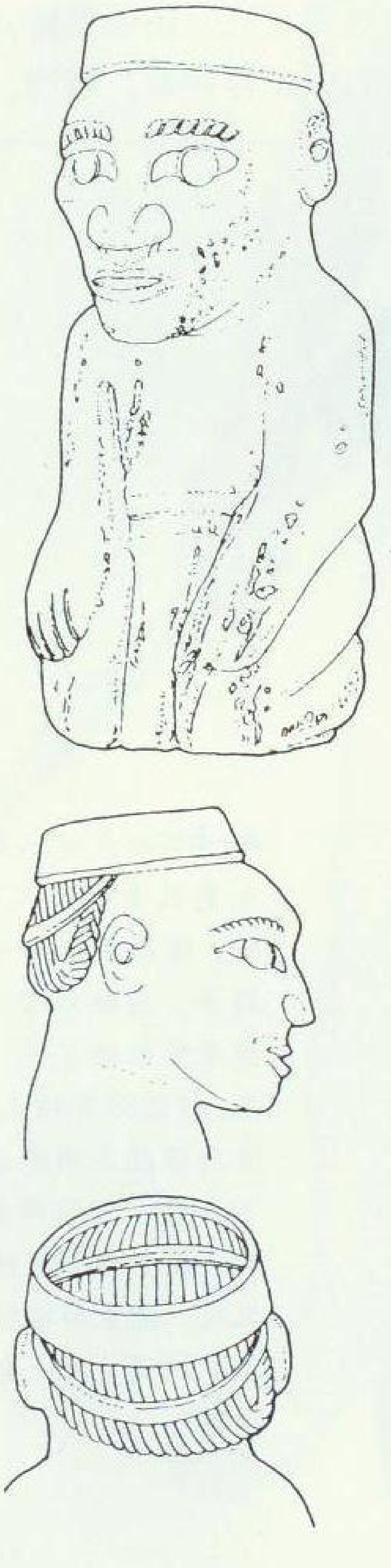


图 A—5 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石雕像，安阳殷墟博物馆藏。

商代男子的冠饰主要是额带，额带又称“頍”(頍的定名，参见丁乙《说頍和额带》，《考古》1984 年第10 期)。安阳出土的玉、石雕像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很多铜人头像上都有这种頍(参见图 A—4左、图 A—5、图 A—6①、②)。从这些人像的衣饰造型上，可以分辨出有的是奴隶，有的则是奴隶主。由此可见，商代无论贵贱，都普遍使用它来束发。

此外就是发辫妆束。图 A—7①的青铜头像，无比清晰地展示了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用现代人的方法编结发辫了。发辫编好后，有的像清代那样拖垂背后，有的盘起来，用笄固定在脑后（图 A-7②）。

商代之前（包括商代）的人物雕像中，除安阳的个别石像和四川广汉的青铜立人像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是赤足外，脚部的刻勒一般都比较模糊，很难辨别脚上是否穿鞋。只有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石边璋上，有两个线刻人像，脚上穿着鞋尖翘起的厚底鞋雕刻得十分明显（图 A—8)。鞋在古时候称作舄、履，《说文》上说：“舄本䧿字，自经典借为履，舄字而本意废矣。”《古

图 A—7 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青铜头像、四川省博物馆藏。①长发梳向脑后，上端束扎，余发编成辫子。②头发向后梳理，发上似罩有头巾，发辫在脑后盘结，插以蝴蝶形花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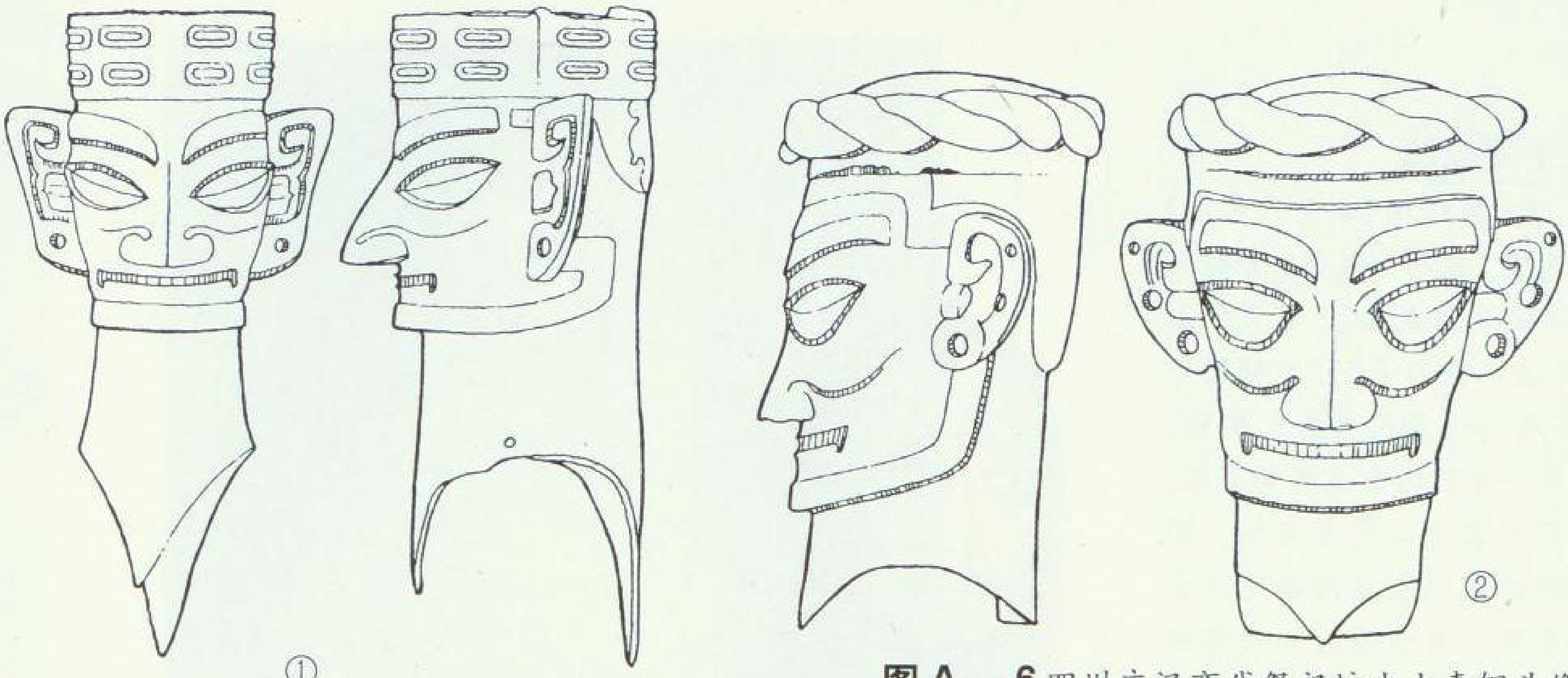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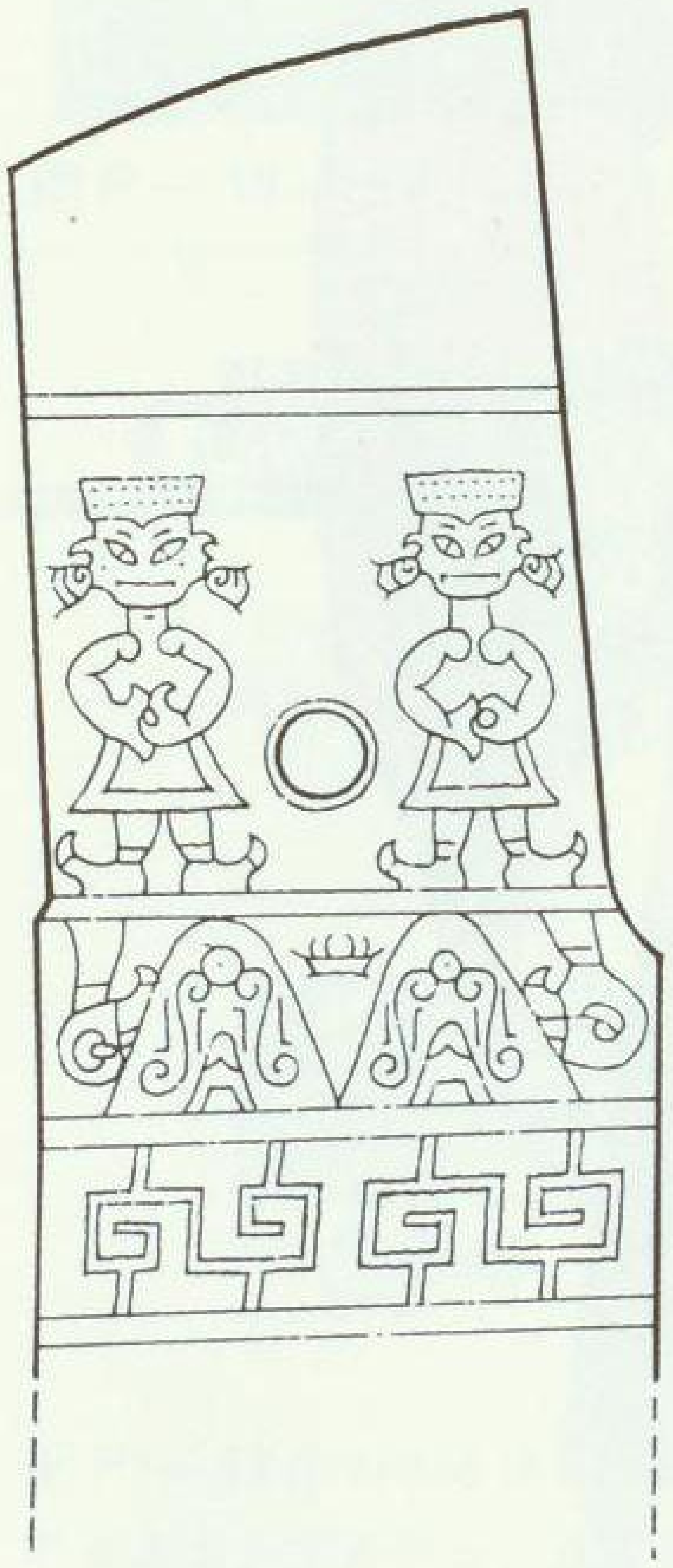


图 A—6 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青铜头像，四川省博物馆藏。①头戴回字纹额带　②头上的颏似用织物卷成，像现代的头箍。



图A—8 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石边璋，四川省博物馆藏。

今注·舆服》把舄解释为：“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湿也。”舄在三千多年前的人类生活中，是一件奢侈品，只有贵族奴隶主才能享用，一般平民和奴隶，蔽体之衣尚不能具备，怎能顾得上脚下？军队中的贵族武士足下穿舄是完全可能的。

商代崇尚白色，《通志略·历代所尚》说：

> 商人尚白，大事剑用日中。戎事乘翰（白马），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朝燕服哻冠而缟衣……

既然军队的主力都是贵族子弟，而商王、贵族的服饰以白为主，那么戎服很可能也采用白色。白色中肯定也要掺入一些诸如红、黄、黑等其他的配色，既作为服饰图案、镶边的色彩，又能使各师之间的服色有所区别。

西周武士复原图

衣、裳、舄根据《新定三礼图》韦弁服插图。裳前为蔽膝，古时又称韍，用皮革制成，韍上有火、山纹饰，为诸侯使用（天子之韍有龙纹）。胄采用北京昌平出土实物，甲根据长安普渡村出土实物复原，兵器采用北京房山出土实物，佩于腰左侧的玉佩根据河南地区出土实物复原，系于身后的绶参照《三才图会》的插图设计，佩与绶是诸侯法服上必不可少的饰物。

西周

（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

公元前 11 世纪末，周武王经过牧野（今河南汲县北）激战，一举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朝。

西周是青铜冶铸的发达时期，当时的官府手工业以铸造青铜器为主，王室或大封建主都有自己的青铜器作坊。随着诸侯分封，青铜冶铸技术也传播到全国各地，所以今天在北至辽宁、河北、东到山东、江苏、安徽，南到湖北、河南的广大区域，都有大量的西周青铜器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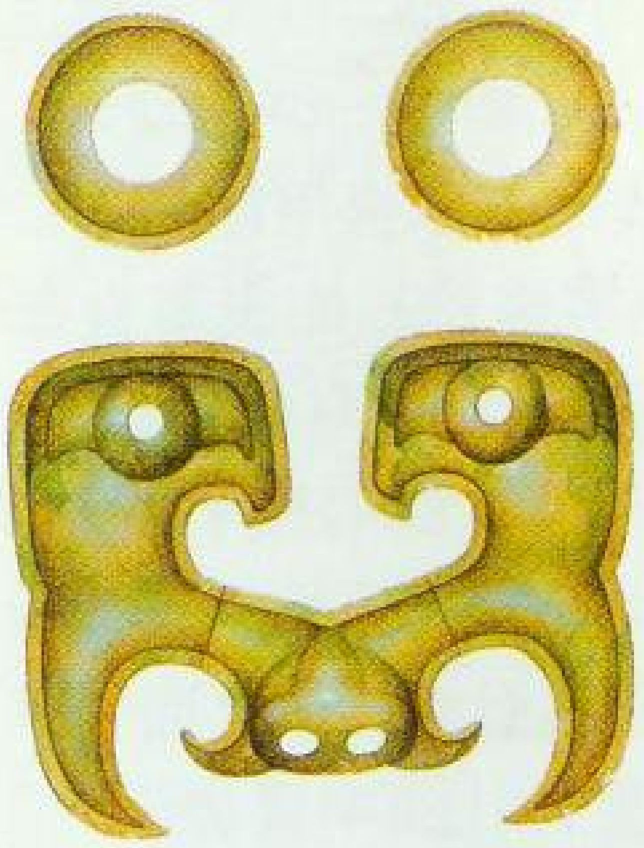
在甲胄方面，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74 年在山东胶县西庵发掘了西周时期的一个车马坑，坑内殉葬一车四马一人，在人头骨部位出土了一组青铜铠甲，一件是胸甲，另两件是背甲（彩图 B—1）。胸甲由左、中、右三片组成，从胸甲周边的穿孔和尺寸来看，可能是钉缀在皮甲胸前的，出土时因衣物腐烂胸甲才滑入头骨位置。两件背甲出土时重叠放置，位于胸甲上方，根据出土位置和放置情况分析，似乎不像是钉缀在甲衣背后的，因此是否属于背甲还值得讨论（图 B—1）。

1975 年在北京昌平西周木椁墓出土了一件青铜胄，铜胄为素面，造型与商代后期的相比较略有差别（彩图 B—2）。

1984 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 18 号西周墓中出土了 42 片青铜甲片，出土时甲片分三组散落于椁室内墓主人脚端及腓骨两侧，经过整理修复，确定是一件铜铠甲（图 B—2，详见白荣金《西周铜甲组合复原》，《考古》1988 年第 9 期）。从复原的形制来看，铠甲是比较原始的，出土时很多甲片的背后还粘附着呈粉状、褐色的腐蚀物，很像皮革背面网状纤维朽烂后留下的痕迹。据此推断，铠甲是以皮革为衬的，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经过复原的年代最早的一件铠甲。

上述这些出土实物可以反映出西周时期铠甲已逐渐向金属材料发展，复原的铜甲就是一个例证；但这时期皮革仍然是制甲的主要材



B—1 山东胶县西庵出土西周青铜胸甲、背甲，山东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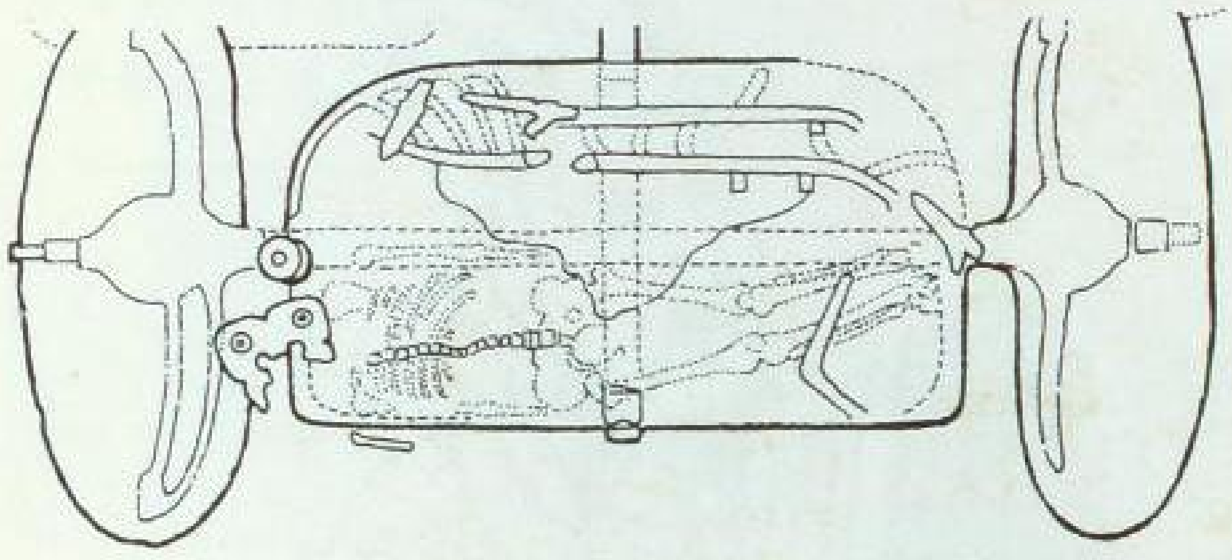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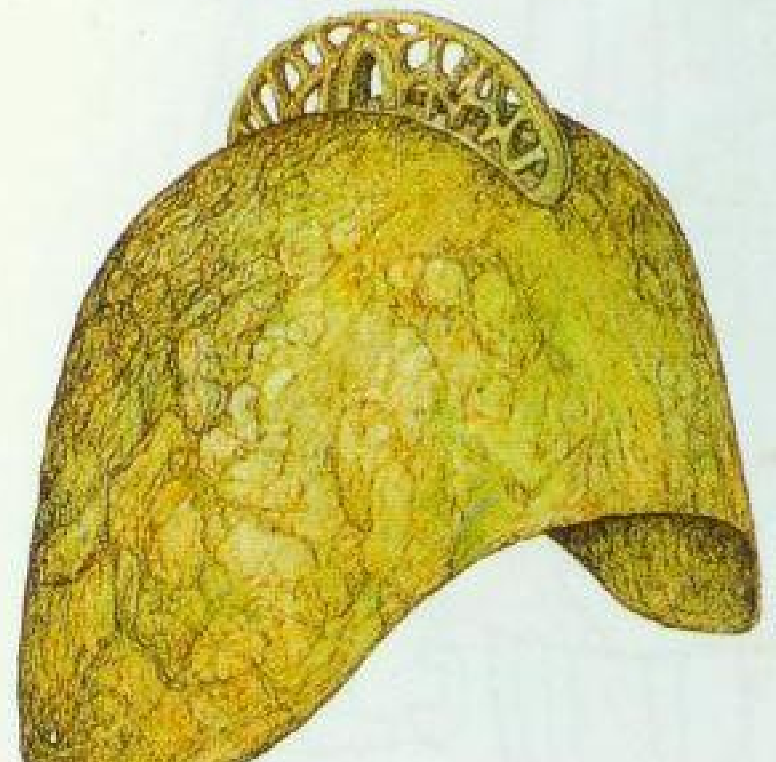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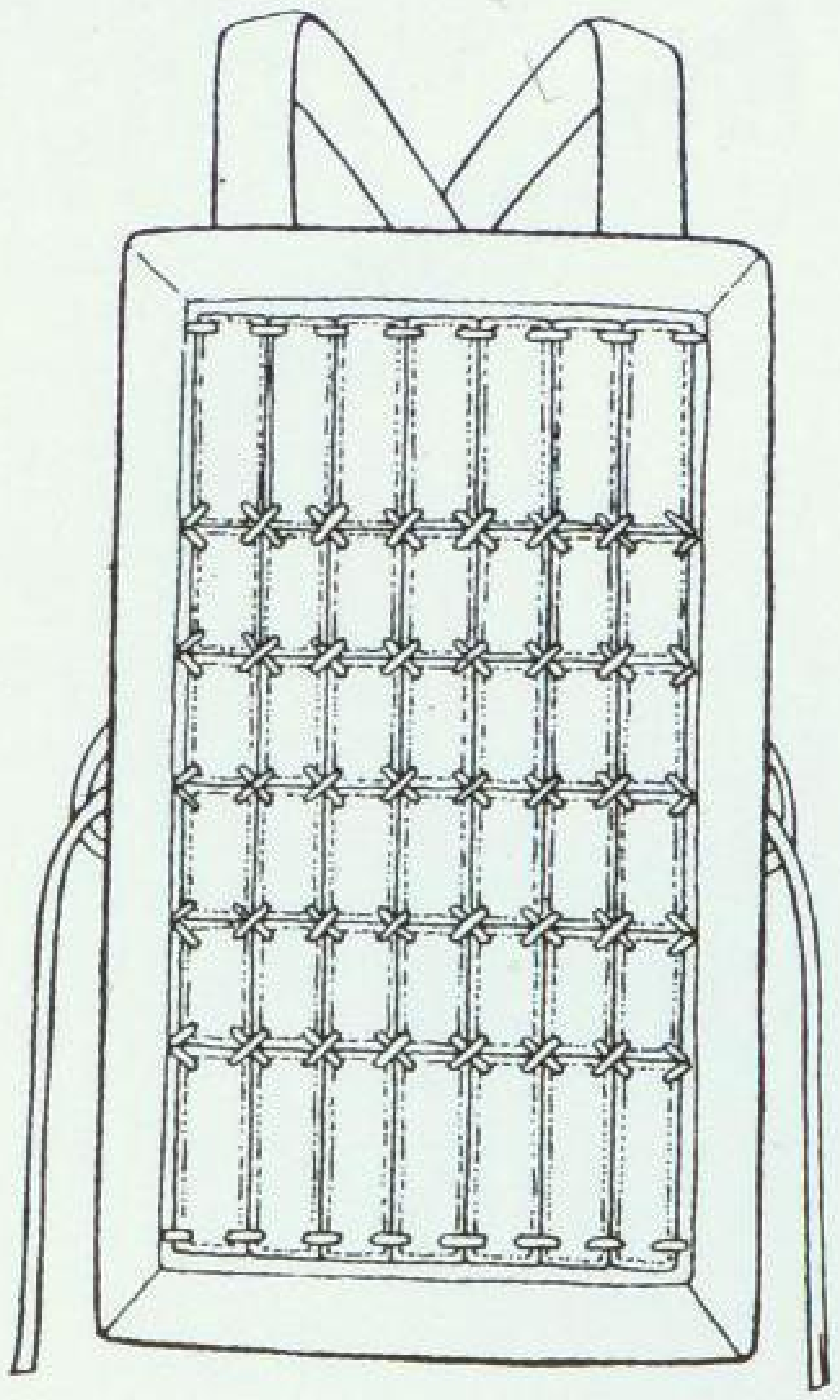
图 B—1 胸甲、背甲出土位置示意图　录自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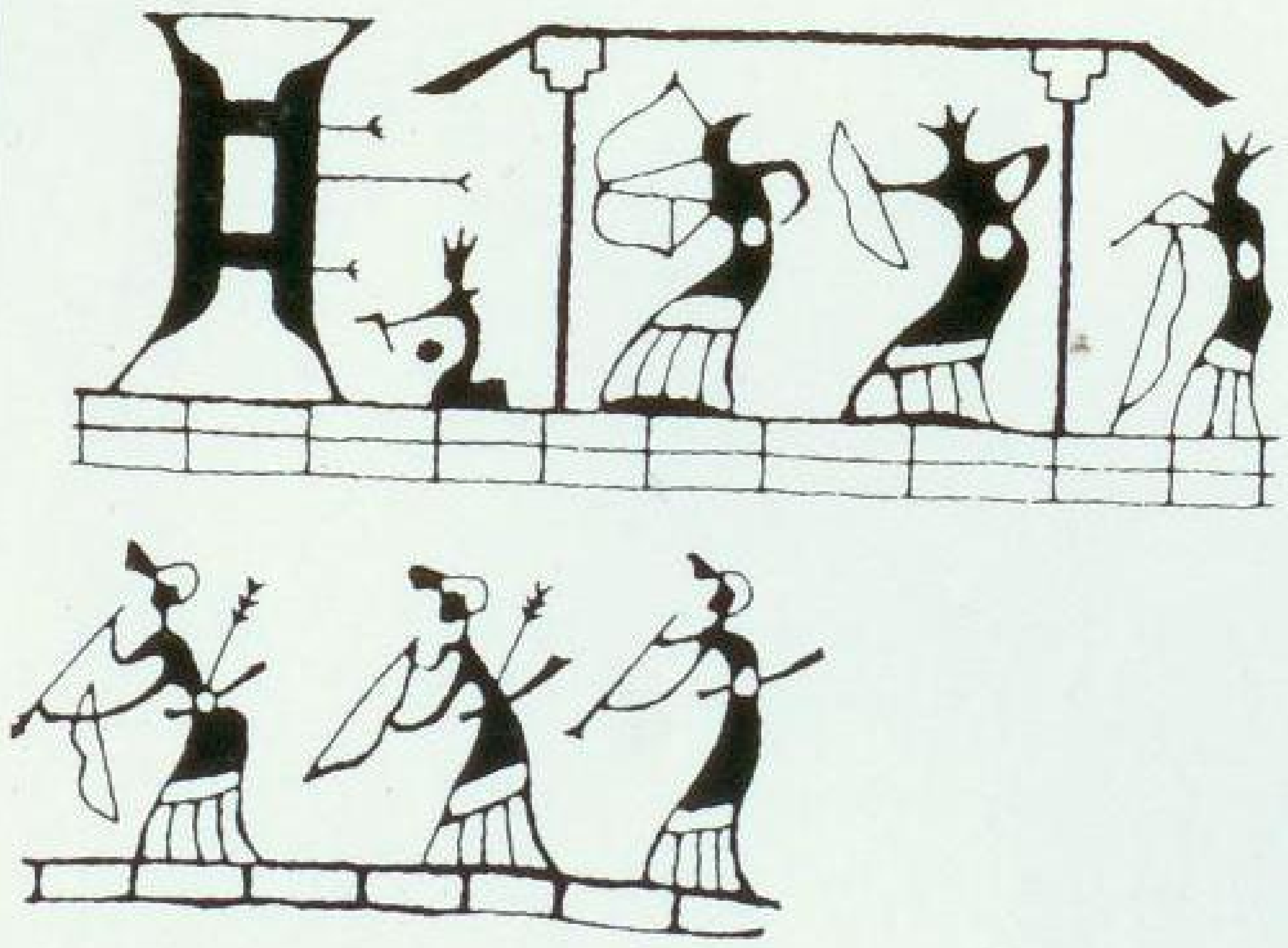
B—2 西周青铜胄，见《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专集上，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料。《周礼·函人》上说："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即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犀、兕都是古代犀牛一类的动物，其皮质坚厚，是制甲的理想材料。合甲即是把二层经过处理（剔除皮革内层肉质）的皮革合在一起制成甲，所以不易腐败，使用寿命较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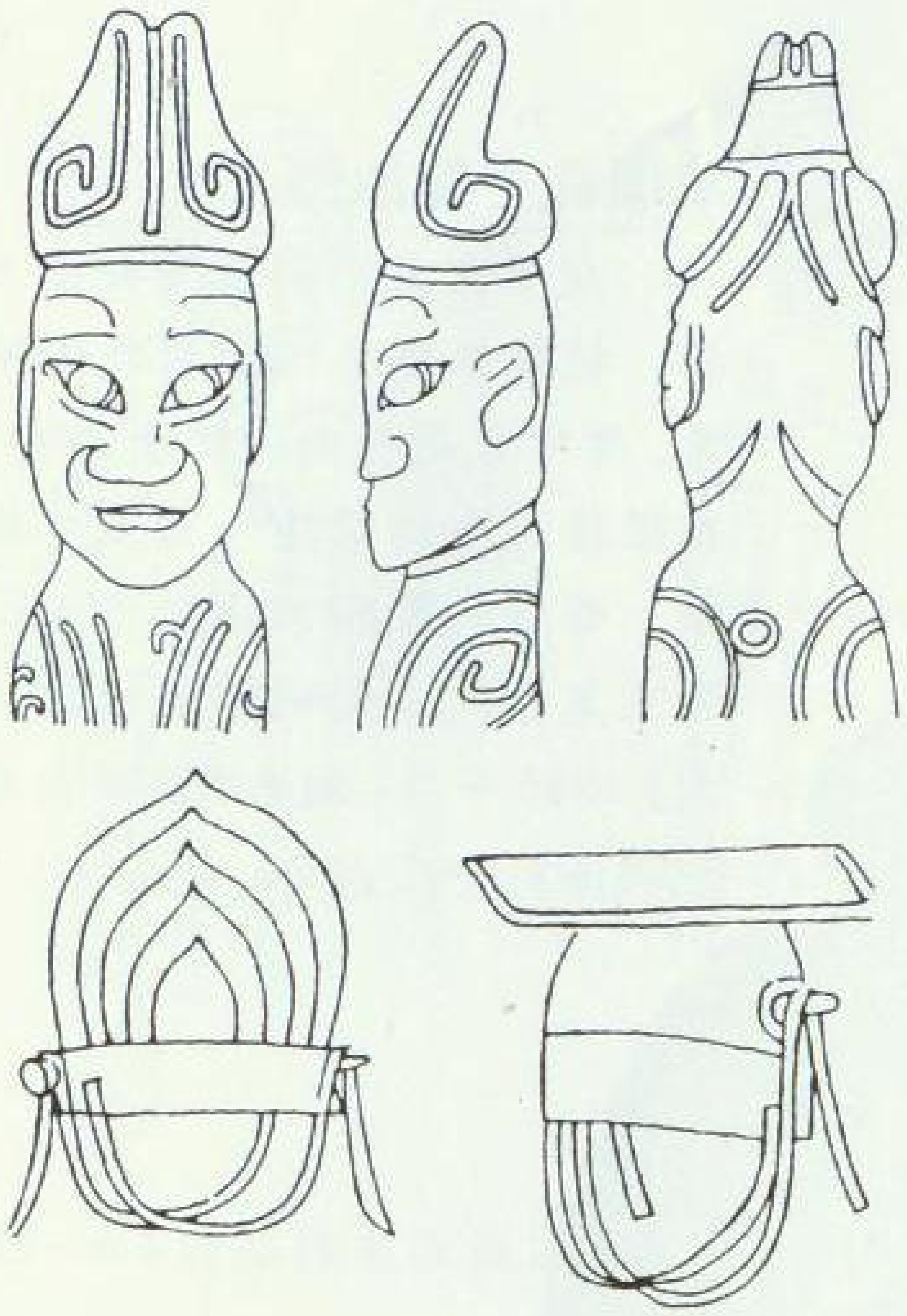
在古代兵制史上，西周初年已开始实行"国人"当兵的制度，其乡遂征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兵制。当时国家军队的组成已经比商代有了突出的发展。西周铭文及《诗经》中屡屡提到"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大举征伐的事，据《小雅·大东篇》释义考证，这三支军队由周天子直接管辖，驻扎在镐京、陪都、卫国等地，用于保



图B—2 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铜甲复原图甲片的四角都开一个孔，甲片编缀时互不叠压，孔眼较大，编缀的材料应是较粗的绳带或皮条，编缀的方法与西汉的金缕玉衣很相似。



图B—3 右：《新定三礼图》插图 诸侯韦弁服，录自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左：习射图、攻战图 战国青铜壶纹饰，故宫博物院藏。



图B—4 上：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玉雕人像，甘肃省博物馆藏。
下：《新定三礼图》中韦弁（左）、爵弁（右）插图

B—3 河南洛阳北窑庞家沟出土西周青铜人形车辖，出处同B—2。

卫京都，监视、镇压新征服的民族（见陈群《中国兵制史》）。这种常备军必定具有正规的戎服。这一点从《周礼》中也可找到证据。《周礼·春官·司服》详细记载了周天子、诸侯的各种冕服，其中的韦弁服是为“兵事之服”。西周军队中还没有专职武官，天子及诸侯就是军队的统帅，他们出征所穿的韦弁服，应就是专用的戎服。至于这种戎服是什么形制，根据《三礼图》等古籍中的插图和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刻纹形象，无疑还是上衣下裳制（图B—3）。

春秋之前，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军队的主力和统帅都乘在战车上作战，士兵则跟随在车后，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刚被用于战场时的情景。这种作战方法，与上衣下裳制的戎服不会产生矛盾。帅与兵的戎服区别可能只在于兵的裳要比帅的短些（以便于奔跑）；衣裳简陋些（如无蔽膝），衣料粗些（以区分等级）。

冠饰方面主要是弁，弁有韦弁、爵弁两种，爵弁为文冠，韦弁为武冠，所以又称“武弁”。一般都用皮革制成。（韦，《说文》：“兽皮之韦，此韦当作围。”）甘肃灵台西周墓内曾出土一件玉雕人像，头上戴一种形如双手复合的冠，与《三礼图》中韦弁冠的插图有些相似，可能就是武弁（图B—4）。普通士卒是不能戴这种弁的，他们一定有另外一些冠饰。在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件青铜人形车辖（古时车轮上的铜配件）上有一种束发冠，很可能是士兵的冠饰（彩图B—3）。

“周人用赤，……戎事乘骠（音元，马腹赤），……以赤为徽号，……”（《通志略·历代所尚》）。戎服也以红色为主，《周礼·春官·司服》说：“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杜预注：“韎，赤色。”说明戎服的上衣下裳都用红色。当然和商代一样，周代戎服在以红色为主的同时，肯定也配置了其他一些别的颜色。

战国武士复原图

皮甲胄采用湖北随县出土实物，袍服参照洛阳金村战国银人像，臂甲采用云南剑川出土实物，靴根据沈阳郑家洼子出土实物复原，带扣与带扣系法根据王仁湘先生复原图，剑的佩法根据《考古》1985年第1期《玉县剑与璏式佩剑法》一文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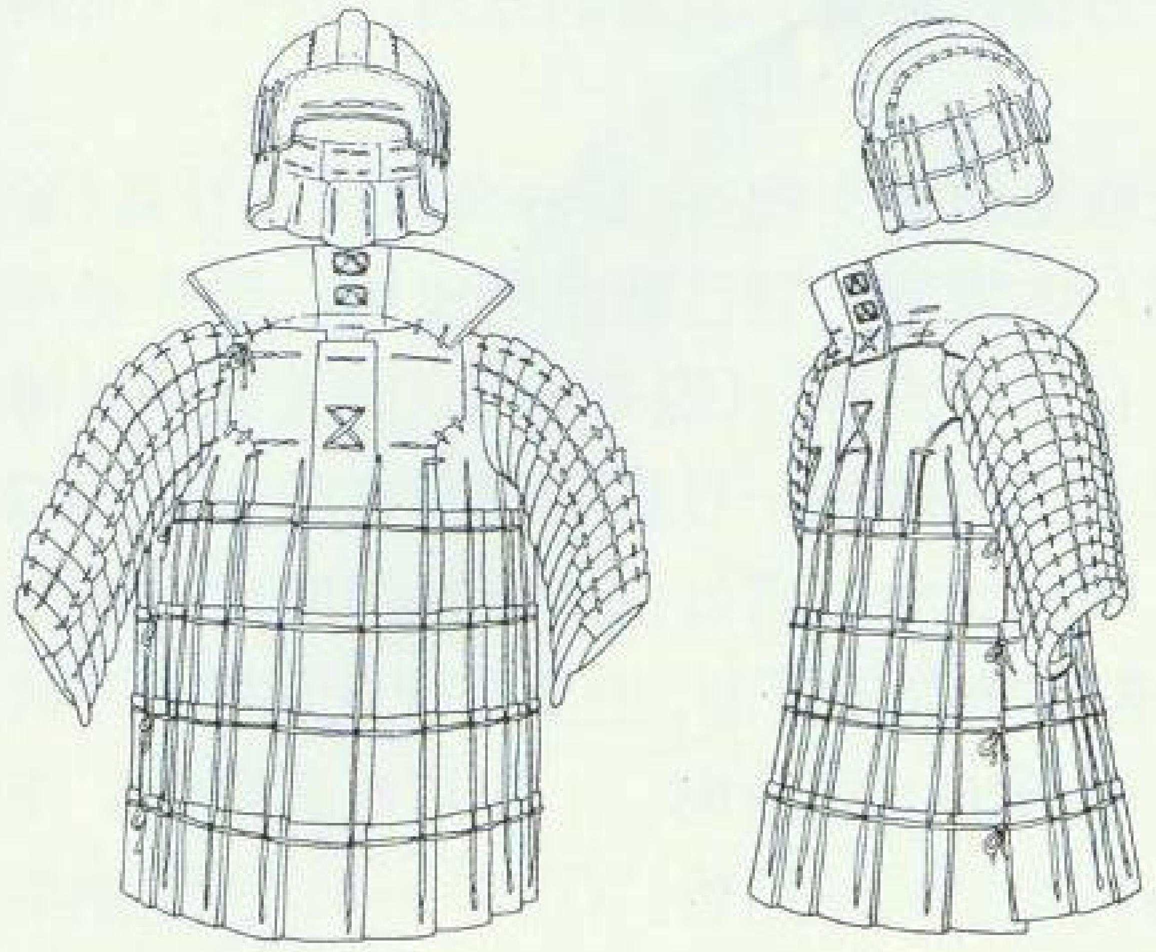


图 C—1 随县擂鼓墩战国墓出土皮甲胄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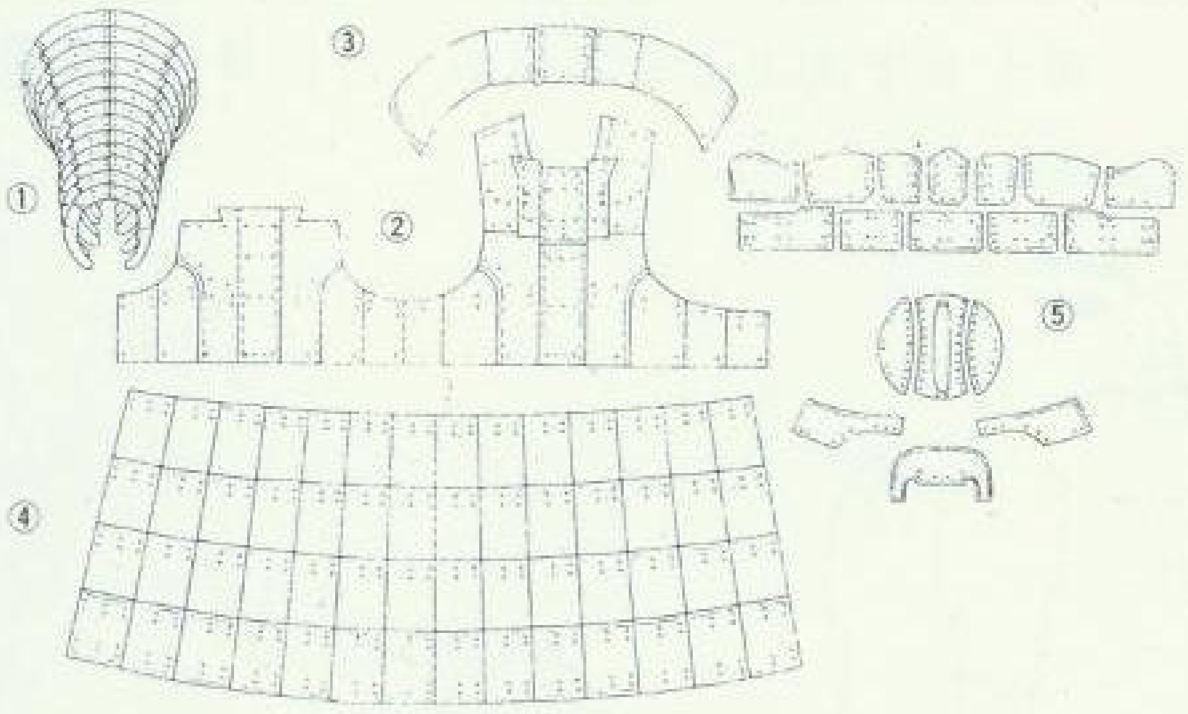


图 C—2 随县出土皮甲胄展开图 ①甲袖②胸、背甲③大领④甲裙⑤胄

图 C—3 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皮甲片（据照片绘制）

东周（春秋战国）

（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由于王位继承的斗争而引起了诸侯的叛变，他们联合犬戎攻入镐京（今西安），杀了幽王，灭了西周。叛乱平息后，周王朝得以匡复，继位的周平王因镐京毁于兵火而迁都洛邑（今洛阳），洛邑在镐京东面，史称东周，又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割据的长期战乱年代，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全面过渡、变革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古代的各种思想学说、科学文化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军事装备的制造技术进步也很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这些实物有：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古墓内发现的大量皮甲胄。经过清理，复原了其中比较完整的十二套，为我们今天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甲胄形制，特别是制造技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图 C—1）。

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甲身二排二十一片，分胸甲、背甲、肩片、肋片、大领。甲袖十三排八十七片（一个），甲片均有弧度。甲裙四排五十六片（图 C—2）。皮甲的编缀方法，横向均为左片压右片，纵向均为下排压上排。胄也是用十八块甲片编缀起来的。不少甲片出土时，孔内还残留着丝带，这就说明甲是用丝带组编的。甲片的表面都髹漆，出土时甲片的皮胎都已腐烂，仅剩下漆壳被保存了下来。（详见湖北省博物馆、随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皮甲胄的清理和复原》，《考古》1979 年第6期）皮甲胄的甲片式样按照外形和尺寸，可分成三十多种，甲片的周边凡露于外表的部分都有用模具压出的凹线。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曾对这些皮甲胄进行研究，认为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下，要制作这样一套甲胄需要用近百套模具进行加工才能完成。工艺繁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试论东周时代皮甲胄的制作技术》，《考古》1984 年第 12 期）

图 C—4 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的皮甲（据照片绘制）

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已采用了类似今天的流水作业生产方法，甲胄制造业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了。

未能复原的实物有：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春秋晚期）内发现一领已散乱的皮甲，甲片呈深褐色，有六种式样。（图 C—3，详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内发现一领皮甲，原来是卷折放置的，出土时已无法揭开，只能从表面看出大概轮廓，上部是方形甲片，下部是施有彩绘的丝织物。（图 C—4，详见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这件皮甲与一件传为长沙出土、现已流失国外的彩绘木俑上的形象十分相似（图 C—5）。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战国时期）内也发现有散乱的甲片，甲

图C—5传为长沙出土的彩绘木俑，俑上甲衣的下面有两条彩绘花边，上面一条无疑应是皮甲内衬垂下的织物饰边。录自（日）林己奈夫《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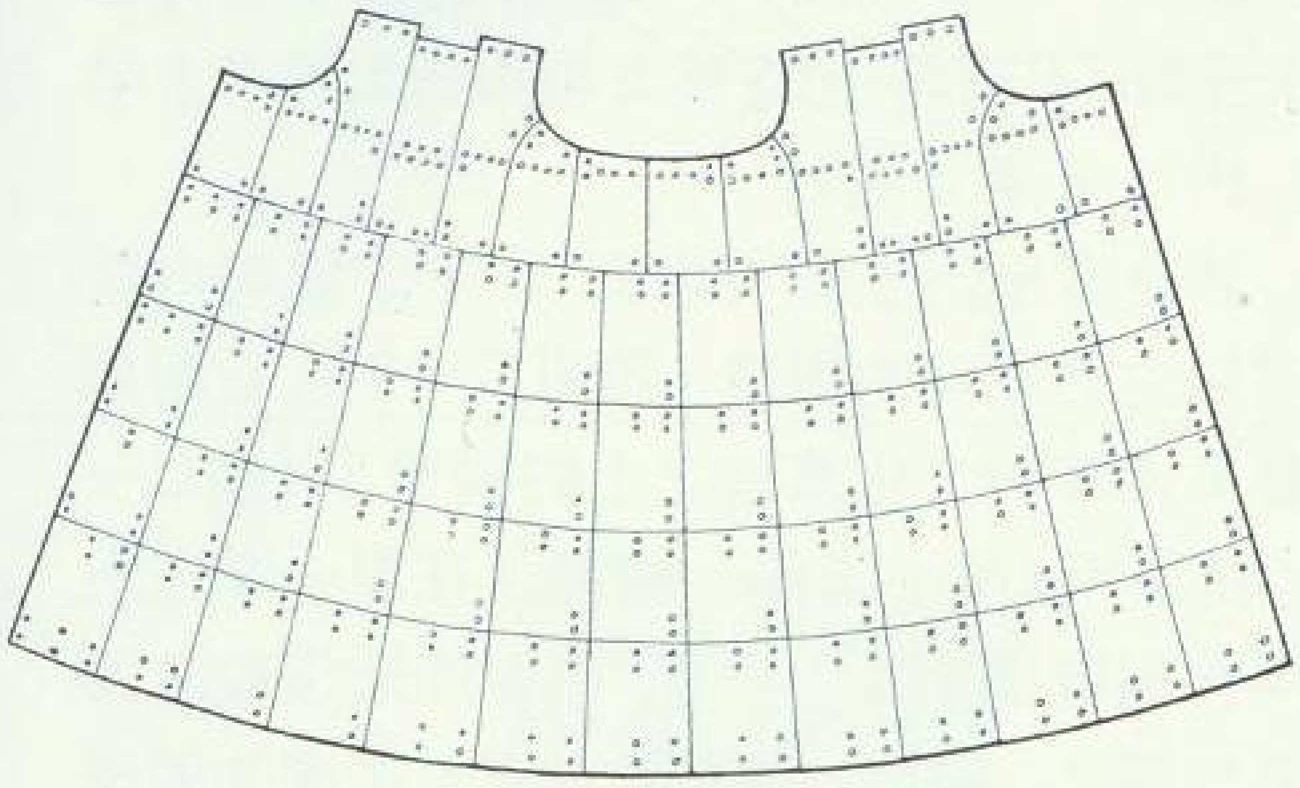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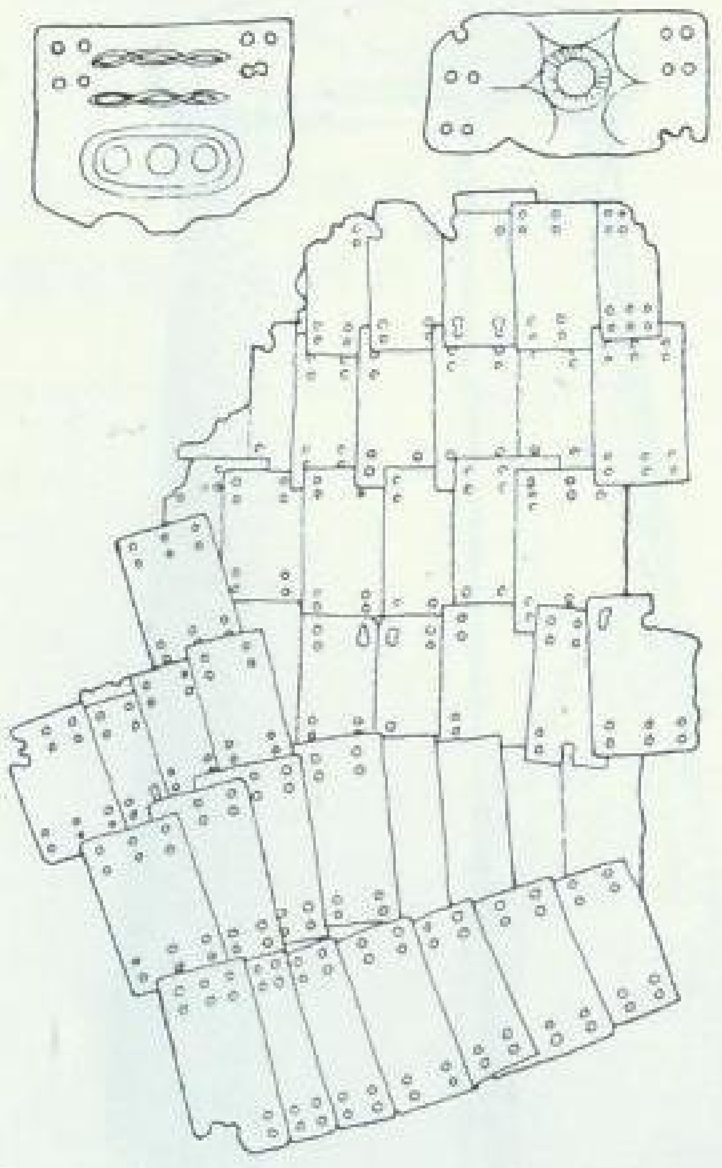
图 C—6 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木甲皮平面

片由二层皮革合起来做成，在少数缀联的孔中还残留着编甲用的小皮条。（参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战国时期还使用木甲，湖北江陵曾有实物出土（图C—6）。这种甲是以木为胎，两面贴革片，表面髹黑漆制作成的，形制与随县擂鼓墩的皮甲相同，但甲片较长，上下只有五排。（详见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木甲在唐代、宋代的文献记载中经常出现，使用历史悠久。这件木甲的出土复原，为研究木甲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实物资料。

关于先秦时期的甲胄制作，古代文献中常有记载，如《周礼》说的“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属在这里是指甲衣上下甲札的续数，按今天通俗的说法即排数。而“甲札”，因甲片较长近似秦汉之前的竹、木牍片的书札，所以称甲札，“革坚则札长”，合甲比其他甲坚硬，因此只要五属就可以了，上面介绍的木甲，上下就只有五属。

春秋战国时期除大量使用皮甲胄外，也使



图C—7①青铜甲片和甲片上刻的花纹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

②铜臂甲花纹展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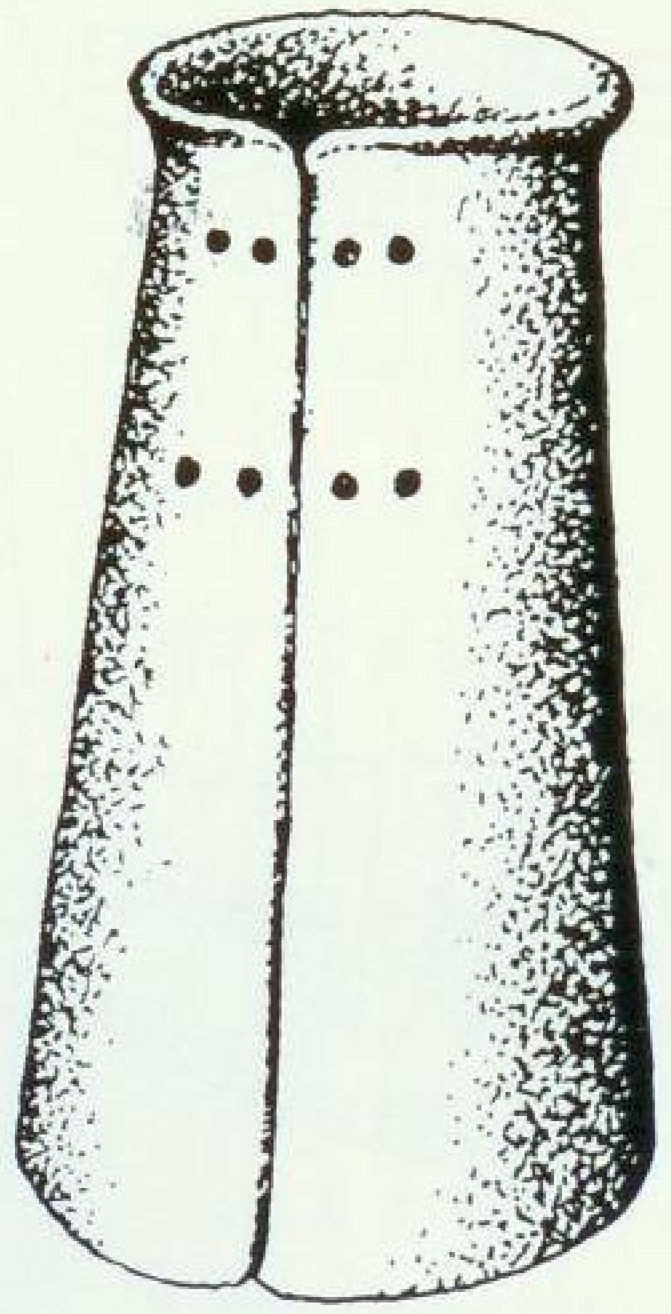
用青铜铠甲。197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中曾出土很多青铜铠甲的部件和甲片，仔细观察这些部件和甲片，不难看出原来应是整领的铠甲，可惜残缺太甚，已无法进行复原。甲片和铠甲部件上用阴线刻出的无比美丽的花纹，充分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和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图C—7、彩图C—2。详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其余零星出土的实物有：辽宁宁城与内蒙古昭乌达盟发现的铜胄（彩图C—3)。云南剑川鳌凤山青铜文化墓地出土的铜臂甲（图C—8）和四川涪陵小田溪、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两件铜胄顶（图C—9)。铜胄的造型较之西周更趋简洁、实用，铜胄顶可能是用来加固皮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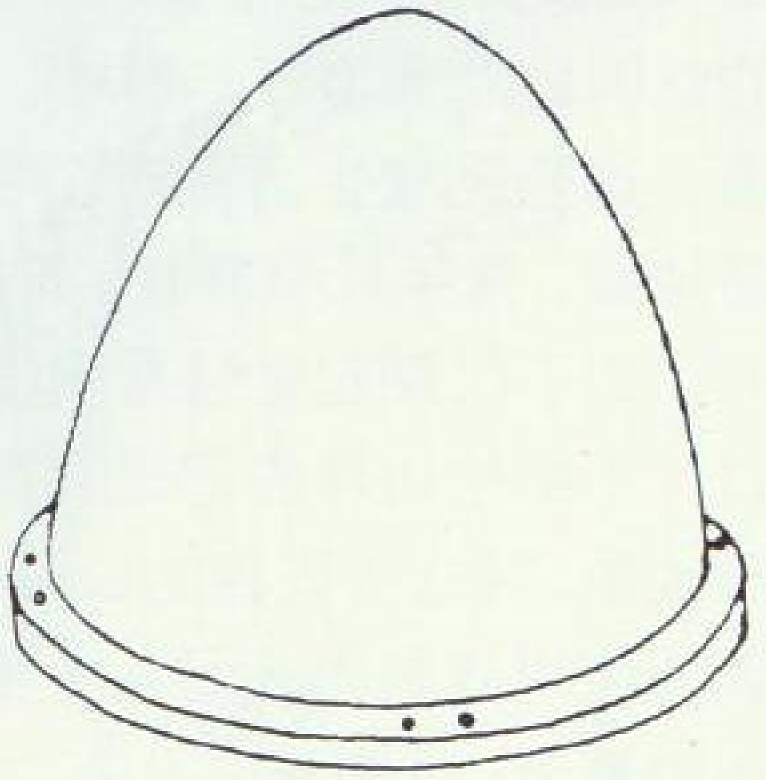
战国后期，出现了铁制铠甲。我国是冶铁技术发达国家，1976年在河北藁城，1977年在北京平谷出土的两件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彩图C—4)，证实了我国从商代起就开始使用铁器。不过当时使用的还只是陨铁，陨铁来自太空落下的陨星，而不是人工冶炼的铁。掌握人工冶铁的技术，始于春秋初期，春秋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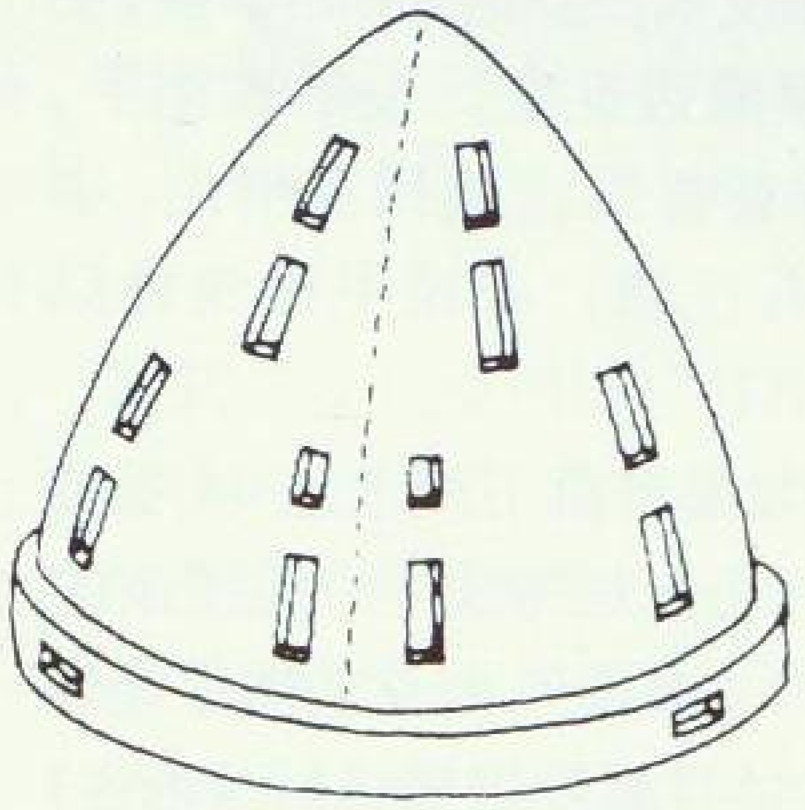
C—2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青铜铠甲部件 左上：臂甲；左下：胫甲；右上：颈甲；右下：背甲（据照片绘制）。

C—3 辽宁宁城出土战国铜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67，外文出版社197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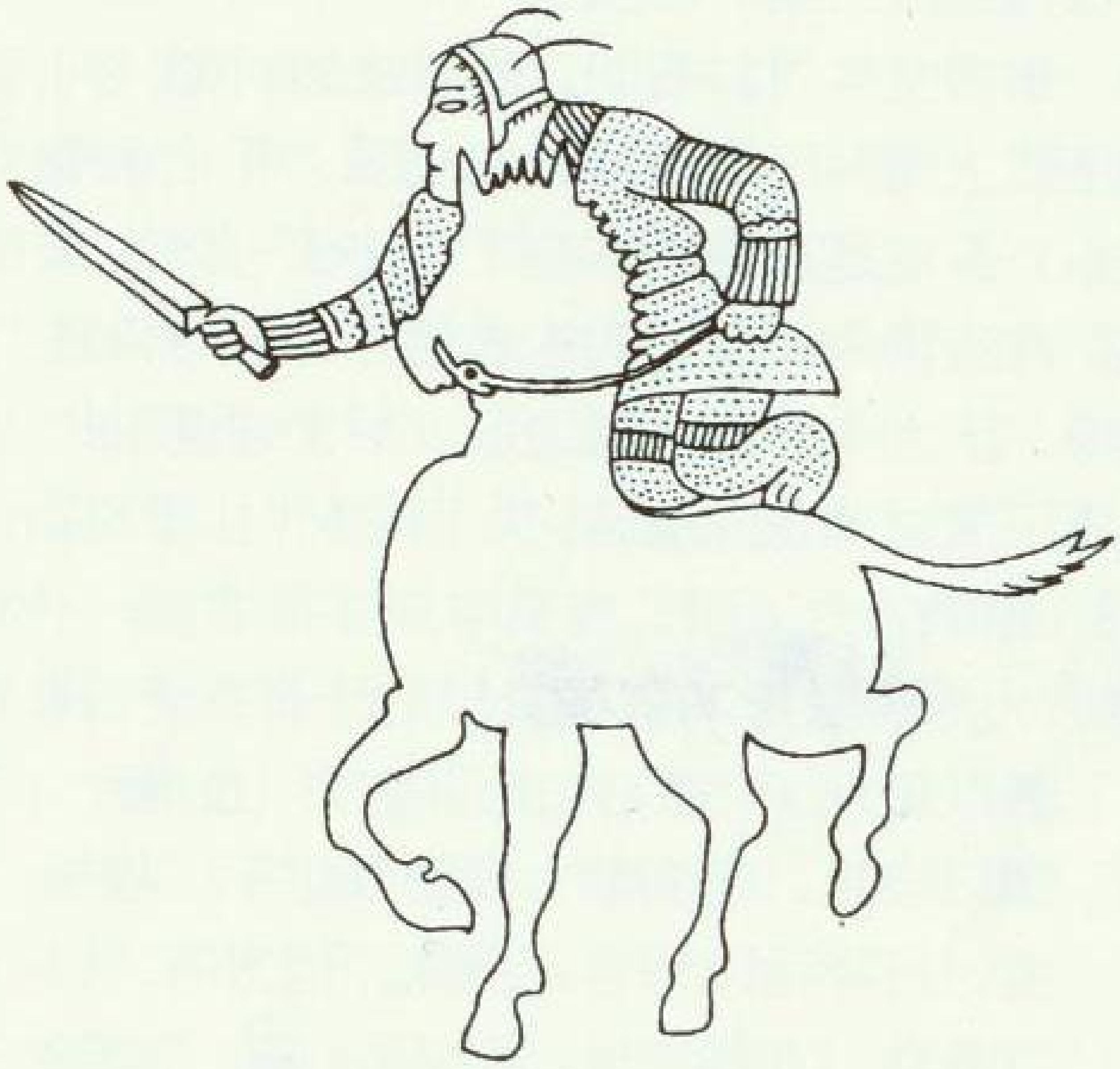
图C—8 云南剑川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铜臂甲，录自《考古》1986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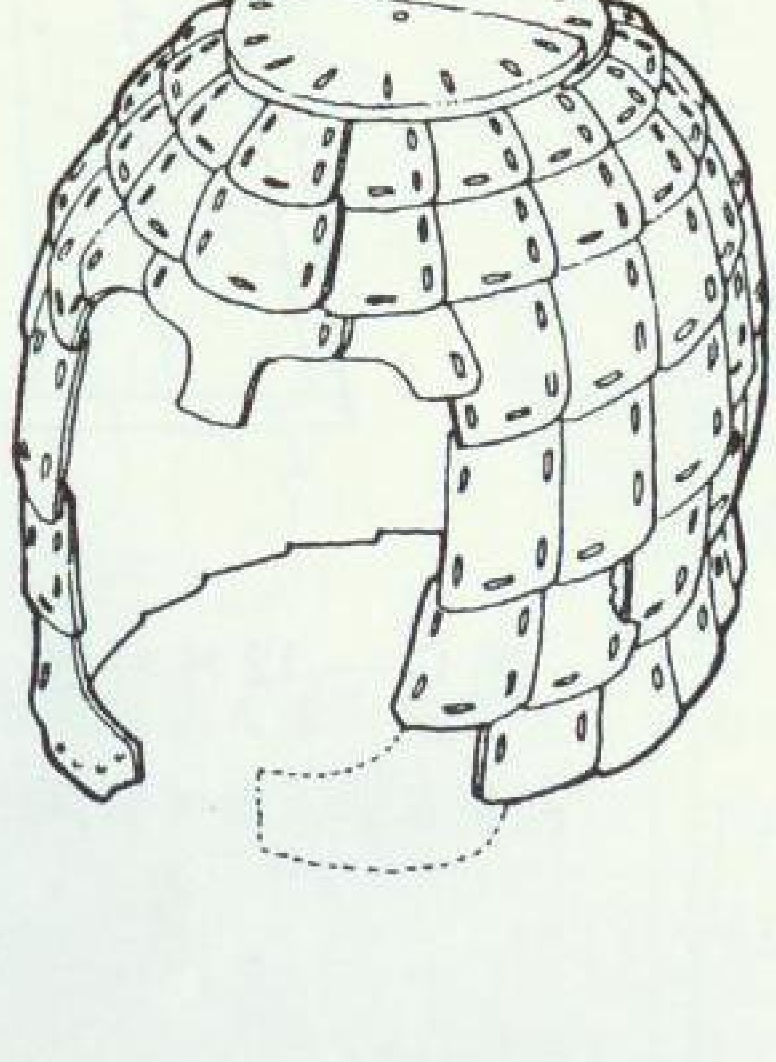


图C—9涪陵小田溪(左)、成都百花潭中学(右)出土的铜胄顶，四川省博物馆藏。

C—4河北藁城出土商代铁刃铜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图C—11传为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背面的线刻武士像



图C—10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战国铁兜鍪复原图

又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这项技术的掌握，使用铁铸造兵器铠甲成为现实。关于铁铠甲，《吕氏春秋·贵卒》曾提到：“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衣铁甲操铁杖以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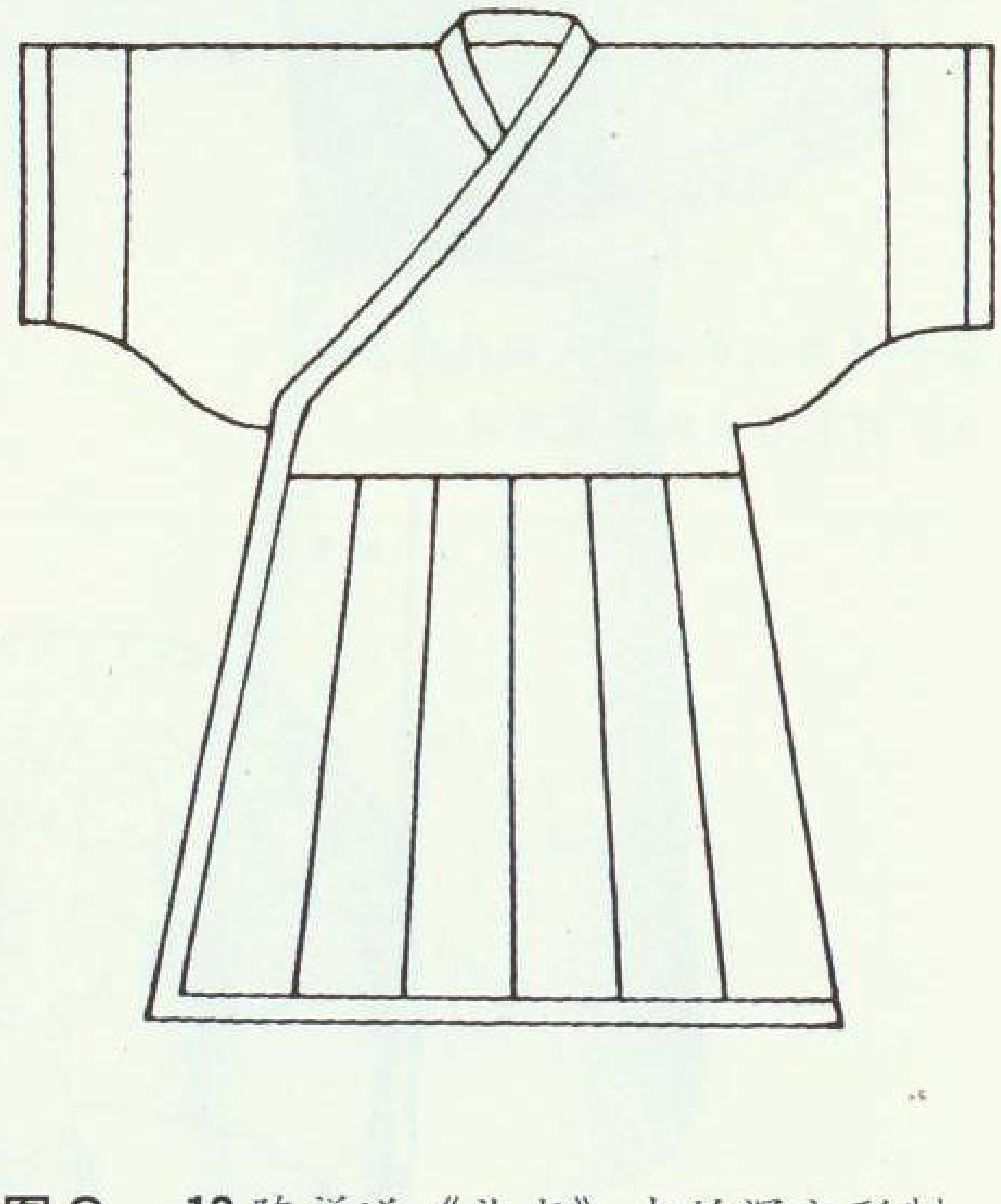
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中，发现了一件由八十九片铁甲片编缀成的铁兜鍪（图C—10，详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从而证实了战国时期铁铠甲的存在。这件铁兜鍪的形制，与传为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的武士像所戴的胄，极为相似。（图C—11，参见成东、锺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83页）。

很多文字资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可能还要上溯到西周后期）的戎服，开始采用深衣。深衣是一种上衣与下裳连成一体的衣服。有些像今天女士的连衣裙。开始时只是诸侯，士大夫平时闲居之服，后来逐渐取代上衣下裳成为正式服装。关于深衣《礼记·深衣》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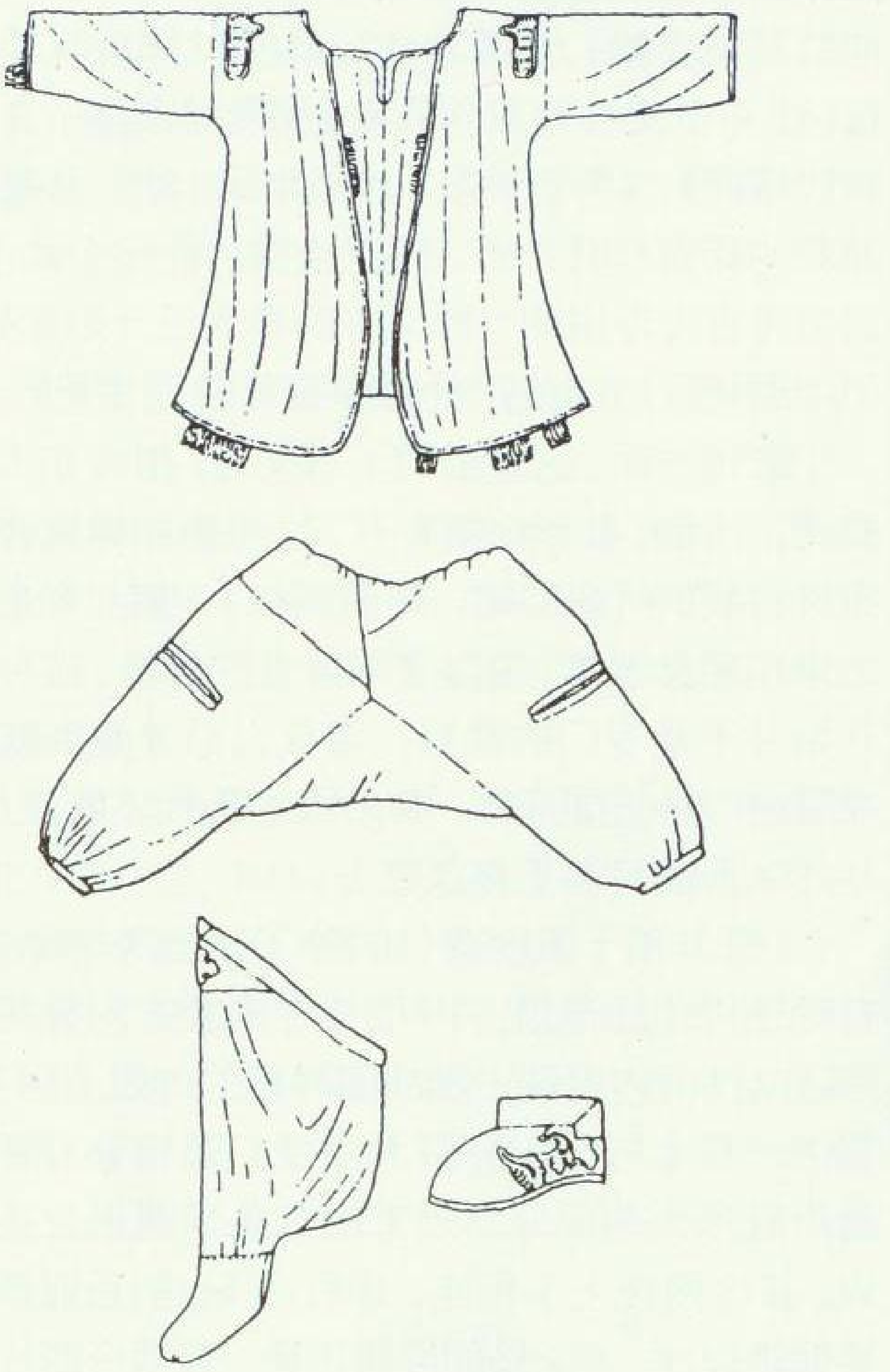
> 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

一件衣服具备了如此众多的含义和优点，难怪要登堂入室，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久的服装了。深衣的形制，陈祥道在《礼书》中绘有裁剪图（图C—12）。此图为我们提供了深衣的基本形制，从“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礼记·深衣》）的记载来看，可以肯定这时它的长度起码要达到脚踝。

战国末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服事件。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地处北方，与林胡、楼烦等少数民族接壤。这些民族生活在崇山峻岭和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常年从事放牧、狩猎，娴于骑射。远从商代武丁时期起就经常南侵，抢掠财物，俘虏人口，不断给边境的居民和国家的安全带来苦难和威胁。对这些民族的征讨一直持续不断，但都因为使用战车作战而不能获得全胜，“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欲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日知录》卷二十九《骑》）。要征服这些民族，只有改变作战方法，变车战为骑战，发展骑兵部队。关于骑兵，《史记》等文史资料表明，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不少诸侯国已经开始创建骑兵，如秦国就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史记·张仪列传》）。但骑兵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当时还没有马鞍具，骑马就有一定的难度，而要在马上作战射箭，难度更高。其二，就是还没有合适的服装。传统的深衣戎服显然不便骑



图C—12 陈祥道《礼书》中的深衣形制



图C—13 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实物 上：衣 中：裤 下左：袜 下右：靴 录自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考古》1987年第6期。

图C—14 左：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银人像，现已流入日本。右：山西长治韩墓出土战国铜像山西省博物馆藏。

马，但要一下子改变千百年的传统习俗也并不容易，于是变服便成了一件有关增强国力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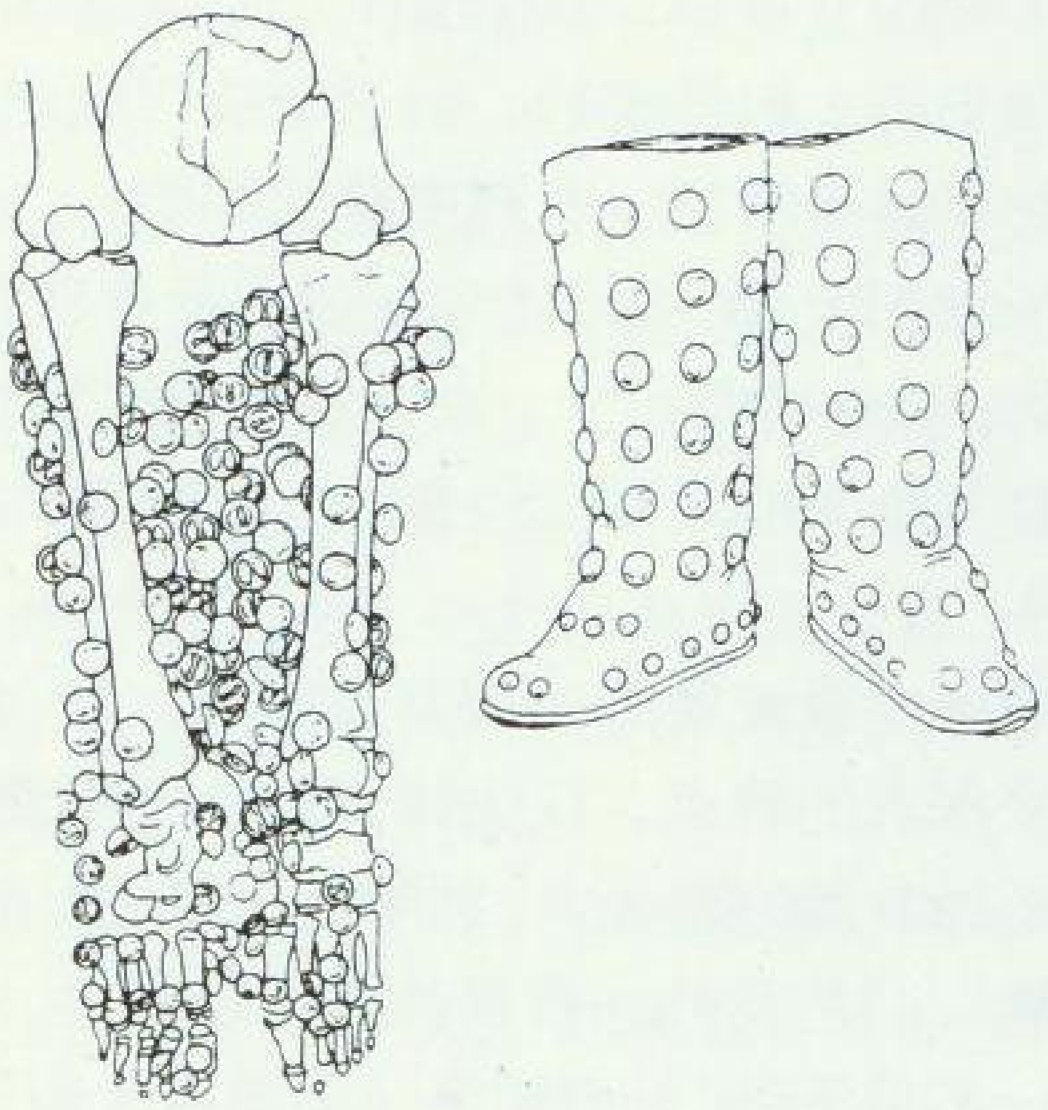
赵武灵王几经周折，在取得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支持后，力排众议，"于是遂服胡服矣"（《史记·赵世家》），自己带头以国君的身份穿起了紧身窄袖、长裤皮靴的胡服。

所谓胡服，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中曾有衣、袴、靴、袜的实物出土，衣是小袖直襟短袍，袴的形制与今天的运动裤较接近，靴为短靿(图C—13)。

变服中最重要的一项其实在裤。上衣仍保持原来深衣的特点，仅去掉下裳十二幅使其变短，长如今天的短大衣。而裤，"古之亵衣，亦有襦裤"，"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虽有襦裤，不见于外"（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引王国维语）。虽然裤在华夏服饰中早就存在，但一直是作为内衣，不能穿在外面的。因为当时的裤都是开裆裤，不能起遮羞的作用，所以裤外一定要系裳或穿深衣。把深衣改短后，裤就直接穿在外面了，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大的变革，当然这时的裤已变成"穷袴"，即满裆了。

变服后的服饰又称"裤褶服"，其形象从下面两件文物上可以看到：一件是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银人像，原来认为表现胡人，现在经过考证，确认为华夏族人（详见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一文）、(图C—14)。他身上穿的就是经过变服后的裤褶服，像上手臂有臂褠，足胫有行缠，很像是表现侍从武士的形象。另一件是山西长治出土的铜人，这件铜人无裤。两件人像的上衣都是"续衽钩边"，完全符合《礼记·深衣》中所说的特点。

变服中还有一项是去履、舄而服靴，"中国的衣服，大体上可谓自行进化的，其仿制外国的，只有靴"（吕思勉《中国通史》）。《释名·释衣服》也说："靴跨也（毕源曰：《说文》无靴字，新附有之，云鞮属），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1974年在沈阳郑家洼子战国时代墓内，发现在人的胫、足骨上排列有大小铜泡180枚，出土时泡下骨上有黑色有机



图C—15 左：沈阳郑家洼子战国墓内皮靴泡饰出土情形 右：泡饰皮靴复原图

C—5 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匈奴金冠饰。

腐殖物附着，据分析死者葬时穿着一双钉满铜泡的长统皮靴。(图C—15，详见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从墓中随葬的兵器马具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个武士。这个考古发现说明当时北方的军人已开始穿靴，但中原地区广泛使用靴要到魏晋以后才开始。

冠饰方面，这时出现了惠文冠，相传亦为赵武灵王所创。其形如帽有双耳，用细如蝉翼的丝织材料制成（惠即蟪，蝉类昆虫），额前有金铛之饰和貂皮暖额，用以表明尊贵的身份。这种冠开始并不是专门的武冠，秦汉以后才逐渐成为戎服的一种重要冠饰，并为以后历代不断使用。其具体形制可参见秦汉部分。

冠上用于表明身份的除了貂铛等饰品外，有时还用动物造型。1972年在内蒙古阿鲁柴登附近的沙窝内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匈奴金银器，其中一件金冠饰十分引人注目。冠饰分冠带和鹰形冠顶饰两部分，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条组成，正面两条上下相连，背后一条。前后冠带连接处饰以虎、羊、马的浮雕图像。冠顶分四片组合成半球形，上面镌刻狼咬羊的浮雕图案，冠顶傲立着一只展翅雄鹰，鹰的头、颈部镶嵌两块绿松石，整个造型栩栩如生，金碧辉煌，真是难得的珍品。(彩图C—5，详见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这件冠饰无疑是身份较高的匈奴贵族用品，而且很可能是个军事长官，因为猛禽猛兽历来是古代武士的一种象征，隋唐以后又常以其为绣纹绣在衣服上来区分武官品级。

腰带是服饰的重要配件，与裤一样，在华夏服饰中也早就存在，如帝王冕服中就有大带、革带一项。不过西周之前的腰带都是用帛或在皮革外包裹帛制成，系束也用帛带为之。以后发明了带勾，便开始用带勾勾连，不仅“所以拘带，且以捍矢”（朱剑心《金石学》），即系挂装矢的矢箙(箭筒)，用途很多。近年对大量的实物进行研究后发现，带勾实际上有三大类：一类为衣襟勾，常被装在衣服的衣襟处，用以系结衣襟；一类为佩挂勾，用于佩挂武器、饰品等；另一类就

是腰带勾。制作带勾的材料有青铜、玉、黄金等各种材料，形制则“坐客满堂，视钩各异”（同上），造型玲珑剔透，非常精美（图C—16）。目前发现的带勾实物，年代最早的是春秋时期；在此之前是否已有带勾，目前尚不能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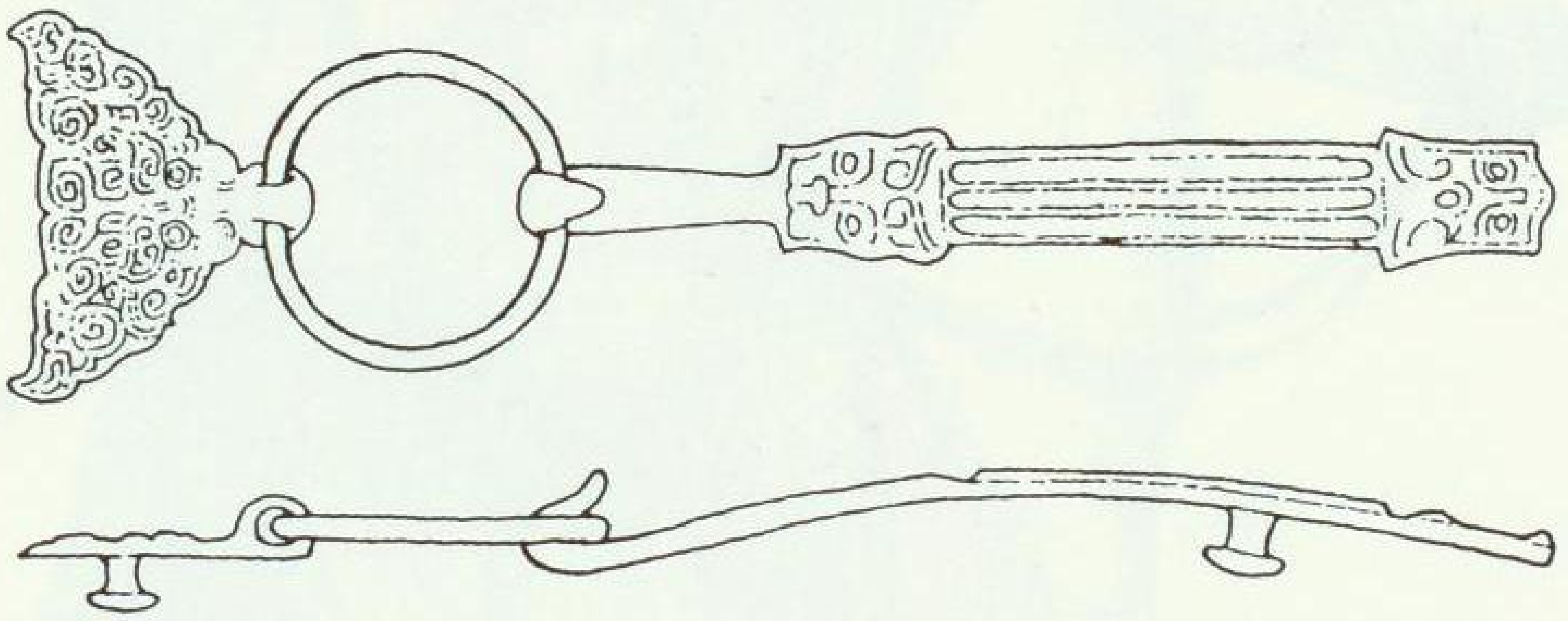
战国以后，又开始用带扣束带、带扣比之带勾，束带更利索，且不易松脱。但刚开始时带扣的扣舌是死的，不能转动，这种死舌带扣的束带，据王仁湘先生研究可有两种方法。（图C—17，详见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

带勾与带扣的起源，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北来”之说，即是从北方胡服中引进的，对它们的称呼如犀比、师比、胥纰等，都与“鲜卑”一词的音很相近。但近年来的研究以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特别是带扣）的起源是从马具开始的，最早用来系辔（马笼头），以后才逐渐用来束带。而且，北方民族使用带勾、带扣束衣的时间也要比中原地区早，因为迟至西汉，中原广大地区依然广泛使用带勾勾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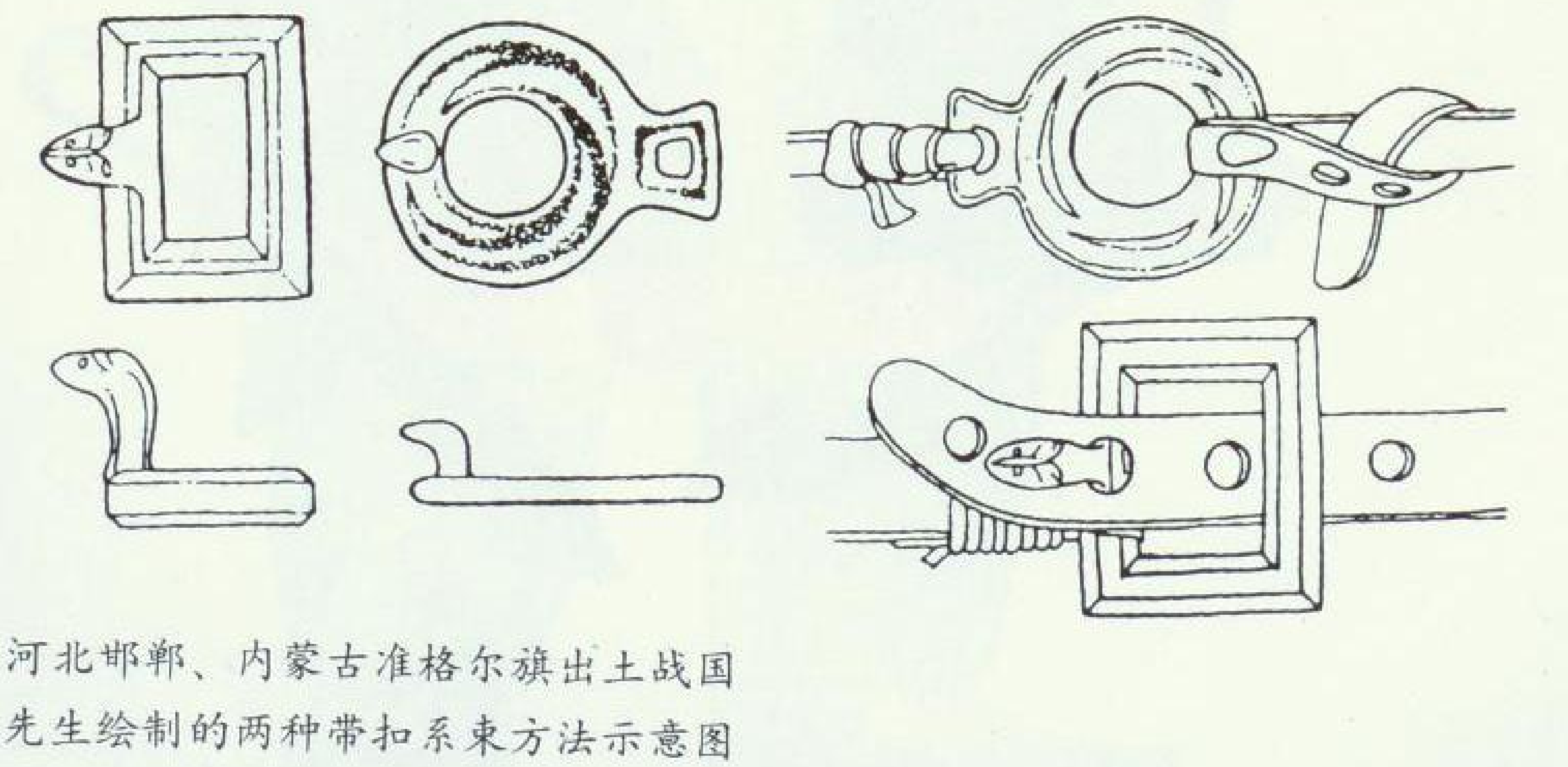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表面上仍尊周王为天子，但实际上都各自独立，阳奉阴违，周天子的权力日趋衰微，自然也不能管束各诸侯国的胡作非为。因此春秋战国的戎服色彩比较混乱，几乎各诸侯国都自有所好，如赵国的王宫卫士都服黑衣，而《吴越春秋》卷五说：

> 夫差临晋与定公争长，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中校之军，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如荼；……左军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矢)，望之若火；右军皆玄裳玄舆，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

真可谓丰富多彩，而晋郤至则是“韎韦之跗注”（一种戎服），因此这一时期的戎服色彩不存在统一的主色。



图C—16 战国带勾



图C—17 左：河北邯郸、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战国带扣 右：王仁湘先生绘制的两种带扣系束方法示意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复原图

袍服参照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银人像（织物绣纹根据湖南江陵楚墓出土实物）；冠根据文字记载，参照汉代出土实物设计；靴根据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实物复原；兵器根据湖南长沙、湖北随县出土实物复原；马具根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实物复原、设计。

秦代将军服饰复原图

根据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出土将军俑复原，服饰颜色根据《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彩绘》一文（秦俑坑 考古队王学理，《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D—1 军吏俑，披一型铠甲。

秦代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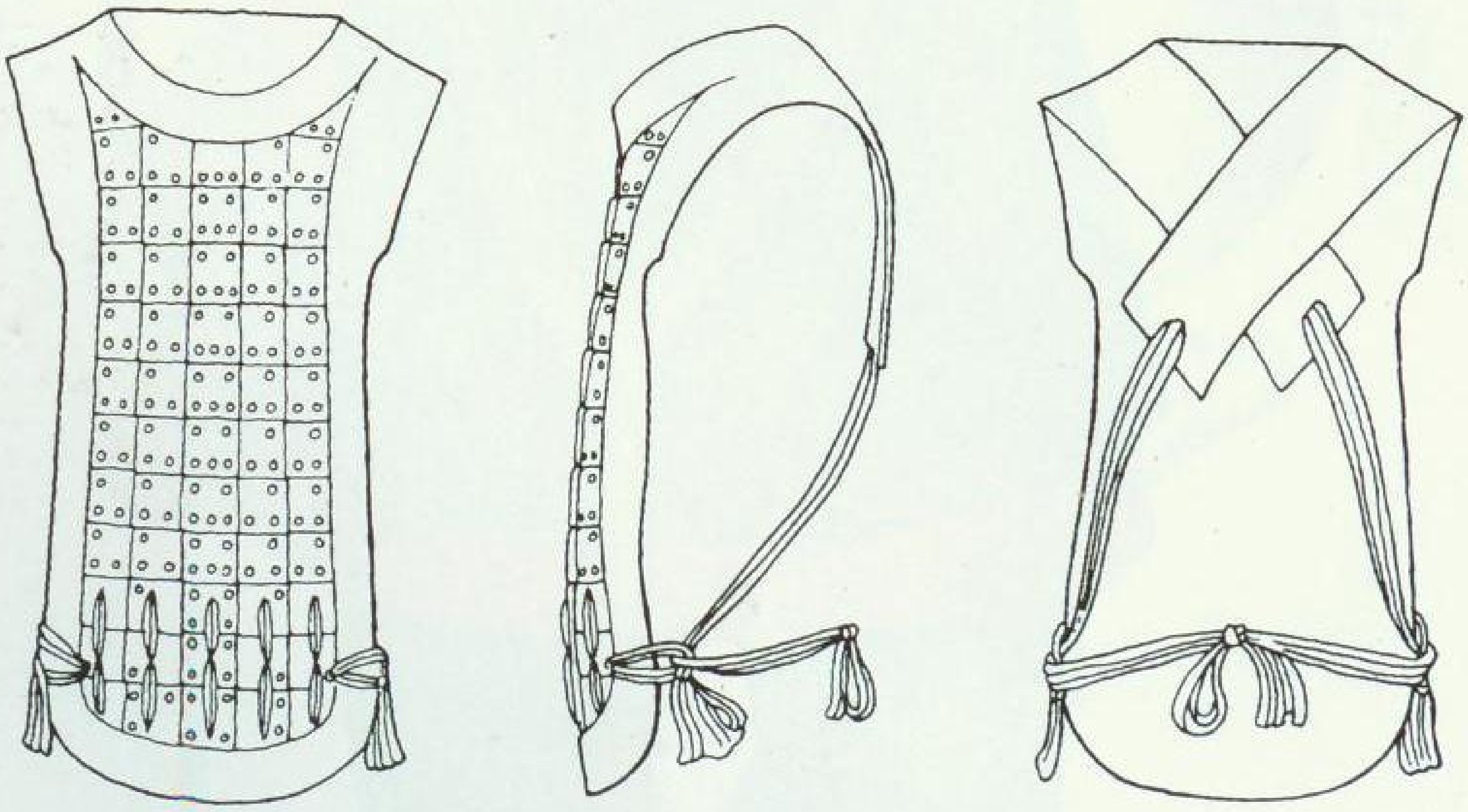
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军事强国。

秦代的军戎服饰是至今资料最全面、最准确、最详细的朝代，这要归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从目前在陕西临潼一、二、三号坑内发掘出土的陶俑陶马来看，这些兵马俑的雕塑手法极为写实，不仅人物的神态表情栩栩如生，而且服饰、鞍辔配件等每个细节都很逼真、准确，从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已出土的兵俑分为将军俑、军吏俑、骑士俑、射手俑、步兵俑和驭手俑几类，他们的铠甲、服饰装束表现出森严的等级制度。（详见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1 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2 期）。

铠甲按形制可分为四型六种。第一型仅能护胸腹，与普渡村出土的西周铜甲很接近，应是较原始的铠甲（图D—1、彩图D—1）。这类铠甲在整个俑群中所占的数量很少。

第二型铠甲可分为两种：一种前身下缘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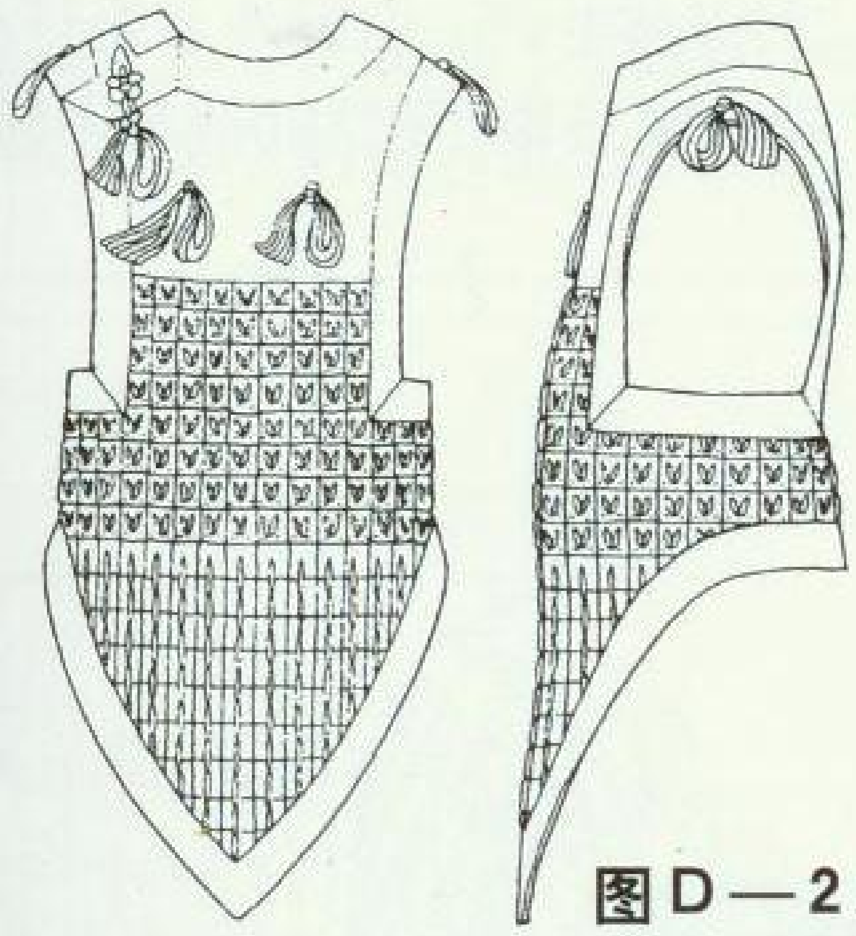


图D—1 一型铠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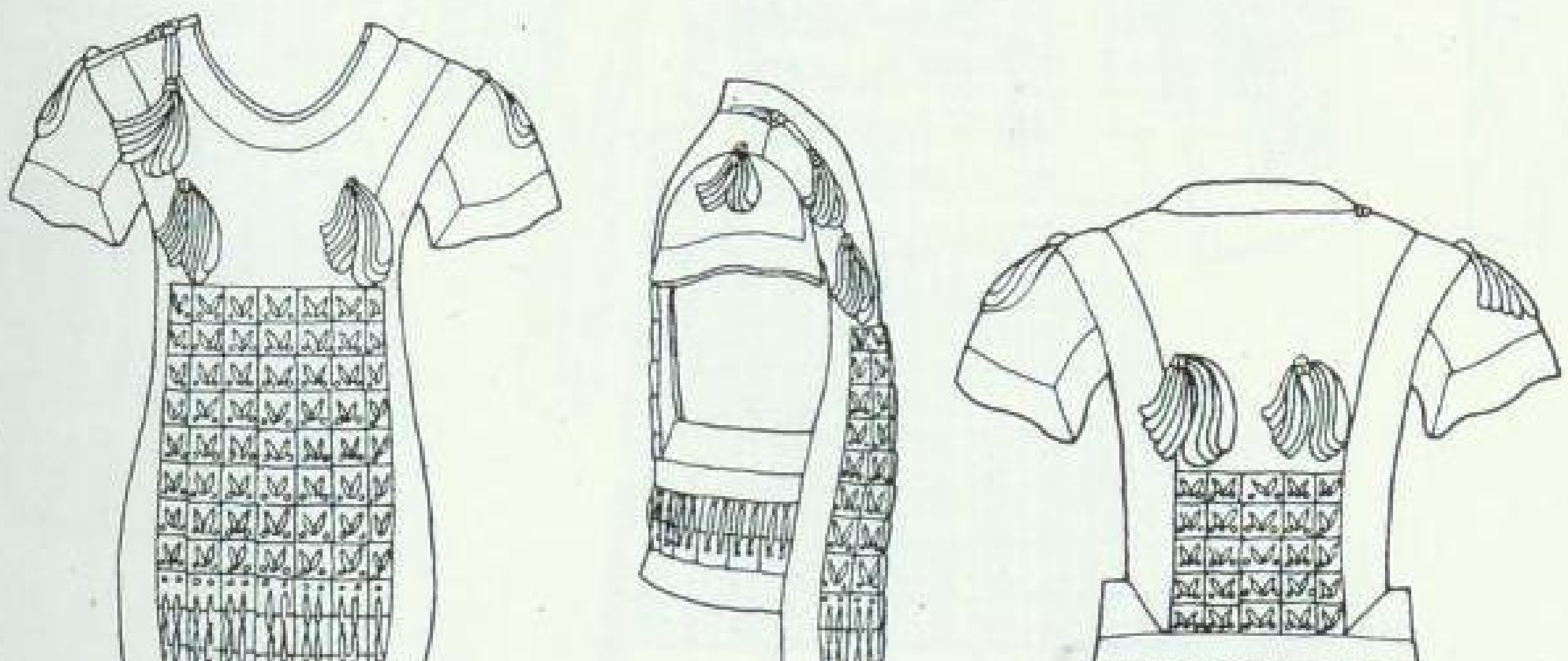
角形，长度至小腹下，有的有整片皮革做成的披膊，有的没有。铠甲的甲片比一、三型显得小而薄，很可能是模拟铁甲片；甲片的表面、铠甲的胸前、两肩和后背，都有彩带做装饰。穿这种铠甲的都是将军俑，因此二型铠A种铠甲可能是秦代最优良的铠甲（图D—2；彩图D—2、3）。另一种前身下缘平直，长及胯下，披膊也是用甲片编缀而成。这种铠甲的甲片比A种略显得大些，但可能也是模拟铁甲片，铠甲上没有彩带装饰。穿这种铠甲的人的身份当比将军俑低，比步兵俑、骑兵俑要高（图D—3；彩图D—4）。第二型铠甲的胸前、后背都无甲片，但从穿戴者身份都较高的情况来分析，不可能在要害部位没有防护，因此很可能上身是整片的护胸护背甲片，这样解释似乎比较合乎逻辑。

第三型铠甲数量最多。骑兵俑和步兵俑都穿这一型铠甲，骑兵的比步兵要短一些，有的有披膊，有的则没有（图D—4；彩图D—5）。这

D—2 将军俑，披二型A种铠甲，有披膊。



图D—2 二型A种铠甲，无披膊。



图D—2 二型A种铠甲， 有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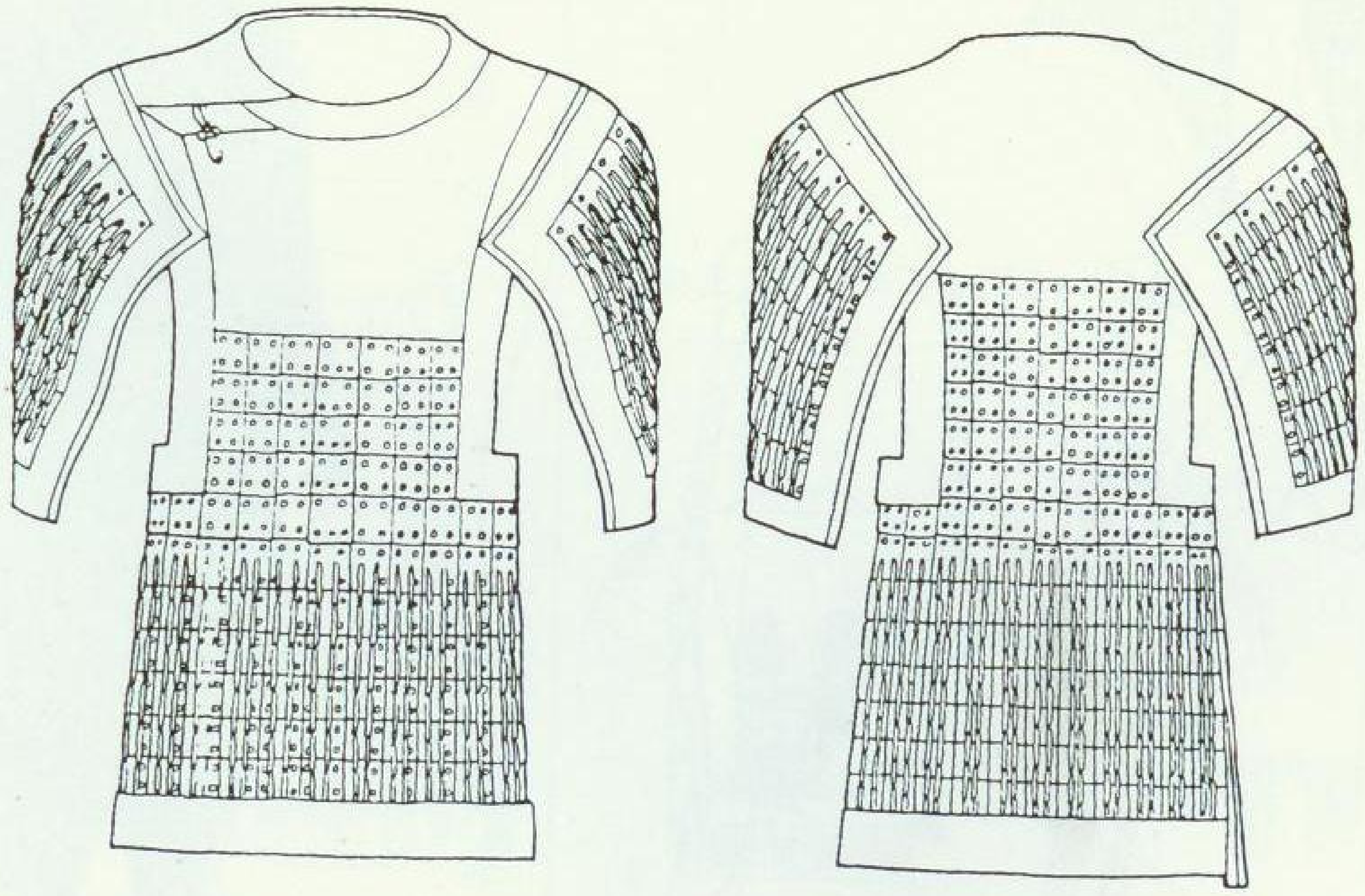
D—3 将军俑，披二型A种铠甲，无披膊。

D—4 军吏俑，披二型B种铠甲。

一型铠甲的甲片都比较大，而且厚，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是模拟皮甲，从随同出土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器这一点来看，这个推测应是正确的。铁铠甲的数量在当时毕竟还是很有限的。

第四型是驭手专用甲，甲身形制与第三型B种差不多，但甲片更小，甲身也要长得多，有高高竖起的盆领和长及手背的甲袖，甲袖的构造和随县战国的皮甲很相似（图D—5）。而且无论是铁甲还是皮甲，都在右侧肩、腋下开襟，也与战国时期的完全相同。这四型铠甲中，凡是铠甲，四周边缘都有包边，而皮甲都没有。

秦始皇陵区除了兵马俑之外，还出土有近似实物的石制甲胄，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对秦始皇陵园内众多的陪葬坑进行试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甲片，经过仔细的清理、辩认，共出土甲衣87领，胄43顶，马甲1副。甲衣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只有身甲，没有披膊，与兵马俑的三型A种皮甲相类似。第二种有披膊，与兵马俑的三型B种皮甲相近。第三种的形制与第二种基本相同，但甲片显得更小，制作更精细，甲身也要长些，甲裙的前后中部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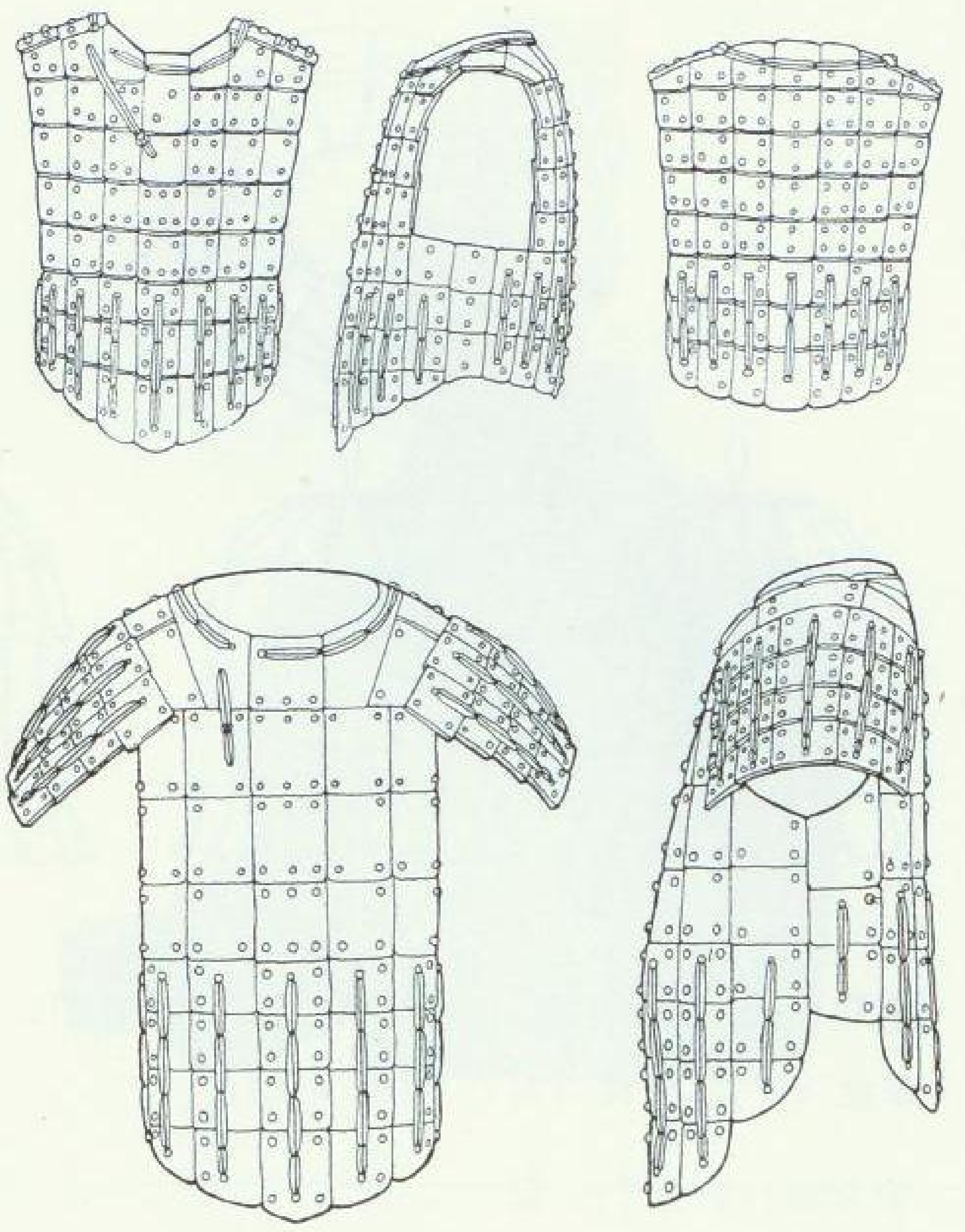


图D—3 二型B种铠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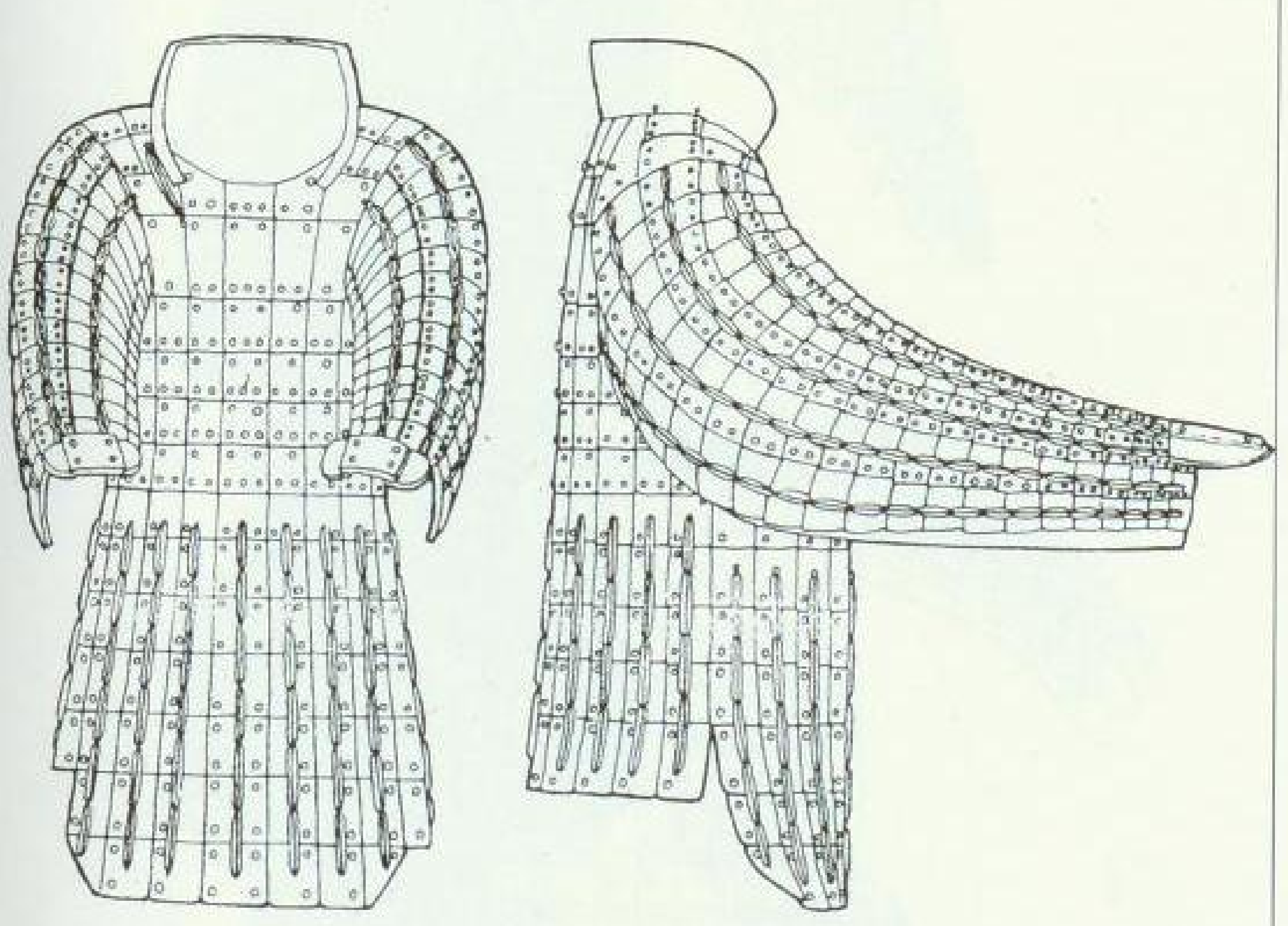
出成尖角。这一种甲衣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其中的几领已经修复（图D—6）。第四种甲衣最为精美，可惜残损较重，不能复原。这种甲的甲身很长，甲裙正面的尖角很突出，甲片很薄而小，很多甲片的下面两角磨成圆形，编缀起来后甲衣呈鱼鳞状，它的形制很可能与将军俑的甲相类似。据专家分析，四种甲衣中前三种都是仿制皮甲，只有第四种是仿制铁甲，而且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鱼鳞甲的实物仿制品（图D—7）。

胄的形制全都相同，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外形和制作方法与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铁兜鍪完全相同，因此可以基本肯定这种石胄是仿制铁制品，它们在实际使用时，应是有皮革或织物内衬的，所以在沿口部位也有包边（图D—8，详见《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秦代的戎服，上自将军下至士卒形制全都相同，一律上穿深衣，下穿小口裤，士卒腿上裹有行缠，足穿靴或履（彩图D—6）。深衣的形制与洛阳金村的银人像完全一致，从厚厚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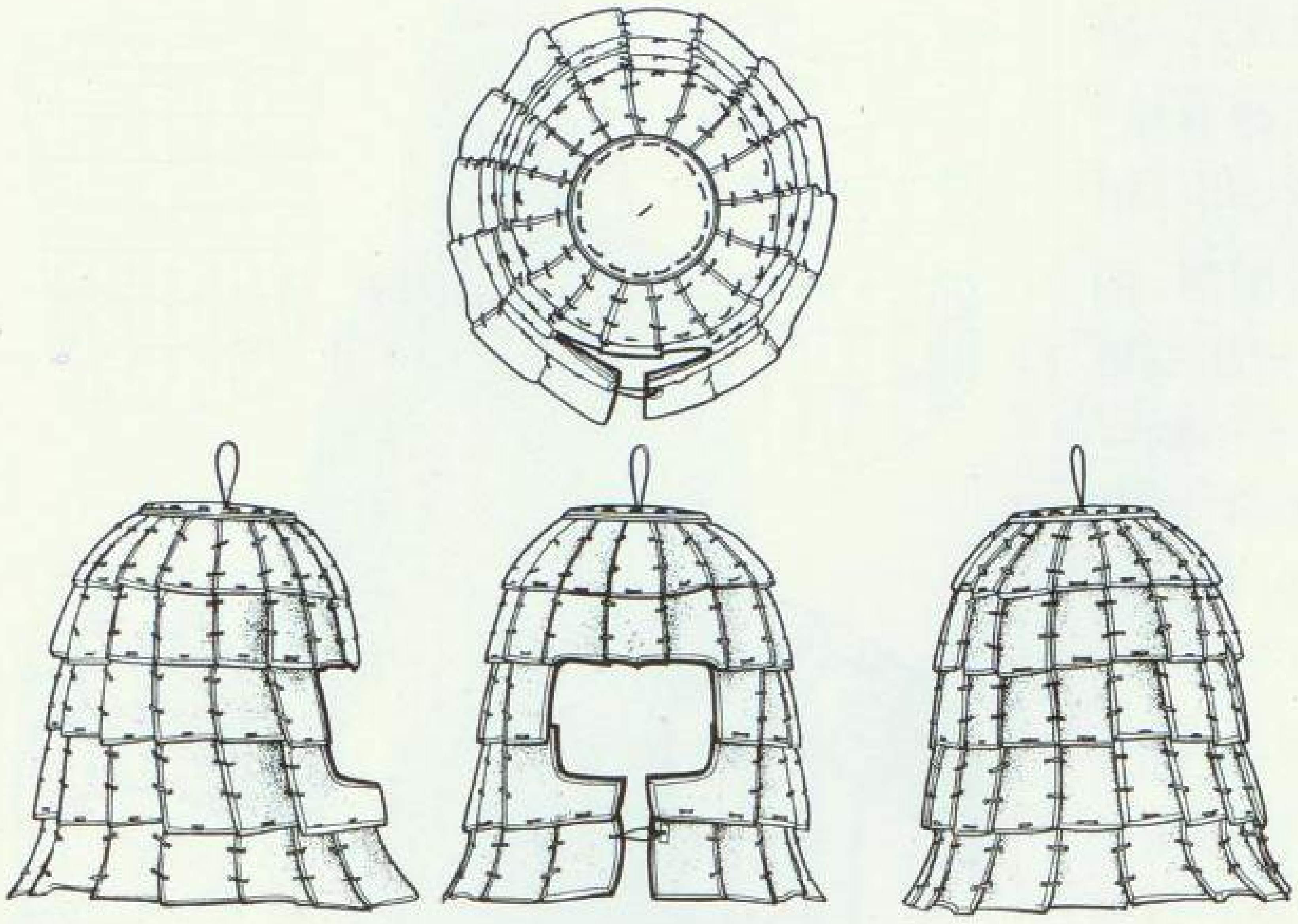


图D—4 上：三型A种皮甲，骑兵用，无披膊。下：三型B种皮甲，步兵、射手用，有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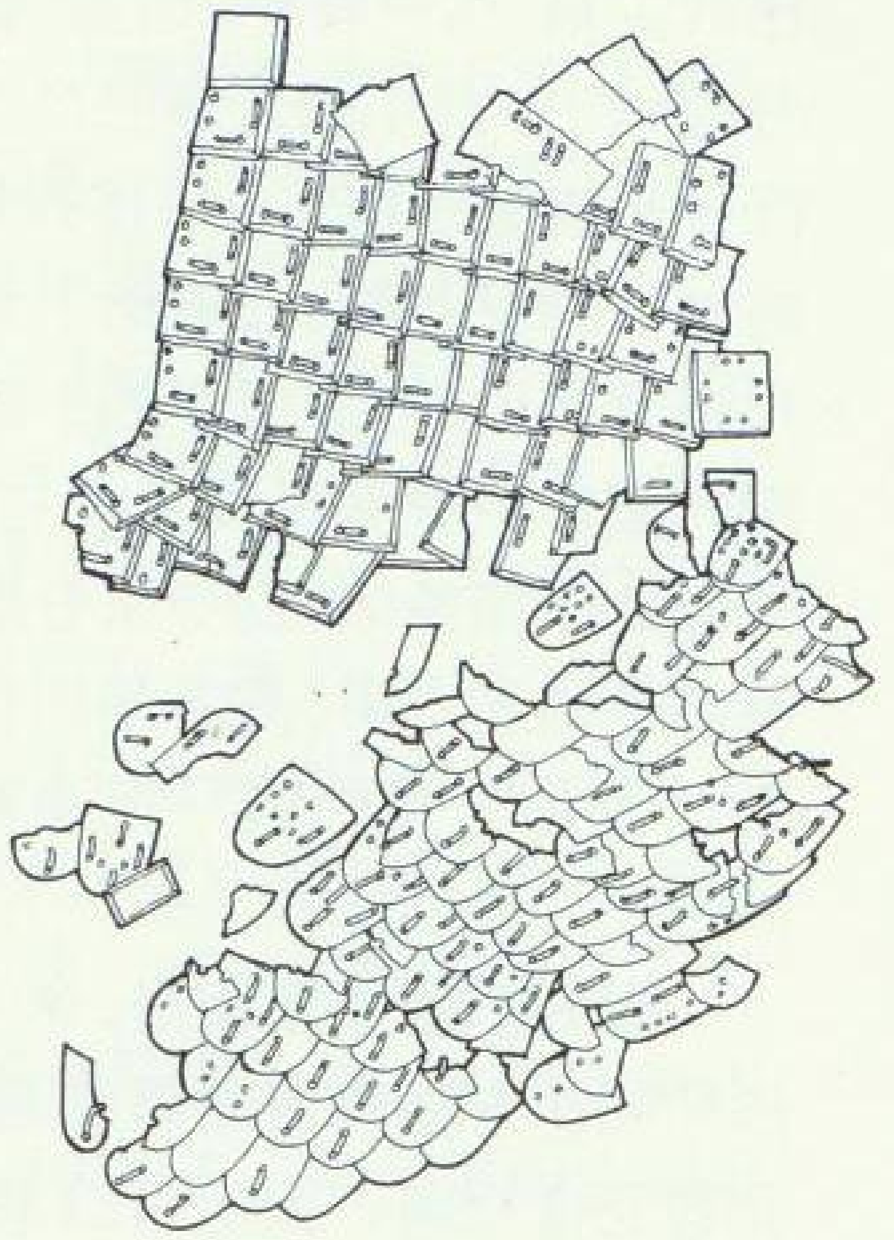


图D—5 四型皮甲，驭手专用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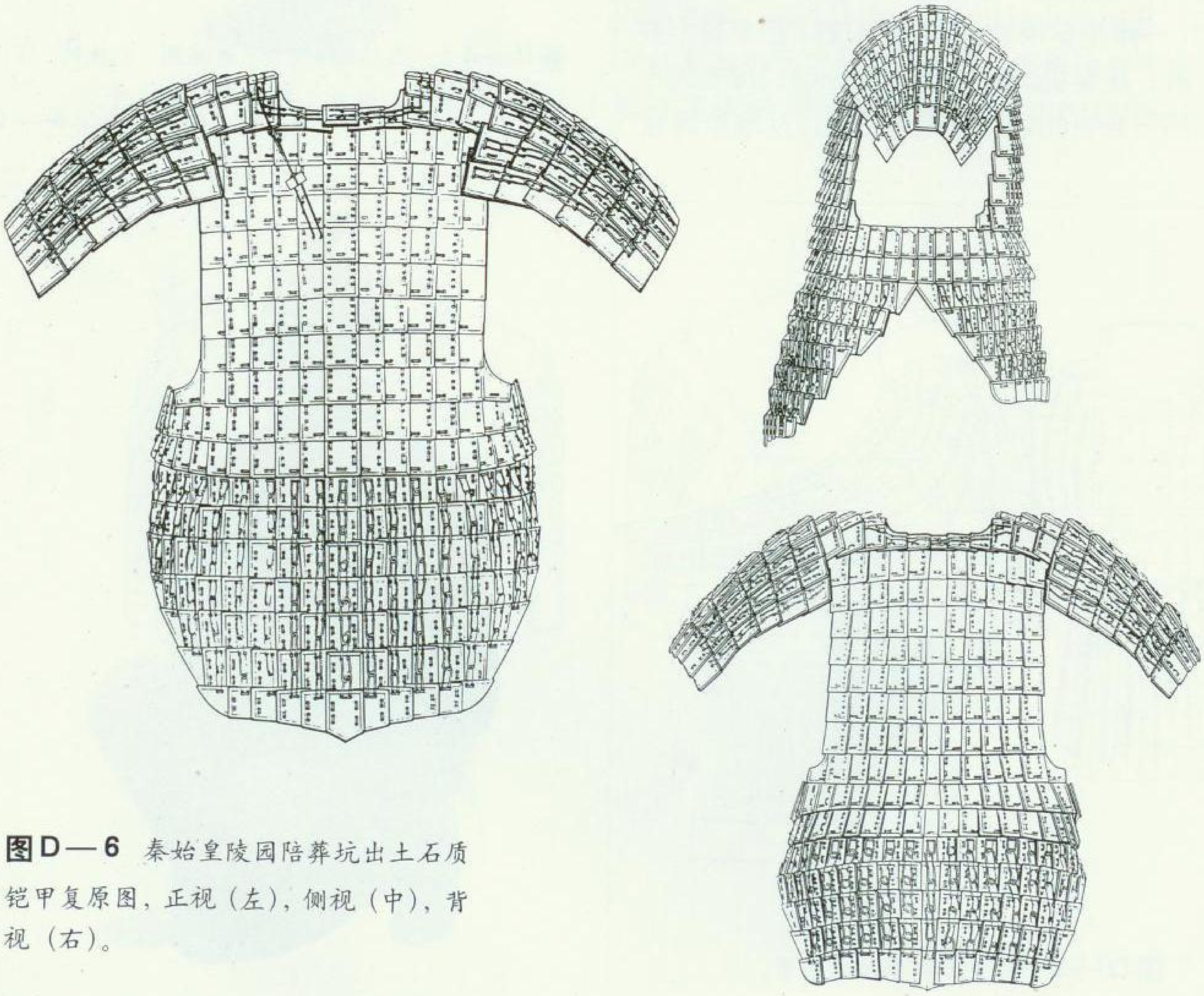
D—5 射手俑，披三型B种铠甲，有披膊。



图D—8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石质胄复图，侧视（左）、正视（中）、背视（右）、顶视（上）。



图D—7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的石质，有鱼鳞形甲片的铠甲残件。



图D—6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石质铠甲复原图，正视（左），侧视（中），背视（右）。

D—7 戴帻的骑兵俑

起的衣领、袖口和袍服折褶都很圆润的形象来看，穿的似乎都是有絮夹袍，这种夹袍很有可能是絮衣。絮衣之名见于《汉书·晁错传》，明代时有一种绵甲，面、里间塞以经过加工的棉絮，做成甲衣后能抵御流矢。絮衣是否与绵甲同属软甲，现在尚无文字可考。

值得指出的是，在全部兵俑中穿袍而无铠甲的占有三分之二。历史上秦皇朝的军队素负盛名，如果大部分战士身上没有防护装备，似乎与秦朝军队的强大很不相称。但是把袍服理解为絮衣并解释为一种软甲，那么相对来说就比较合理了。而如果解释成棉衣的话，就会与大部分俑都只戴帻或发髻妆束的现象发生矛盾，身上防寒，头部也应保暖，至少将军应戴有兼防护保暖两种功效的胄。

兵俑的首饰大致分为四类。一类为帻，有两种：一种为骑兵俑、军吏俑头上所戴，似用皮革制成，罩于发髻，用带系接于颔下，与頍有某些相同之处（彩图D—7）。另一种为将军俑头上所戴，发掘简报把它称作鹖冠，其实也应称作帻。鹖冠的特点，《晋书·舆服志》说得很明白："鹖冠加双鹖尾，竖插两边……"但仔细观察将军俑冠的形象，好像根本没有用于插鹖尾的装置，其外形质感主要表现的却是比较厚的织物折成的头饰（图D—9）。这与《后汉书·舆服志》有关"昔者有冠无帻，……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和《隋书·礼仪志》有关"帻，案董巴云：'起于秦人，施于武将，初为绛袙，以表贵贱焉'"的记载相一致，所以这种冠饰不能称作鹖冠而应称为帻。

第二类是冠，为骑兵所戴（图D—10）。这种冠在俑群中数量很少，它的形象与汉代的武冠（即战国的赵惠文冠）很接近（参见汉代部分），只是体积较小，而且有可以插鹖尾的条件。这种冠与将军俑的相比较，称为鹖冠的可能性更大。

据记载，"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通志略·器服略》）。骑兵在战国时期是很受重视

D—6 穿袍服的将军俑

图 D — 10 戴冠之骑兵俑

的兵种，《六韬》中记载的选拔骑士的要求、标准非常高，一般帝王诸侯的侍从警卫部队都是骑兵，秦始皇也是如此。对亲侍部队的优秀者赐以冠饰作为表彰，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戴这种赐冠的人一般身份又不会很高，否则不能起到蔑视被征服国国君的作用。

第三类从形象上来看，应该称为帽（彩图D—8）。关于帽，《通志略 · 器服略》说：“周成王问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曰：古之人上有帽而勾额。”说明它的名称早就有了。有些图册把这种帽注为帻或介帻，这是欠妥的，帻形如帽要到西汉时期，而且还有个变化过程（参见汉代部分），秦代不可能有形如帽的帻。

第四类是发髻。发髻梳法样式很多，有的可以明显看出在头发中还裹入“偏诸”（织物做成的布带）进行编织（图D—11；彩图D—9）。

靴履也有四种，根据形象定名为：高统靴、方口翘头履、方口齐头履、方口翘尖履。靴和履都用带缚于脚背和足踝（图D—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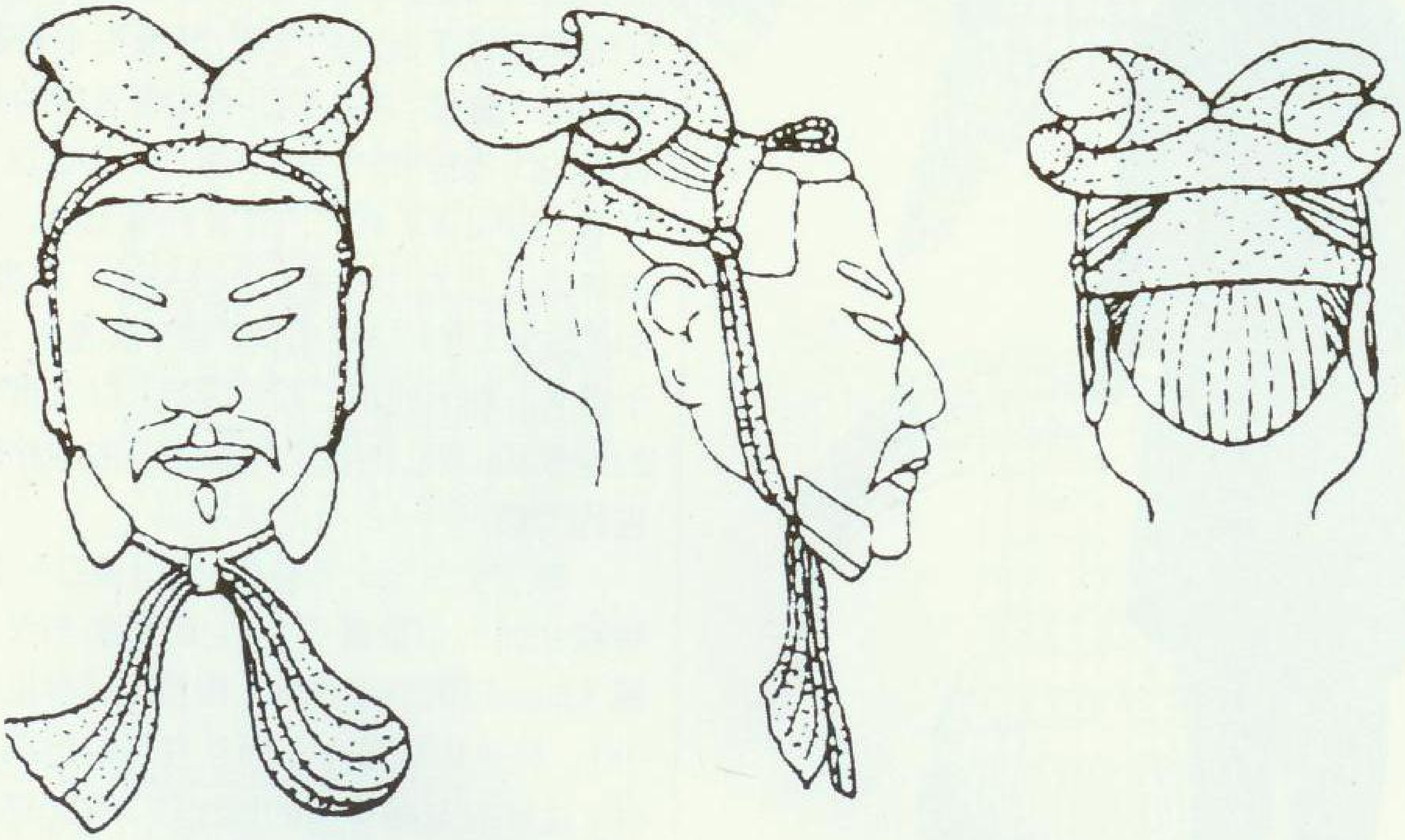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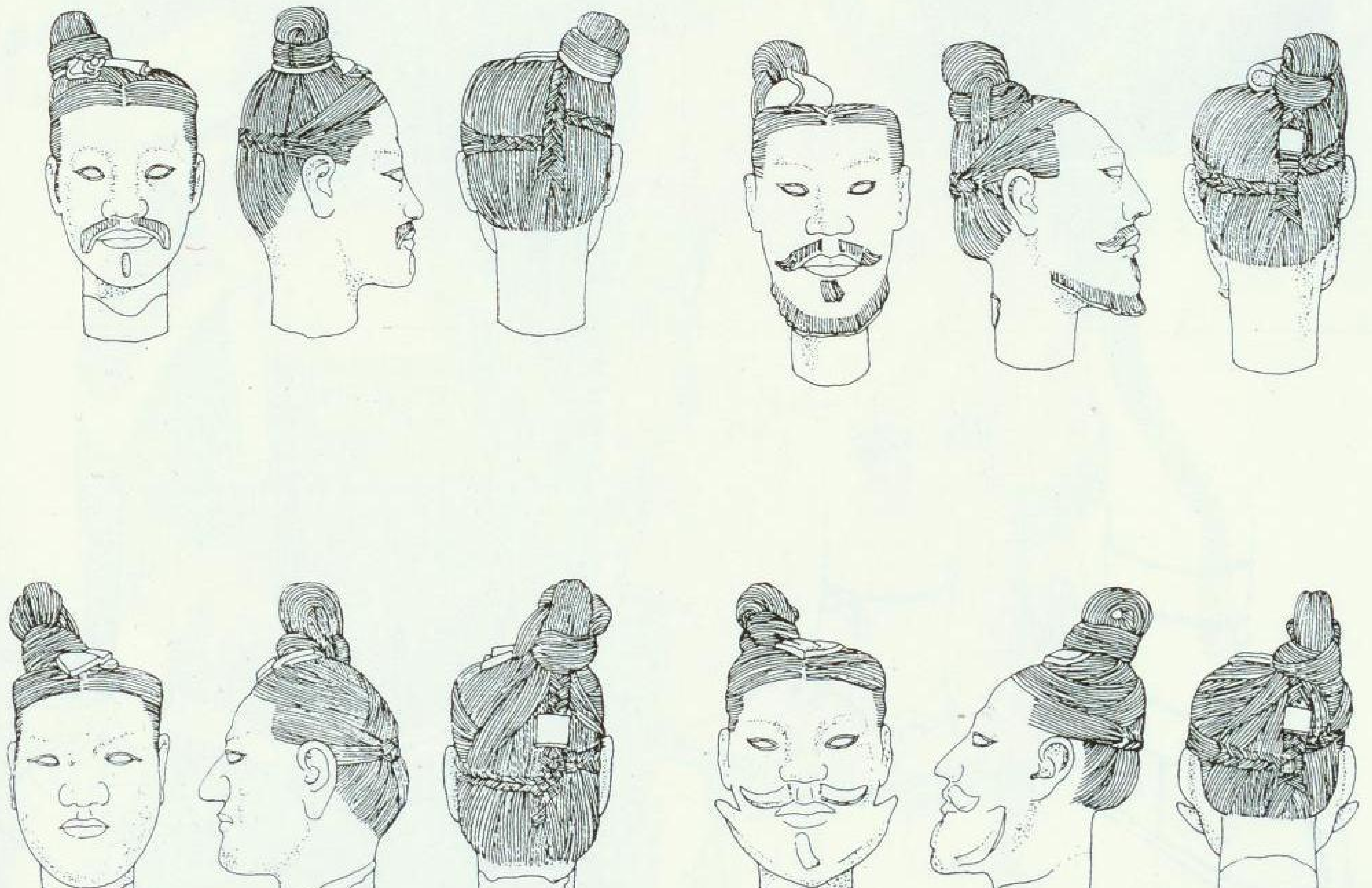


图 D — 9 将军俑帻正、侧、背三视图

D—8 戴帽的步兵俑

从袍服俑上可以看出，戎服外一般都束腰带，腰带用皮革做成，古称带、鞶革。《文献通考·带》曰："革带古之鞶带也，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驺寺皆服之。""秦二世始名腰带"（《孔氏谈苑》卷五），带用带勾系接（参见彩图D—6）。

秦代之前各朝对于服饰和旌旗的尚色，被战国时期兴起的阴阳家所利用。他们根据道教有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把这些尚色与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解释演绎成朝代兴亡的原因。他们认为夏尚青属木德，殷尚白属金德，金克木，所以殷取代了夏；而周尚赤属火德，火克金，因此周灭掉了商；到秦始皇做了皇帝，他十分迷信这一套，觉得自己取代了



图D—11 四种发髻俑的发髻梳法、样式

D—9 发髻妆束的兵卒俑

周，一定属水德，所以“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史记·秦始皇本纪》)。但秦始皇兵马俑所反映出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戎服的实际色彩还是很丰富的。

所有的兵马俑在当初都经彩绘，这从出土时残留、粘附在俑和泥土上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其中袍服主要有紫、粉紫、朱红、粉红、绿、粉绿、蓝、粉蓝、黑等色；铠甲主要是赭色，上面的编缀绳带和包边有白、中黄、橘黄、朱红等色。一型、二型铠甲的领口、胸前和背后的束带还绘有几何花纹图案。靴履则有赭黑、赭色、橘红色几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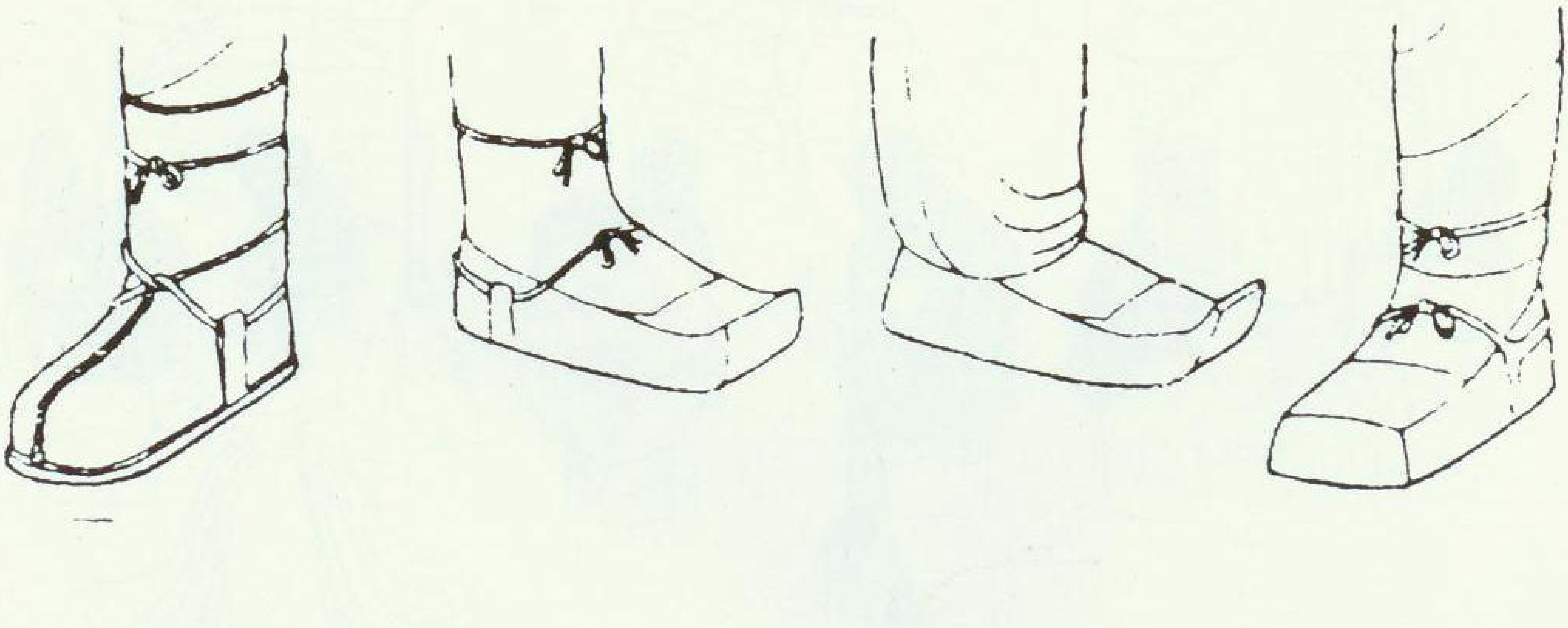


图 D—12 从左至右：高统靴、方口翘头履、方口翘尖履、方口齐头履。

D—10 秦代骑兵、步兵服饰复原图

根据秦始皇兵马俑一、三号坑出土骑兵、士兵俑复原。兵器、马具采用秦俑坑、秦车马俑坑出土实物。

西汉将帅军戎服饰复原图

甲胄根据临淄齐王墓实物复原，戎服根据杨家湾兵马俑、河南偃师杏园东汉墓壁画形象设计，兵器采用河北满城汉刘胜墓、四川成渝、山东巨野出土实物，佩剑方法参考图E—18。

E—1 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汉代铁铠和（据照片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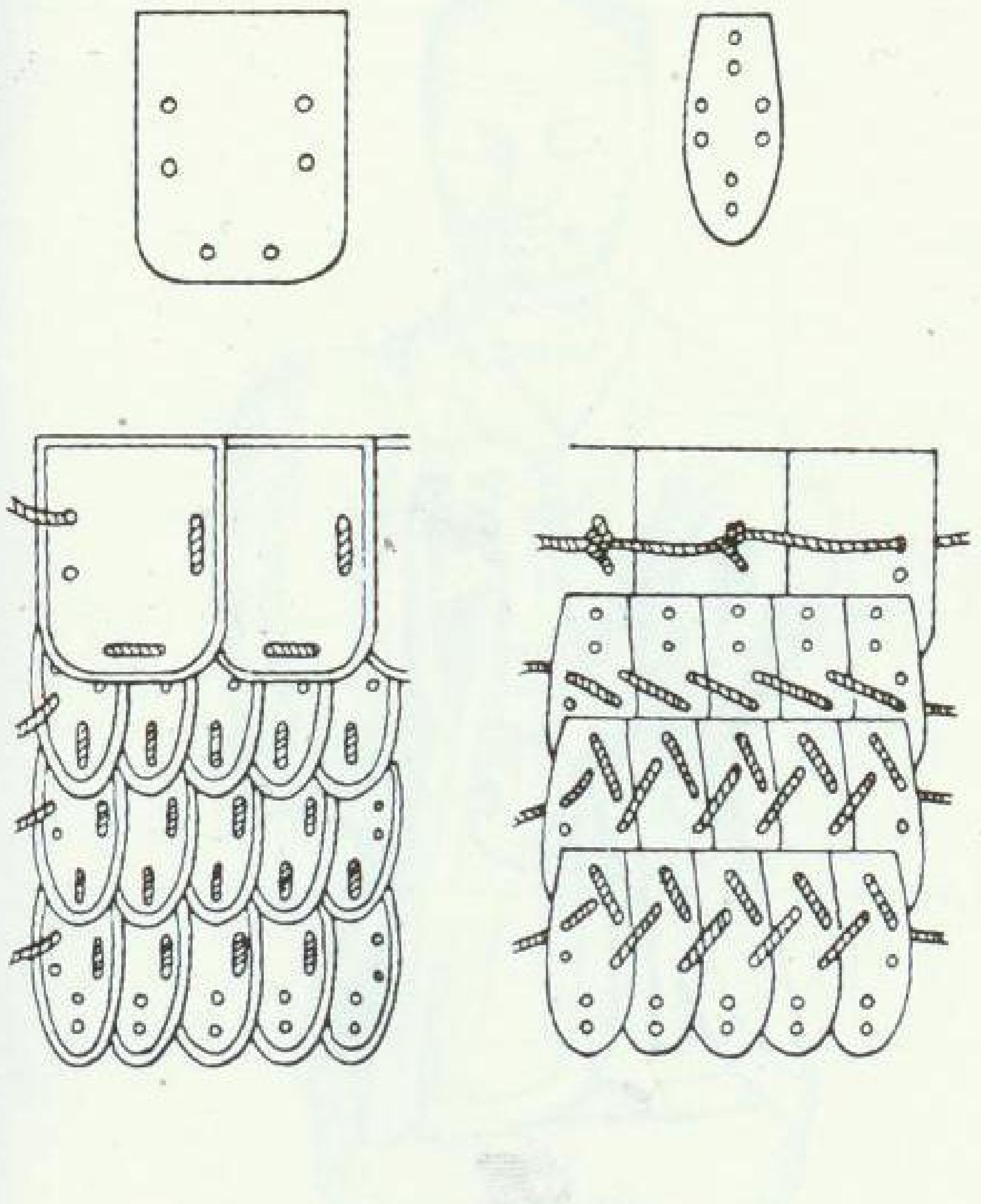


图 E—1 洛阳西郊西汉墓出土铁铠甲
左：正面　　右：背面

汉代

（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

汉代以王莽新政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汉（又称西汉）的军戎服饰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沿袭秦制。由于汉代的丧葬制度把兵器铠甲做为随葬品，所以从被发掘的汉墓中获得了大量出土实物，使汉代成了目前这方面掌握实物资料最多的一个朝代。

铁兵器经过战国后期和秦代的发展，到西汉时已占主要地位，近年来出土的西汉铠甲全都是铁甲，而且都是锻铁制成的。这些出土实物有：

1957年在洛阳西郊3032号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的残铁铠，由于锈蚀严重，仅保存下来328片甲片，在少数甲片上附有绢痕，在一部分甲片上存有编缀用的麻绳痕迹。（图 E—1，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 年第 2 期）

1960 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汉城遗址的清理工作中，从第七发掘区的一座窖穴内出土了一领完整的铁铠，铁铠分身甲、钎和锻铔几部分。身甲由长条形甲片编缀而成，前身上下四排，背后五排，胸前开襟，用铁钩扣连。“钎”（汉代对披膊的称呼）和甲身垂缘用鱼鳞甲片编缀而成，钎上下六排，甲身垂缘上下三排。甲身开领处有用长条形甲片编缀成的“锻铔”（汉代对盆领的称呼），外形与随县出土的皮甲盆领十分相似。甲片的编缀方法是前片压后片，上排压下排，甲身和锻铔固定编缀，不能活动，钎和甲身垂缘是活动编缀，横向固定，上下可以伸缩自如，与秦始皇兵马俑铠甲的编法相同。甲片用麻绳组编，发掘简报中未提到发现有铠甲内衬痕迹的问题，但坚硬的铁甲一定会有内衬，不然不仅会磨坏衣物，而且会擦伤人的肌肤。这领铠甲的年代据考证是汉武帝晚期遗物。（彩图E—1、彩图 E—18；详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考古》1975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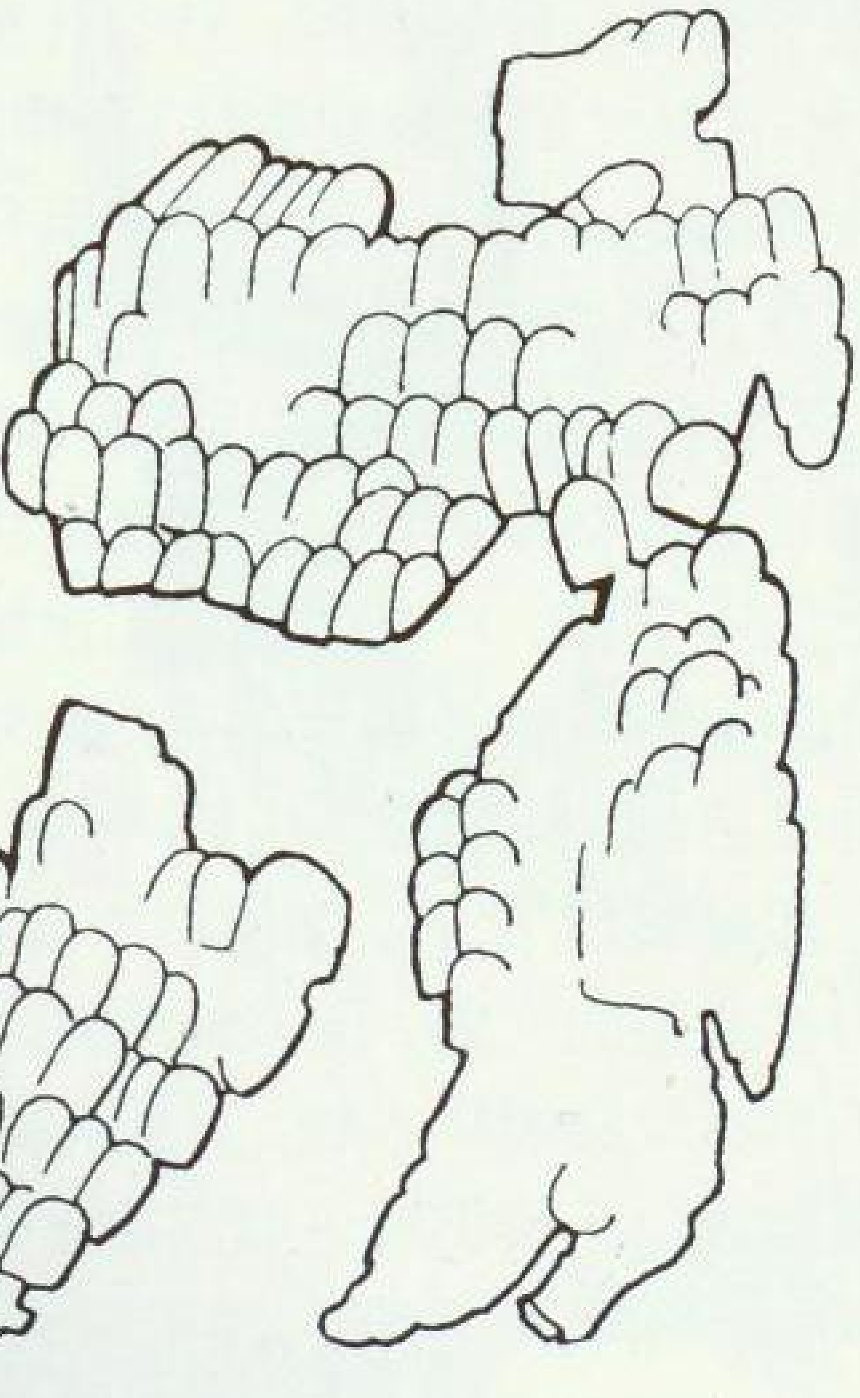
在遗址的第四发掘区，还出土一领残铁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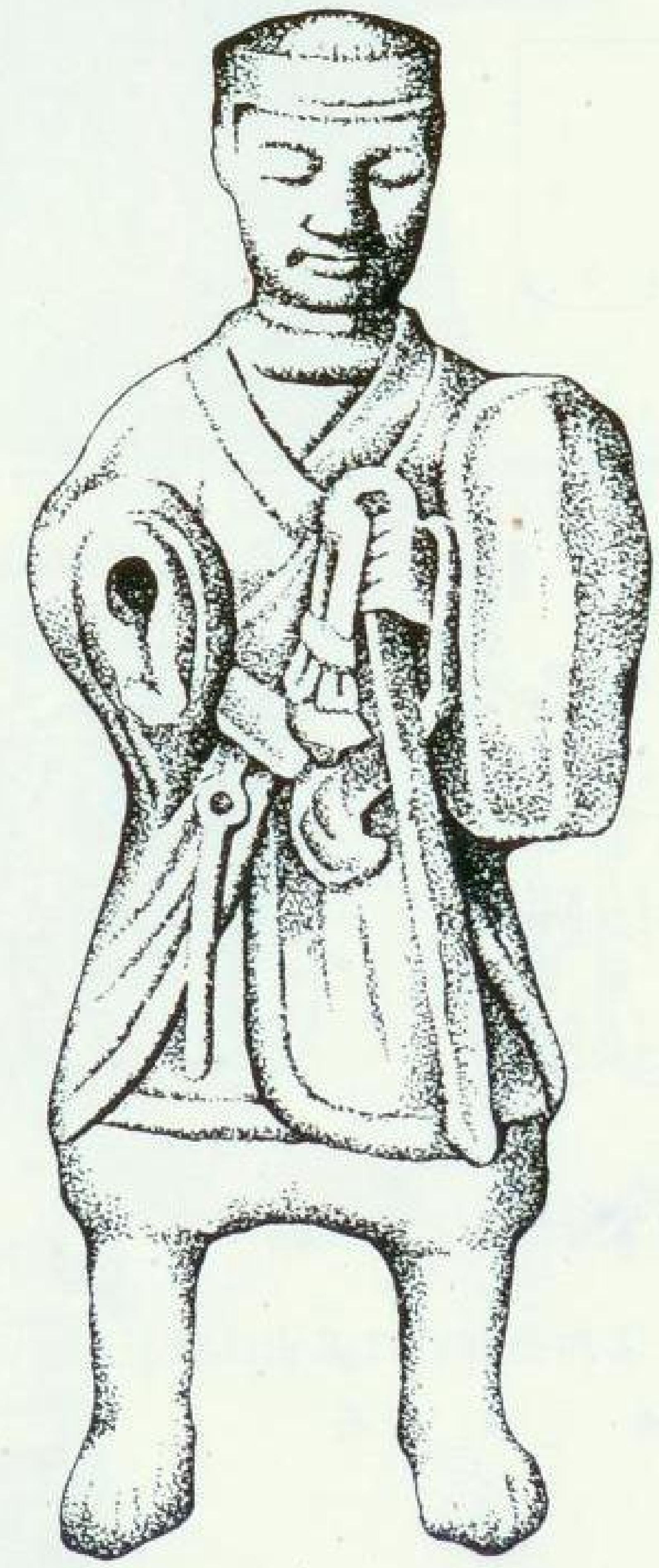
据简报介绍，由于损毁严重，发现时已断裂成不相联属的几个部分，所以无法复原。根据出土时的现场观察，初步推测是用来保护下体的"髀裈"（汉代对腿裙的称呼），与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执刀俑上的形象有相似之处（图E—2）。

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了一领铁铠甲，铠甲用2244片鱼鳞甲片编缀而成，方口领，前胸对开襟，用丝线做绊扣连。甲片用丝绳组编，钎的腋下封口形如短袖，钎与甲身下缘6排甲片为活动编缀，其余均为固定编缀（彩图E—2，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期）。刘胜死于元鼎四年，铠甲当是公元前113年随葬入土的，属于武帝中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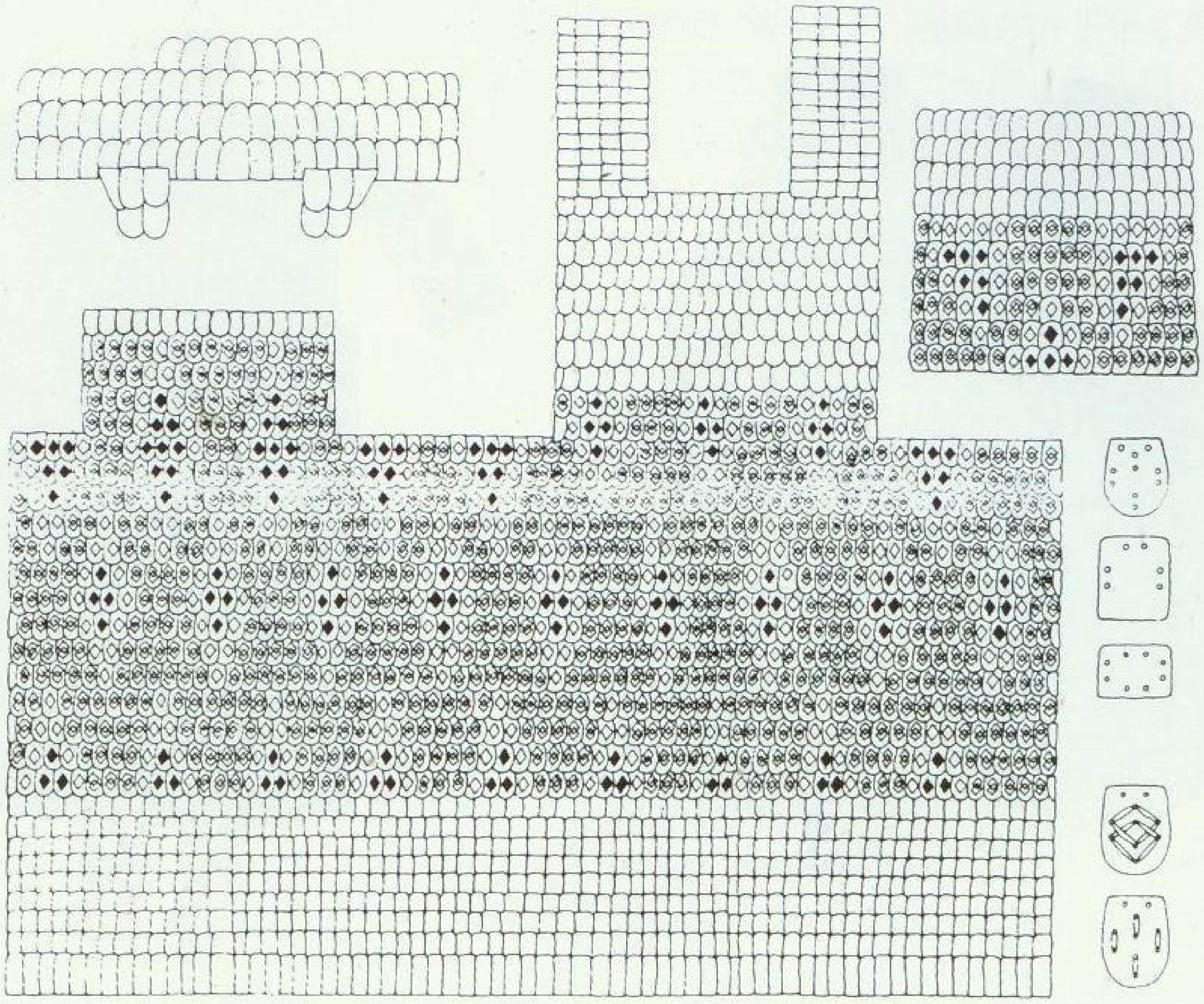
1979年在山东临淄大武村西汉齐王墓五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两领铁铠和一顶铁胄，两领铁铠的形制相同，都有较长的钎，钎和甲身部分为鱼鳞形甲片，垂缘和肩片为方形甲片。方口领，开襟在右肩和侧腋下，用三组丝带系接。

E—2 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铁铠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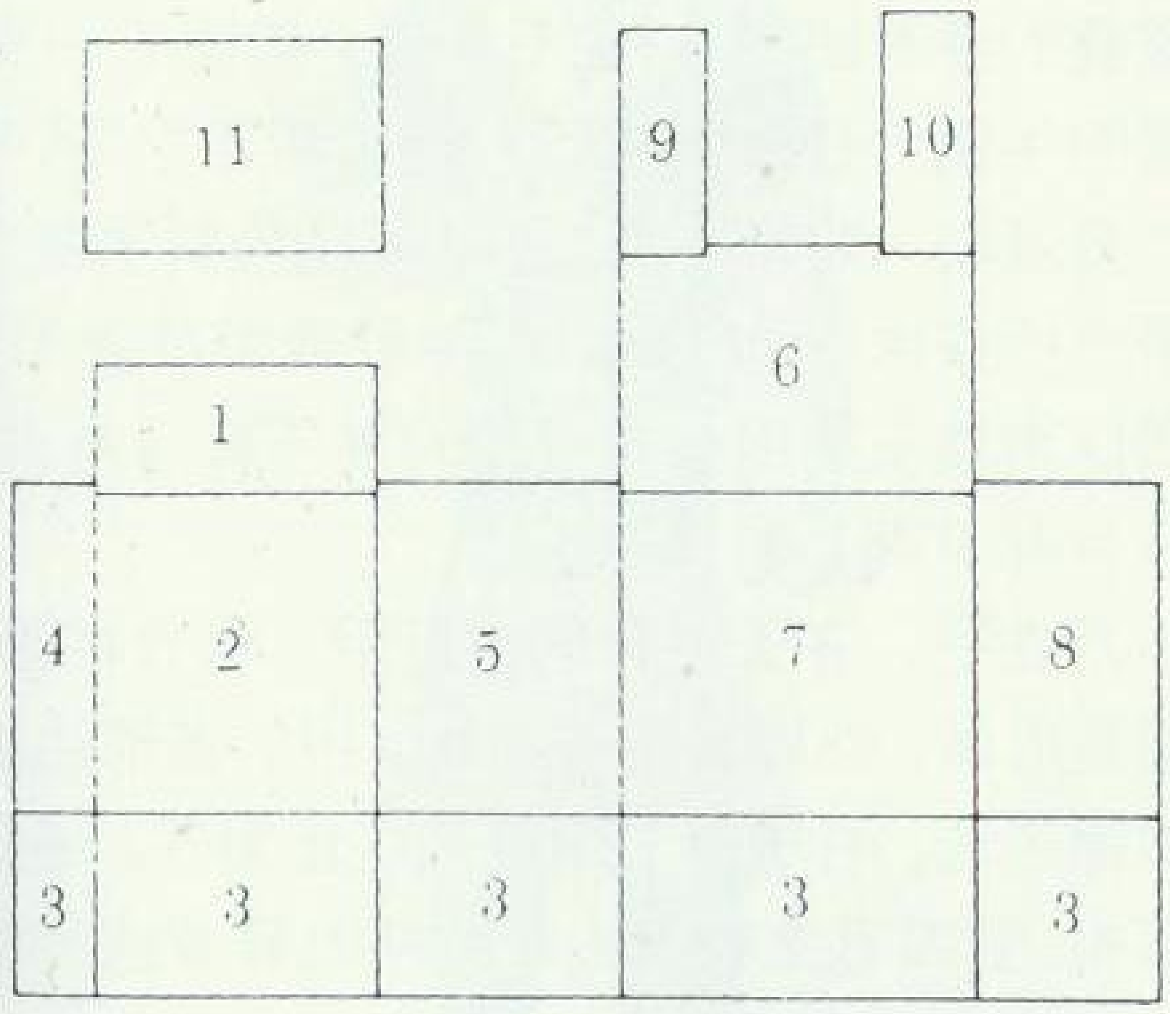




图E—2 左：二十家子残铁铠出土时的情况 右：汉执刀俑　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E—3山东临淄汉齐王墓出土金银饰甲展开图
左上：胄展开图　　右上：钎展开图　　右下：甲片类型和丝带装饰编缀方法（正、背）



图E—4素面甲各部位示意图(1)前胸(2)腹块(3)垂缘(4)右肋前块(5)左肋(6)后背(7)腰块(8)右肋后块(9)左肩(10)右肩(11)披膊

甲身下缘有8排甲片为活动编缀，其余全部为固定编缀，编缀材料是麻绳。一领是金银饰甲，另一领为素面甲。金银饰甲的前胸后背与钎的下段有菱形金银片贴附在甲片上组成图案，不贴金银片的甲片上则用红丝带编成两个重叠的菱形做装饰。这种用丝带仅做装饰而不起编缀作用的现象，在秦将军俑铠甲上也可见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将军俑铠甲应是铁甲（参见秦代图D—2）。铁胄亦是用鱼鳞甲片编缀而成，外形像一个圆椎形筒，顶部不封口，其形制甚为独特。(图E—3、E—4、彩图E—4；详见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西汉齐王铁甲胄的复原》,《考古》1987年第11期）齐王刘襄死于汉文帝前元元年，为公元前179年，属西汉初期。

1983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西耳室随葬器

E—3 广州南越王墓铠甲复原图

E—4 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金银饰甲的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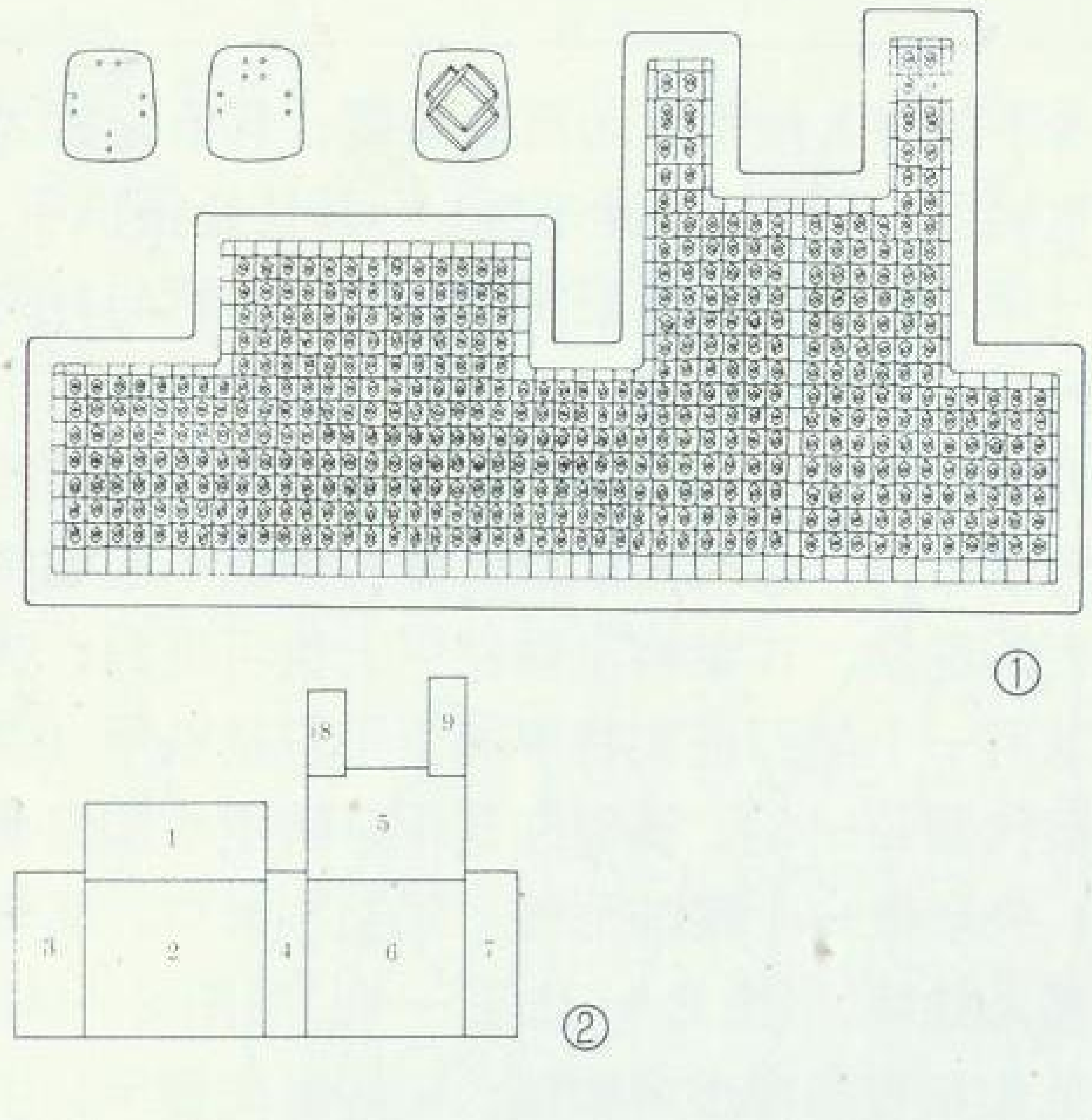


图 E—5 ①广州汉南越王墓出土铠甲展开图
左上：铠甲甲片类型和丝带装饰编法（正面）
②铠甲展开分块示意图 1.胸片 2.腹片 3.右前侧 4.左侧 5.后背上段 6.后背下段 7.右后侧 8.左肩 9.右肩

物中，也发现一领保存基本完整的铁铠甲，形制与齐王甲差不多，但无钎和甲身垂缘，因此全部甲片都是固定编缀的。甲片也用丝带组编，与齐王金银饰甲一样，身甲部分的甲片表面也有用不同于组编丝带颜色的丝带编成的互相重叠的菱形图案。（图 E—5、彩图 E—3）此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28—前117年之间，与刘胜墓属同一时期。（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铁铠甲的复原》，《考古》1987 年第 9 期）

刘胜甲、齐王甲和南越王甲，都有衬里，内层是皮革，外层是绢类织物，甲的各部边缘用织锦包边。衬里除了用皮革、丝绢外，还使用麻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有这种实物（彩图 E—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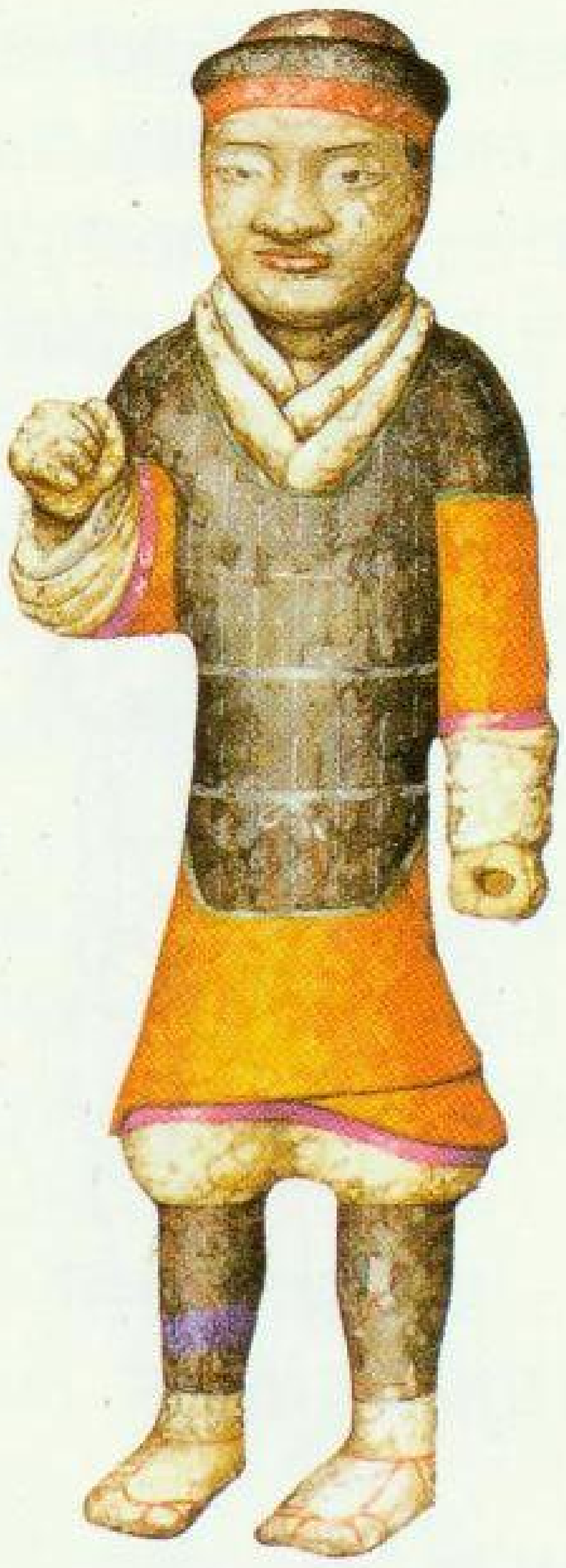
上述五领完整的出土铠甲，除二十家子一领未经复原外，其余均得到复原（齐王甲是在九年以后复原的）。从时间上来说，都集中在汉武帝前后时期，跨度在公元前 179 年至前 90

E—5 杨家湾出土彩绘陶俑（将军俑）二类一型玄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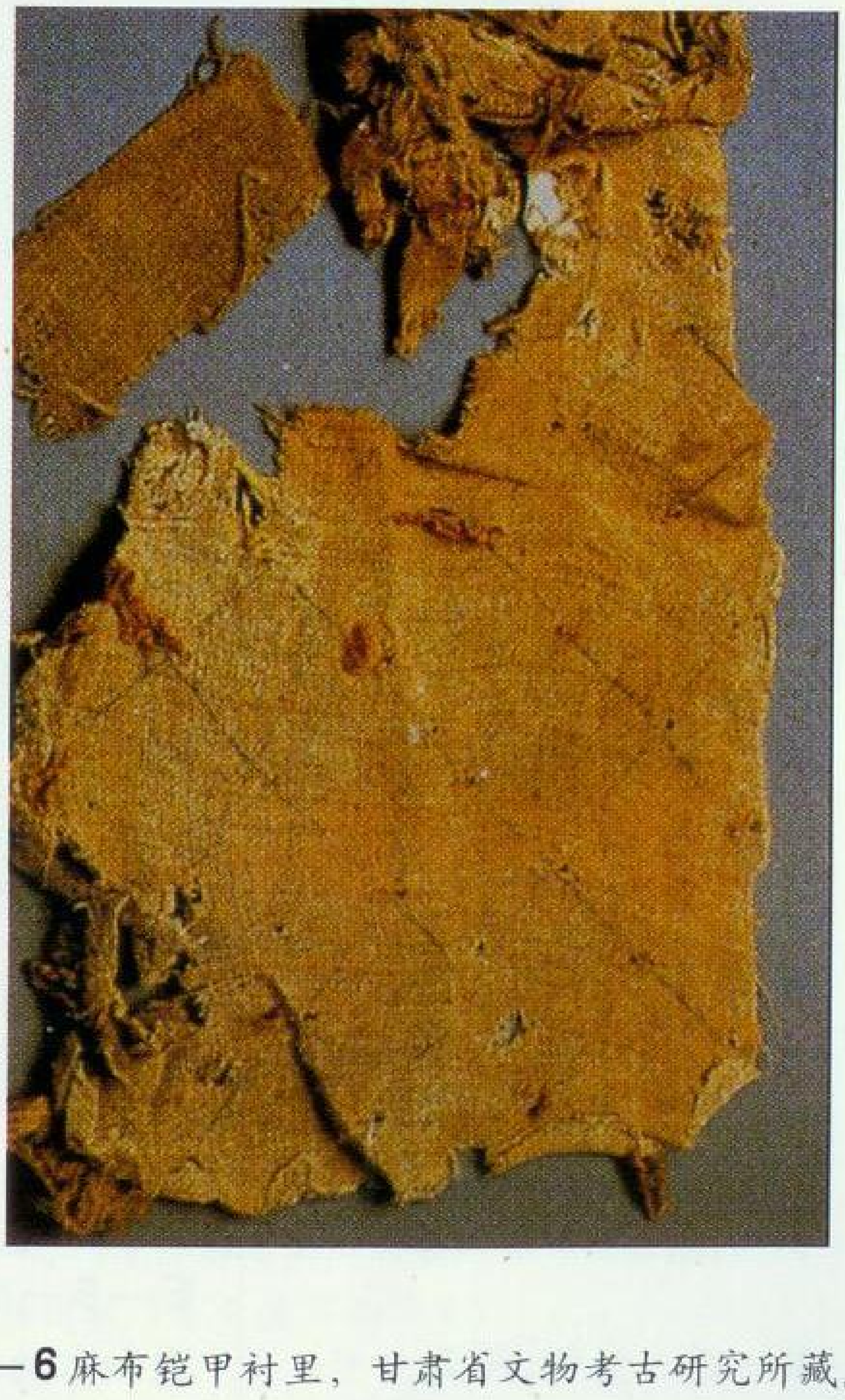
年的80多年之间。按顺序齐王甲在先，南越王甲、刘胜甲居中，二十家子甲在后。前四领甲特别是金银饰甲，因其墓主身份，当代表着最高一层规格；二十家子甲虽然年代较晚，但可能使用者为一般将校，所以甲片较之前四领都要大。这五领铠甲的形制，与秦代铠甲和隋县战国皮甲都或多或少地有着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其间的承继、沿袭关系。

西汉的这种铁甲，当时称为“玄甲”，很多史籍和汉魏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曾提到。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霍去病“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自茂陵”。曹丕的《广陵作》中，也有“霜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的诗句。其被称作玄甲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指铁甲上涂的黑漆，一是指铁的颜色本来就是黑色（古时称玄）。玄甲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西汉彩绘兵马俑上也能见到。

1965年在咸阳市北郊杨家湾传为周勃墓附近的土坑中，发掘出二千五百多件彩绘兵马俑，与后来发现的秦俑一样，有很多是身披铠甲的。



E—7 杨家湾出土彩绘陶俑，二类二型玄甲，骑兵俑。



E—6 麻布铠甲衬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10 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兵马俑（跪射俑）

这些铠甲都是用颜料画在俑身上，虽然式样不同，但均为黑色，上面用红白两色勾画出甲片细部，这些应该就是玄甲。（彩图E—5、E—7；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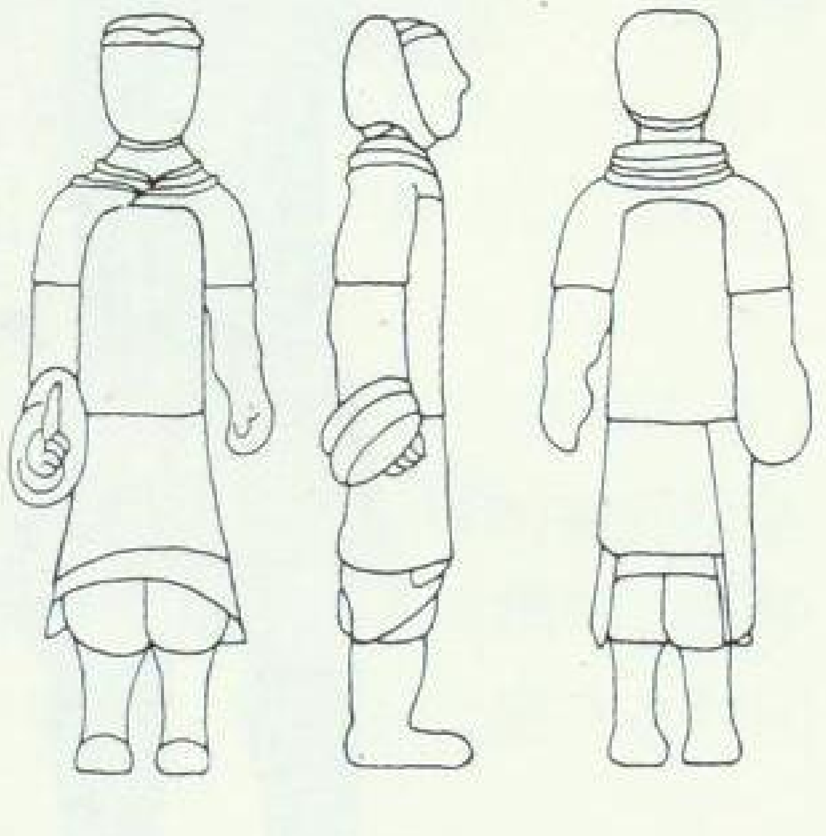
根据发掘简报和咸阳市博物馆（西汉兵马俑陈列馆）的归纳，杨家湾兵俑铠甲分为二类四型。其中有一型好像是皮甲，而第二类与出土实物基本相同，甲片上画出的红白组编材料与出土实物上的残留物正相符合（彩图E—8、）。

1984年在江苏徐州狮子山也发掘出了西汉时期的兵马俑，这些兵马俑因墓坑坍塌，泥土压在俑上，出土时彩绘已荡然无存，只能从部分俑的塑造形象上依稀分辨出甲的大致形制。其中有一种与杨家湾二类甲相似（图E—5），另一种只能识别出包裹整个头部、光露出面目的兜鍪，身上的铠甲已无法看清。（彩图E—10，详见徐州市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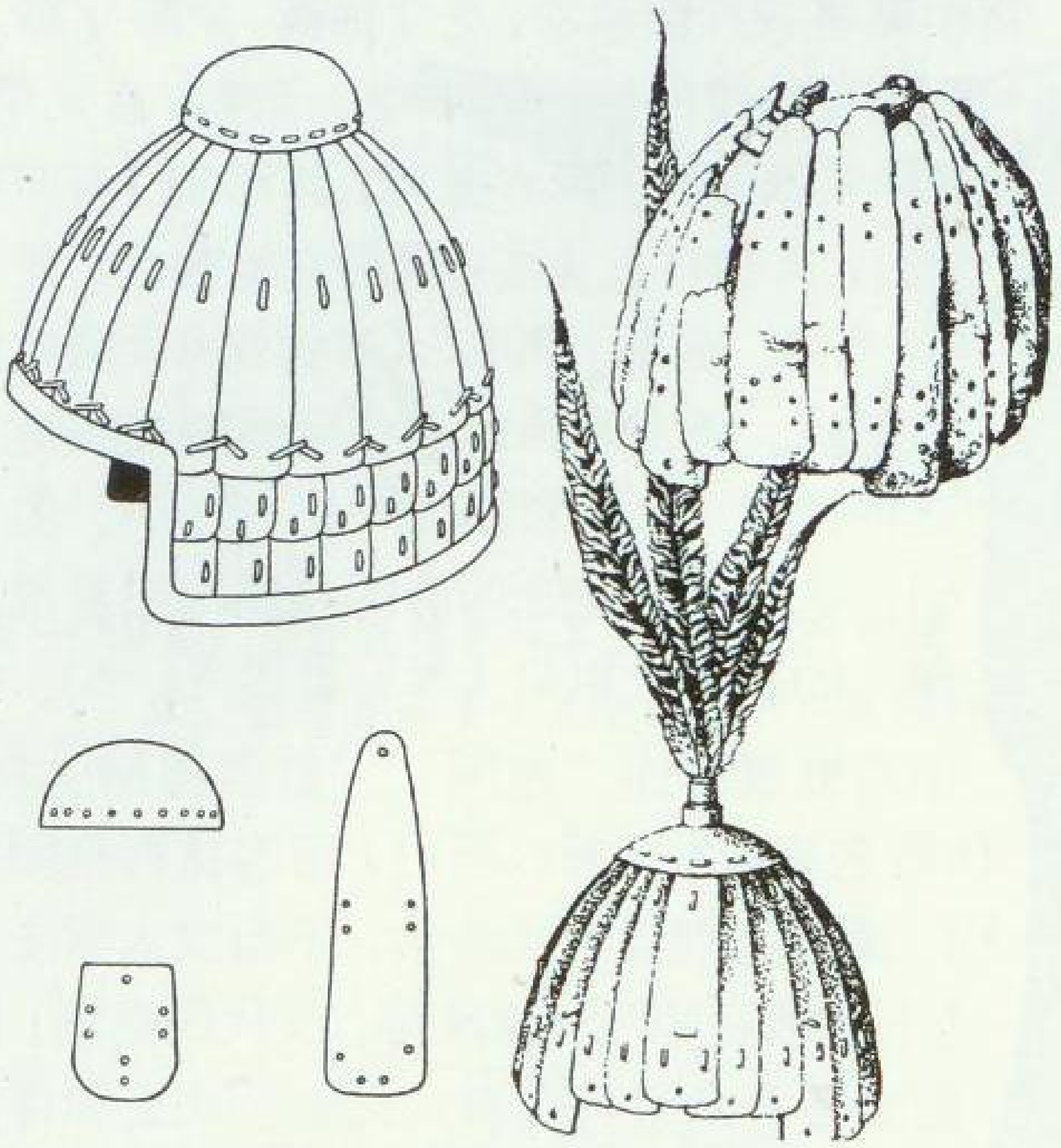
后汉（又称东汉）时期的甲胄资料目前发现十分稀少，从山东沂南和徐州十里铺的两件画像石上的形象可以明确看出，铠甲已有较长的髀裈(图E—7)。髀裈在西汉时好像已开始使用，二十家子出土的残铁铠据推测就是髀

E—8一类二型甲，应是皮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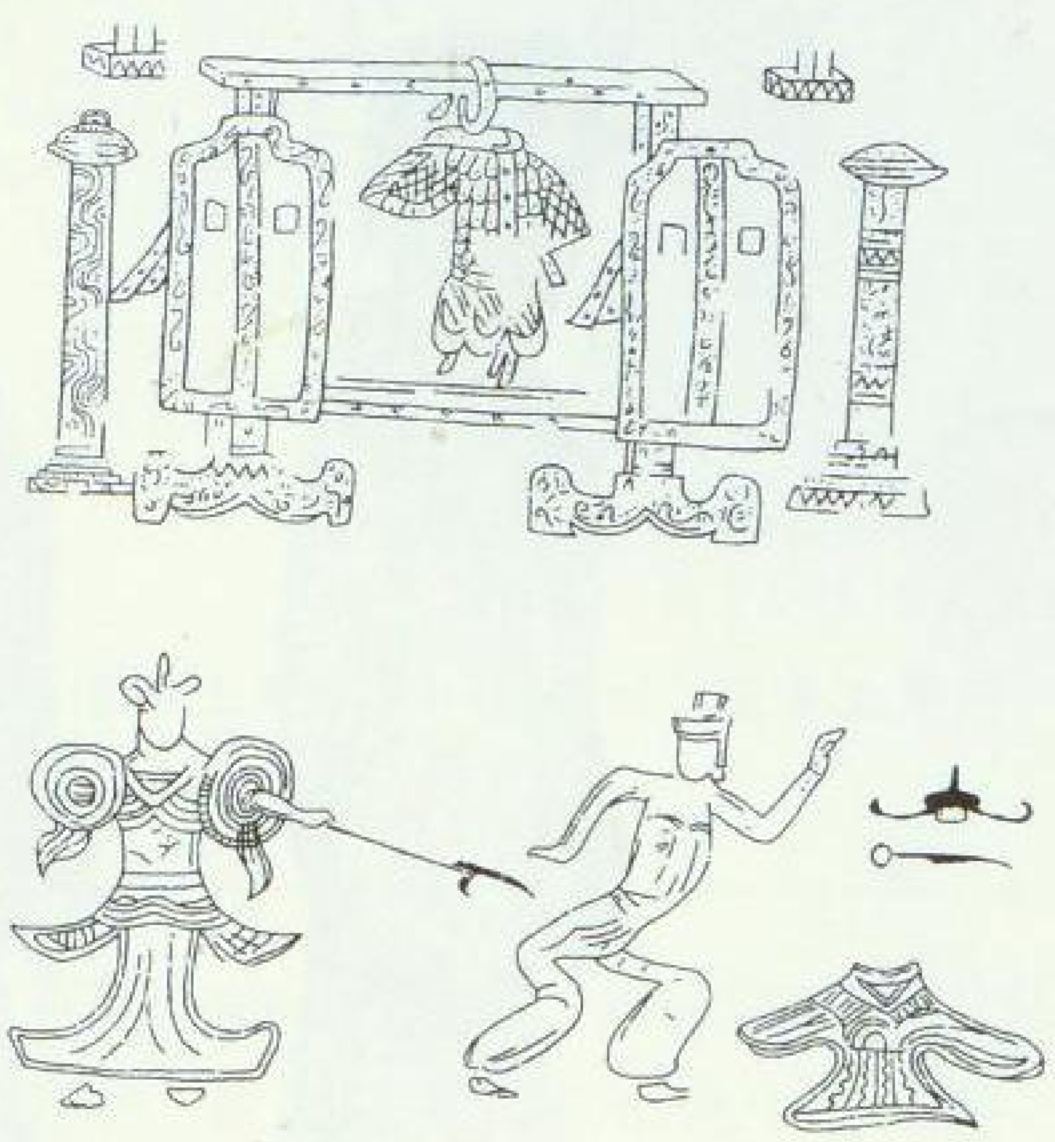
E—9一类一型玄甲（均由咸阳市博物馆供稿）



图E—6 徐州狮子山出土铠甲俑



图E—8 左：老河深鲜卑墓出土铁胄复原图（上）和胄顶正视图与长、短二种胄片（下） 右：1985年抚顺高尔山城出土高句丽铁胄（上）和复制品（下），沈阳市博物馆收藏、陈列。



图E—7 上：山东沂南画像石画像　　下：徐州十里铺画像石画像　　录自《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中国古代的甲胄》、《考古》1966年第2期《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

裈，笔者在考察杨家湾兵马俑时发现，很多骑兵俑的大腿部都有画出的似用整片皮革做成的髀裈，周围还用黑红等色勾边，应是表现甲的包边（彩图E—11）。发掘简报和很多图册、文章均未提到这一问题。

胄的实物资料有：1980年在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村属于东汉初期的鲜卑墓中发现一顶铁胄。铁胄由胄顶和胄片编缀而成，胄顶是半球形，胄片有长短二种，出土时胄片已散开叠成环状。（详见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笔者根据发掘简报提供的尺寸进行复原，其复原后的形象见图E—8（左）。这种胄与云南出土的一件铜扣饰上的武士头盔也十分相像（彩图E—13），其形制直到魏晋时期仍没有明显的改变。

汉代的戎服在整体上有很多方面与秦代相似，军队中不分尊卑都上穿禅衣，下穿裤。禅衣为深衣制，又称纱縠单衣，《汉宫仪》卷上曰：“虎

E—11 杨家湾出土汉兵马俑（骑兵俑），咸阳市博物馆藏（笔者据实物写生）

E—12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彩绘侍卫俑，徐州市博物馆藏（据实物写生）。

贲中郎将衣纱縠单衣，虎文锦裤，余郎亦然。”纱縠即有绉纹的纱，禅即单，“禅衣言无里也”（《释名疏证补·释衣服》），其形制“有曲裾垂于后，其制将正（整）幅帛交输裁之，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于两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杨家湾和狮子山兵俑的戎服袍正是这种禅衣（参见彩图E—5、E—7、图E—6）。这种禅衣垂之两旁的燕尾与三星堆商代铜人的裳十分相似（参见彩图A—5）。禅衣中直裾者称作“襜褕”，“言其襜褕弘裕也”（《释名疏证补·释衣服》），形容这种袍服很宽松、飘逸。汉代崇尚儒学，不但文人学士，连武士也峨冠博带附庸风雅。汉代的壁画、俑和画像石上经常可以看到武士、武吏和侍卫身穿长及脚背的襜褕（图E—9，彩图E—12）。

杨家湾等处出土的俑身上一般都穿两层深衣，外面一层，笔者疑为与秦俑相同，穿的是絮衣。絮衣见载于《汉书·晁错传》：“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这

E—13云南出土的汉代铜扣饰，云南省博物馆藏。

图E—10 左：偃师杏园东汉墓壁画上的平巾帻　　中：沂南画像石上有屋山的平巾帻（应属王莽所创）。　　右：偃师杏园东汉墓壁画上平巾帻加纱冠的形象。

E—14 武伯图 河南偃师杏园汉墓壁画（据临摹，参照照片绘制）

图E—9 左：山东沂南汉画像石　　右：四川望都汉墓壁画持戟武士图

里提到的正是一个骑兵的全副装备，以坚甲和絮衣并列，或可说明絮衣也是甲的一种，彩图E—11的杨家湾骑俑如果上穿絮衣，下着髀裈，就显得完全合理了。

戎服的裤称作“袑”，因裤腿很大，故曰大袑。《汉书·朱博传》说：“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袑，不中节度。’”颜师古注：“袑，音绍，谓大袴也。”有时也直称裤，如《汉官仪》上提到的“虎纹锦裤”，其形象参见彩图E—14，军旅中士卒为便利行动，袑外一般都要裹行缠。

众多的形象资料表明，汉代军人的冠饰基本上是平巾帻外罩武冠。关于帻，上文秦代部分已经提及，《晋书·舆服志》记述很清楚：“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其形制如图E—10。东汉时期，武吏还有在平巾帻外加纱冠的习惯。

至于武冠，《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晋书·舆服志》记述更详：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笼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赵惠文王所造，因以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轻细如蝉翼，故名惠文。……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诸将军武官通服之。这种冠在汉代可能有大小两种，并用多种材料做成。体积比较小的一种用毡或皮革制成，多于军中使用。如杨家湾与狮子山兵俑头上所戴，秦俑中也有戴此冠者（参见彩图E—7、E—11、E—13，秦代部分图D—7）。体积比

图E—11 上：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漆缅武冠，马王堆汉墓博物馆藏。右：①沂南画像石上戴武冠的形象。②新疆罗布淖尔汉楼兰烽燧堡遗址出土毡制武冠，新疆博物馆藏。③甘肃武威磨咀汉墓出土漆纱武冠，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E—12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兵马俑、发辫俑，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博物馆藏。

较大的一种用漆纱制作，用于侍卫仪仗和宫廷礼服。漆纱和毡制的武冠都有实物出土，在新疆发现的毡冠上还留有插羽饰的铜管和残羽毛。(图E—11)

由此引出了鹖冠的问题。汉代以降，武冠使用面很广，《晋书》的记载就讲得很清楚。为了区别武官与侍臣的身份，武官戴武冠时要插鹖尾，所以《隋书·礼仪志》说：“鹖冠，犹大冠也，加双鹖尾，竖插两边，故以名焉。”《通志略·器服略》在“赵惠文冠”条下说得更直接明了：“又加双鹖尾植左右，名鹖冠。”很清楚地表明鹖冠是武冠的又一种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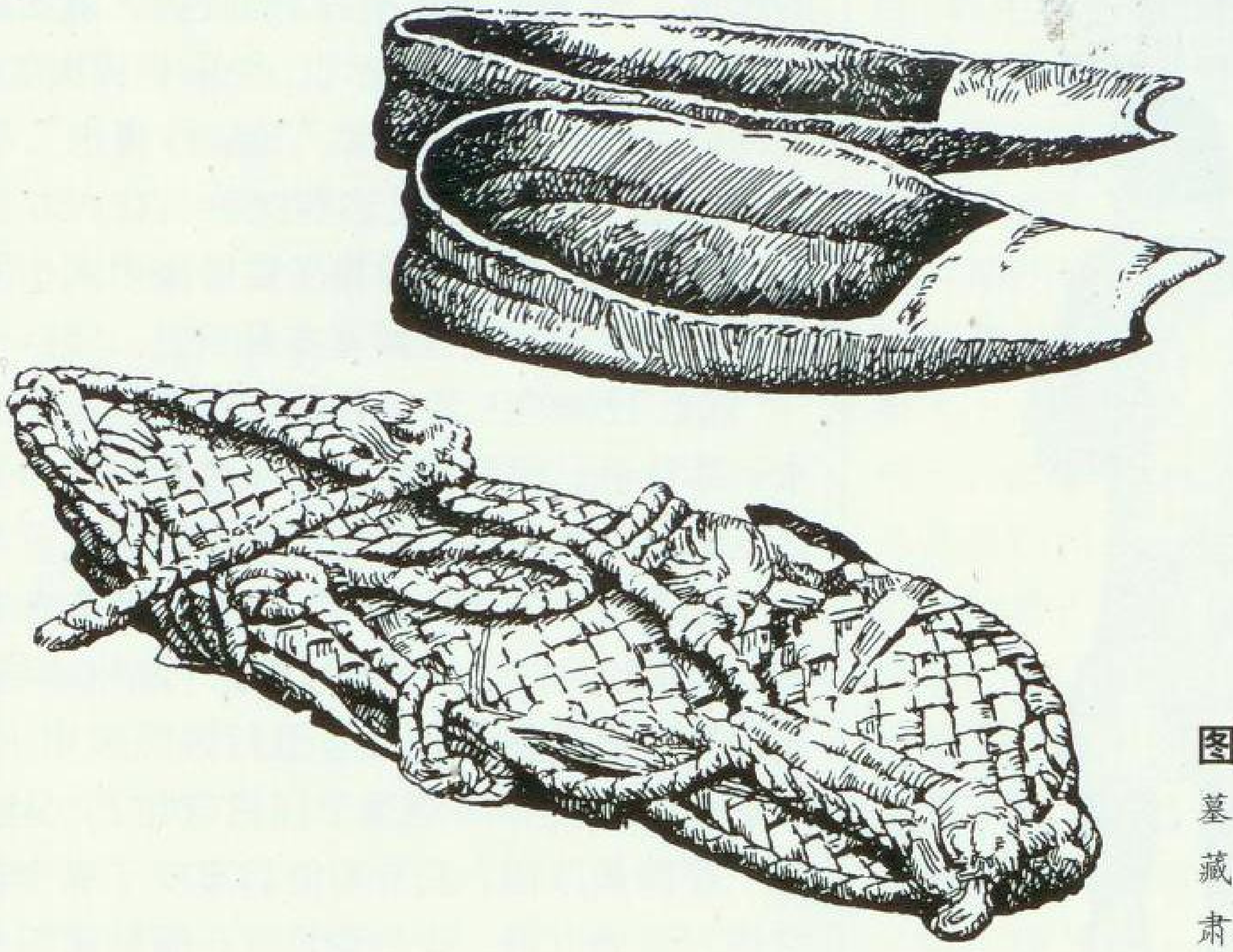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与秦代一样，汉代军中也有发髻装饰，杨家湾和狮子山兵马俑中就有发髻俑和发辫俑。(参见彩图E—16、图E—12)

汉代戎服外一般束两条腰带，一条为皮制，一条为绢制，以带钩系接。从北洞山侍卫俑上来看，皮带用于束衣，绢带则用于佩剑。(参见彩图E—12)

汉代时武士还使用帔风，帔风古时简称“帔”。《说文》曰：“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盖古名裙，弘农方言曰帔。”199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汉墓中出土一座精美绝伦的鼓座铜俑（彩图E—15)，身上的服饰和衣服上的绣纹图案刻勒得十分清晰，肩上披了一件帔风，帔风的下缘束入腰带内，特征与《说文》所说十分相符。这是目前最早的帔风形象资料，虽然属于少数民族服饰（其蛇纹具有明确的滇池文化特征)，但无疑属中国古代服饰。从形制上看，这种帔风已与后来在欧洲出现的披风、斗篷非常接近了。

武士脚上主要穿靴履，以履为主，有圆头平底、月牙形头等样式，多以麻布或麻编织而成。麻履、麻鞋都有实物出土（图E—13)，靴为圆头高鞠靴（参见彩图E—5、图E—6)。

汉代戎服的颜色，《古今注》云：“今户伯（武官名）服赤帻，缥衣，素袜（指行缠)，弁之遗法也。”《汉官解诂》说：“旧时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皆绛衣戎服，示扬武



图E—13 上：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麻履实物，湖北省博物馆藏。下：甘肃敦煌出土麻鞋实物，甘肃省博物馆藏。（据实物写生和照片绘制）。

E—15云南江川李家山51号汉墓出土鼓座铜俑（据实物写生），云南省江川县博物馆藏。

E—16 杨家湾出土兵马俑、发髻俑，身上所披为幡，咸阳市博物馆藏。

威。”西汉的禁军“缇骑”是一支装备华丽精良的骑兵队伍，其名称中的“缇”，指的就是服饰的颜色。赤、纁、绛、缇都属红色。《说文解字注》的注解是：“绛，大赤也，今俗称谓大红也；纯赤者，今俗称为朱红也。”“纁，浅绛也”。“缇，丹黄色也”。由此可见这些红色是在大红至橘红之间，杨家湾兵马俑和汉墓壁画中武士服饰的彩绘颜色与上述注解基本相符。

汉代服饰的主色，若按五行说应该是土克水，为黄色。但汉高祖在起兵造反时，为了笼络人心，曾利用酒后斩蛇的事，编造了一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使人相信他是赤龙下凡，未来的真命天子（见《史记·高祖本纪》）。所以西汉初的尚色违反了五行说而采用火德，尚赤色。汉文帝时对这个问题曾重新讨论过，并一度准备改色，武帝即位后重申了赤帝斩蛇之符，应为火德，此后至东汉，服饰旗帜一直以红色为主。

汉代是武官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春秋之前我国原没有专职的武官，军队由天子和诸侯统领。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兵、军种和战略战术也不断复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家，形成了实际上的专职武官。秦代东征西讨大量用兵，任用了许多将帅，使武官制度有了一个雏型。到了西汉，从高祖刘邦拜韩信为将时起，西汉的军事已直接由“大将军”负责。到武帝时，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武官制度，武官与士兵的服饰也开始产生比较明显的区别。杨家湾兵马俑中，有一件身穿鱼鳞甲、头戴帻、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高统靴的俑就是代表作，它的服饰的各方面与其他步兵、骑兵俑已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参见彩图E—5）

区别官兵身份的不仅是服饰，还有军服上的徽识。军服上标出徽识在先秦时代已有制度。汉代的徽识，主要有章、幡和负羽三种。章的级别较低，为士卒和临时参战的平民佩戴；幡的等级比章高，为武官所佩戴；负羽则大约军官和士卒均可用。（参见孙机《汉代军服上的徽识》，《文物》1988 年第 8 期）

E—17 左：徐州北洞山出土仪卫俑，背上所负应是矢箙。右：杨家湾出土兵马俑，背上所负为章。徐州市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藏。

章的形象可参考杨家湾兵俑背后佩戴的长方形物（彩图E—17右）。据文献记载，章上一般要注明佩戴者的身份、姓名和所属部队，以便作战牺牲后识别、收殓。

幡"为肩上绛织，如燕尾者也"（孙文引薛综注）。杨家湾兵俑中有一件发髻俑，右肩上斜披着红白两色帛做成的类似披肩的饰物，与上述记载很相似，应就是这种幡。（彩图E—16）

负羽屡屡见诸于各种史籍，但如何负法至今尚未获得明确的形象资料。《汉代军服上的徽识》一文认为有两种形象资料可供参考：一种是狮子山兵俑和北洞山仪卫俑背后佩戴的长方形盒子，可能是用来插羽毛的（图E—14左、彩图E—17左）。发掘简报认为这种盒子是箭箙（装箭的筒），但是文认为，箭箙里面既不见箭镞或箭的模型，俑的身上又不佩弓，所以可能不是箭箙。另一种是很多秦俑背后的两个环，出土时上面空无一物，这种环亦有可能用来负羽。这些推测虽然都很有道理，但仍有需商榷之处。秦俑的环且不论，北洞山与狮子山兵俑背后的盒子是箭箙的可能性仍然比较大，理由一、箭箙中无箭镞，因为这些俑的比例与秦俑不同，比真人小许多倍，箭箙已经很小，箭镞按比例自然更小，在这么小的箭箙里放箭镞模型既无意义也很难做到。理由二、只负箙而不佩弓在南北朝时期的俑上都是如此，这些俑上的箙与箭的塑造十分清晰。三、箭箙负于背后，于取箭事实上十分便利。汉时多用弩，弩箭的铤（箭杆）不如弓箭的长（弩箭一般长34—41厘米，弓箭最短也在67厘米以上），负于背后，反手取箭位置正合适（参见图E—14右）。因为箭铤短，所以箭箙也要浅，如果深的话，箭就有可能卡住取不出来，背的位置也要适当偏高，低了手就不易够着。吉林老河深鲜卑墓中，随铁甲胄出土的还有一长一短二件箭箙，短的一件很像汉俑上所负的盒子。负羽的方法究竟如何，也许有一天会出现新的资料来最后解开这个谜。

图E—14 左：徐州狮子山出土兵俑，徐州市狮子山汉兵马俑博物馆藏。右：矢箙背于后背取矢示意图。

西汉骑兵军戎服饰复原图

戎服、冠饰，根据杨家湾兵马俑形象复原，铠甲根据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出土实物复原，兵器参考《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佩剑方法根据《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一文设计。

魏晋时期军戎服饰复原图

甲胄根据偃师杏园出土的武士陶俑，参照有关出土实物复原。戎服根据江苏南京出土的持盾武士俑、辽宁朝阳县袁台子东晋墓壁画上武士像复原。革带根据带銙出土实物复原。兵器参照《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马具根据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实物复原。

魏晋时期

（公元 220 年—公元 420 年）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宦官两股势力的激烈斗争，引发了封建军阀之间的残酷大混战。经过长期兼并，最后剩下曹魏、刘蜀和孙吴三大政治集团，形成了相互鼎立的局面。这种局面以蜀的先亡而告结束，以后曹魏也因内部矛盾激化而为豪强士族司马氏所取代。司马氏在灭吴后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由于皇族内部不断倾轧而酿成了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加之外族的入侵，使统一的国家再次分裂，出现了东晋十六国的更大的割据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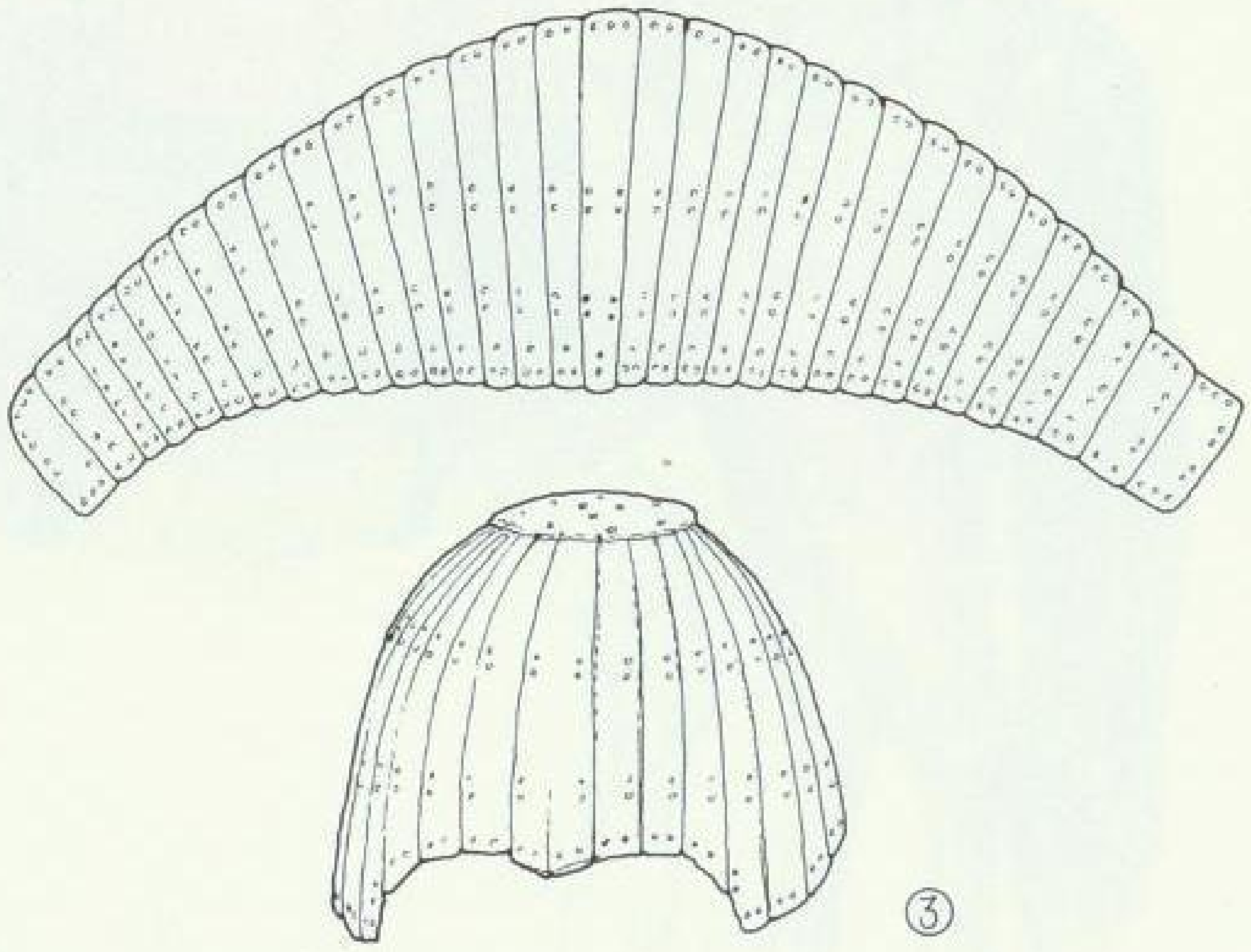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虽然促使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军事科学得到发展，但给社会经济生产造成的破坏却极其巨大，因此在武器装备方面，与汉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步。

F—1河南偃师杏园村魏晋墓出土武士俑（据实物写生），河南省博物馆藏。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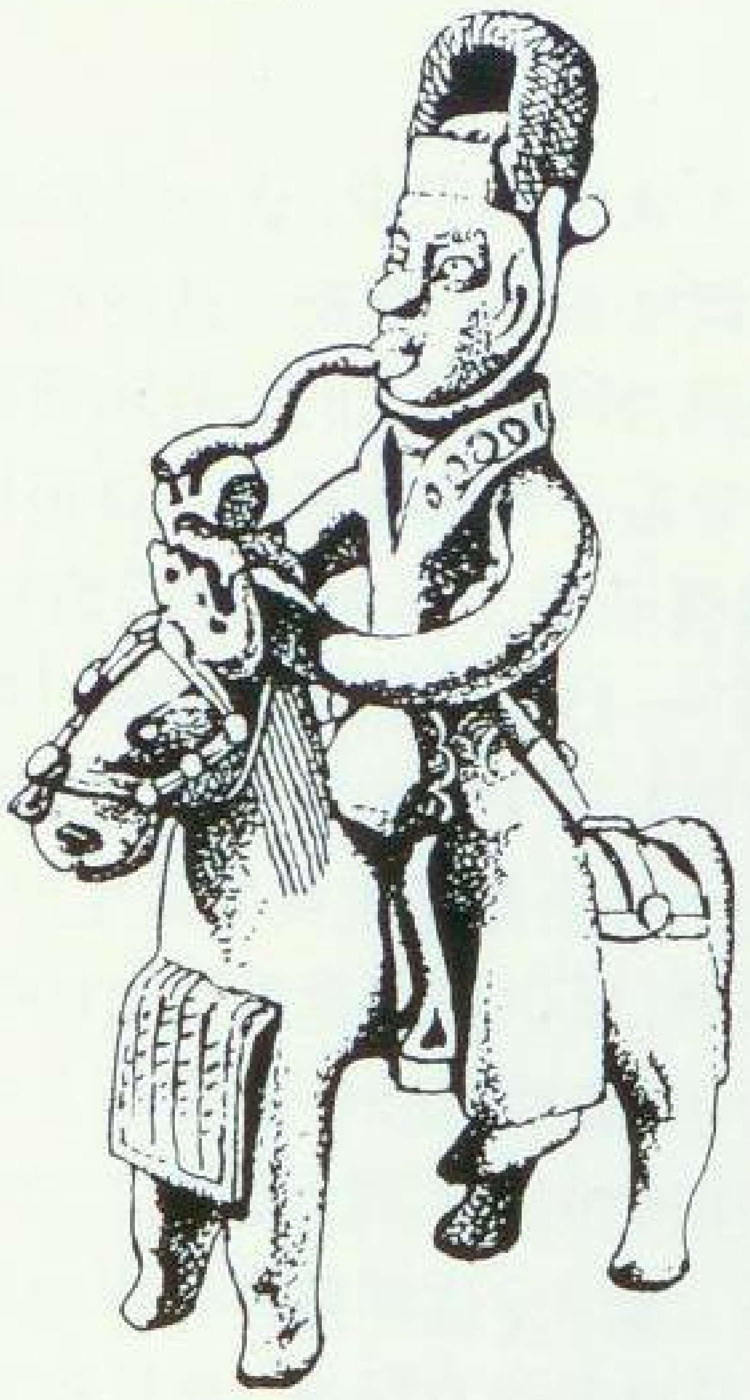
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一时期主要使用一种称为“筩袖铠”的铁铠，这种铠甲的形制，在河南偃师杏园村出土的一件陶俑上表现得十分清晰。它是一种胸背相连、有短袖，用鱼鳞形甲片编缀而成，形如现代的短袖套衫的铁铠（彩图F—1），有的还有盆领（图F—1③），在《南史》、《宋书》中称作“诸葛亮筩袖铠”，可能是当时诸葛亮重视军备生产，曾亲自督制这种铠甲，所以把经他改进过的铠甲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筩袖铠的外形实际上与西汉刘胜墓的铁铠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开襟，穿时从头上套入，这样整件铠甲就不存在薄弱环节（因开襟处总有隙缝，容易使刀矢透入）。这种铠甲“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南史·殷孝祖传》），在当时堪称坚硬无比，很可能是用“百炼钢”制造的。百炼钢出现于东汉，自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开始掌握块炼钢技术以后，已使钢铁冶炼进了一大步。随后发明的铸铁脱炭钢、钞钢和将薄钢片反复折叠锻打的百炼钢技术，使钢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后一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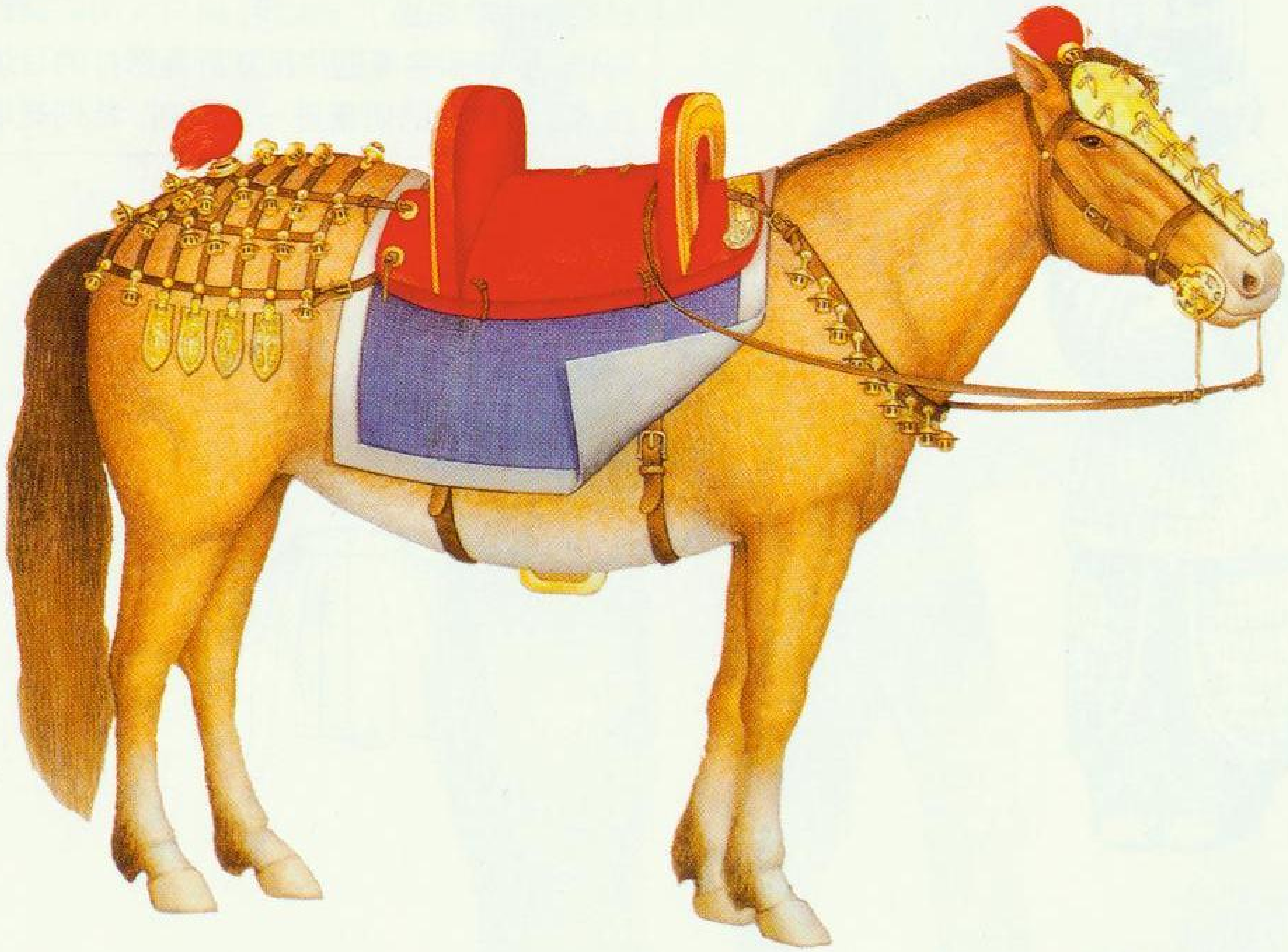
图F—1①：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中武士形象。②：陕西西安出土东晋时期陶武士俑。西安历史博物馆藏。③：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墓出土铁盆领、铁胄。



图F—2 湖南长沙出土西晋陶骑俑，据《湖南省文物图录》照片绘制。

种打铁技术，直到现代农村地区还在使用。用这种钢铁制造铠甲，无疑要比以前的铁甲精良得多。骑兵使用筩袖铠时，还配有腿裙（即汉代的髀裈），这种腿裙比汉代要长，因而更能有效地保护骑兵的腿部（图F—1）。

骑兵在汉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要归功于马鞍、马镫的发明。1974年在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马具，这套工艺精湛的鎏金鞍辔已具有现代马具的全部构件，是全世界最早的马具（彩图F—2）。不足之处在于设计上还不够先进，鞍座较宽平，后鞍桥比前鞍桥还高，坐上去显然不舒服。马镫也是单个的，主要供上马时踩踏之用，上马以后便不再踩镫，湖南长沙出土的一件西晋陶骑俑，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图F—2）。虽然如此，比起无鞍无镫时代来，骑马的难度已大大降低，而同时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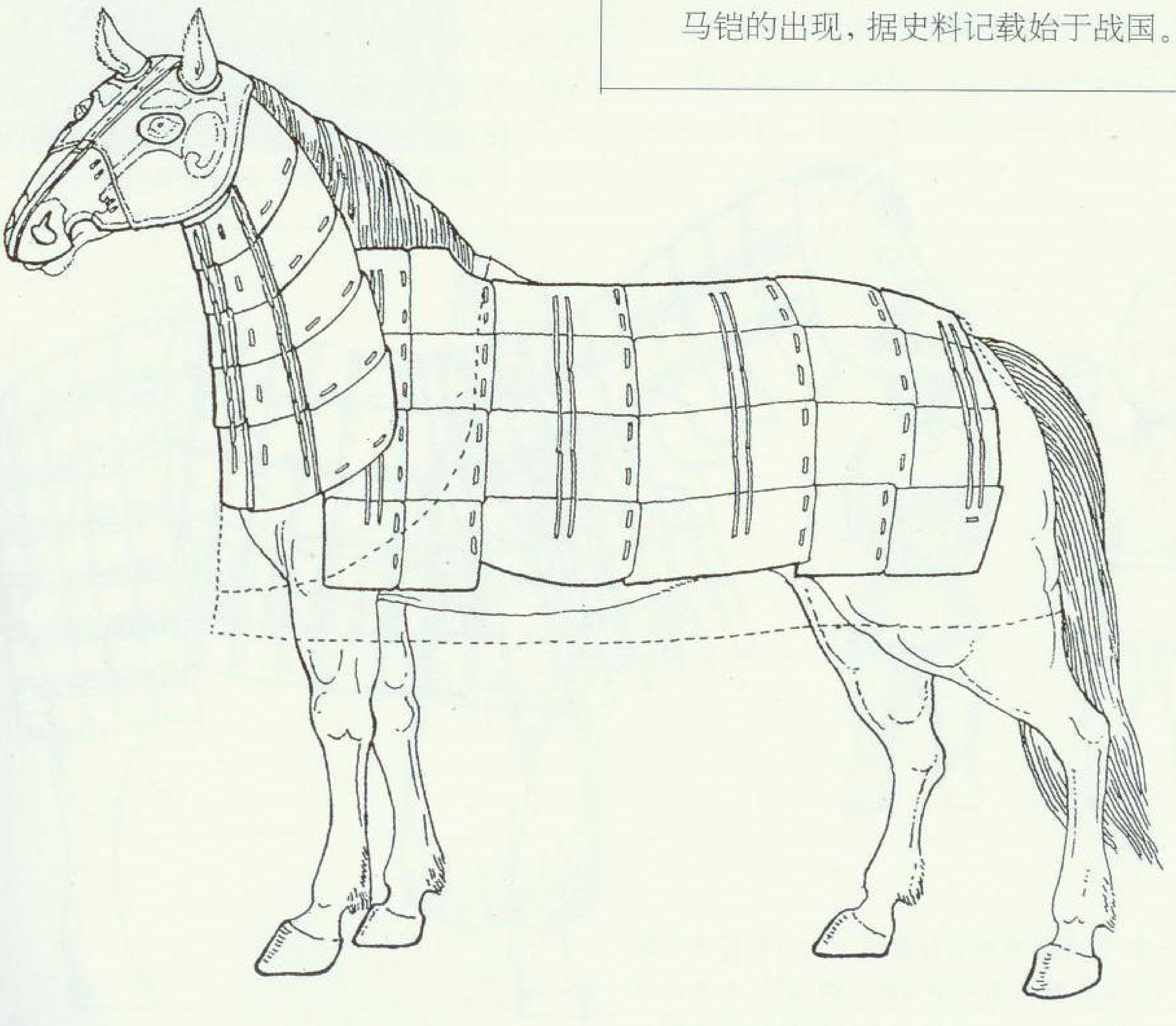
F—2 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鎏金马鞍具复原图（详见《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

兵在马上作战的能力也大大加强，因而对铠甲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胄在辽宁朝阳有实物出土，其形制与图F—1①、彩图F—1的形象基本相同，还是沿袭东汉，胄顶高高地竖有缨饰。

魏晋时期的铠甲，虽然从形象资料上仅见俑袖铠一种，但从文字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就列举了黑光甲、明光甲、两当铠、环锁铠、马镫等五种，黑光和明光可能是同一种甲，只是在表面防锈技术处理上有所不同。这两种甲和两当铠后来取代筩袖铠，成为南北朝时期使用的主要铠甲。环锁铠即明清时期的锁子铠（参见明、清部分），在当时是极为珍贵的铠甲。马铠是保护战马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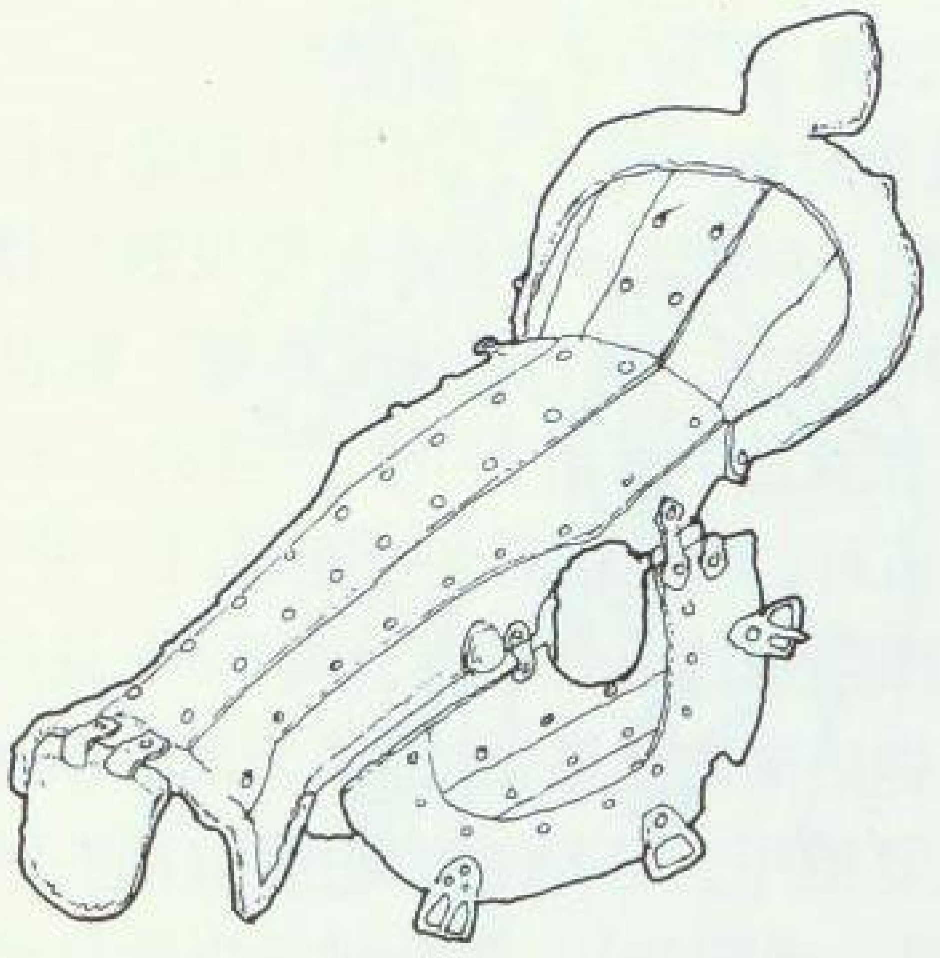
马铠的出现，据史料记载始于战国。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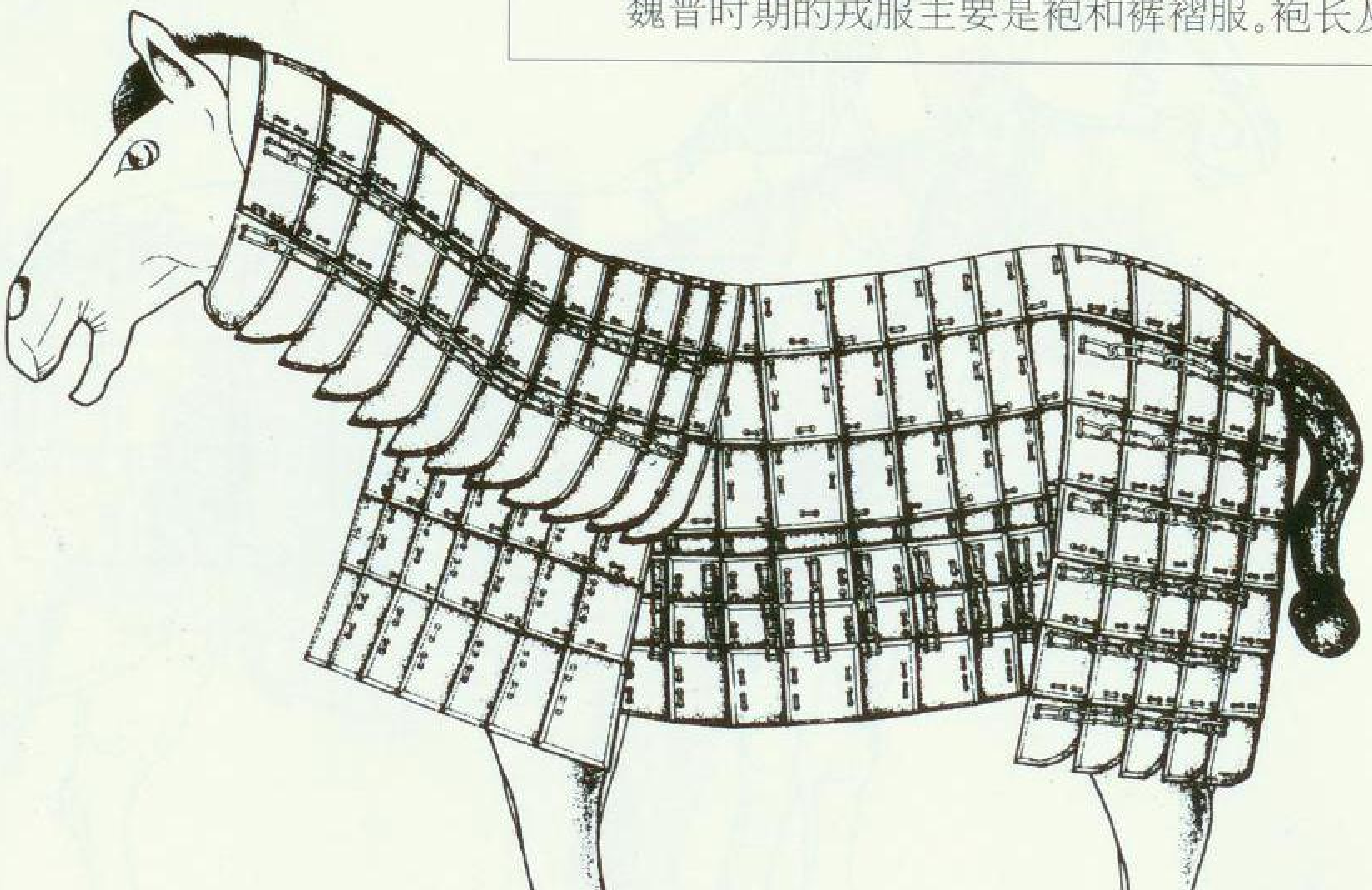
图F—3 上：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战国皮马胄（平面图）中：湖北随县出土战国皮马甲残片，湖北省博物馆藏。下：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皮马甲整理复原图，详见白荣金《包山楚墓马甲复原辩证》，《文物》1989年第3期。

随县战国墓曾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马胄和马身甲的残片，制作极精美。1987年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也发现了一领完整的皮马甲（图F—3下，详见吴顺青等《荆门包山2号墓部分遗物的清理与复原》，《文物》1986年第5期）。再有就是前文提到的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的石制仿皮马甲，这副马甲也已修复（详见《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但从复原图上可以看出，这领甲的复原准确性还值得讨论。东晋时起，马甲开始用铁制，就是在出土胄与盆领实物的墓中，还同时出土了一件保存十分完好的铁马胄，（图F—4②，详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11期）。马甲的使用在汉末已较普遍，曹操的《军策令》里就曾提到：“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十具。”三百之数与南北朝时期的铠马万群相比，虽为区区小数，但在当时也就十分可观了。

　　魏晋时期的戎服主要是袍和裤褶服。袍长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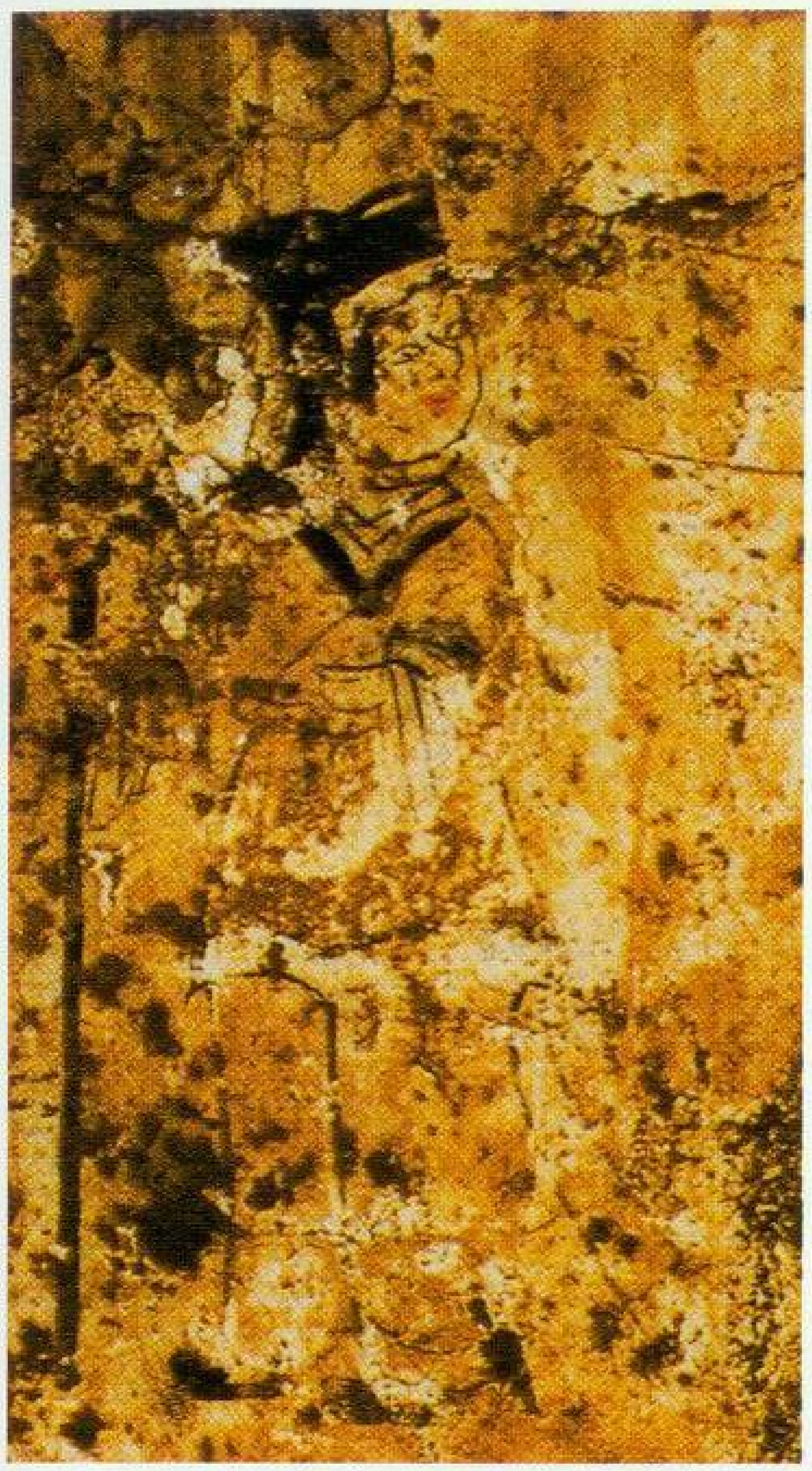


②



①

图F—4 ①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石制马甲复原图。这 幅复原图的马项甲（即‘鸡项’，见宋代马甲部分）问题校突出，两侧甲片的中间接缝应在马颈下，而不应在马颈上（鬃毛处），所以应将项甲从现在的位置颠倒过来，但如此则胸甲（即荡胸）的复原又要重新考虑。② 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号墓出土铁马胄。



F—3 辽宁朝阳县袁台子东晋墓西壁壁画。

膝下，宽袖。褶短至两胯，紧身小袖，袍、褶一般都是交直领，右衽，但也有盘圆领。裤则为大口裤，东晋的与西晋的相比较裤脚更大，很像今天的女裙裤。因此《晋书·五行志》上说："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褄。"其形象参见图F—5，彩图F—3。

冠饰主要有武冠、鹖冠、却敌冠、樊哙冠、帻、幅巾和帢等。魏晋时期的武冠形象资料比较少，目前为止笔者发现的只有两例：一为朝鲜北道安岳的冬寿墓壁画上的形象，从外形上看与汉代基本相似，也用漆纱制成，冠下也戴帻。据《晋书·舆服志》记载，晋代武官戴此冠一般不加金珰、附蝉、貂尾，只有侍中、常侍等侍臣，才以冠上所加的上述饰物来区分品级。其中貂尾的插法在宁懋石室的石刻画像上表现得十分清楚（图F—6②）。珰的形象在魏晋时期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只能从唐代范履冰画像上略见一斑（图F—6③）。这种冠饰作为武官、侍臣的礼服，一般用于典礼仪仗。

①　②　③　④

图F—5　①成都扬子山晋墓墓门石刻门吏像。②江苏南京出土东晋持盾武士俑，江苏省博物馆藏。③④河南偃师杏园魏晋墓出土武士俑，河南省博物馆藏。

②

另一例为晋墓出土的陶俑头上戴的一种平顶、两侧有短耳的冠，冠上有交叉的划线，从外形上看与武冠很像（图F—6④）。《晋书·舆服志》有这么一则记载：“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所宜，逐因冠为别。介帻服文吏，平上帻服武官也。”所记平上帻特点与该陶俑的冠也很相符，因此颇疑平上帻是晋代武冠的又一名称。

魏晋时的鹖冠，比较确切的形象资料尚未发现。有的书中曾举出集安高句丽舞俑冢壁画上骑射武士头上所戴的冠为例（图F—7），但根据唐李贤墓壁画上高丽使者的冠饰形象（参见唐代部分彩图I—26右侧第一人），并参照《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一》有关“高句丽，汉玄菟郡也……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头上，以显异之”的记载，冠上插羽毛分明是代表高句丽官员身份的标志，而非鹖冠的饰品，因此其形象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却敌冠、樊哙冠见载于《晋书·舆服志》：

①

图F—6①朝鲜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冬寿像，录自《文物》1980年第3期孙机《羽扇纶巾》一文插图。②洛阳出土北魏宁懋石室石刻画像，（美）波士顿博物馆藏。

③

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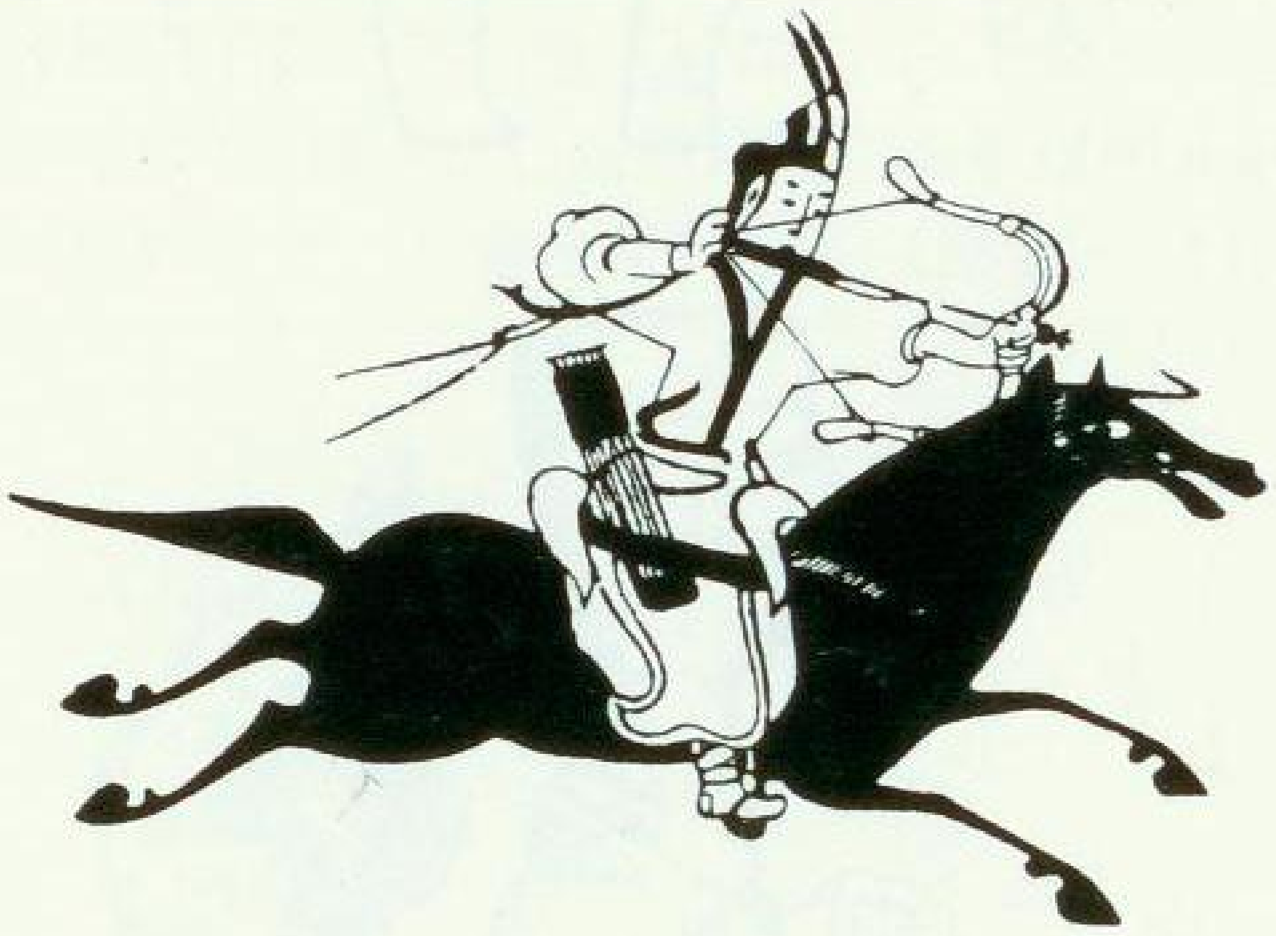
图F—6③唐范履冰像，录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④晋墓出土陶俑（出土地点不详），录自《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凡当殿门卫士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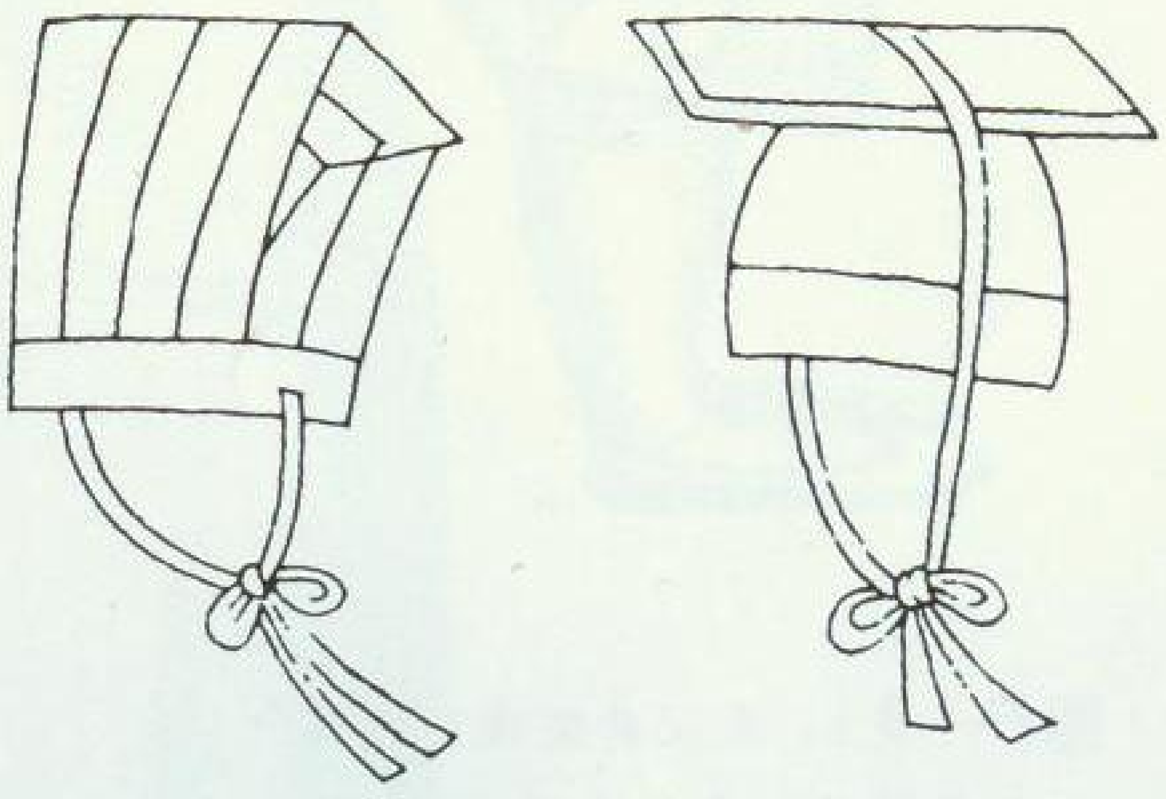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汉会于鸿门，项籍图危高祖，樊哙常持铁楯，闻急，乃裂裳苞楯，戴以为冠，排入羽营，因数羽罪，汉王乘间得出。后人壮其意，乃制冠像焉。凡殿门司马卫士服之。

这两种冠在东汉时就已使用，宋淳熙时的刻本《三礼图》中有附图，可以提供大致上的形象参考（图F—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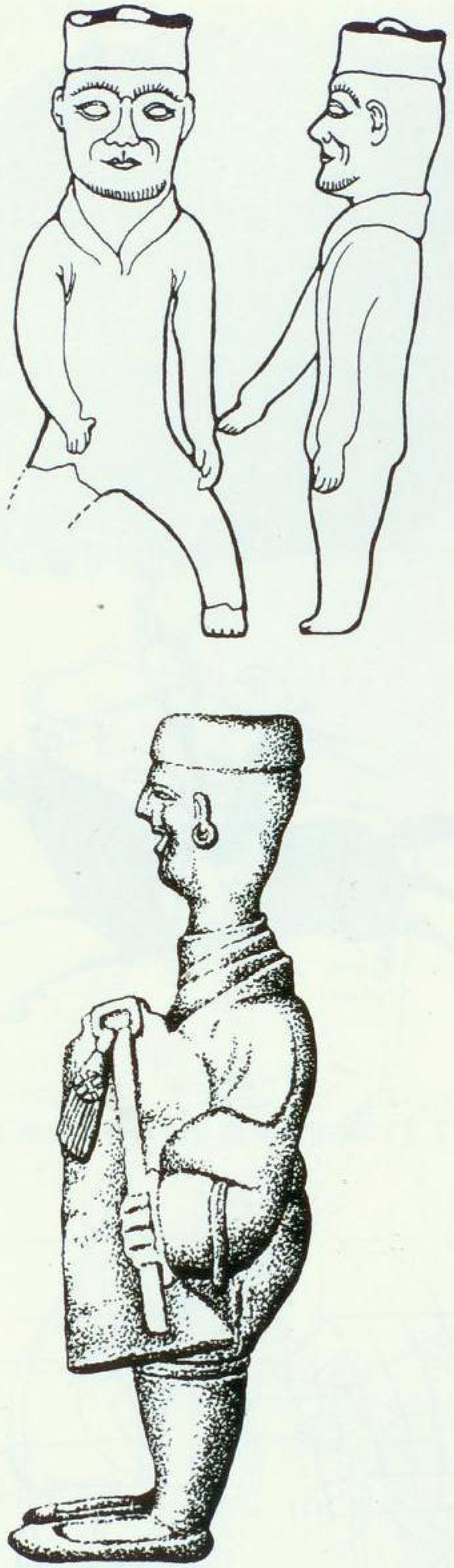
帻仍然保持东汉初期的形象，像平顶小帽，无耳，南北朝时期变成一种小冠，称平巾帻（图F—9）。



图F—7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舞俑冢壁画上的骑射图



图F—8左：却敌冠　右：樊哙冠《三礼图》插图，录自《中国古代版画丛刊》。



图F—9 上：武汉黄陂滠口晋墓出土残骑俑，武汉市博物馆藏。下：四川涂井蜀汉崖墓出土武士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魏晋时期军队中使用最普遍的冠饰是袷。《古今注》曰：“帢(帢)，魏武帝所制，初以章身服之轻便，又作五色帢，以表方面（指军队的各方面军）也。”《三国志 · 魏志 · 武帝纪》“敛以时服”裴松之注引《傅子》曰：“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细绢）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又《晋书 · 五行志》载：“初，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这些记载说明,帢的使用面很广，功能也很多。既能以色表明武官的品级，又可区别军队的各方面军。它的式样前后也有过一些变化。从出土的陶俑上可以看出，其形象与我国30年代流行的瓜皮帽很相似。做帢的材料，除了缣之外，可能也用皮或毡，南北朝以后,帢逐渐演变成丧服冠（图F—10）。

幅巾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前引《武帝纪》裴松

①

②

③

图F—10

之注引《傅子》:“汉末王公多委（厌之意）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这说明当时只有高级将帅才能使用幅巾，幅巾的系裹方法可能与隋唐的幞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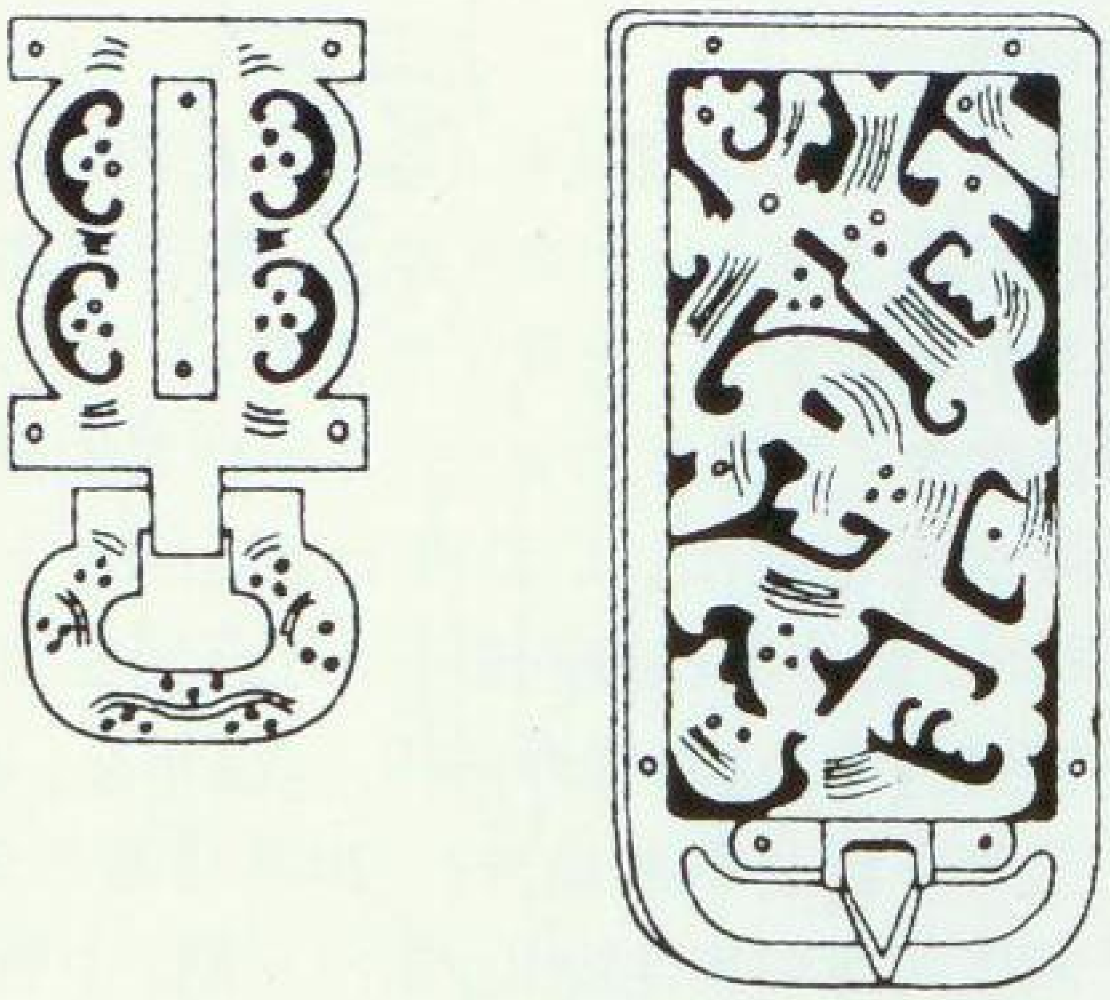
军人一般都穿圆头靴，靴尖不起翘。铠甲和戎服外均束带，带用带扣系束。魏晋时期由于马具的不断完善，出现了活舌带扣，活舌带扣很快取代了使用有二千五百多年之久的带勾和后来的死舌带扣，广泛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受少数民族的影响，还开始在革带表面钉缀饰件。这种饰件称铐，可以用金、银、铜、玉等多种材料制成。铐下附有马蹄形环，用于佩挂武器和其他物品。东汉后期，中原地区使用了数千年的璏式佩剑法，由于带扣的运用而改变为悬挂式，这种悬挂式又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图F—11）。

④

⑤

图F—10 恰的各种形象①、②、③《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登载的晋俑头像。④：武汉黄陂滠口晋墓出土持盾武士俑。⑤：南京晋墓出土东晋持盾武士俑，南京博物馆藏。

自汉代打破了五行定色法以后，后继的朝代便无法严格按照相生相克的理论来制定服色，只能采用刘邦的办法，利用一些所谓吉兆瑞符，来牵强附会地解释、决定应属何德。据《通志略·礼略》记载，魏尚土德，服尚黄；而晋尚金德，服色尚白。由于魏晋时期各种形象资料较少，事实究竟如何，目前尚难以断定；但从已掌握的部分材料来看，基本还是与文字记载相符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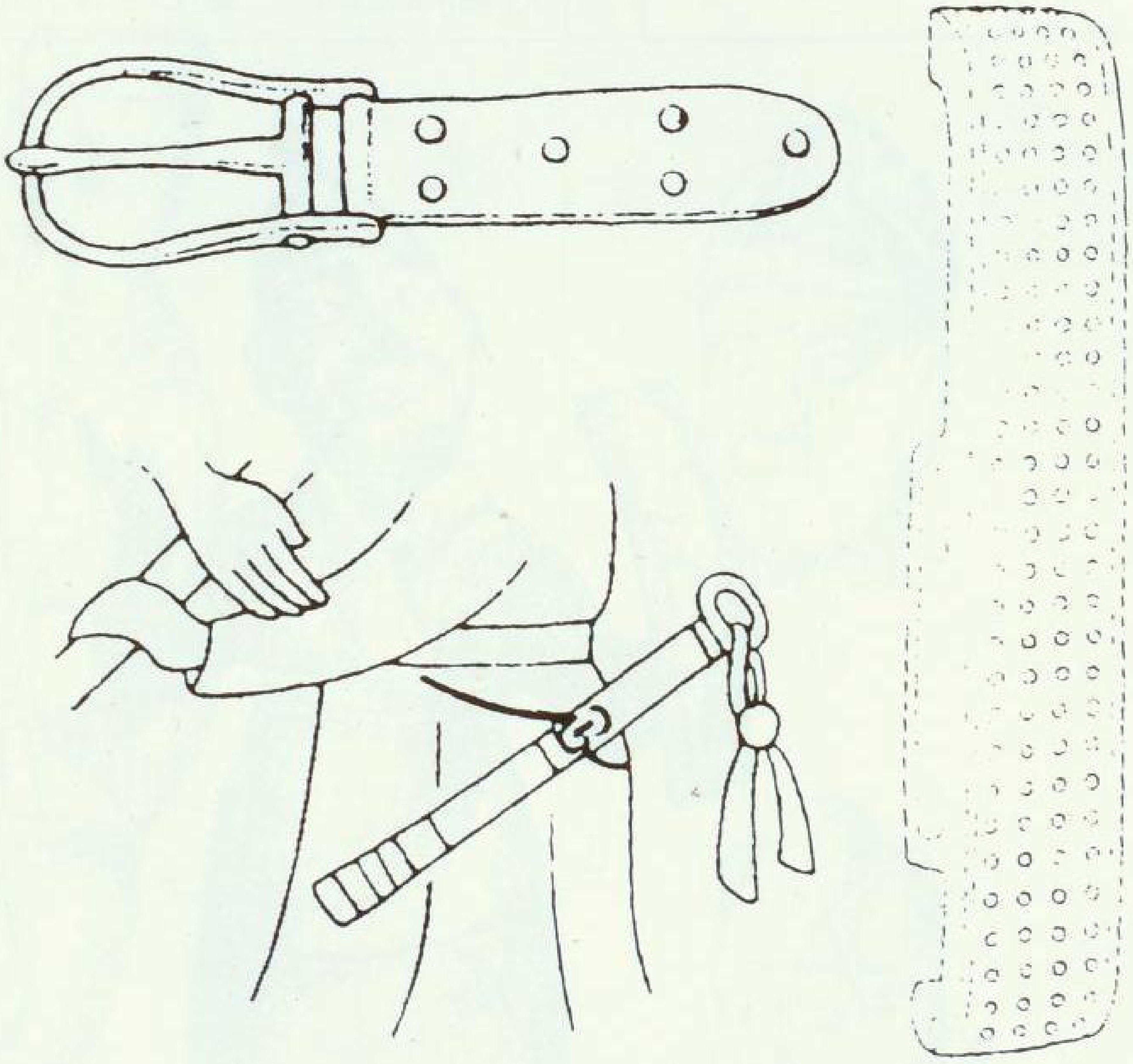


图 F—11 上：洛阳晋墓出土，鎏金铜銙(左)，鎏金铜带扣（右），录自《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中：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出土银带扣，录自《文物》1984 年第 6 期。下左：山东临沂白庄出土东汉画像石上的佩刀者。下右：汉代装于剑鞘上的玉璏。

南北朝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河北吴桥北朝墓、洛阳北魏元邵墓俑复原，胄采用呼和浩特市出土实物，戎服根据河北磁县东魏墓和元邵墓等出土武士俑复原。兵器采用宁夏固原北周墓出土实物，马铠根据河南邓县出土画像砖上的形象，参照日本出土的马面帘实物复原、设计。

南北朝

（公元 420 年—公元 589 年）

历史上把公元386年至581年间在北方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称为北朝，420至589年在南方建立的南朝宋、南齐、梁、陈等称为南朝。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魏立国的时间最长（148年），影响也较大。这些割据政权之间经常发生残杀和兼并战争，开国帝王无一不是手握重兵的将帅，因此往往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来促进和提高武器军备的生产，从而使武器装备生产在这一时期内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铠甲方面，这一时期不但种类多样，而且质量和制造技术也很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铠甲是两当铠。《释名·释衣服》曰："两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两当甲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大甲片的多为皮甲，前后两片甲在肩部，左右两侧不相连接，背甲上缘钉有两根皮带，穿过胸甲上的带扣系束后披挂于肩。胸甲上缘左右两角微

G—1 左：陕西汉中市出土西魏武士俑，身上的两当甲好像是皮甲，西安历史博物馆藏。右：河南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持盾武士俑，洛阳市博物馆藏。两图均据实物写生。

图 G—1 两当甲的形象左：山西太原南郊北齐墓出土武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右上：河北曲阳北魏墓出土武士俑，录自《考古》1972 年第 5 期。右下：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负矢箙武士俑，录自《文物》1984 年第 9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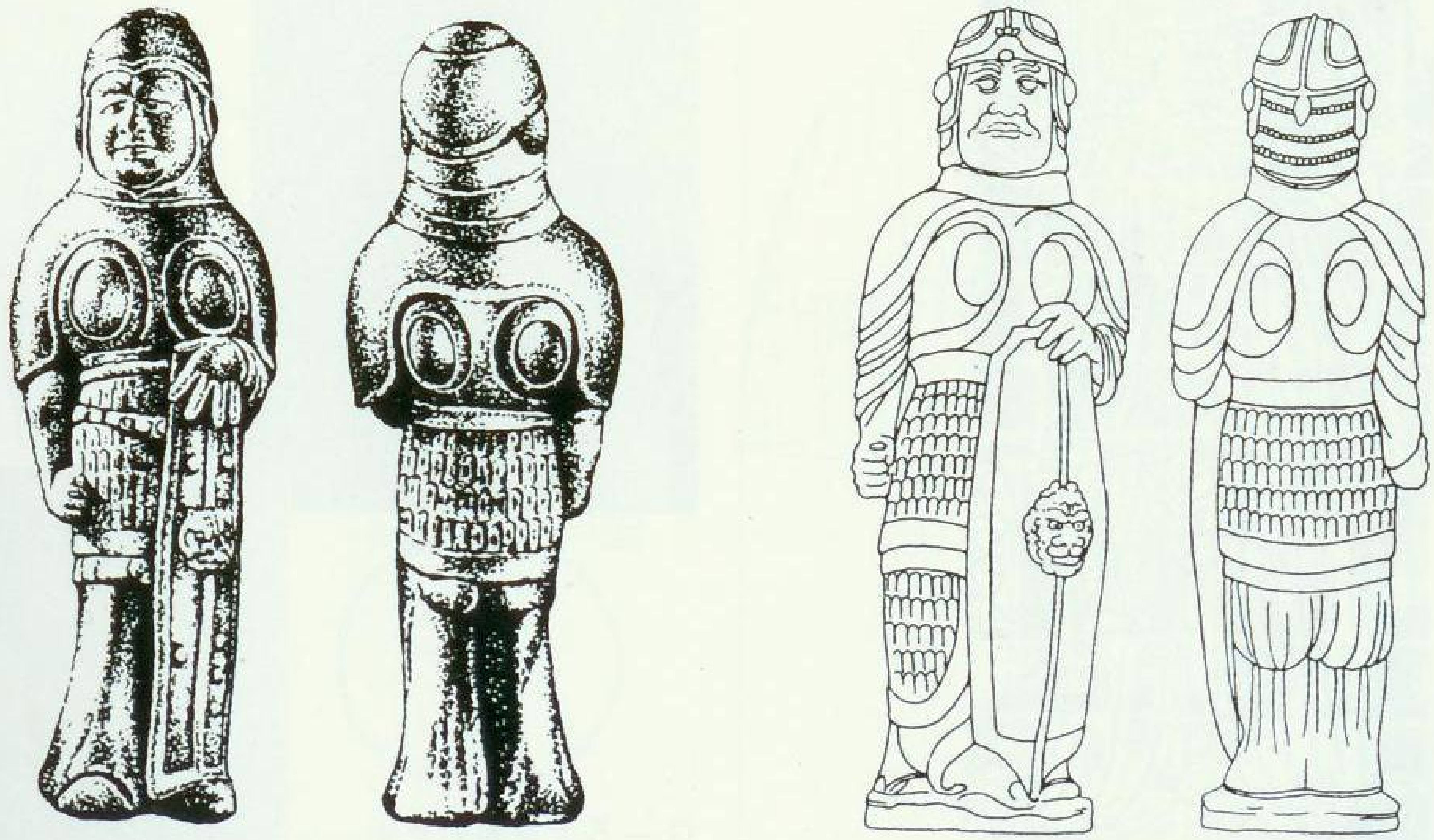
G—2 河北省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据照片绘制），录自《文物》1984 年第 9 期。

出，宽度超过胸宽，这是为了扩大胸部的保护面积，背甲上缘中间突凸形成一三角形，用于保护项部。腰部以下是用皮革制成的筒形短裙以代替腿裙，一般没有披膊（图G—1、彩图G—1）。两当甲是新一代铠甲，自两当甲始，出现了一系列新式铠甲。

大批南北朝时期的墓中出土的武士俑，都穿一种胸前背后有两面圆护的铠甲，这是明光甲。明光甲是一种比较精良、贵重的铠甲，不仅有披膊、腿裙，还有护项（由原来的盆领变化而来），防护面积明显比其他各种甲都大。除了胸背甲是整块的甲片外，其余都用小甲片编缀而成（图G—2，彩图G—2、3）。

明光甲其名，可能与胸背甲上的圆护有关。从魏晋时期起，铠甲已大都使用钢铁制造，但铁甲易锈蚀。为解决这个问题，制铠匠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钢铁防锈，除了髹漆还可以水磨，水磨以后不仅不容易生锈，而且还能产生明亮的反光（特别是在阳光下）。为了增强反光的作用，使对方因目眩而不能直视自己，从而给披甲者创造有利的攻击机会，于是别出心裁

G—3 北魏持盾武士俑（据实物写生，出土地点不详），河南省博物馆藏。



图G—2 左：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持盾武士俑，太原市博物馆藏。右：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持盾武士俑，河北省博物馆藏。

G—4 呼和浩特市北魏墓出土武士俑

地在胸背甲上特地安上两个凸出的圆镜。汉代的铜镜背面，常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取明与光之意，明光甲之名可能即由此而来。从穿这种铠甲的俑一般比同墓中其他俑都要高大这一点来分析，当时能配备明光甲的可能都是官品较高、兵种重要的武官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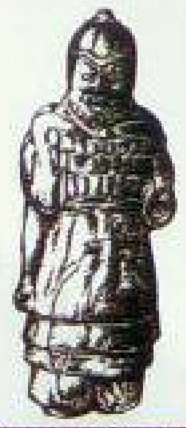
南北朝后期，明光甲开始用束甲绊束甲，以使铠甲较贴身，便于行动。束甲绊的材料可能是皮条、丝线或绢帛。束甲时将甲绊套于领间，在领口处打结后向下纵束，至腹前再打结，分成两头围裹腰部后系束在背后。这种束甲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末（参见彩图G—5）。

黑光甲与明光甲同见于东汉末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两种甲可能是相同类型，区别在于前者胸背甲上没有圆护，甲面用漆漆髹，犹如汉代时的玄甲。因找不到比较详细的文字描述，上述看法就作为参考，其形制参见图G—3。

除了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铠甲以外，魏晋时期的筒袖铠也仍在继续使用，从一件制作比较粗劣的北魏俑上，可依稀分辨出仍保持着的原来形制（彩图G—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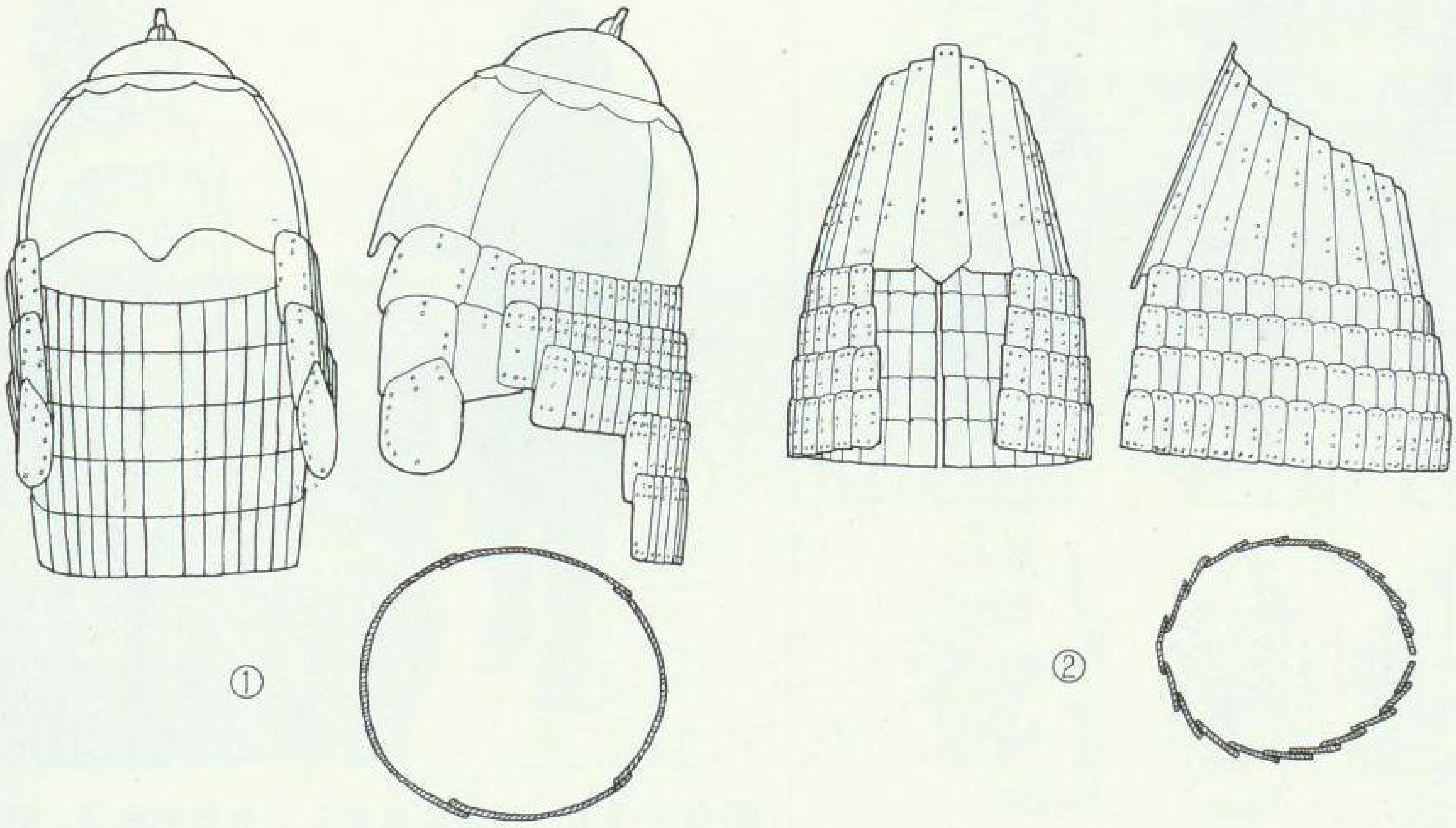
图G—3 江苏丹阳出土南朝墓室砖画，录自《文物》1980年第2期。

G—5 河北邯郸北响堂寺北齐石刻（第三窟中心柱宝床下小龛内神王雕像）



G—6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具装甲骑俑，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保护头部的有兜鍪、胄、盔等。兜鍪仍像魏晋时那样，顶部是一个半球形的胄顶，兜体用小甲片或几块大甲片拼制而成，但顿项（兜鍪两侧和脑后下垂的、用于保护面颊与后脑的装置）明显加长，有的包裹整个项部，眉心间还有伸出的三角形护甲（彩图G—6）。这种兜鍪的实物在河北邺城曾有保存很完整的实物出土。1986年，邺城考古队在邺南古城址的朱明门外城壕中发掘出一批铁甲胄，其中有十二件铁兜鍪，按形制可分为二型，I型就是已介绍的魏晋时期的这一种（图G—4①），从复原图上可以看出，该兜鍪的顿项很特别，它的边缘并不是平齐的，内衬的材料不可能在这种边缘上做包边，只能自然下垂任其披垫于内。II型兜鍪无胄顶，其外形与制作方法很像汉代临淄齐王墓出土的实物，但它的顿项要比汉代大许多，顿项的周边甲片上有细密的孔眼，这无疑是给内衬织物包边缝纫用的。这件兜鍪的脑后还可以开合，似乎可以根据人头的大小进行微调（图G—4②，详见《邺南城出土的北朝铁甲胄》、《考古》1996年第1期）。胄则用生铁



图G—4 ① I型兜鍪正、侧视图，剖面图。②II型兜鍪正、侧视图，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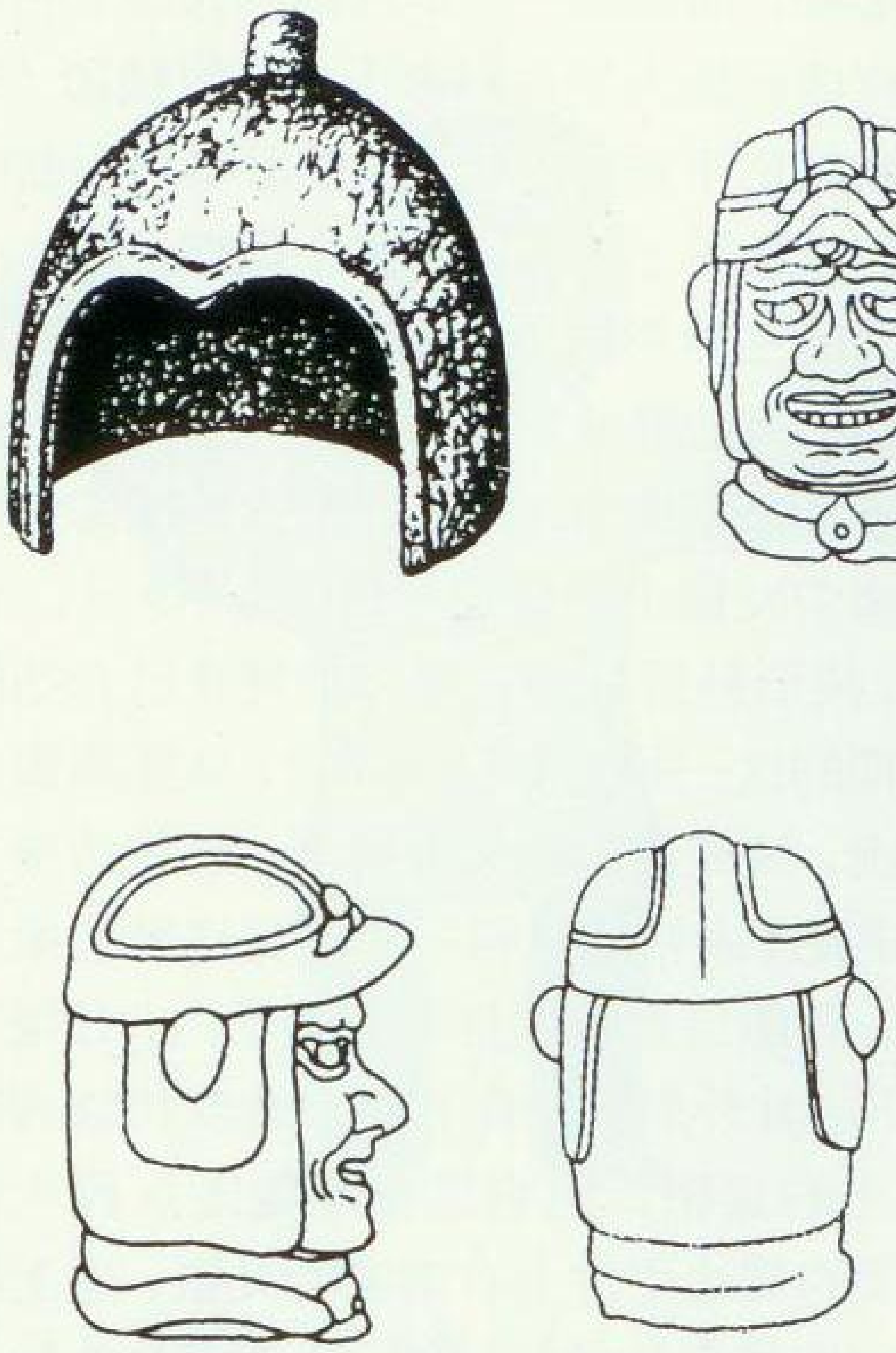


图 G—5 左：呼和浩特市出土北魏铁胄，呼和浩特博物馆藏。右：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录自《文物》1984 年第 9 期。

整体铸成，在呼和浩特曾出土过一件实物，其外形与彩图G—5陶俑头上的胄完全相同，胄顶的短管是插羽毛缨饰的（图G—5左）。盔的形制很有特点，一般以盔架铆上甲片制成（彩图G—3陶俑盔上的铆钉清晰可辨），前额有突出的冲角。这种盔有时可能也用铁架、皮革甲片铆合制成，在革制顿项的两耳处，有时为了便于耳朵听音还钉有圆形甲泡，甲泡上可能还开孔（图G—5右）。

在首铠中还有一种罩甲，可能用铁片，也可能用革片制成，缚于额前用于保护前额部（图G—6）。这种罩甲大概为一般不太重要的军种的校尉、士兵所配备，在唐宋时期的俑和雕像上偶尔也能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铠甲虽然大量使用铁制，但也仍用皮革，或者两种材料结合使用（参见图G—7）。其制作技术也有新的改进，北燕冯素弗墓中曾出土了多种残甲联片，甲片全用皮线缀连成排，每排上缘都包以皮边。经过包边的排甲联缀成甲衣后，不再会因为弯折而使上下甲片自行磨擦损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制甲工艺的精湛（图G—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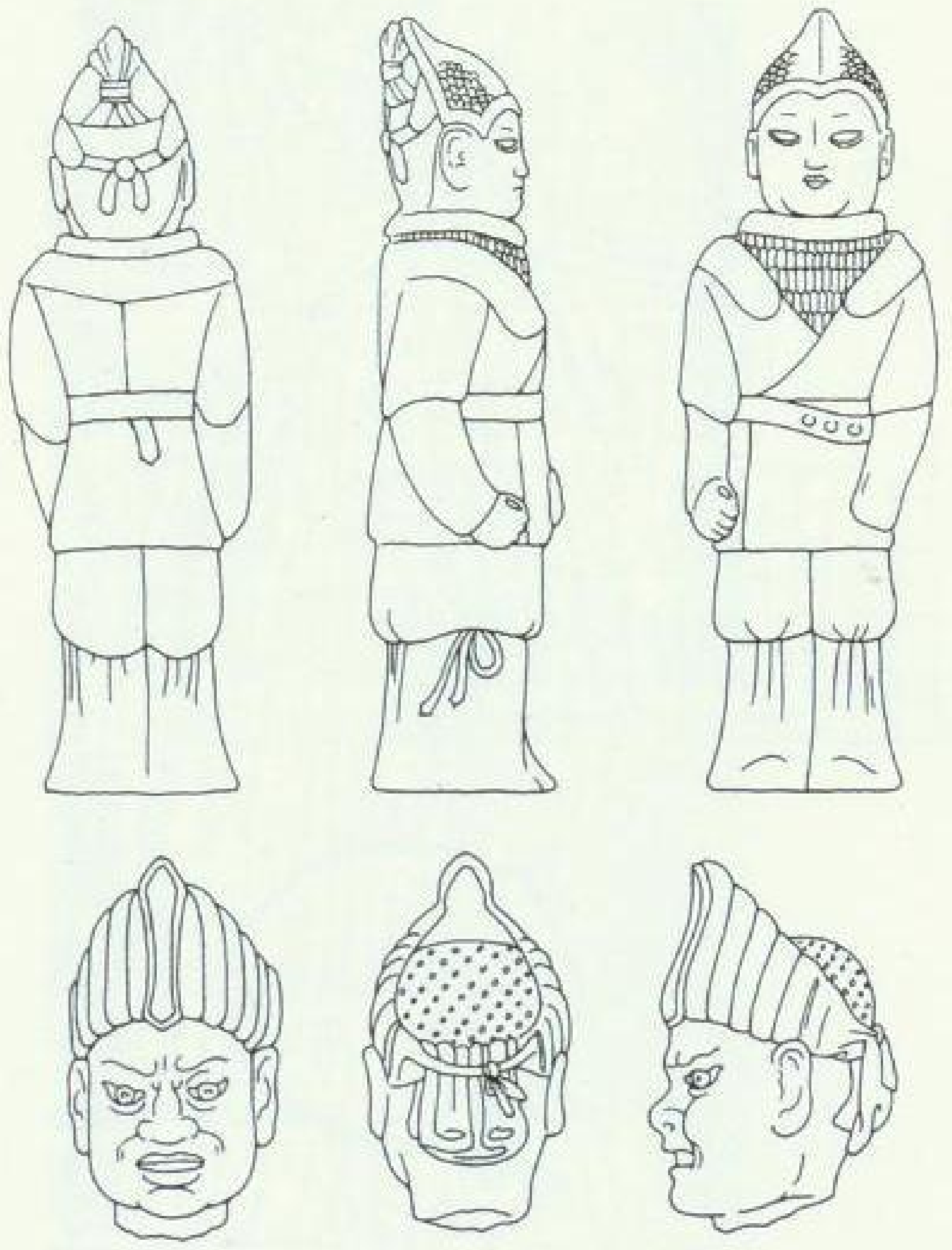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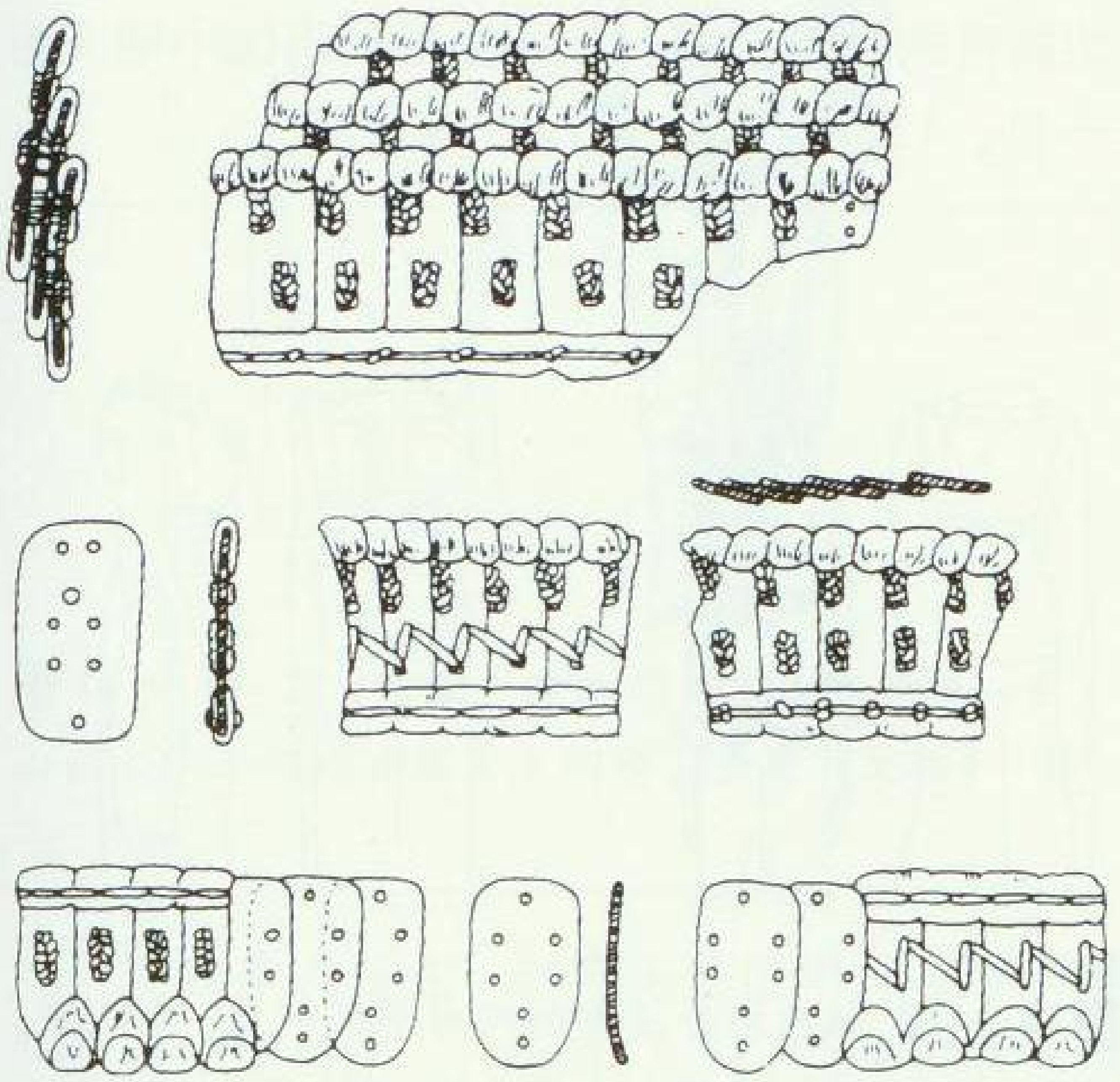


图 G—6 上：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出土侍卫俑，录自《考古》1990 年第 7 期。下：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这两种罩甲内均先用巾包裹头发，罩甲缚于头巾的外面。

图 G—7 左：陕西安康市出土南朝部曲俑，铠甲都用皮革制成，只有盔、甲裙上钉有铁制盔顶和甲泡，西安历史博物馆藏。右：山西太原北齐墓出土武士俑，胸甲是用铁甲片编缀的，甲裙和披膊则是用大块皮革制成，太原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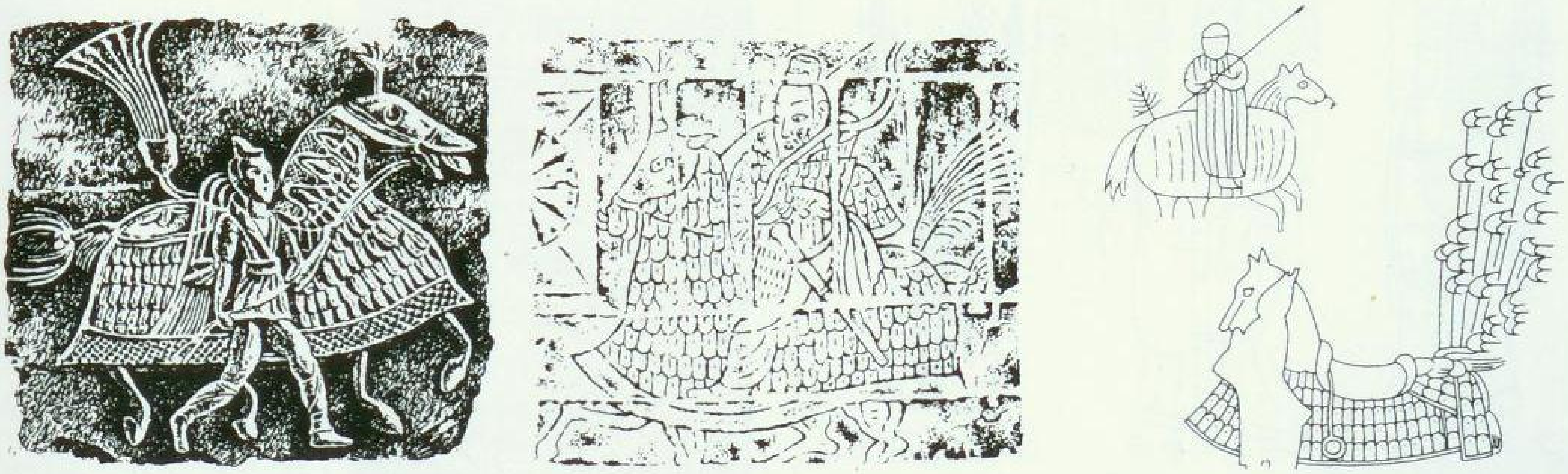


图G—8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铁甲残片实物，录自《文物》1973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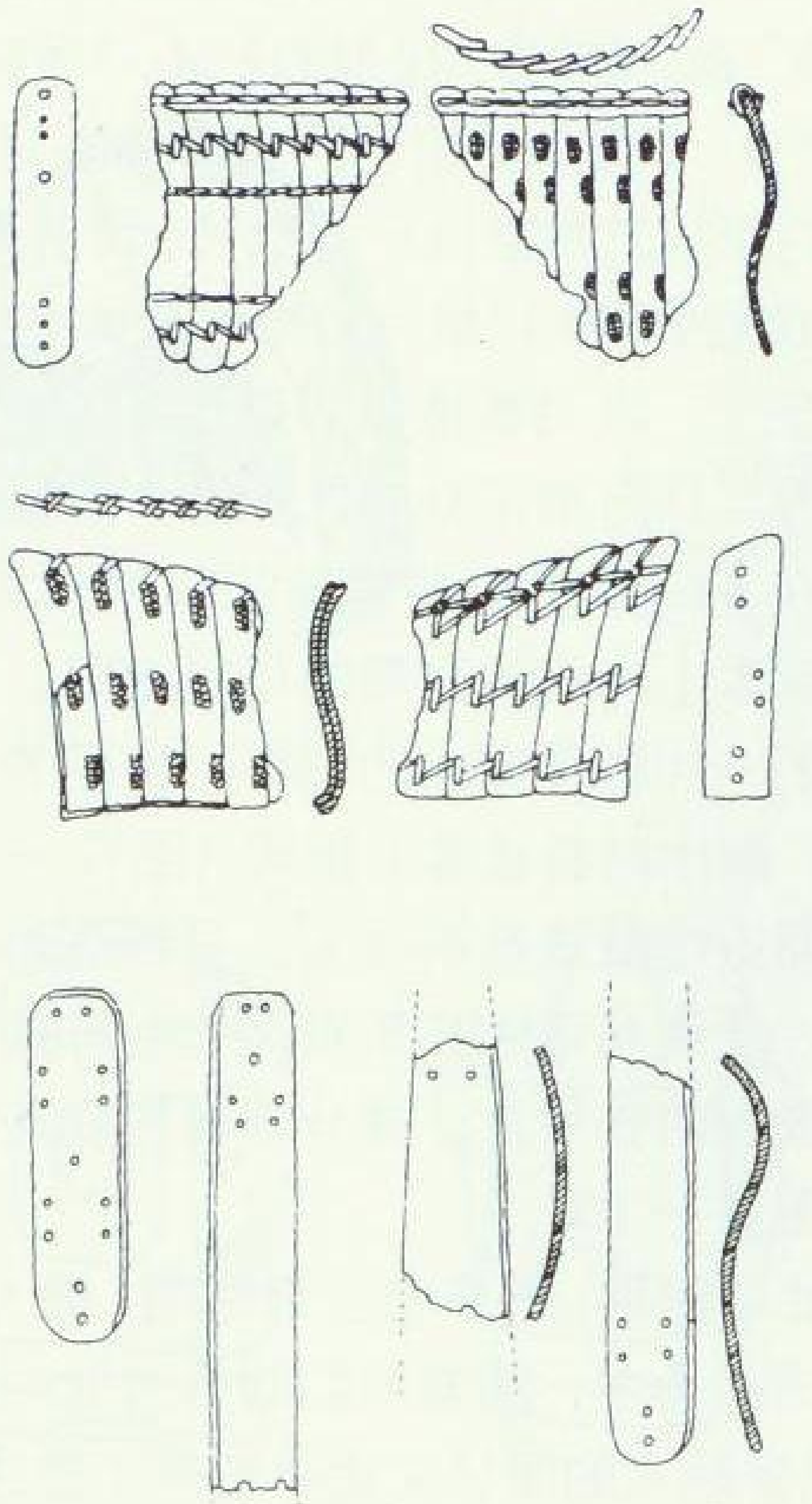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大量使用的铠甲，就是“具装”铠。《宋史·仪卫志》曰：“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文字资料证实，这一时期的骑兵常常数以千、万计地装备具装铠。《晋书·姚兴载记》记姚兴击败乞伏乾归时，“收铠马六万匹”。人马都披铠的重装骑兵是当时军队的主力。从河南邓县和江苏出土的画像砖以及数量众多的甲骑具装俑上的马铠形象来看，其形制基本上与战国时期的马甲相同，只在马尻部多了一件称作寄生的装饰。寄生的形状多种多样，制作材料也各不相同（图G—9），南北朝后期寄生就逐渐淘汰了。马铠这时大部分用铁制，北燕冯素弗和集安高句丽等墓中出土的尺寸很大的铁甲片，据分析可能就是具装铠甲片（图G—10）。

南北朝时期，很多帝王都是胡、羯人，其军队也以胡人为主，随着他们的势力向中原地区扩展，很多胡人的服饰文化也被带了进来。因此南北朝时期的戎服很具特色，不仅样式多，融合了多民族的服饰，而且因武官制度进一步完善，官兵在服饰上有了更明显的区别。当时有很多戎服的式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以裲裆衫最为突出。

《隋书·礼仪志》载：“陈皆采梁之旧制。……直阁将军、诸殿主帅朱服武冠，正直绛衫，从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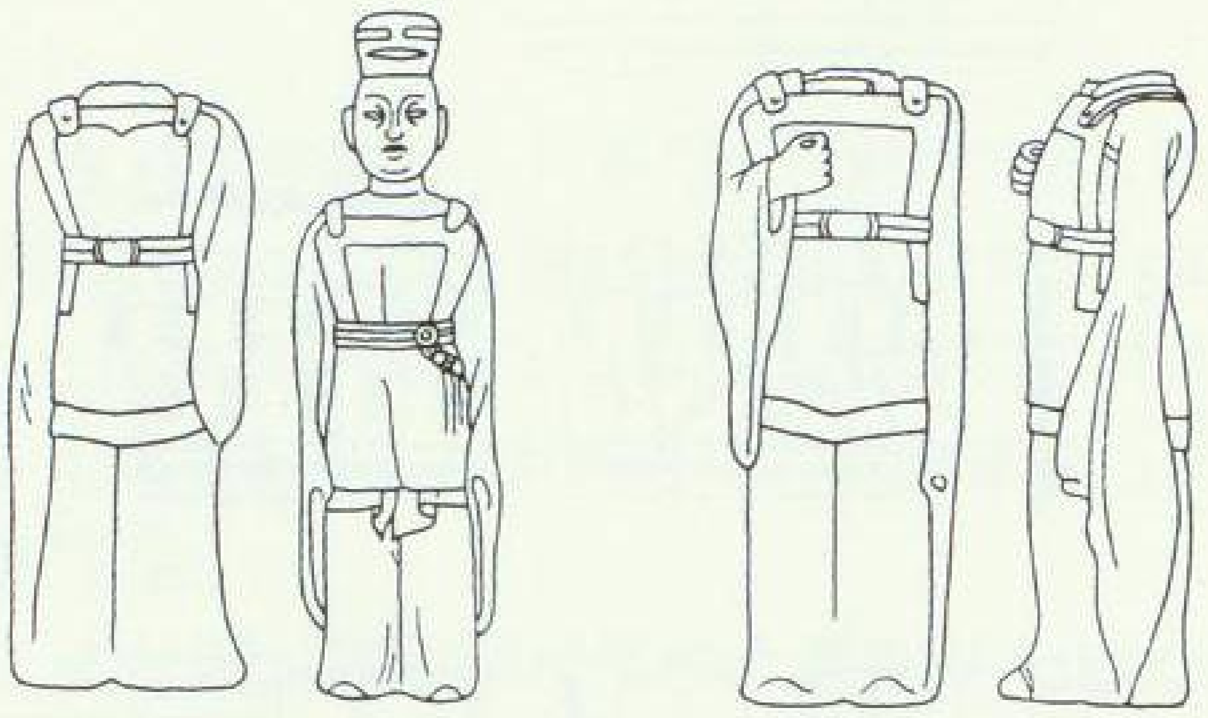
图G—9 左：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录自《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江苏镇江出土南朝墓画像砖拓片，南朝甲骑具装，镇江市博物馆藏。右上：云南昭通东晋霍承嗣墓壁画上的寄生形象。右下：高句丽铠马冢壁画上的寄生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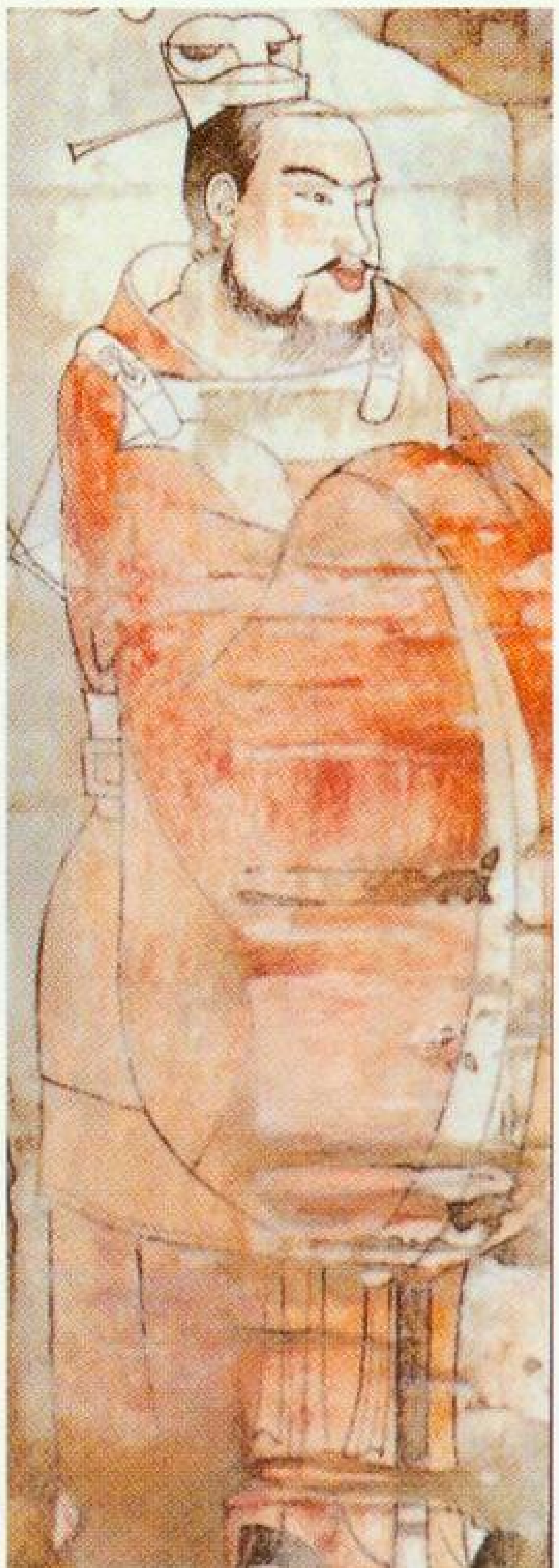
图G—10 上、中：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大型铁甲片，录自《文物》1973年第3期。下：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大型残甲片，录自《考古》1977年第2期。

图G—11 左、右衽式裲裆衫。左：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武士俑，录自《考古》1977年第6期。中：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壁画，录自《文物》1985年第11期。右：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武士俑，录自《文物》1983年第10期。

裲裆衫。”这种裲裆衫长至膝上，直领宽袖，左、右衽都有，原来可能是作为两当甲的一种内衬戎服，军官和士兵都可服用。后来武官在裲裆衫外披上与两当甲形制完全相同的布制或革制两当，作为武官的公事制服，一直使用到唐代中期（图G—11、12、彩图G—7）。



图G—12 裲裆衫外披布制两当甲的形象。左、右都是河北吴桥北齐墓出土武官俑，录自《文物》1984年第9期。



图G—7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门吏像（据照片绘制），身上所披的两当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布制的。

图 G—15 左：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仪仗俑。右：山西太原南郊北齐墓出土陶俑，录自《文物》1990年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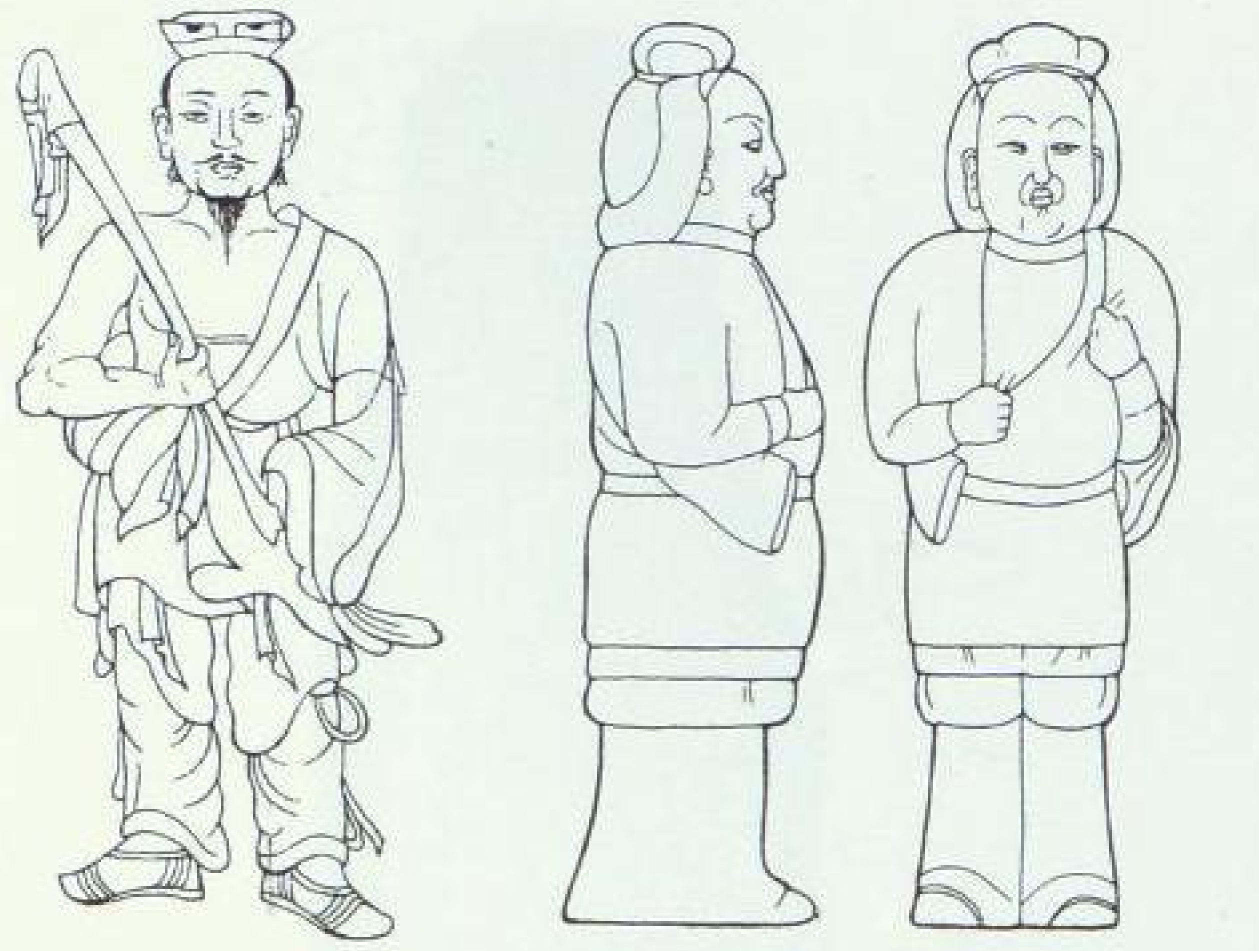


图 G—14 左：裲裆衫袒露一臂的穿法，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壁画，录自《文物》1984年第4期。右：河北磁县湾漳北朝陶俑，短袖襦袒露一臂的穿法，录自《考古》1990年第7期。

短袖襦也是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的戎服，其形制更具胡服特点：小袖口，左衽、右衽或前开襟，大翻领，单、棉都有。棉的可能像秦汉时期的絮衣，河北等地出土的一些陶俑身穿的短襦上都划有交叉形线条，发掘简报认为这是模拟皮甲，笔者以为这种线条可能是表示固定棉絮的缝线，就像现代的切线棉袄。穿这种软甲的可能都是不太重要的兵种和普通士兵（图G—13）。穿短袖襦有时还袒露一臂，裲裆衫和帔风也有这种穿法（帔风这种穿法参见隋代）（图G—14）。

襦袍一般穿在短袖襦或铠甲内，也可直接穿在外面。衣长至膝，圆立领，衣襟在领右侧垂直向下，窄长衣袖，单、棉都有。棉的袖长盖手，这是北方民族服饰的特点，作用应是为了手的保暖。这种长袖在金代戎服中依然流行，清代时，更变化成能卷起放下的马蹄袖（图G—15）。

北朝墓中出土的武士俑，披帔风戴风帽的很多，反映出当时这类服饰使用很普遍，这可能与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帔风与汉代不同，它的形制像一件大衣，有领和袖，但穿时一般袖都空悬，并不套入。衣领在颔下交叉，用带或扣系接，长及小腿中部（彩图G—8、9、10）。

戎服裤基本沿袭东晋样式，一般都是大口裤，裤脚在膝下用带扎住，称为“缚裤”，“缚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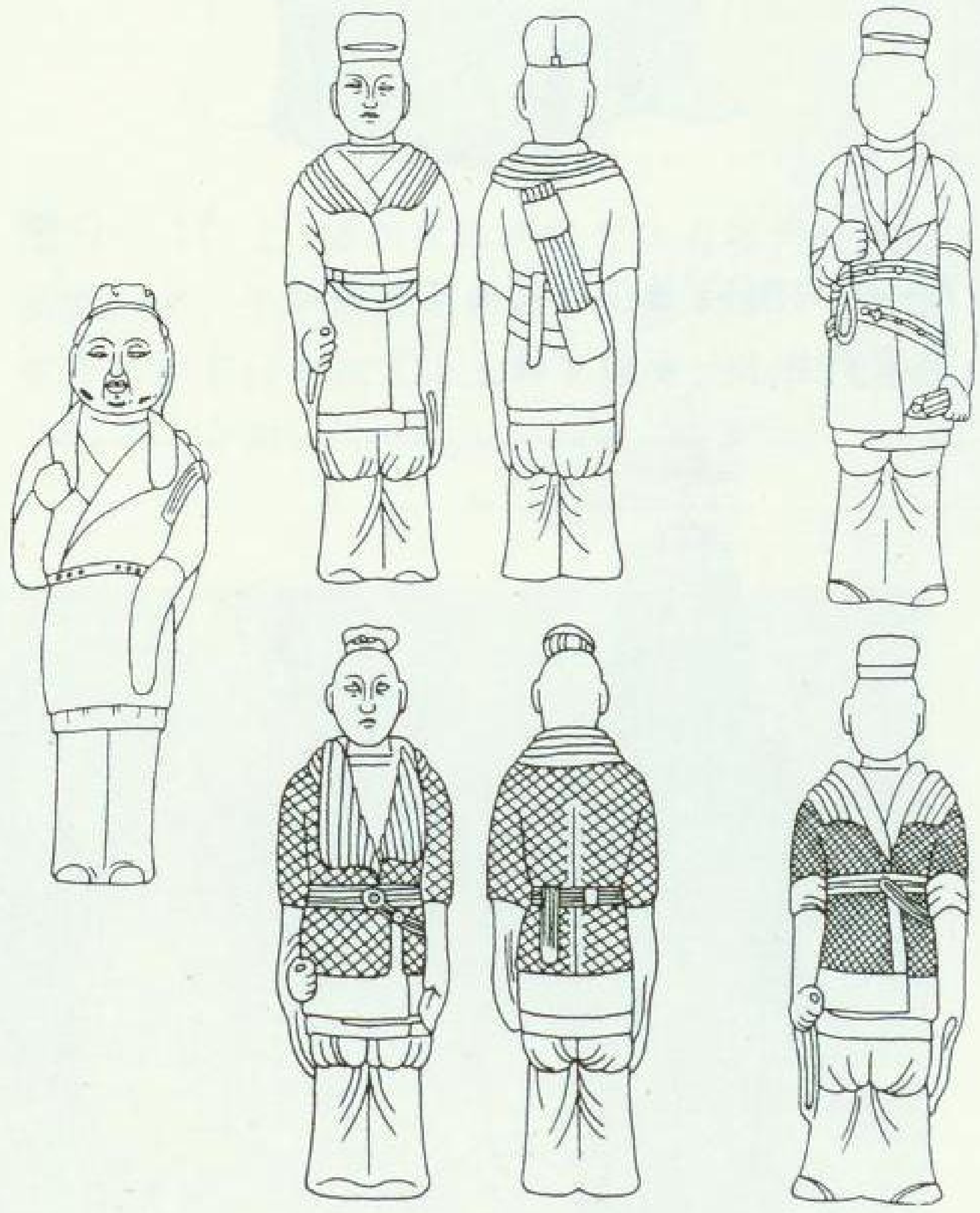


图 G—13 左：山西寿县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武士俑，襦为右衽，录自《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中上、下：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襦为左衽，录自《文物》1984年第9期。右上、下：河北磁县东魏墓出土武士俑，上为前开襟，下为左衽，录自《考古》1977年第6期。

G—8 同图9，该俑的侧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垂于一旁的空袖。

不舒散也”（《旧唐书·舆服志》，彩图G—11），有时也用行缠（图G—16）。除大口裤之外，还有直统裤，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壁画上的仪卫武士均着直统裤（参见图G—14左），脚上穿圆头皮靴或尖头履，以穿靴为多。

戎服的冠饰以平巾帻、帽较为普遍。平巾帻的形制在魏晋时期变化成一种小冠，后部突起，以笄固定于发上（详见图G—17）。帽有合欢帽、突骑帽、风帽等几种。合欢帽之名见于《邺中记》：“石季龙出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其形象参见图G—18②。突骑帽之名见于《隋书·礼仪志七》：“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像也”，其形象参见图G—18②、③、④。风帽一般与帔风同时使用。还有一些名称无考的小冠和帽，也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武士俑、仪卫俑头上（图G—19）。

戎服、铠甲外均束革带，带用带扣扣束。带扣经过魏晋时期的改进以后，其外形、结构已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完全相同。束带时，习惯把带扣束在腰的左侧或右侧，而不像现代是放在正中间。带扣后面往往拖有很长一段带尾，横过前腹，绕过左胯，在背部把带头从下向上插入腰带，正

G—9 北齐将军俑，帔风穿在身上的正面形象，选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G—10 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武士俑，帔风与G—8略有不同，领为厚棉领，洛阳市博物馆藏。

图G—16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壁画持刀武士像，脚上为行缠。

图 G — 18 ①突骑帽形象之一，洛阳古墓博物馆藏北魏彩绘仪卫俑。②③突骑帽形象之二、三，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④合欢帽形象，西安草厂坡北魏墓出土佩弓武士俑，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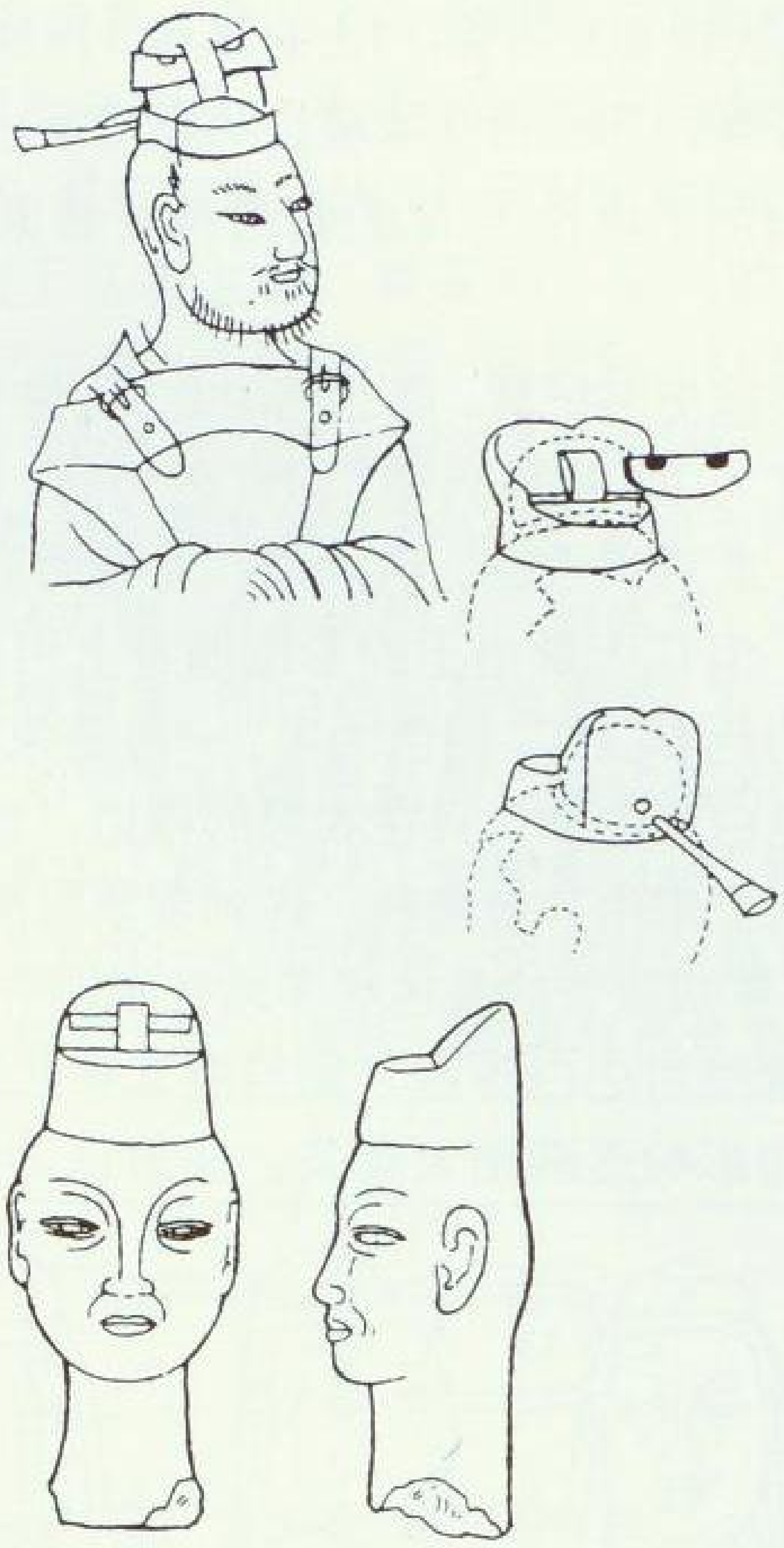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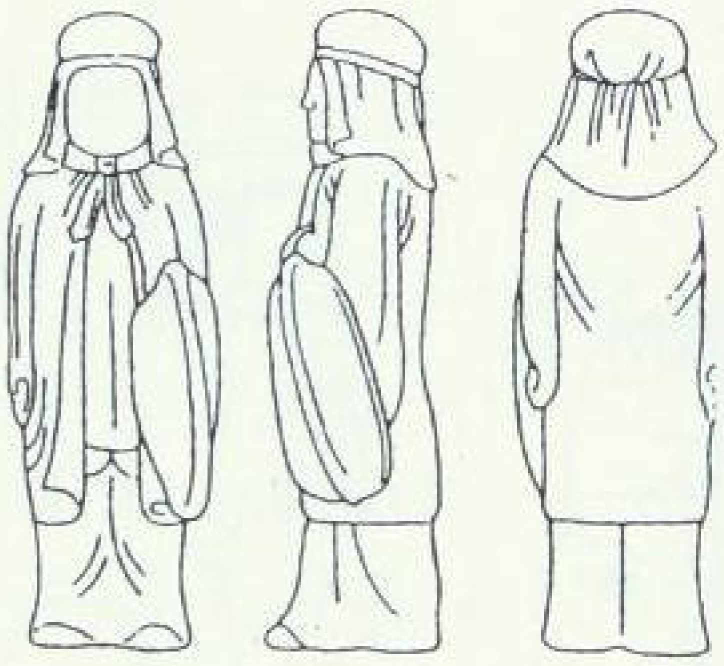


图 G — 17 上：洛阳出土北魏升仙石棺前档石刻画像。中：平巾帻戴法示意图（供参考）下：江苏丹阳金家村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录自《文物》1980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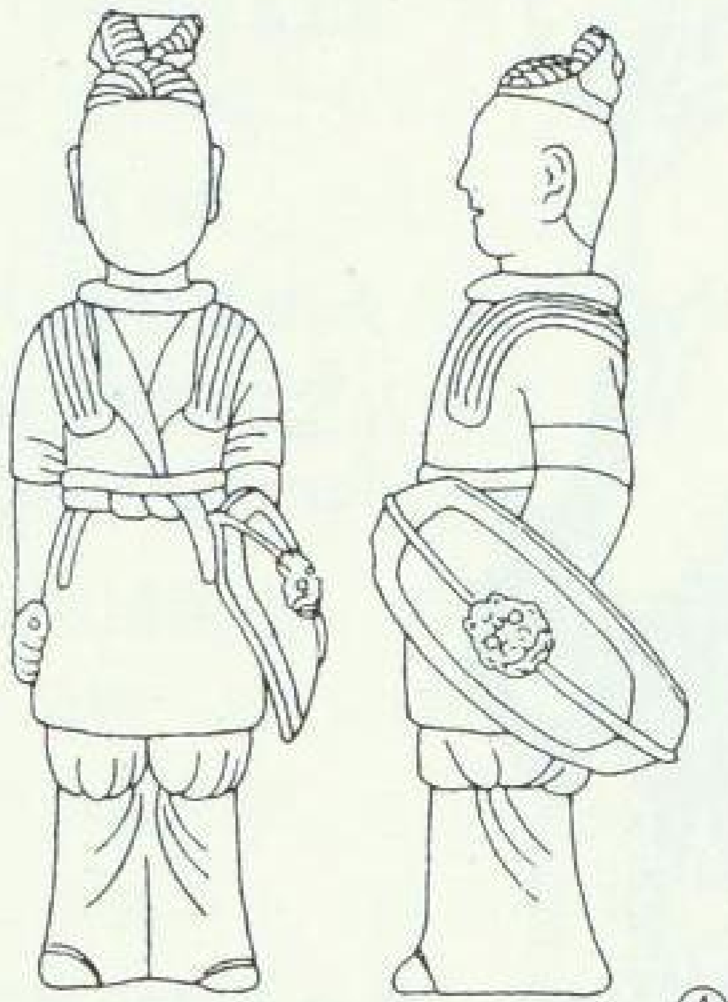
G — 11 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两武士均头戴平巾帻，着大口裤，缚裤。

如《孔氏谈苑》所说："古有革带，反插垂头。"革带表面钉饰的銙件数量也明显增多，带尾末端还增加了称作铊 尾的新銙件（参见图G—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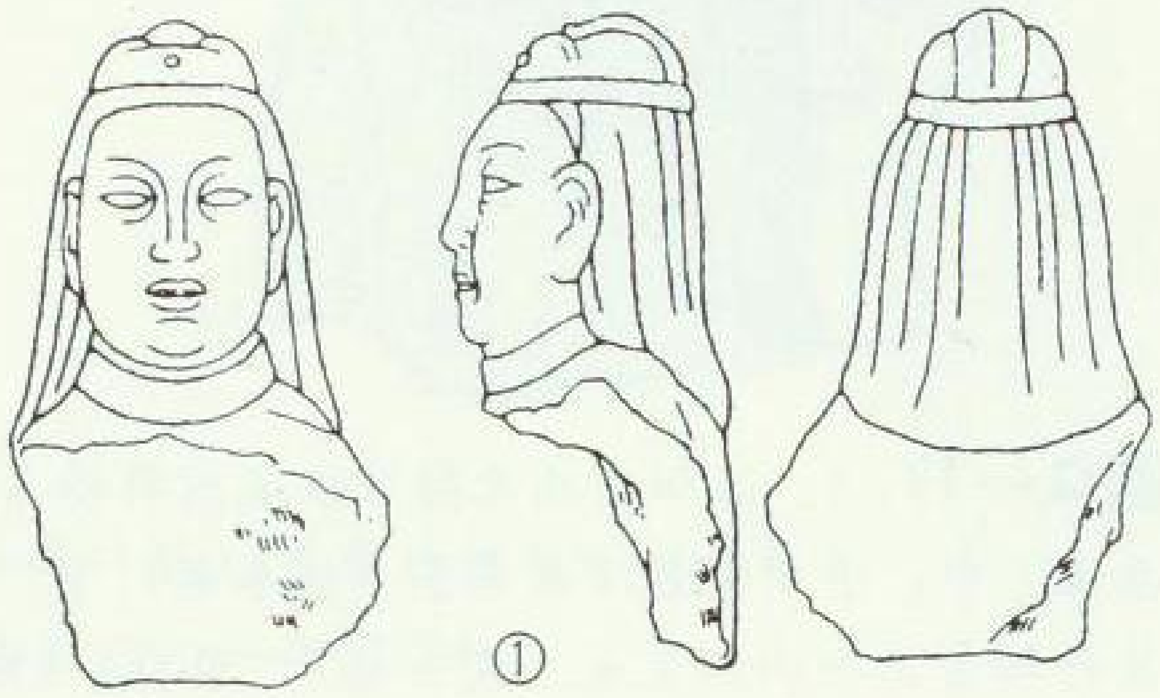
根据史书记载，南北朝中北齐、陈尚木德，色以青为主；梁属火德，以红色为尚；南朝宋、西魏、北周用水德，色尚黑；北魏为土德，色尚黄。但从大量出土的彩绘俑身上可以看出，戎服的色彩以红、白色为主，一般是朱衣白裤，有时是白衣白裤，只在衣服的镶边、铠甲外缘的包边上采用其他颜色。这种现象反映了汉代以后，军戎服饰的颜色更多地注重明亮、鲜丽；而大量使用红白等色，则与南北朝时期佛教、儒教的影响逐渐增大有关。儒教认为红、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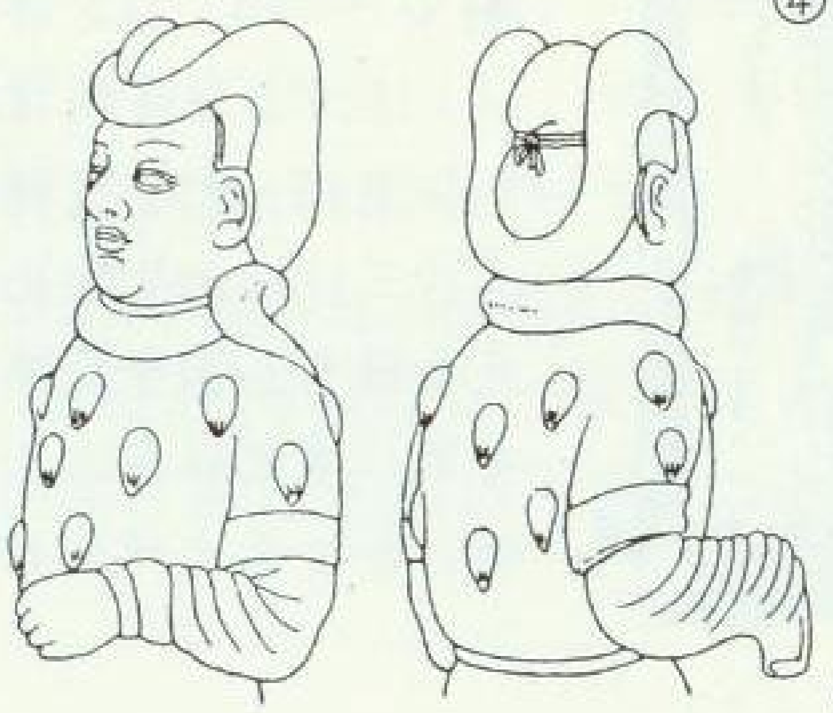
③



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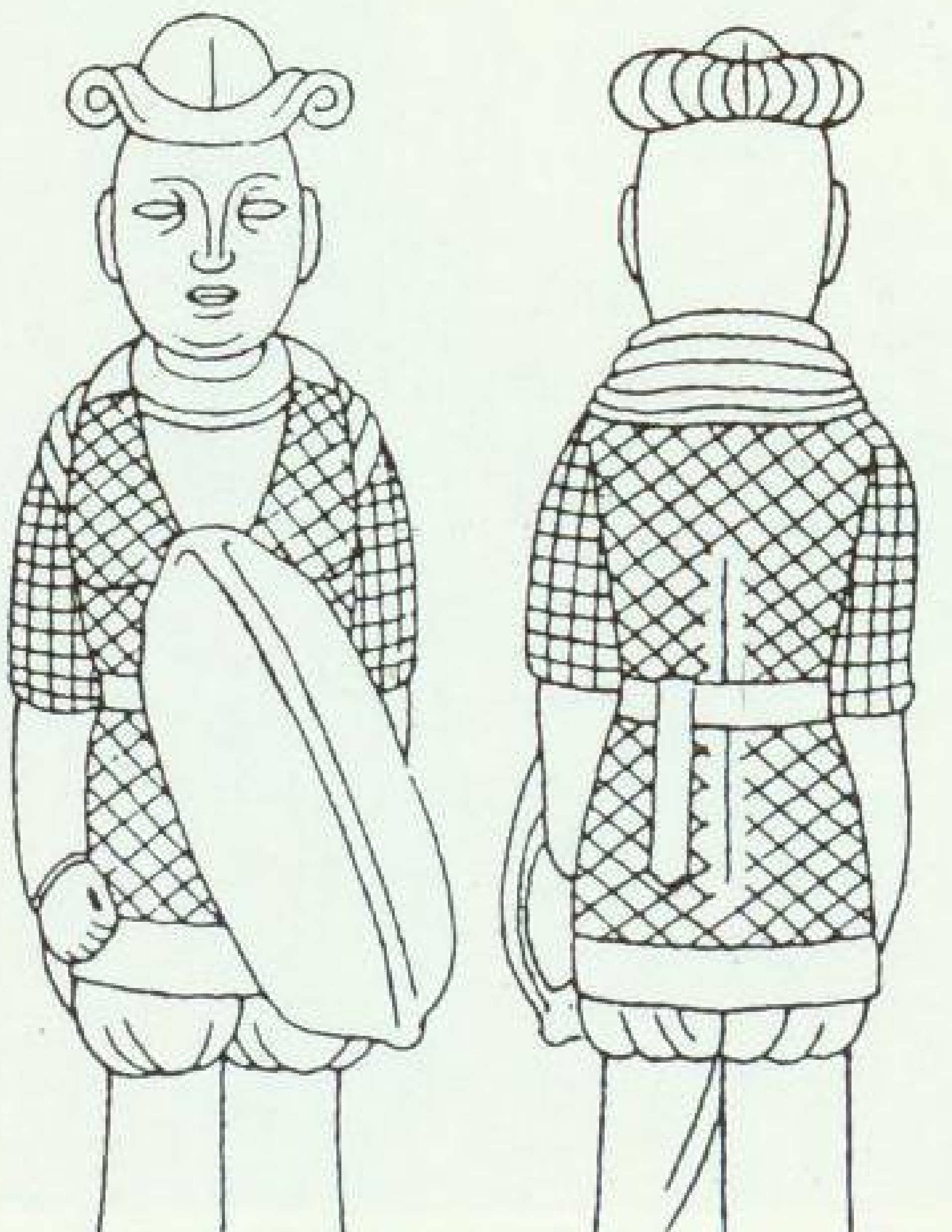


①



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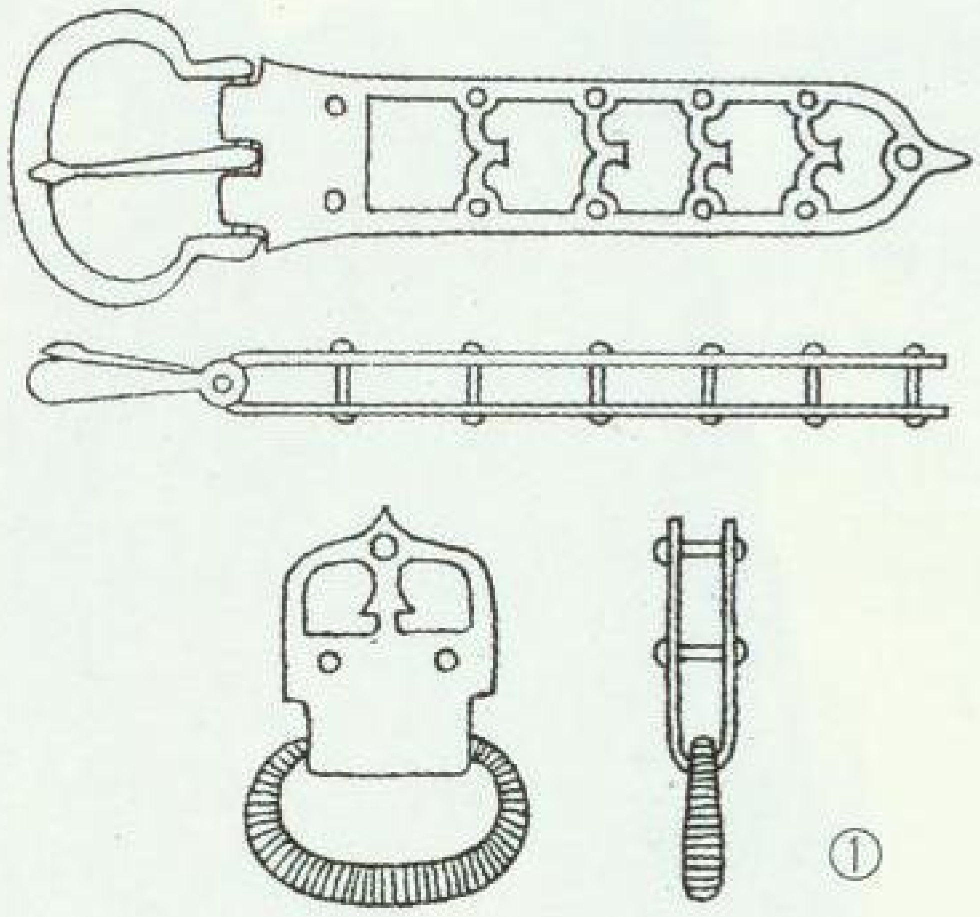
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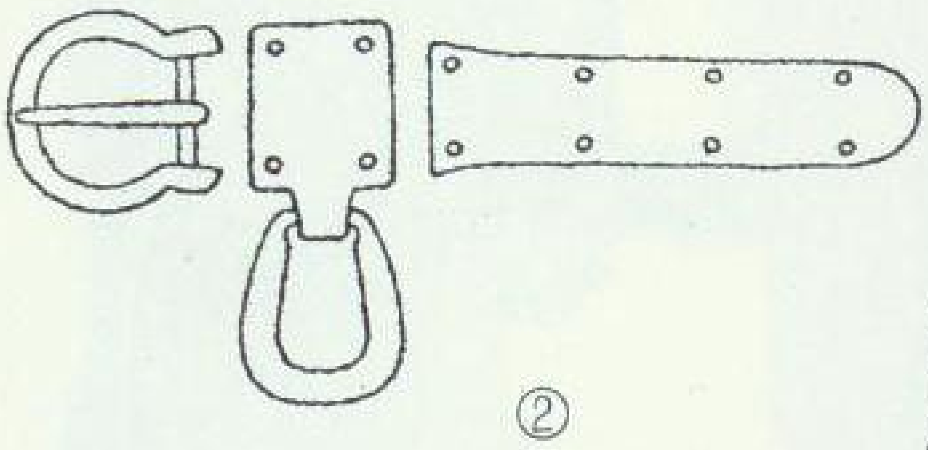
②

图G—19①③风帽形象，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风帽俑和俑头。②⑥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持盾武士俑和两种俑头。④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持盾武士俑。⑤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骑俑。②—⑥的冠帽名称都无考，②的形象看上去像皮革制成的小冠，④的形象很可能是一种发髻。⑤的这种帽在隋代时仍然使用，⑥上的小冠好像是用布帛裹发束成的形象。⑥下所戴应称为一种帽，从盖住半个耳朵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暖帽。

黑、蓝、黄是正色，其余由两种以上色相调配成的颜色是间色；凡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重要服饰，都应该用正色。孔子对于官服的紫色品级居于红色之上，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认为紫色是间色，决不能以此来压正色。戎服用红白等色，可能也含有其军队是正大、堂皇之师的意思。另一方面，红色能给人一种威烈、令人振奋的视觉效果；而白色却具有肃杀、不可侵犯之意，用于军队都能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冠、靴基本上都用黑色。铠甲则以金、银色为多，明光甲的一些边缘处，也常涂以金色，极少数的部位也配以湖蓝、绿等其他色彩。


①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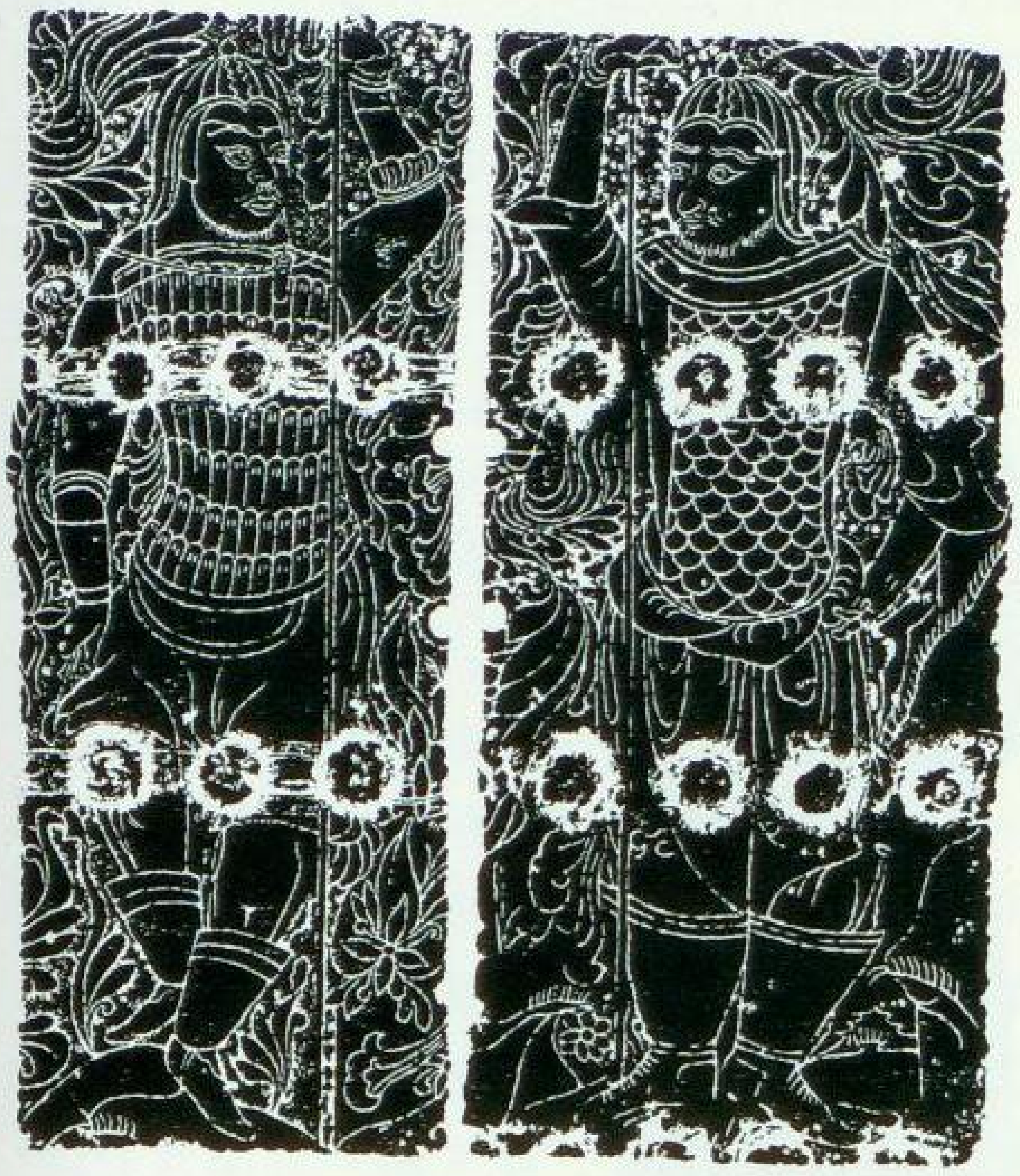

②

④

图 G—20 ①宁夏朝阳八宝村出土北燕时期的鎏金带扣、带銙。②河北定县北魏石函中所出带扣、带銙和铊尾。③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武士俑。④《历代帝王图卷》陈宣帝像中之执扇侍臣，图中腰带为反插垂头的形象。

隋代武士复原图

甲胄根据安徽合肥、亳县隋墓出土武士俑复原；戎服根据河南安阳、宁夏固原等隋墓出土武士俑实物复原；革带带具采用宁夏固原隋墓出土实物；兵器根据安阳等地出土瓷俑上的形象复原。



图H—1陕西省三原县隋李和墓墓室石门线刻画（拓片局部），两武士头戴式样相同的兜鍪，均穿两当铠和长靴，臂甲的式样也相同，只有两当铠的甲片和形制略有差别。

隋代

（公元581年—公元618年）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的、但是统一的封建皇朝。

由于建国时间短，在没有完成各种政治经济变革之前就已被推翻，因此很多方面还基本沿袭着南北朝的旧制，军戎服饰也是如此。

铠甲使用最普遍的仍是两当铠和明光铠。

两当铠的结构有所进步，形制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一般身甲全都用鱼鳞等形状的小甲片编制，长度已延伸至腹部，取代了原来的皮革制甲裙。身甲的下垂缘为半圆形，其下还缀有似用皮革制的弯月形、荷叶形甲片，用以保护小腹。这些改进使腰部以下的防护大大增强（图H—1）。

明光甲的形制基本上与南北朝时期相同，只是腿裙变得更长。安徽合肥出土的两件陶俑的铠甲腿裙长至脚背，而且垂于正面（参见彩图H—1），穿有这种腿裙的铠甲当不便乘骑而只能步战。步兵的甲胄装备已如此精良，骑兵当然更加坚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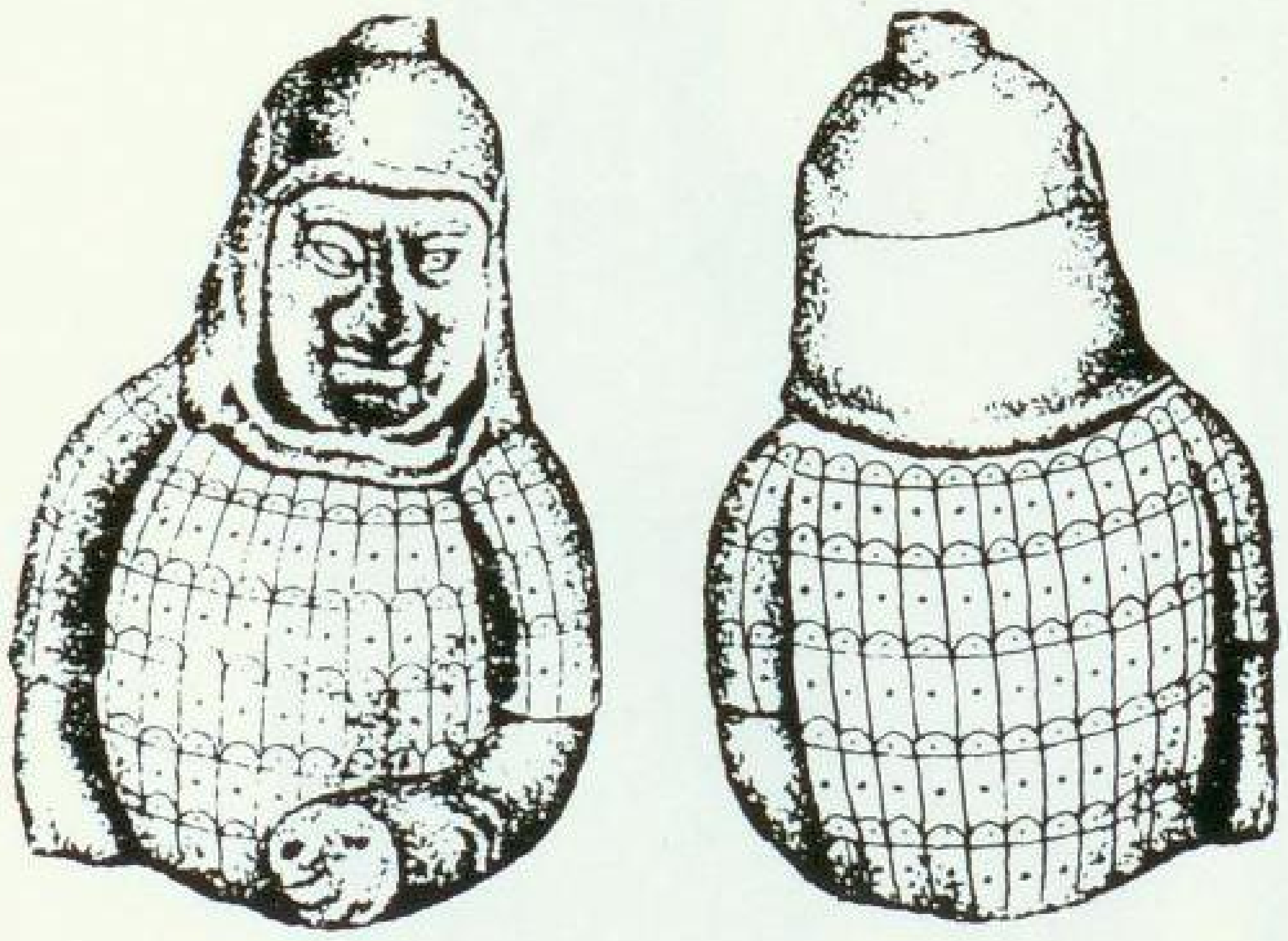
H—1安徽合肥西郊隋墓出土持盾步兵俑，选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湖北武汉出土的一件瓷武士俑身披的明光甲与兜鍪、顿项连成一体，就像现代的潜水服，其防护之严可见一斑（彩图 H—2）。

除了上述两种铠甲之外，也有胸背甲全部用铁甲片编缀的铠甲，这类铠甲是否即是记载中所说的黑光甲（图 H—2）。

可能由于连年战争，采矿冶炼等生产遭受破坏的原因，隋代还大量使用皮革制甲。《隋书·礼仪志》载："大业七年，征辽东……，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应为乌缨拂之误），建六驳旗。"这则记载表明，当时军队装备的铠甲有一半是皮甲。而根据多种形象资料分析，这时的皮甲实际上已不同于战国时期，并不一定全都用皮革制造，在各个要害部位都用了铁甲片来进行加固，其防护功能比纯粹的皮甲肯定要强得多。

H—2 湖北武汉出土持盾步兵俑（据照片绘制），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H—2 陕西三原隋李和墓出土残骑俑，陕西省博物馆藏。

H—3 河南陕县隋墓出土持盾武士俑，甲身部分铁制，其余好像都是革制（据实物写生），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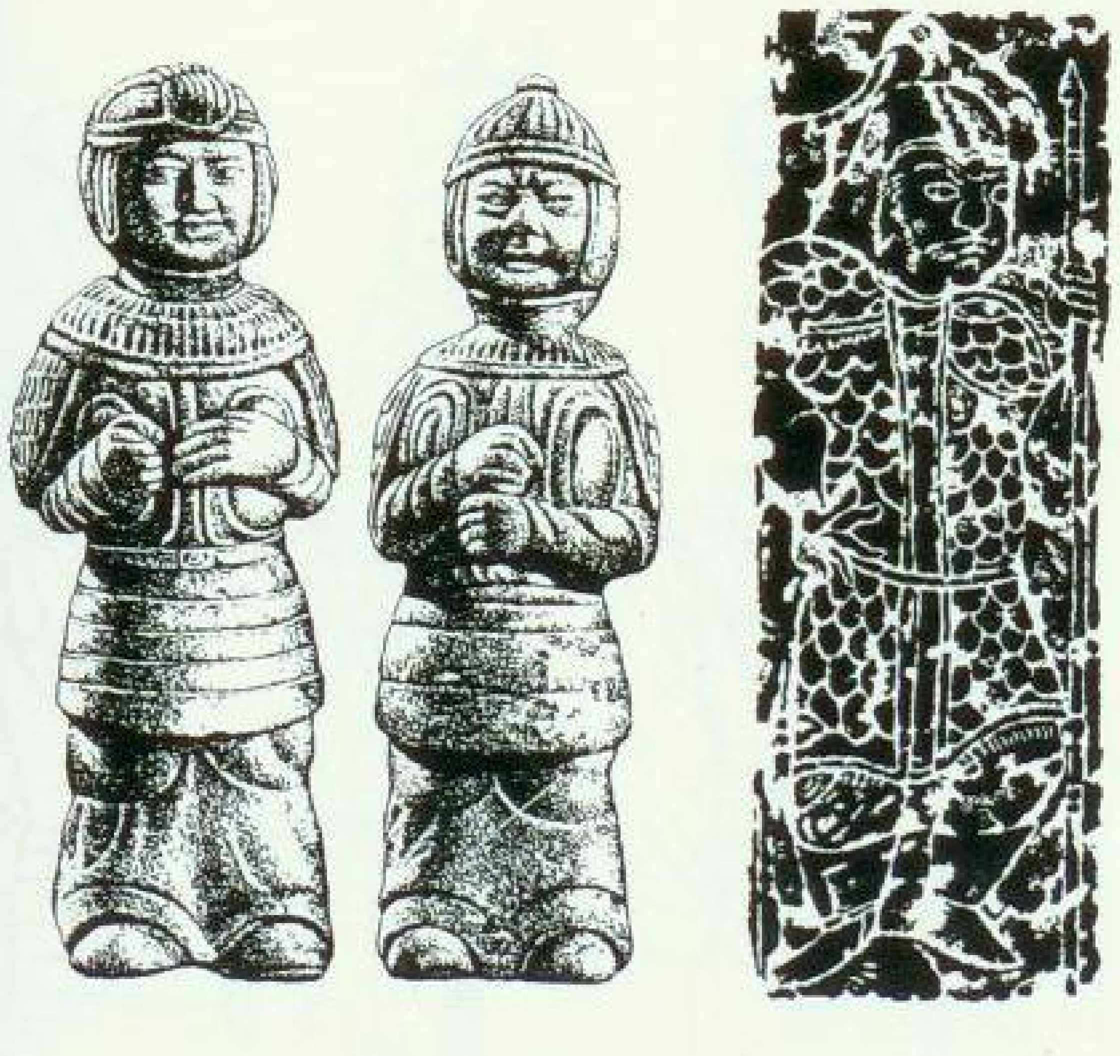
图H—3、彩图H—3、4的几件陶俑很明显地展示了这种皮铁合甲。当然，也会有全部用皮革制造的铠甲，陕西三原隋李和墓的石棺椁上有一幅线刻武士像，身上的铠甲还保留着汉代前开襟的形制，甲片也较大，很可能就是全部用皮革制造的皮甲（图H—3右）。

这时兜鍪、盔、胄除了继续采用南北朝时期的形制以外（参见图H—3、彩图H—1、3、4），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彩图H—2的那种像潜水服头盔的兜鍪，就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首铠。

作为铠甲部件的臂甲，这时出现了轮箍型的样式，较之薄片型的应该更加坚固。敦煌莫高窟420窟壁画上有一幅隋代武士图，胫部好像还有胫甲（图H—4）。胫甲见载于《汉书·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注引"服虔曰：'作大甲三属，竟人身也。'苏林曰：'兜鍪也，盆领也，髀裈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裈一、胫缴一，凡三属也。'"其中胫缴即胫甲，战国时期所用胫甲已由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胫甲得到了证实，但其后直到南北朝，各种形象资料上都没有发现胫甲。这幅图的描绘虽然不够清楚明确，但或可说明隋代又重新开始使用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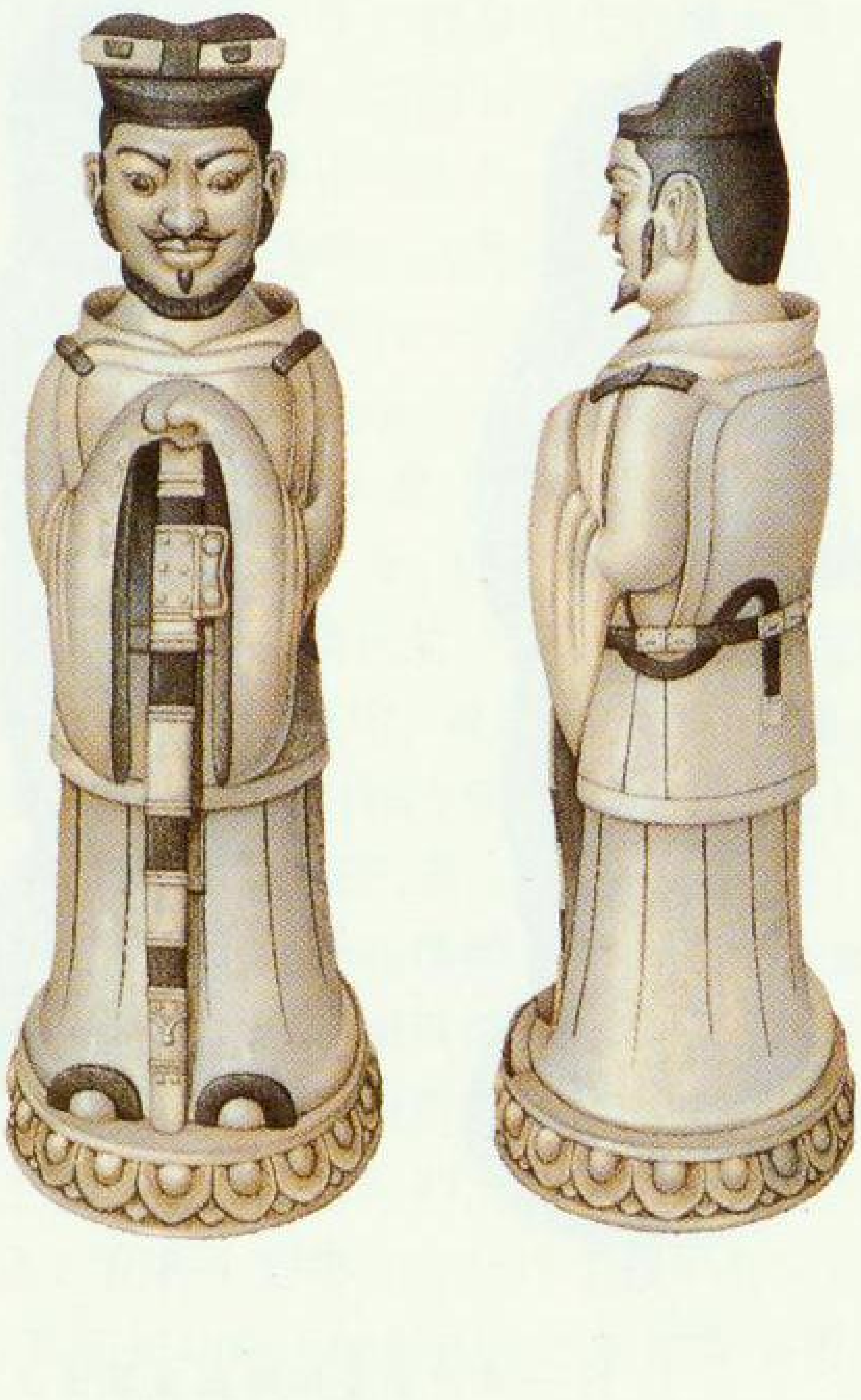
隋代还继续大量使用马铠，上文所引《隋书·

H—4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武士俑，铠甲的胸甲圆护、兜鍪顿项、披膊、臂甲似为铁制，其余的为革制（据实物写生），河南省博物馆藏。



图H—3 左、中：安徽亳县隋墓出土武士俑，俑的兜鍪、披膊、胸甲圆护很像铁制，而顿项、护肩、臂甲、腿裙都是革制，但护肩上还另缀有铁甲片。右：陕西三原隋李和墓棺椁石刻像拓片，身上铠甲似为皮甲。

图H—4 敦煌莫高窟420窟武士像，图中铠甲俱为横线表示，胫部也有，所以疑是胫甲。



H—5 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黑白武官瓷俑（据实物写生），河南省博物馆藏。

礼仪志》的那则记载，就表明骑兵几乎全部装备马铠。从山西太原斛律彻墓出土的甲马骑俑上可以看出，马铠的形制好像还是没有变化，只是寄生已不再出现（图H—5）。

隋代初期的戎服基本上保持了南北朝的风貌，从各种形象资料上看不出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其基本形制是裤褶服。

武官的服饰，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二年）二月丙戌，诏尚书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制定舆服。……文官弁服，……武官平巾帻，裤褶，……”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一对瓷武官俑，很准确地再现了这种服饰（彩图H—5）。这件瓷俑的平巾帻与南北朝相比较，冠体显著变大了，除此之外，裲裆衫外披两当甲和很宽大的裤，都一如旧制。两当甲除了绢布所制之外，也有可能用皮革制成，湖北武汉出土的两件陶俑身上的甲，腰部以下还绘有虎纹，看上去很像是毛皮所制（图H—6）。武官的裲裆甲制裤褶服又名常服、从省服，为武官日常办公、上朝议事时的服饰。宫廷的侍卫、侍从也穿这种服饰，有时候，裲裆衫外也可以不披两当甲，这种穿法在南北朝的陈朝是正职武官的服饰，隋代如何，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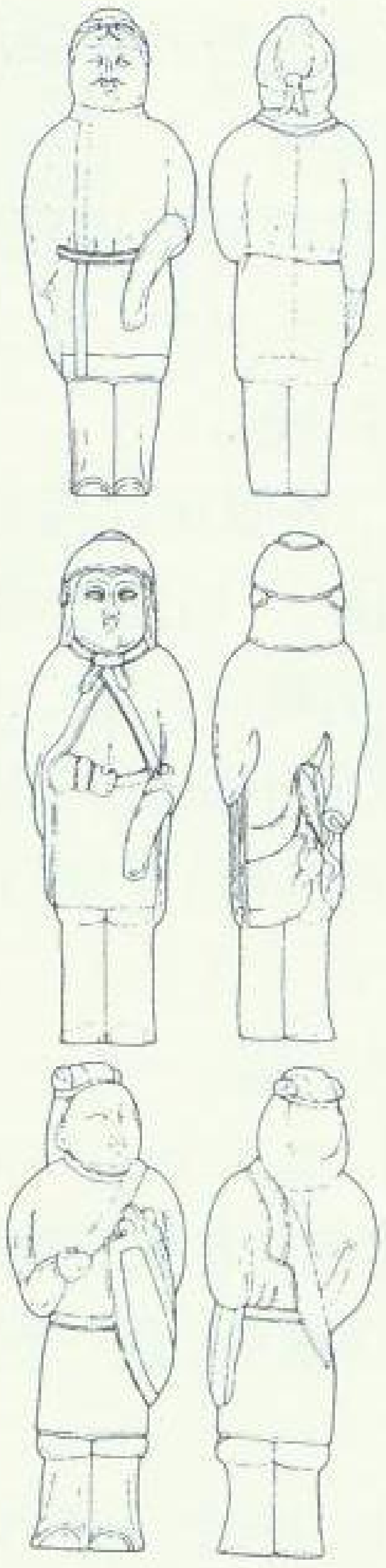
图H—5 山西太原隋斛律彻墓出土甲马骑俑，录自《文物》1992年第10期。

图H—6 湖北武昌隋墓出土武士俑，录自《考古》1986年第1期。

未发现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图H—7) 中、高级武官除了常服外，还有专门的朝服，《隋书·礼仪志》载：“左右卫、左右武侯大将军、领左右大将军，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裤褶，金玳瑁装裲裆甲。……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将军，领左右将军，左右监门卫将军，太子左右卫、左右宗卫、左右内等率，左右监门郎将及诸副率，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裤，金装裲裆甲。……直阁将军、直寝、直斋、太子直阁、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绛衫，大口裤褶，银装两当甲。”隋代朝服的形象资料，目前还未具体掌握，只能参考唐代的有关资料。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隋代武官实际上具有三种服饰：出征作战的戎服铠甲，平时的公服和用于国家大典的朝服，这种情况从侧面反映了武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史载隋文帝建国以后，在调整、承袭北周、北齐武官制的基础上，曾采用曹魏以来的九品制，制定了一套比较具体、明确的武官名号、品级以及武散官制度。这套官制的确定，基本完成了封建政权文武分流的官僚体系。

军队的士兵和下级校尉的服饰，仍然是南北朝时期的襦袍和短袖襦。此外还有帔风，帔风除了衣领已变成单领外，其余各部分形制都没有变化，襦袍和短袖襦亦如此 (图H—8)，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戎服服饰出现。

《中华古今注》云：“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袄子，取军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以上皆紫。”所谓缺胯袄子，实际上是一种开衩的长衫。从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壁画、河南安阳和安徽亳县隋墓出土的陶俑上可以看出，衫长至胫中部或脚背，盘圆领、右衽、小袖、开衩的情况资料上反映不甚清楚，可能是右侧衣纽扣至胯间，左侧裁开 (唐代的有关资料上反映得比较清楚，可以借鉴图H—9)。武官穿缺胯衫时以颜色和织料来区分等级。缺胯衫无论式样、结构都与南北朝的襦袍十分相似，应该说是从襦袍变化而来的。这种袍服在唐代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无论男女都喜欢穿着，成了十分流行的时装，风靡了近



图H—8 山西太原隋斛律彻墓出土仪仗俑 (上) 武士俑 (中)、持盾俑 (下)，录自《文物》1992年第10期。武士俑的帔风只穿一袖，另一袖空悬身后，持盾俑亦如此。

图H—7 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壁画拄剑武士图，录自《文物》1992年第10期。

图H—9 上左：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壁画，其服饰已与唐代初期完全相同，录自《文物》1992年第10期。上右：河南安阳安阳桥村隋墓出土持盾武士俑（盾已脱落），录自《考古》1992年第1期。下：安徽亳县隋墓出土的陶俑，录自《考古》1977年第1期。俑上将衣领翻开的穿法在唐代十分流行。

半个世纪。近代男子的长衫和女士的旗袍，过去的观点都认为是受旗装的影响，而我以为，仍是缺胯衫的继续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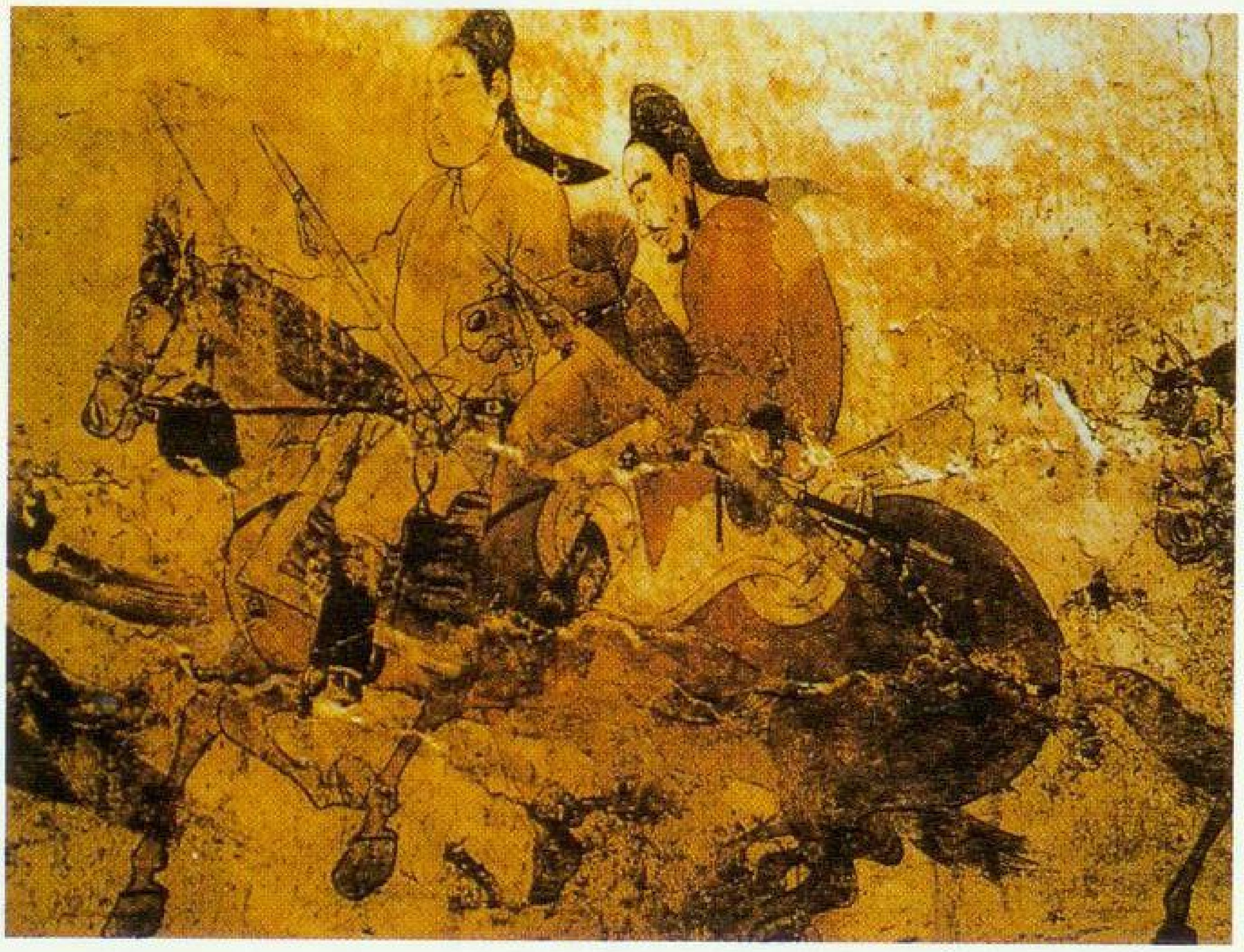
冠饰方面，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平巾帻，隋代还广泛使用称作“折上巾”的戎冠饰。《大唐新语》卷十《厘革》说：

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幅）巾渡河，递相仿效，因以成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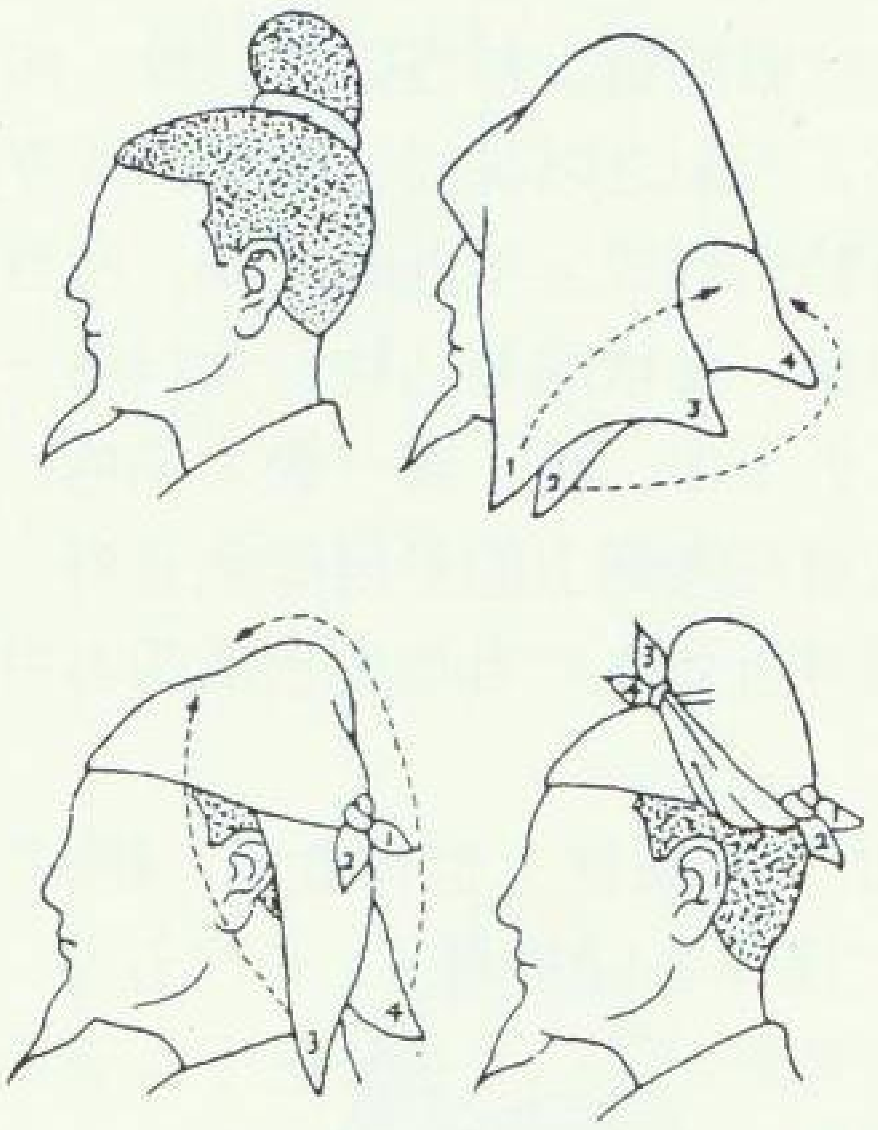
《云麓漫钞》卷三说：

> 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名折，以三尺皂 绢，向后裹发。晋宋曰幕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逐曰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

上述记载表明，折上巾起始于东汉末的幅巾，南北朝时称幕后，其形象可以参考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其中有一幅出行武士图上有很多武士的发髻都用皂帛包裹，垂下一段飘于脑后（彩图H—6），这种妆束应就是幕后，在隋初的军队中也仍然使用（图H—10）。变成折上巾以后，初期尚是一种平头小样（唐代的称呼）的裹法（参见图H—9上右、下），隋末开始在幞头



H—6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出行武士图》，《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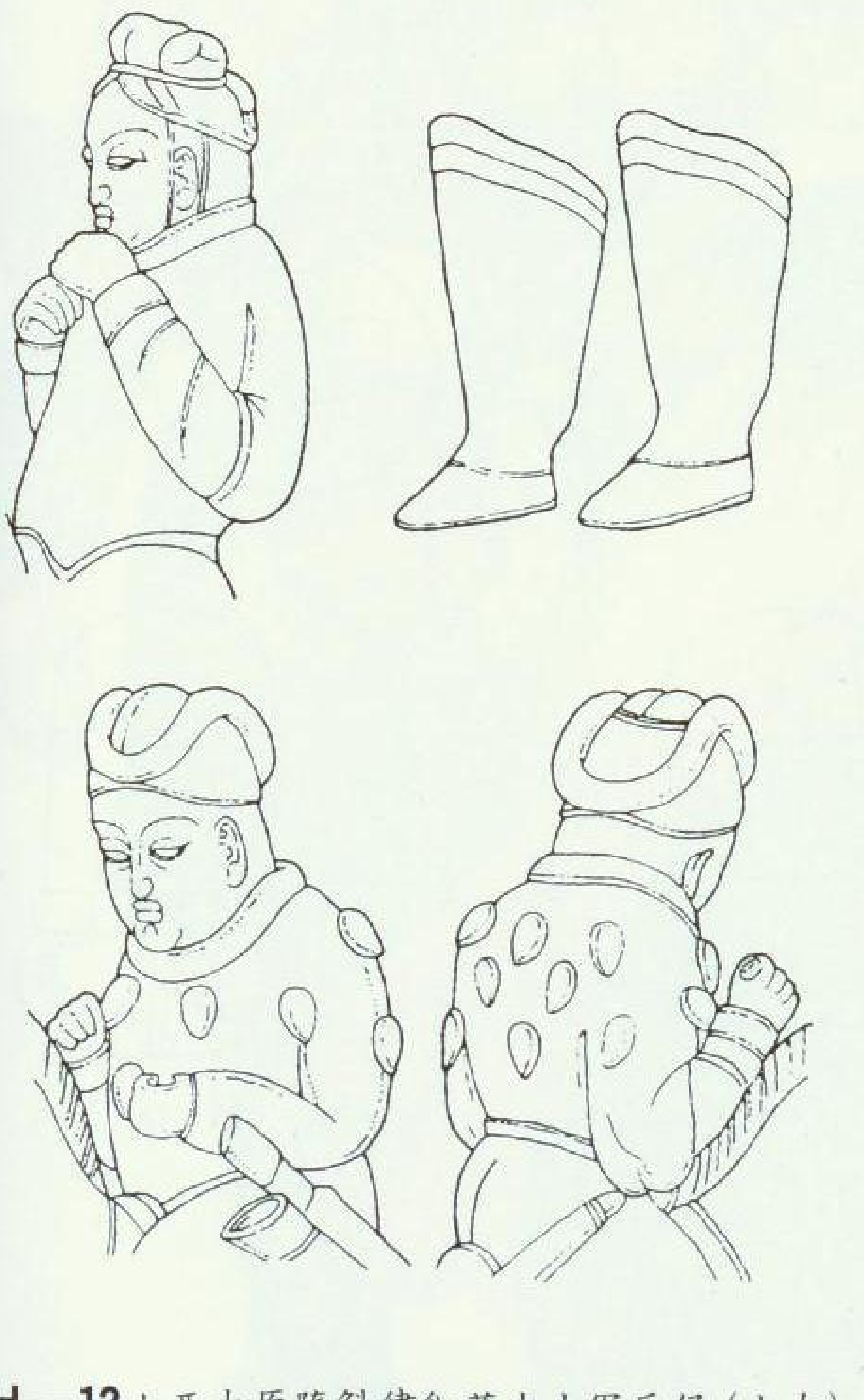
图H—11傅熹年先生的幞头系

下加“巾子”。巾子实际上是一个假发髻，可以用桐木、丝葛、纱罗、藤草、皮革制做，扣在发髻上，以保证能裹出固定的幞头外形（参见图H—9上左）。

隋代折上巾的形象资料，过去发现的很少，比较清楚、确切的资料大都是近十年来才出土的。在这之前人们要研究它，只能根据文字资料，参考唐代的形象进行推测。傅熹年先生在《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文物》1978年第11期）中，曾根据推测绘出了其系裹的步骤方法，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图H—11）。

折上巾之外，还有一些南北朝时期常用的巾、帽隋代也继续使用（图H—12）。军人穿戎服时，一般都穿乌皮六合靴，乌皮者，染黑的皮革也，六合可能是指由六块皮缝合而成。83年在河南安阳隋墓中曾出土一双陶瓷的靴（图H—12上右），很可能就是这种靴。

隋代的腰带基本上与南北朝时期相同。张盛墓出土的两件瓷俑身上的革带塑造得十分细致，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清楚明了的形象（参见



图H—12山西太原隋斛律彻墓出土军乐俑（上左）、骑俑（下），骑俑的帽、服饰与北齐娄睿墓的骑俑完全相同（参见南北朝图G—18⑤）。上右：河南安阳安阳桥村隋墓出土瓷靴，录自《考古》1992年第1期。

图H—10山西太原斛律彻墓出土军乐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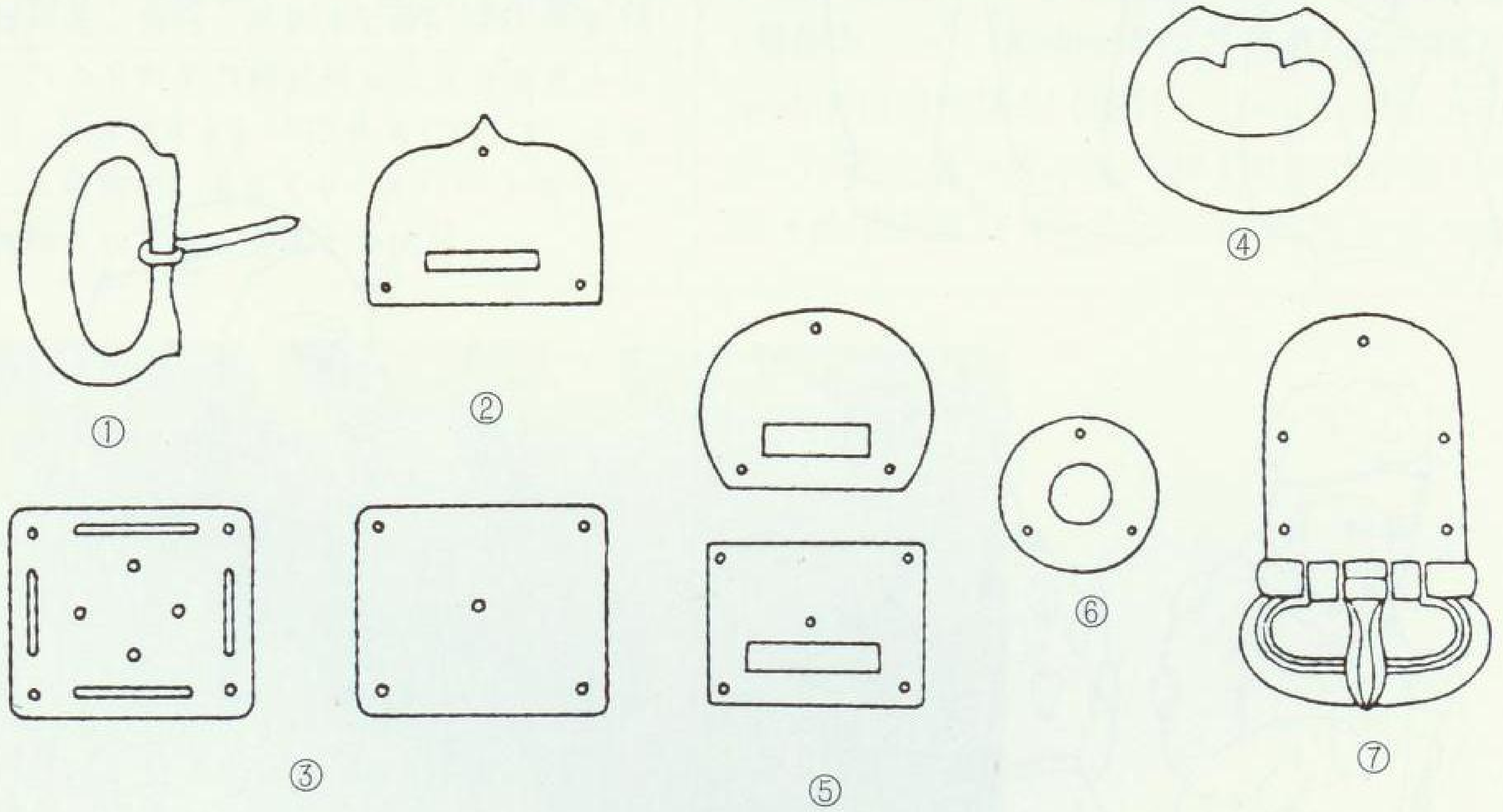
彩图H—3、5)。其带面装饰的带銙已遍布整条腰带，而且往往在一根腰带上装饰两种以上造型相异的带銙，(参见图H—13隋姬威墓〈地点不详〉、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出土的带銙实物)。革带的带尾垂头插法与南北朝时期不同，带尾由下至上插入腰带后，一定要再折个弯，让垂头向下揩入腰带。这种插法据《新唐书·车服志》的解释，称“铊尾，取顺下之意”。其间好像含有一种避讳的意思：古时称当朝皇帝为上、今上，而反与犯同音，又是造反的连用词，反插向上就具有犯上作乱的含义了。

隋代戎服的颜色，《隋书·礼仪志》载：

> 是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至六年后，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与帝王的服饰黄色有明显不同）。

由此可见，戎服的袍、衫当以紫、绯、绿、青为主要颜色，而配之以浅红、浅绿、浅青、深绿、深青等颜色形成上下九品之制。两当甲则有金装、银装、金玳瑁装几种，大口裤一般以白色为主，折上巾、靴、履一般为黑色，铠甲的色彩从残留在陶俑上的彩绘颜色分辨，则以朱、白、黑等色为主，当然也包括两当甲的几种色彩。

隋代的军戎服饰上也有徽记，《隋书·礼仪志》载：“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者，执以行。不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军记带的作用、性质看来与汉代的章是相同的，而幡的作用，也许可以用来探究汉代幡的用途。



图H—13①—④隋姬威墓出土玉带具（出处、出土地点不详）。①带扣②③带銙④附环⑤—⑦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出土金带具。⑤⑥带銙⑦带扣　录自《文物》1992年第10期。

唐代武士复原图

甲胄据洛阳、乾县、吐鲁番阿斯塔那和陕西礼泉昭陵陪葬墓等唐墓出土彩绘武士俑、三彩武士俑等形象复原；戎服根据西安长乐公主墓壁画、鲜于庭诲墓出土参军戏俑等形象复原；织物纹样根据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实物描绘；革带根据日本白鹤美术馆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实物复原；兵器根据内蒙古科尔沁出土实物，西安杨思勖墓石刻形象复原。

I—1洛阳龙门石窟敬善寺石窟南侧天王像，此洞开凿于麟德元年(664)。

图I—1左：湖南长沙出土持盾武士俑，湖南省博物馆藏。右：陕西咸阳独孤开远墓（据考证为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土持盾武士俑，咸阳市博物馆藏。

唐代

（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都对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根据唐皇朝由盛至衰的转变过程，习惯上把它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在各个方面都有较鲜明的特征，军戎服饰也是如此。

初唐的铠甲和戎服基本保持着南北朝以来至隋代形成的式样和形制；武德中期、贞观以后，在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高宗、则天两朝，国力鼎盛，天下承平，上层集团奢侈之风日甚一日，戎服和铠甲的绝大部分脱离了实用的功能，演变成美观豪华、以装饰为主的仪典服饰。“安史之乱”后，重又恢复到金戈铁马时代的那种利于作战的实用状态，特别是铠甲，晚唐时已形成基本固定的形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

唐代的铠甲，据《唐六典》记载，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锤、白布、皂绢、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细麟、山文、乌锤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白布、皂绢、布背、木甲，则各以制造材料命名。

在铁甲中，仍以明光甲使用最普遍。唐代初期，明光甲的形制除护项外，结构和外形与隋代基本相同，没有明显的区别。（图I—1左，此俑与隋代彩图H—2俑的铠甲极为相似，彩图I—1）护项在领口处出现两个外翻的圆钩，有的勒甲索就套在这两个圆勾上纵束，向下与腿裙的束带相连接，在胸部乳下用第二根勒甲索横过身体勒束胸背甲，横直两根束甲绊在胸前交叉处用一个圆环加以固定。（彩图I—3、5）大部分除利用护项圆钩外，则仍沿用南北朝以来的束甲方法，这种方法使用时间较之上一种更为长久（图I—1右；彩图I—2、4、6、7、8）。

进入永徽以后，铠甲肩部出现了有虎头、龙首造型的护肩，披膊有的垫在护肩下，有的为护

I—2 洛阳龙门石窟杨氏洞外北壁左侧天王像

I—3 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石刻天王像，此窟开凿于永徽元年(650)。

I—4 巩县石窟寺石刻天王像

I—5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石刻造像，像身似未穿铠甲，但束甲部分刻勒清晰，四川省博物馆藏。

I—6 西安南郊出土汉白玉天王像，西安市文物研究所藏。

I—7 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贴金彩绘武士俑（据实物写生），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I—8 敦煌莫高窟264窟彩塑天王像

图I—2 河南安阳修定寺塔外壁砖雕（据照片绘制）

肩取代。（彩图I—6、7）对肩部防护的加强，可能是一种称作“陌刀”的兵器大量使用的缘故。出现于唐初的这种长约3米的砍刀，对肩部的威胁较大，其杀伤力也要比矛戟等穿刺兵器强得多，因此就要进一步加强上半身的防护。臂甲的上部也安装了皮质的像撑开的伞一样的护甲，用于保护肘部。身甲的腹部增加了与胸背甲上同样的圆型护甲（图I—2；彩图I—7、8、9）。腹部使用圆形护甲并不始于唐代，199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西汉墓内出土了一条铜扣金腰带，铜扣是一面直径25厘米左右的圆形镜，镜面镶嵌了大小两个玉环，中心是一个突起的尖角。这根腰带系束在腰间，铜扣的圆镜正好起到护腹的作用，这无疑是腹甲的起始（图I—3）。在腿裙前面开衩处，还出现了保护下腹部的短而小的鹘尾。小腿部开始使用胫甲，胫甲好像是前后两片组成，用皮带上下纵横束绊住的（参见彩图I—6、8、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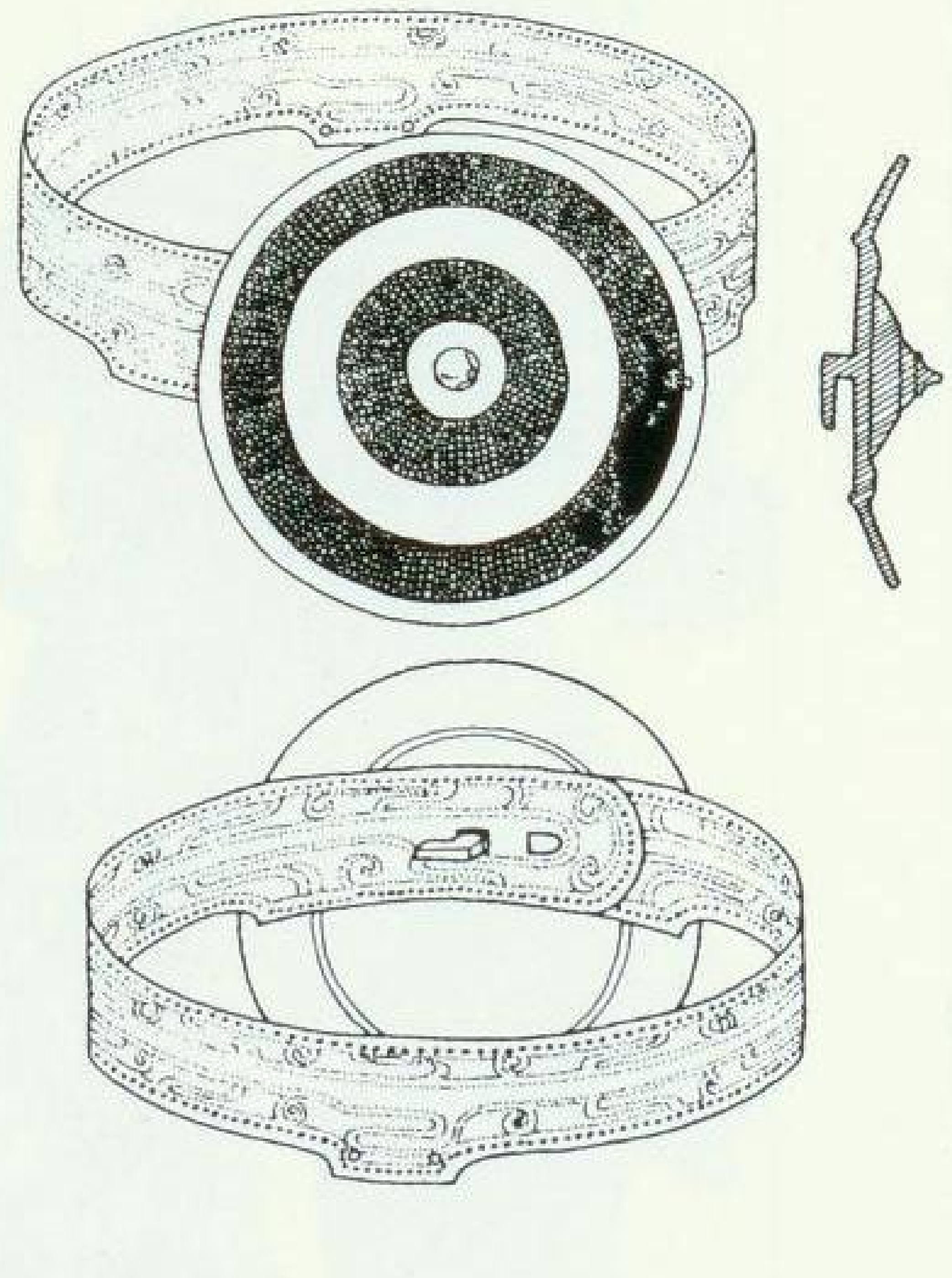
盛唐后期至唐末，胸腹部的圆护上也出现了各种兽头、虎吞等雕塑形象，这种改变使圆护甲失去了反光镜的作用。从形象资料上看出，这

I—9 洛阳出土唐代三彩镇墓武士俑，洛阳市博物馆藏。

一时期的大部分铠甲又重新开始全部用小甲片编制，但结构上仍保持了明光甲的形制，用于束甲的绳索或皮条已为皮革所取代，保护下腹的鹘尾也逐渐变得宽大起来（图I—4；彩图I—10、11、12、13）。

光要甲与明光甲的区别，目前尚无可靠资料以供参考。至于细鳞、山文、乌锤等甲，细鳞应就是鱼鳞甲片的另一种叫法，可能这时期的这种甲片特别小，所以称作细鳞；山纹甲片在南北朝的北燕冯素弗墓中曾有实物出土（图I—5），这种凸型甲片与图I—4、彩图I—11的天王像铠甲上的甲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唐代铠甲上还经常出现一种长条形，上缘有一小圆头的甲片，或许就是乌锤甲片（参见彩图I—7武士俑的腿裙）。

唐代的铠甲中，步兵甲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种。与明光甲相比，步兵甲的腿裙比较长，且一般不开衩；如果开衩，也要使两片相交合拢处相互重叠，不留空隙。胸前甲片有时仿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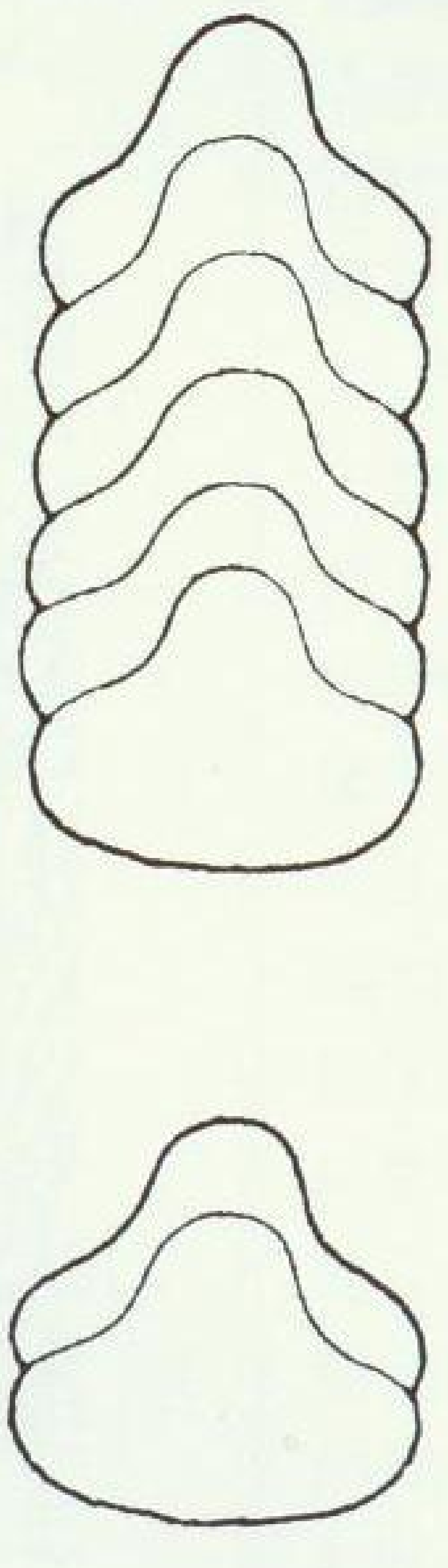
图I—3 云南江川李家山西汉墓出土铜扣金腰带，这件实物与同墓出土的鼓座铜俑身上的腰带完全相同（参见汉代彩图E—17上：正面 下：背面 上右：圆镜剖面图）。

I—10 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168窟彩塑天王像

图Ⅰ—4 唐代石刻天王像（据实物写生，像上腹前与身后的飘带，为这时期出现的佛像上的装饰，实际生活中并无此物），上海博物馆藏。

Ⅰ—12 日本教王护国寺藏唐木造毗沙门天王像，像身铠甲雕刻细致，质感逼真，弥足珍贵。

Ⅰ—11 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彩塑天王像，寺建于建中三年(782)。



图Ⅰ—5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凸型甲片，录自《文物》1973年第3期。

Ⅰ—13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彩塑天王像，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

I—14 西安昭陵陪葬墓唐长乐公主墓壁画上：武士出行图（局部）。右：右起第一人临摹像（据西安历史博物馆复制品临摹）。

I—15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彩塑天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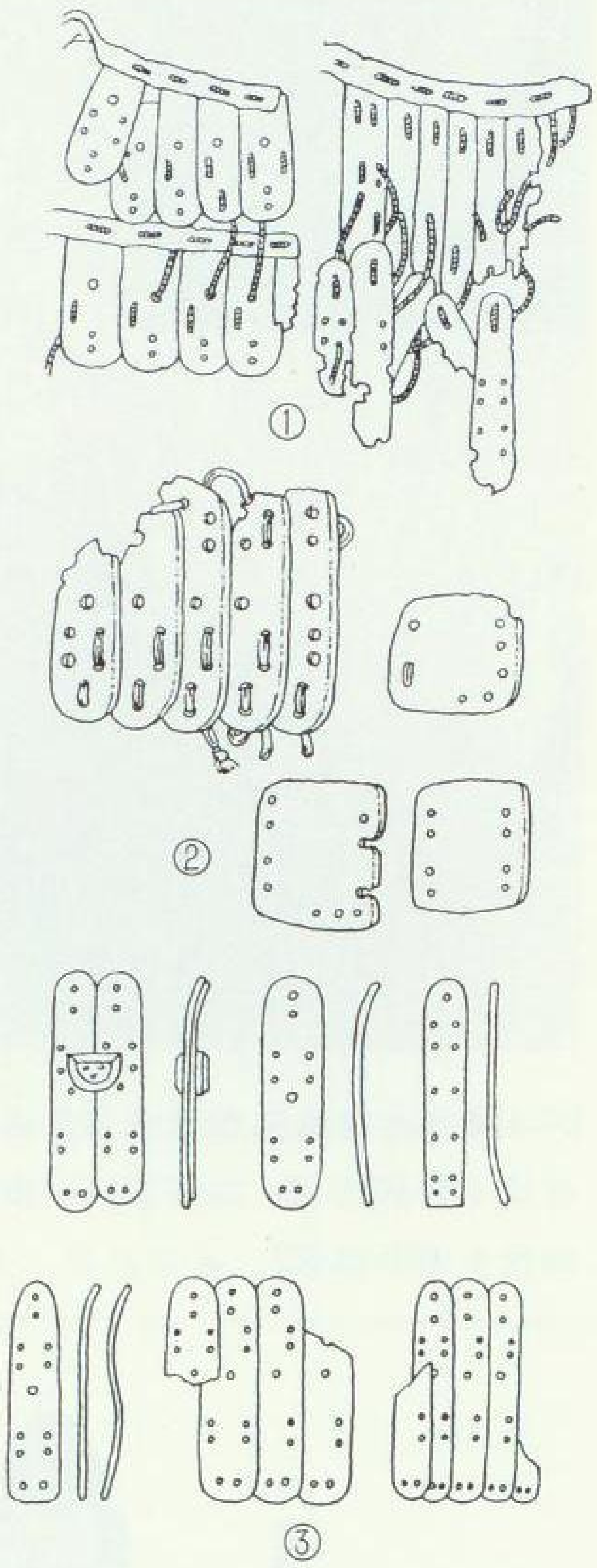
光甲，上缀圆形铁护（参见图I—6；彩图I—14）。

唐代的皮甲，在形制上都仿照明光甲。唐初，各部结构与外形都沿袭隋代，贞观之后，出现了具有唐代特点的胸甲、披膊和腿裙。唐末的皮甲，则与盛唐时期的明光甲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图I—7；彩图I—15）。从图像资料上可以明显看出，在皮甲的重要部位和某些部件上，都缀有铁制圆护、甲片（参见步兵甲）。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区分唐代的铁、皮甲，应以铠甲甲片主要用何种材料制成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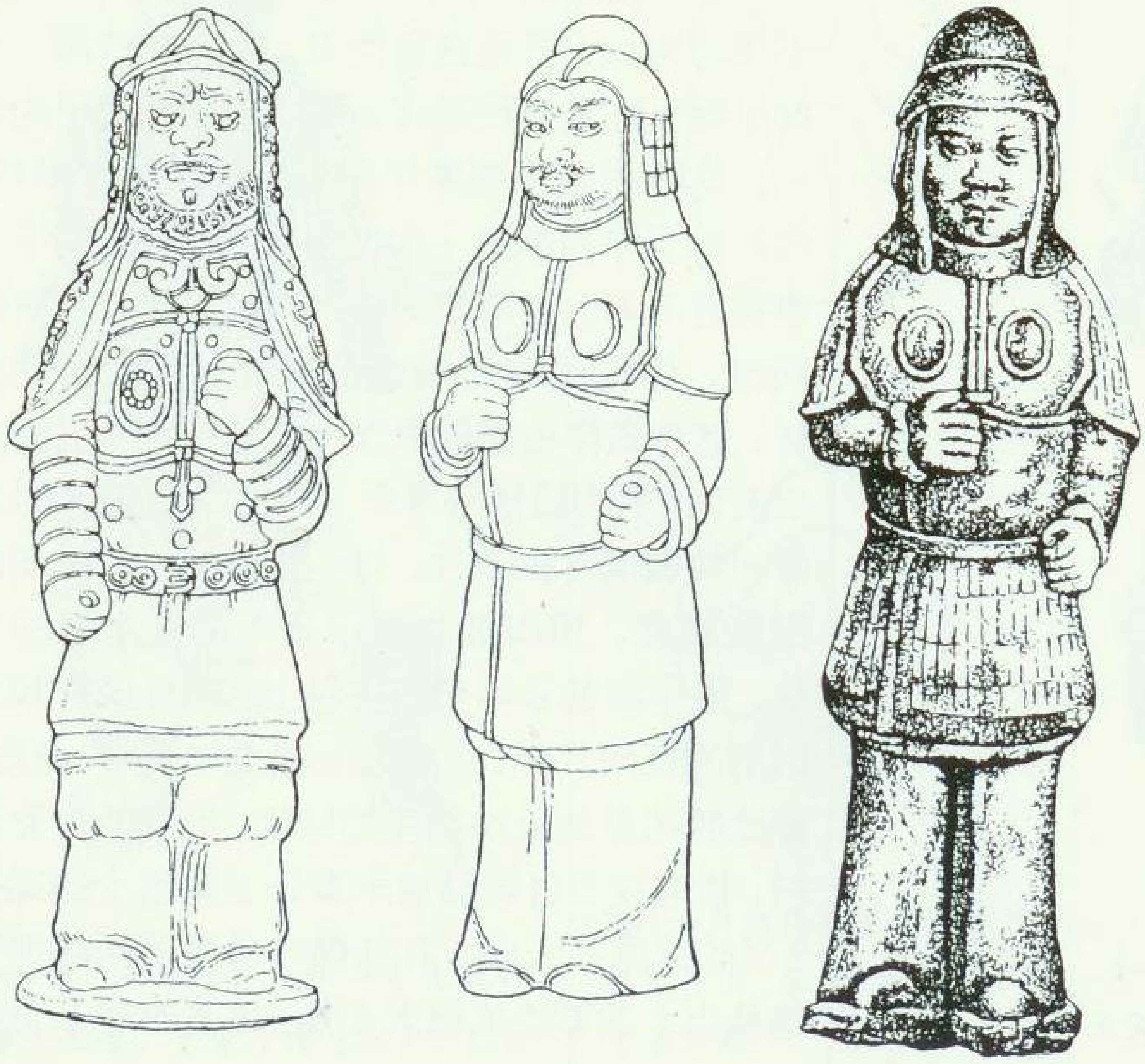
唐代的铠甲制造技术十分先进。在新疆和西安曲池地区出土的铁、皮甲片、尺寸都很小，加工十分精致，甲片的编连有用麻绳、皮线，也有用铆钉铆接的（图I—8）。甲片编连成甲衣后，用皮革和绢帛上下两层做内衬，各部分的边缘还用织锦包出宽宽的包边，有的还在包边外镶缀虎、豹、熊等毛皮，或用锦缎打褶做装饰（见彩图I—6、7；图I—4、6）。

盛唐时期的彩塑、墓中出土的陶俑以及石刻天王、武士造像上，经常出现一些装饰十分繁缛、华美的铠甲，这些铠甲一望而知既不可能用铁，也不像用皮革制成，实际上就是《唐六典》中说的绢甲。绢甲是一种仪仗甲，一般不用于实战，只是宫廷侍卫、武士的戎服，它的出现可能是受到武官公服的帛制裲裆甲的启示。这种甲是用图案华美的绢或织绵作面料，内衬数层厚帛制成。和皮、铁甲一样，绢甲上也镶有皮革、金属制造的饰件、甲片。绢甲的问世，给铠甲的形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式样，这种式样使整件甲衣上下连成一体（在此之前，铠甲的腿裙与身甲不相连属），摊开时就像一块裁剪开的衣片，披挂上身后，从后向前围裹起来，用胸部和腰部上下两重束甲的方法，使甲衣紧紧地包裹在身上。这种式样较之以前的任何式样，在穿着上都更加利索、合理。能比较清楚地反映绢甲的结构、形制的形象资料，首推陕西省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高达2米的镇墓武士俑，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雄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天王俑。笔者有幸亲见了

图Ⅰ—6 左：西安高氏墓出土武士俑（据照片绘制），录自《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中、右：西安唐李寿墓石棺线刻画（据实物写生、描摹），陕西省博物馆藏。这三像中，左图的披膊和胸甲可以明显看出是皮革制成，中、右图除了中的披膊以外，其余好像都是革制。



图Ⅰ—8 ①新疆出土铁甲片②新疆出土皮甲片摘自（日）原田淑人《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③西安曲池地区出土铁甲片新疆出土铁甲片



图Ⅰ—7 左：陕西咸阳唐墓出土武士俑，录自《中国古俑白描》，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中：陕西礼泉唐昭陵陪葬墓出土武士俑，昭陵博物馆藏。右：河南洛阳偃师唐柳凯墓出土武士俑（据照片绘制），洛阳市博物馆藏。

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并对它们作了仔细的观察和写生记录，从这两件俑身上，基本可以了解唐代这种绚丽多姿的绢甲的面貌（见彩图I—20、21）。其余如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甘肃敦煌出土的三彩武士俑、敦煌莫高窟194窟的彩塑天王像等，也都是典型的参考资料(彩图I—16、17、18、19)。

《唐六典》中的布背甲，应也属于绢甲一类。笔者在西安考察时，于唐代艺术博物馆内发现一尊彩绘天王俑(色已褪尽)，其铠甲的背甲形象吸引了我：那块又宽又厚、上缘向后弯垂的背甲，很可能就是布背甲（图I—9）。因为若用数层皮革叠成如此厚度，一定坚硬如铁，决不可能出现塑像上那种因束甲绊勒束而出现的内陷凹痕和上缘外弯的情况。

唐代的木甲和锁子甲，现在没有形象资料可以参考。木甲的制造很可能仍用战国时期以木为蕊，外包皮革的方法。锁子甲在唐代是最精良的铁甲，《二老堂诗知》云：“甲之精细者，谓之锁子甲。”

I—16 三彩镇墓天王俑（据实物写生），甘肃敦煌出土，上海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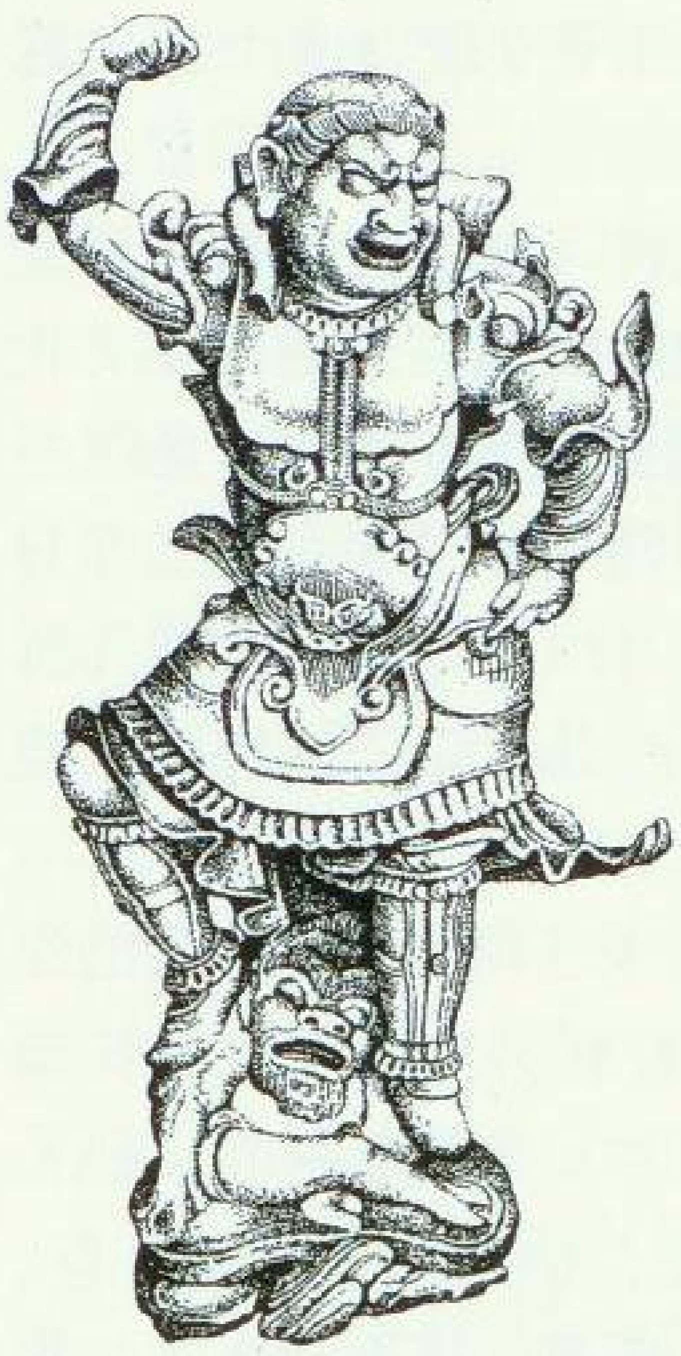
I—17 敦煌莫高窟（194窟）彩塑天王像

I—18 汉白玉雕天王造像（残，据实物写生），陕西省博物馆藏。

I—19 敦煌莫高窟 194 窟彩塑天王俑

I—20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镇墓武士俑（据照片绘制》，此俑背部损坏较严重，大部分颜色已褪去。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藏。

I—21彩绘木雕天王俑(据实物写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206 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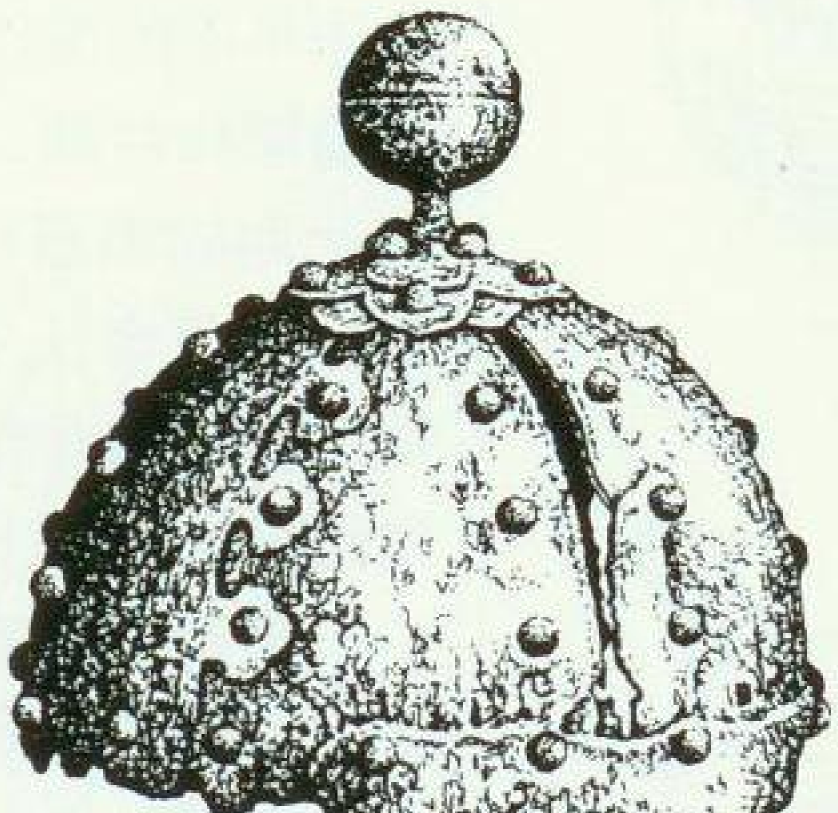
图I—9彩绘天王俑（根据实物写生），西安唐代艺术博物馆藏。此像铠甲的胸、腹、鹘尾、胫甲好像由皮革制成，兽头护肩应是金属制成，其余可能都是绢制。

据记载唐代还使用过纸甲。《新唐书·徐商传》："徐商袭纸为铠，劲矢不能洞。"其形制现在同样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但据推测，必定是用很多层纸叠粘在一起，做成较大的甲片拼缀而成。纸叠到一定程度，的确具有相当强的抵御能力，但如果做成小甲片，其硬度必然降低且极易损坏，这种纸铠如果遇到火攻或水淹，其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唐代兜鍪、盔的形制随着铠甲的变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初期，明显可以看出与隋代的相同之处（参见图I—1左、7左；彩图I—14），贞观以后，盔的顶上多以半圆形铁胄顶取代隋代的盔脊（参见图I—1右、6左、7中、右，彩图I—7、9、16）。盛唐以后，盔的顿项有的整个向上翻起，有的向两侧斜卷，盔顶或装饰羽毛，或装饰铁珠。（参见图I—10；彩图I—9、16、17）盔顶有铁珠的铁盔，黑龙江宁安县曾有实物出土（图I—11）。

在这一时期出土的天王俑上，还大量出现盔顶饰有鸟雀形象的头盔（图I—12、彩图I—22）。从这种头盔仅见于墓中出土的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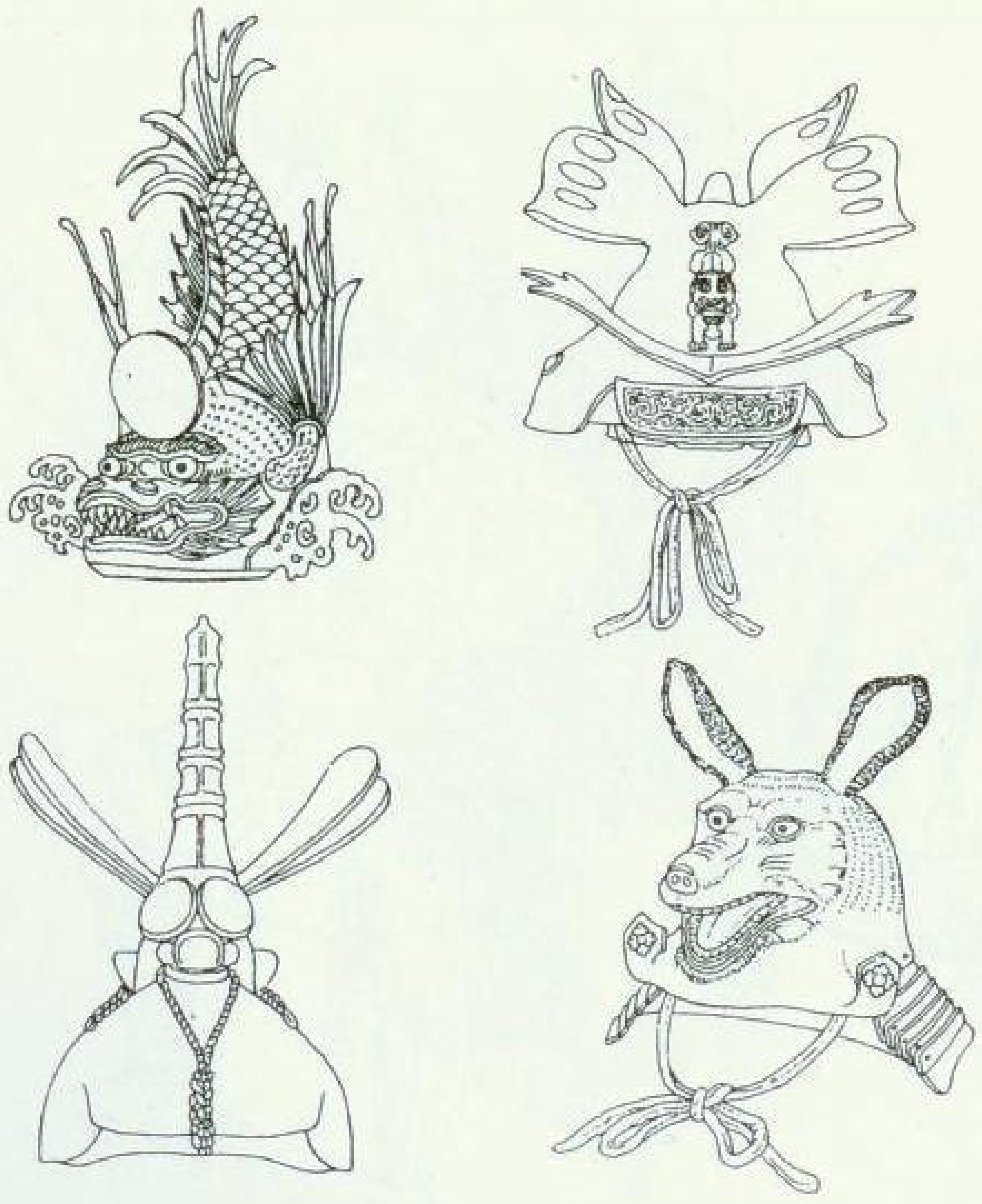
图I—10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鎏金舍利宝函（法门寺博物馆藏）。宝函镂刻的天王像头上的兜鍪顿项向上翻起，这种式样为唐末、五代时期普遍采用，兜鍪顶上的圆球形胄顶与黑龙江的出土实物完全相同。



图I—11 黑龙江宁安县勃海国遗址出土唐代铁盔，盔用十二块铁片铆接而成（据实物写生），哈尔滨市博物馆收藏。

图I—12 三彩镇墓天王俑（据实物写生），洛阳市博物馆藏。

I—22 三彩天王俑，洛阳市博物馆藏。



图I—13 日本室町时期的头盔上左：鯱鱼形上右：蝶形下左：蜻蜓形下右：熊头形摘自［日］笹间良彦著《日本甲胄图解词典》，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10月出版。

上，而不见于同期的壁画、彩塑和雕刻作品这一现象来判断，可能与很多鼻子和角高高卷起的龙首状的护肩一样，是一种夸张的艺术装饰，实际上并不存在。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的可能，唐代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我国古代的很多文化科学技术都是在这时传播到世界各国的，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收运用，铠甲制造也如此。在日本古代铠甲的头盔中，就有很多是以动物作为盔顶装饰造型的（图I—13）。因此，不能完全否定唐代鸟雀装饰的头盔的存在。

晚唐的盔顶开始用大朵红缨做装饰，盔的左右两侧、后脑部开始向下延伸至耳轮、骶骨下，两侧出现了凤翅形的装饰（参见彩图I—11、13）。这种式样的盔和中期护颊、护项向上翻起的盔，后来流行于五代和宋朝，西夏、辽等朝也竞相模仿。

唐代还使用兽头盔。这种盔从图I—14的形象来看，好像是用野兽头骨、皮毛所制（前面可见兽脚，后面还拖了一条兽尾），内衬铁或皮帽衬，帽衬有时还与假面连成一体。假面是一种用薄金属制作的保护面部的面铠，在商代时就开始使用（图I—15·①），北齐时代的歌舞《兰陵王》表演的就是兰陵王戴假面作战的故事。还有一种称作半面的面铠，这种面铠不罩住面部，只遮盖在前额和两颊。洛阳曾出土一件三彩武士俑，发表此俑的图册注解为戴假面武士俑（彩图I—23），可笔者认为此俑所戴其实是半面。半面的实物目前还未发现，日本保存的很多面铠，可以给我们提供形象上的参考（图I—15）。

唐代也使用马铠，但一般不是用于实战。从文字记载和形象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重装骑兵在隋末已逐渐退出战场，一系列反映唐初战争场面的石窟、墓室壁画和雕刻（如昭陵六骏），几乎看不到战马披铠的形象，只有在一些帝王墓室的随葬俑中，才能见到装饰华丽、贴金彩绘的骑甲俑。这些俑以懿德太子墓出土的最为突出（图I—16；彩图I—24），这种具装可以明显看出是作为仪仗队的装饰而使用的。古代皇家典礼中，用铠马作仪仗早已有之，魏晋时期的冬寿墓壁画

上就有这种场面的描绘（图Ⅰ—17）。

唐代的戎服在初期也基本沿袭隋制，贞观以后，由于与边疆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多，受到外来文化习俗的影响，首先从宫廷、上层社会开始，形成一种“尚胡”的风气。《旧唐书·舆服志》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这种风气自然也影响到军戎服饰。“安史之乱”以后，唐皇朝试图通过实行某些矫枉过正的变革措施来挽救政治上的颓势，重新对服饰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明令禁止了一些明显具有外来服饰影响的宫廷礼服，恢复了一部分古典传统服饰，但总体上还是保留了原有的风格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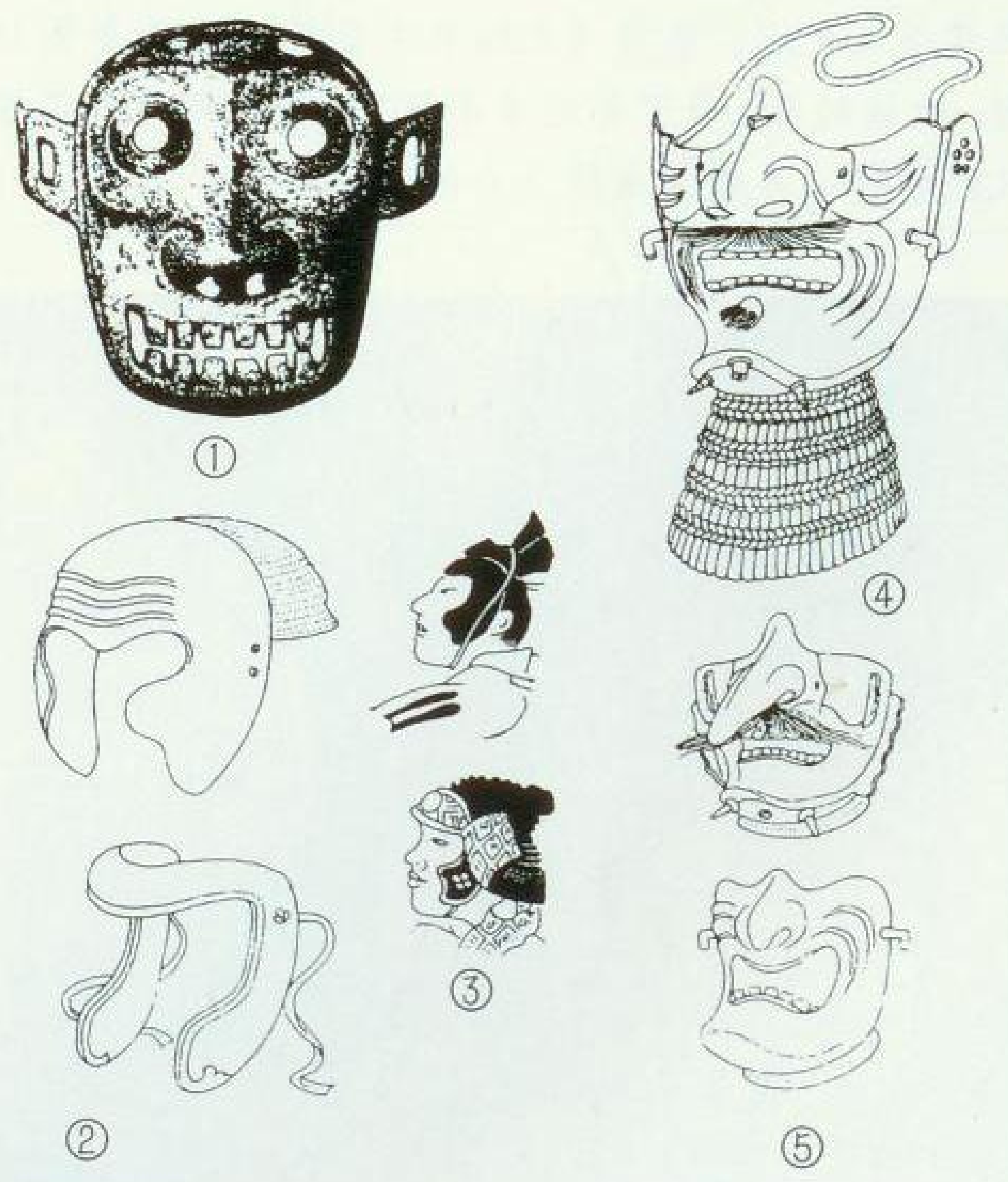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武官制度全面建成的时期，因此唐代武官的服饰比过去历代更为完备，官服有朝服和常服之分，服用范围是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朝服的形制参见彩图Ⅰ—25。

常服在初唐时期仍然沿袭了隋代的平巾帻制，《新唐书·车服志》载：

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

Ⅰ—23 三彩武士俑，头部可以清楚地看出戴有半面，半面的式样与日本古代的半面很相似。河南洛阳唐墓出土，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图Ⅰ—14 三彩镇墓武士俑正、侧背面（据实物写生），西安唐代艺术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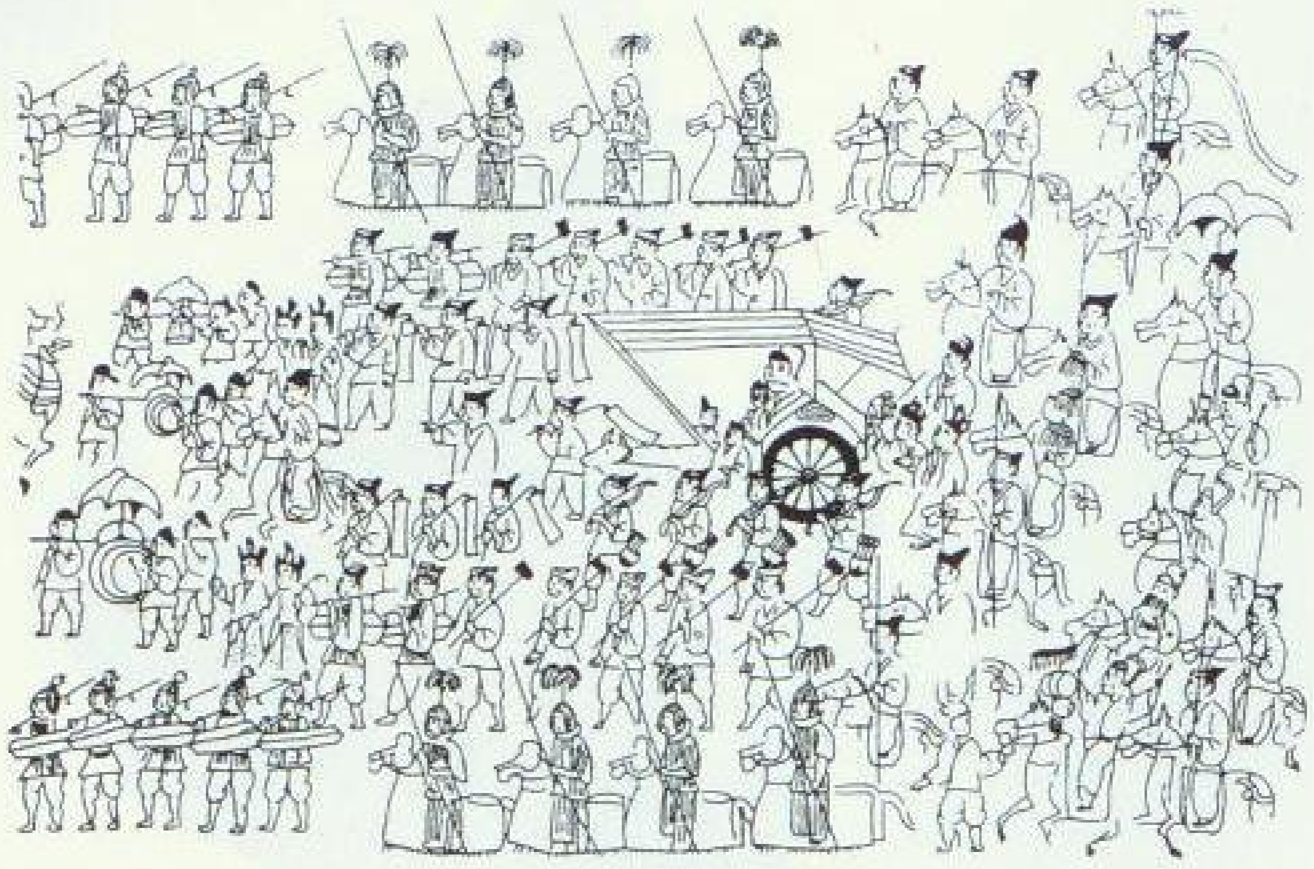


图Ⅰ—15 ①商代青铜假面，陕西城周出土，故宫博物院藏。②日本的半面③浮世绘上戴半面的日本武士④⑤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铁假面摘自《日本甲胄图解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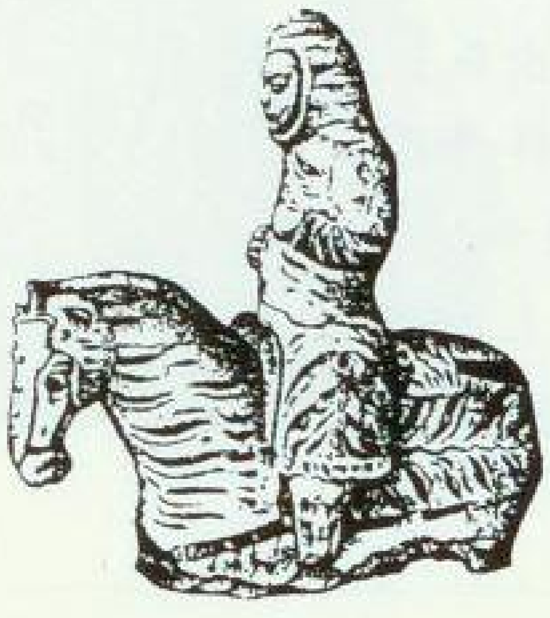
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裤，乌皮鞾(即靴)，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裲裆、螣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裤，紫附褠(褠相当于现今的袖套，形如臂甲)。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裲裆、螣蛇。……裲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螣蛇之制：以锦为表，长八尺，中实以绵，象蛇形。

这里说的襦、褶，实际上就是裲裆衫，与隋代一样，裲裆衫外也可不披裲裆甲。这种常服制，至唐代中期仍继续使用。其中说的有短袖的裲裆和螣蛇，还未在至今所掌握的形象资料中发现或识别出来（参见图Ⅰ—18；彩图Ⅰ—26）。盛唐后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首先是平巾帻开始慢慢地变成高耸的大冠，冠顶两个外翻的圆角尚保留着一点平巾帻的遗像。贞元十五年(799)以后，因德宗皇帝下诏废止裤褶制（指朝、常服，其余不限），此后武官服裤外还要加裳（参见图Ⅰ—19；彩图Ⅰ—27、28）。

武官的专门戎服为缺胯衫，衫的形制与隋代



图Ⅰ—17 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冬寿出行图》，录自《考古》1959年第1期。



图Ⅰ—16 甲马武士俑（根据照片绘制），陕西咸阳底张湾唐墓出土，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此俑的人、马甲都好像是绢甲，甲上的虎纹应像汉代那样，是印染或绘上去的。

Ⅰ—25 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礼宾图”从左至右，第一至第三人为唐代官员朝服形象，第四人为东罗马国使者，第五人为高句丽国使者。

Ⅰ—24 彩绘贴金骑马俑（据实物写生），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I—26 陕西乾县乾陵神道武臣石刻像，此墓约建于公元684—704年之间。

好像没有不同，两侧开衩的推测，因唐代有关的形象资料描绘得十分清楚而得到证实（参见图I—20)。衫以颜色和绣纹（这是隋代没有的）来区分品级。《中华古今注》载：“至武德元年，高祖诏其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袄子，织成紫瑞兽袄子，左右武卫将军服豹文袄子，左右凗卫将军服瑞鹰文袄子。”以后对绣纹又作了变动，“延载元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监门卫将军等饰以对师（狮）子，左右卫饰以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豹韬卫饰以豹，左右鹰扬卫饰以鹰，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旧唐书·舆服志》)。由于没有实物参考，难以了解这些绣纹的形象，至于绣纹绣在袍服上的位置，可以参考图I—21。唐代的缺胯衫在膝的上下位置处，还要将袍裾裁下一段缝上，这是贞观年间应丞相长孙无忌的请求而作的改进，表示上衣下裳连成一

图I—18 左：李寿墓石棺线刻画（拓片），陕西省博物馆藏。中、右：陕西三原唐李寿墓壁画，录自《文物》1974年第9期。两图所绘人物均为仪仗队，上右图中前二人（有裲裆甲者），下图中左面第一人，均为仪仗队的领军军官。

图I—19 西安王家坟唐唐安公主（即德宗皇帝之女）墓室石门线刻武官像，录自《文物》1991年第9期。

I—27 唐建陵神道武臣石像，陵建于宝应元年(762)。

图I—20 左、中：唐永泰公主墓墓室右门、石棺椁线刻画，录自《文物》1964年第1期。中一人似为女服男装，这是唐代的时尚。右：西安王家坟唐唐安公主墓壁画男侍图，像上两侧开衩的情况画得十分清楚，录自《文物》1991年第9期。

I—28 三彩武官俑（据实物写生，出土地点不详），冠上的金饰和玉珠饰与《新唐书·舆服志》所载相符，上海市博物馆藏。

体的古深衣制的遗像。(参见图I—20、22)

士兵的戎服有两种，一种是盘领窄袍，另一种就是缺胯袍。士兵的缺胯袍自然不会像军官那样绣有纹饰，盘领窄袍和南北朝、隋朝的襦袍有相似之处，但衣服下摆明显大于襦袍，左侧不开衣衩，衣和袖好像比缺胯衫更窄更紧，下着大口裤，头戴折上巾，唐代称幞头。(参见图I—18、22)

幞头使用的范围至唐代已远远超出军队，

图I—21 唐画《纨扇仕女图》中人物

图I—22 唐李寿墓壁画列戟图局部

I—29 陕西乾县唐李贤墓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皇帝和文武百官、文人学士都喜欢戴这种冠饰。在整个唐代，幞头曾流行过多种不同的式样，《云麓漫钞》卷三云：

> 唐武德中，尚平头小样者，嗣圣二年则天临朝，以丝葛为之，以赐百官，呼为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亦呼为武家诸王样巾子。景龙四年，内宴赐百官内样巾子，高而后隆，目为英王样巾子。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圆其头是也。

这则记载告诉我们，从高祖至玄宗时期，先后出现了平头小样、武家诸王样、英王样和开元内样四种幞头。为了说明这四种幞头的差别，笔者根据各个时期的形象资料，列出对照图表（图I—23），供读者参考。开元以后，幞头的造型仍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区别已不甚明显，到了晚唐幞头已变成一种无须系裹、随时可戴的帽子。

在幞头发生变化的同时，幞头的系脚也在发生变化。唐初只是两条下垂的带子，盛唐时有的系脚下垂少许再上折搭于脑后，幞脚有的采用绢一类较软的材料制作，使其能随着人的活动而飘拂；有的用纱、罗等稍硬的材料制作，使其两脚微微分开像燕尾，形成一个固定的造型。晚唐时幞脚都用硬质材料（铁等）作骨架，使其向两边撑开，有时还微微上翘（参见图I—23）。

唐代的武士还时兴在幞头外包一块红色或白色的罗帕，称作“抹额”。《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高宗假朝散大夫，使从军。”抹额的形象在李贤墓壁画上有所描绘（参见彩图I—29），推测其系裹方法当如图I—24。据《中华古今注》云：

> 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甲马及九十一千余人，中有金甲及铁甲，不被甲者以红绡抹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抹额，益武士之首服。

似乎抹额的出现远远早于唐代，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其中明显带有后人述说神话的口吻。

唐代也出现过一些新的戎服，很多有关唐代的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短后衣”，就是其中之

图Ⅰ—23 唐代幞头形象对照图表

此图表参照了傅熹年先生《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的附图，详见《文物》1978 年第 11 期。

I—30 西安杨思勖墓出土石刻像，陕西省博物馆藏。

I—31 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参军戏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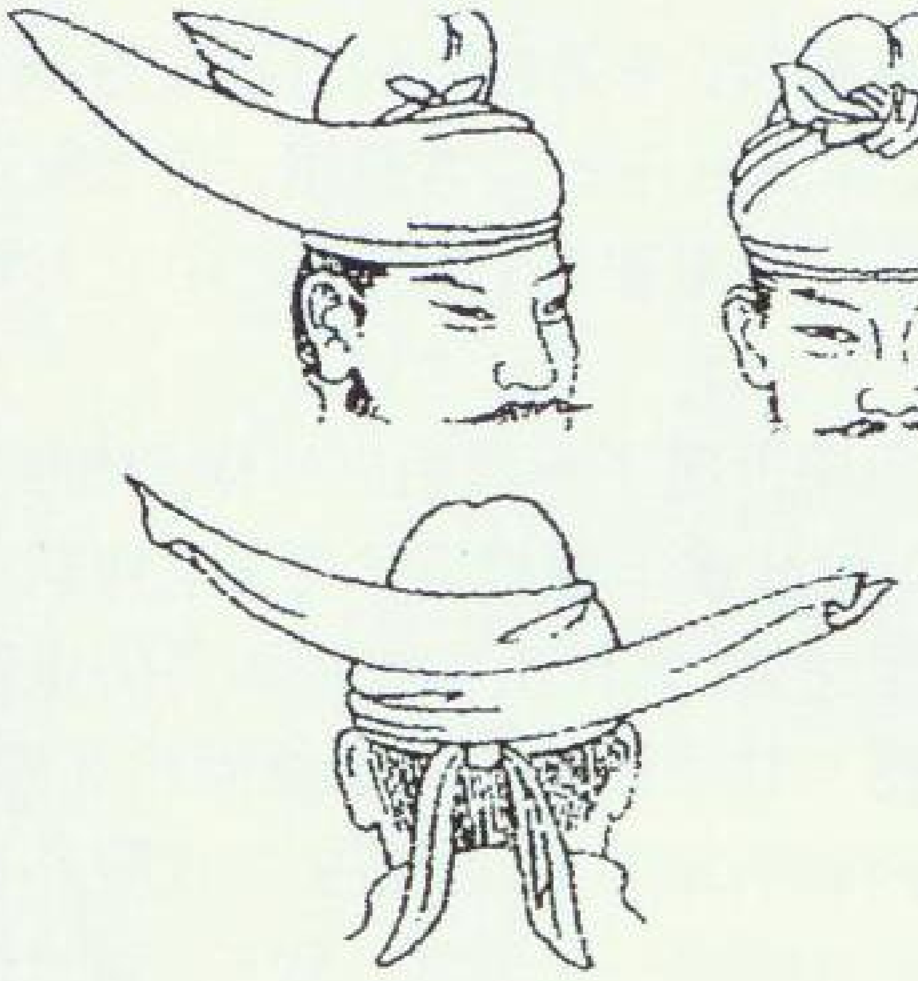


图 I—24 抹额的系裹方法示意图

一。如《太平广记》载“唐玄宗在洛……，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金甲，衣短后绣袍”，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这种戎服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服饰，历来众说不一。笔者从西安出土的一对参军戏俑身上的袍服得到启发，提出一些看法供参考、讨论。这两件俑的袍服领、袖、衣襟很像南北朝的襦袍，但前衣下摆尖而垂地，后摆则平直，正好比前摆短一截，具有短后的特点（参见彩图I—31）。参军戏起自后赵石勒，以俳优演出某参军的故事作为笑谑，因为演的是军人，演员肯定会用某种戎服作为演出服装。对照杨思勖墓出土石刻侍从像，其前衣下摆虽挽起塞入腰带内，但垂下的两个前摆尖角（因衣襟在前胸右侧垂直向下，裁剪时左右掩交的衣衽就会出现两个尖角）则十分清楚，若放下正好形成与参军戏俑袍服一样的形象（参见彩图I—30）。而同时期的敦煌彩塑天王像，甲内所衬的绣袍都前摆下垂尖角而后摆平直（彩图I—32），据此认为，这种袍服可能就是短后衣，短后衣在宋元诸朝一直广泛使用。

在新出现的戎服中，还有一种称作“半臂”的服饰。《新唐书·食货志》载：“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短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半臂又称背子（《石林燕语》卷十：“背子本半臂，武士服。”），

据记载起自秦代，隋炀帝时后宫嫔妃好服，至唐代以后，军人武士也经常服用，其形象可参考西安长乐公主墓壁画“出行图”中之人物服饰（彩图I—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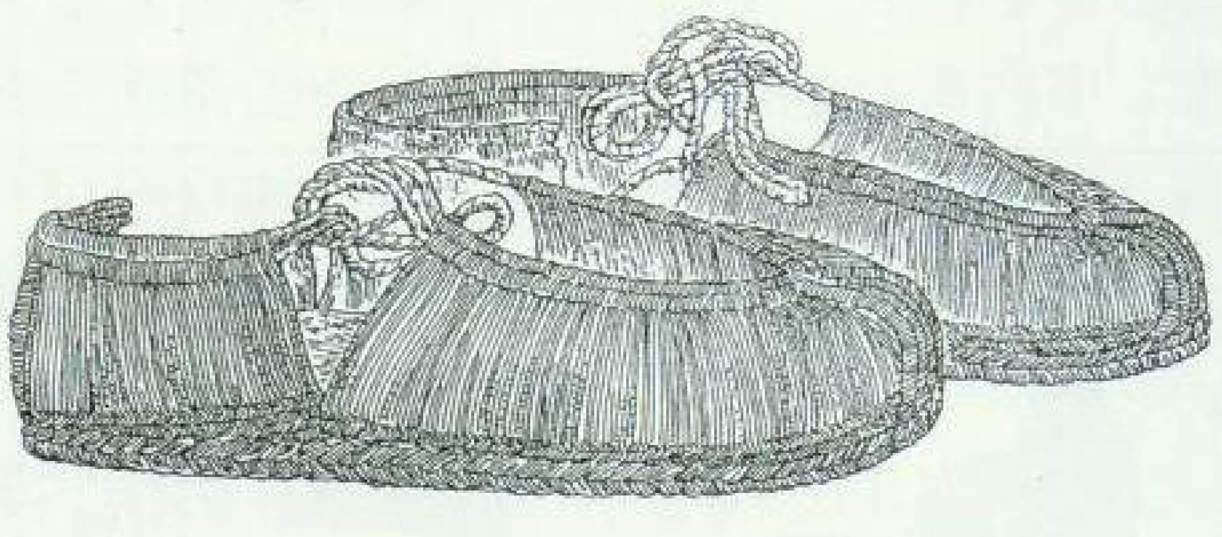
唐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后来称作“抱肚”的戎服附件，抱肚成半圆形围于腰间，初期一般都束于铠甲之外，其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止腰间佩挂的武器与铁甲因碰击、磨擦而相互损坏，或发出响声影响军事行动。后来在戎服外也束抱肚，成为戎服的一种装饰，至元、明时仍使用，颇为时尚。唐代抱肚的式样参见图I—4；彩图I—11、12、34。

唐代无论男女尊卑、文臣武将，都好穿长靿短靿乌皮靴，靴头尖而起翘。但武官着朝服、常服时，也穿鞋头饰有云头装饰的舄履或麻鞋，新疆吐鲁番曾出土了一双基本完好的唐代麻鞋（图I—25)，这双鞋与唐道因法师碑上线刻武士像脚上的鞋（图I—26）极为相似。

唐代的革带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在革带饰件——带銙下面的环上，装有一根根的小皮带，称作“鞢韄带”，这种鞢韄带是为了便于佩挂东西。唐代初期，鞢韄带最高等级为十三銙，《新唐书·李靖传》载：“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刓(即圆)，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由此可见，一根革带上有两种造型不同的銙，从出土实物来看，以方形为主，配以桃形或拱形（图I—28)。盛唐以后，銙下的环逐渐废去，鞢韄小带直接穿

I—32 敦煌莫高窟159窟彩塑天王像（盛唐时期作品）

I—34 四川大足石刻第五窟毗沙门天王像



图I—25 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代麻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I—33 西安唐长乐公主墓壁画出行图中人物，根据西安历史博物馆复制品临摹。

过铐上的“古眼”垂挂下来（参见图Ⅰ—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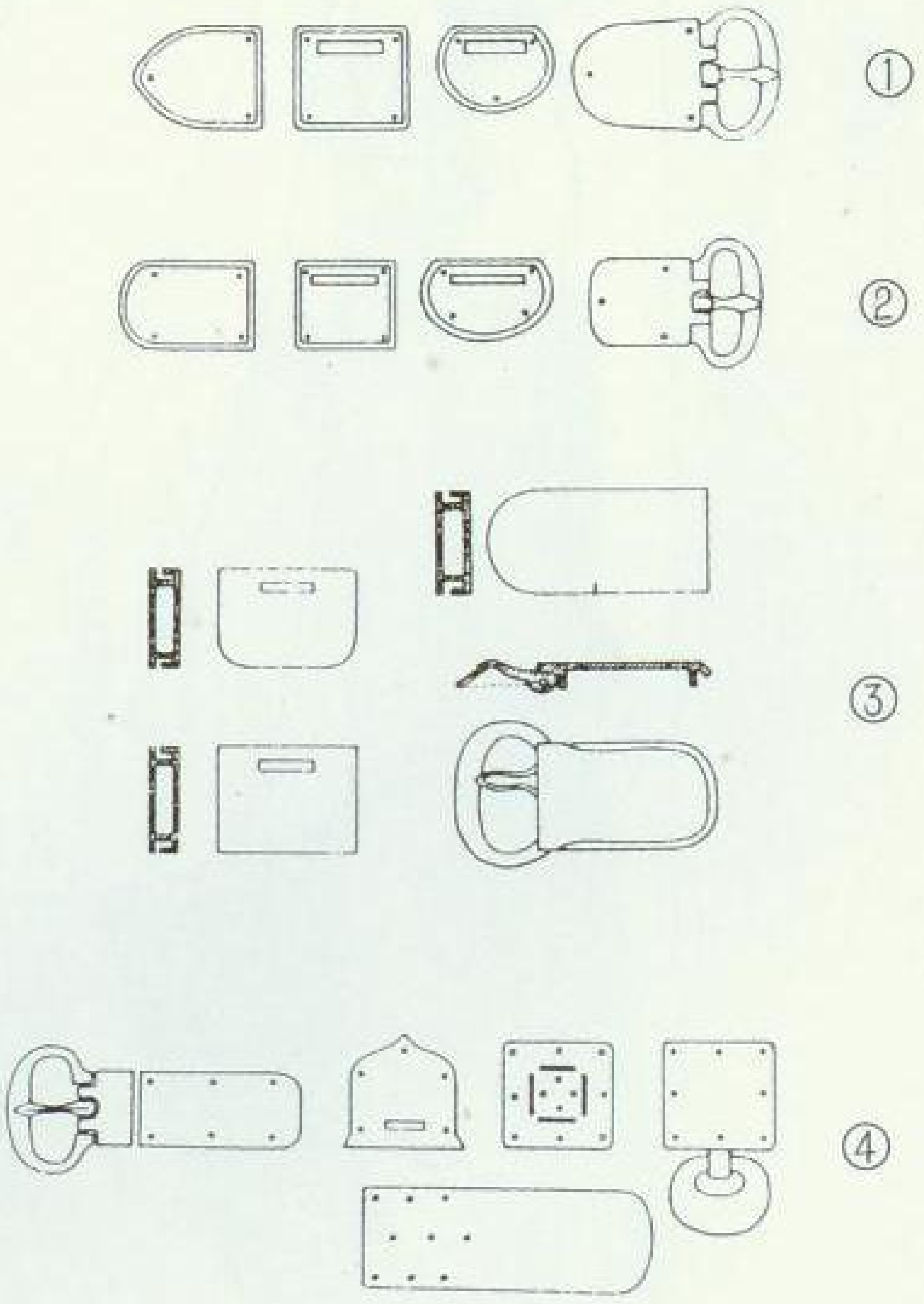
蹀躞带所佩的，是一些根据朝廷的规定各级文武官员必须随身所带的物件。《旧唐书·舆服志》载：“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以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砺石，武官欲带者从之。景元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以下带手巾、算袋、其刀子、砺石等许不佩。武官五品以上佩鞊鞢七事，七谓佩刀、刀子（匕首）、砺石、火石袋等也。”

佩物制度废除以后，带铐下的蹀躞也逐渐废去，日本正仓院收藏有一根唐绀玉带，就是没有蹀躞的腰带（图Ⅰ—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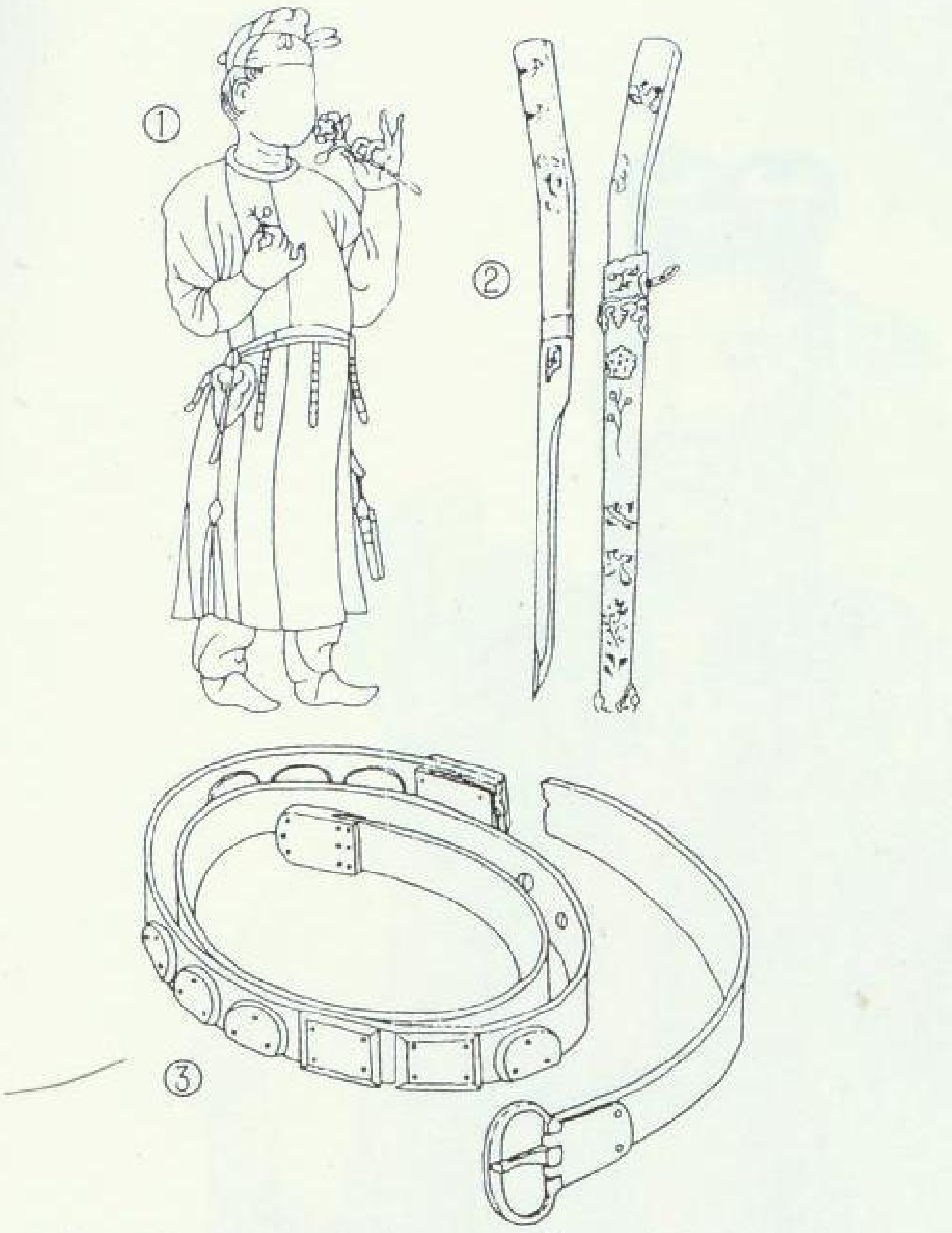
佩物制度废止后，为了区分官员的勋级，又实行了佩鱼制度。“鱼”原为出入宫廷的信符，相当于汉代调动军队的虎符，分成二半，一半保存在皇宫里，另一半由出入皇宫的官员装在鱼袋内佩戴在身。《新唐书·车服志》说：“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银鱼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武则天时代，鱼袋逐渐成为官员勋级的标志，“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天授二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

图Ⅰ—26 唐道因法师碑碑座线刻武士像，陕西省博物馆藏。

图Ⅰ—27 左：唐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人物 右：唐懿德太子墓石棺椁线刻人物，此图可以看出带铐古眼上装蹀躞的形象。



图Ⅰ—28 各地出土的唐代带具实物①辽宁朝阳唐墓出土②山西平鲁唐代窖藏出土③河北蔚县黄梅乡出土西安何家村唐代窟藏出土④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图I—29 ①: 西安韦洞墓石椁线刻中佩刀子人物。②: 日本正仓院藏唐沉香鞘把金银绘饰嵌珠玉刀子。③: 日本正仓院藏唐绀玉革带。带面髹黑漆，上缀绀玉（深青杂金红色的琉璃）方銙三块，圆銙七块，鎏金带扣、铊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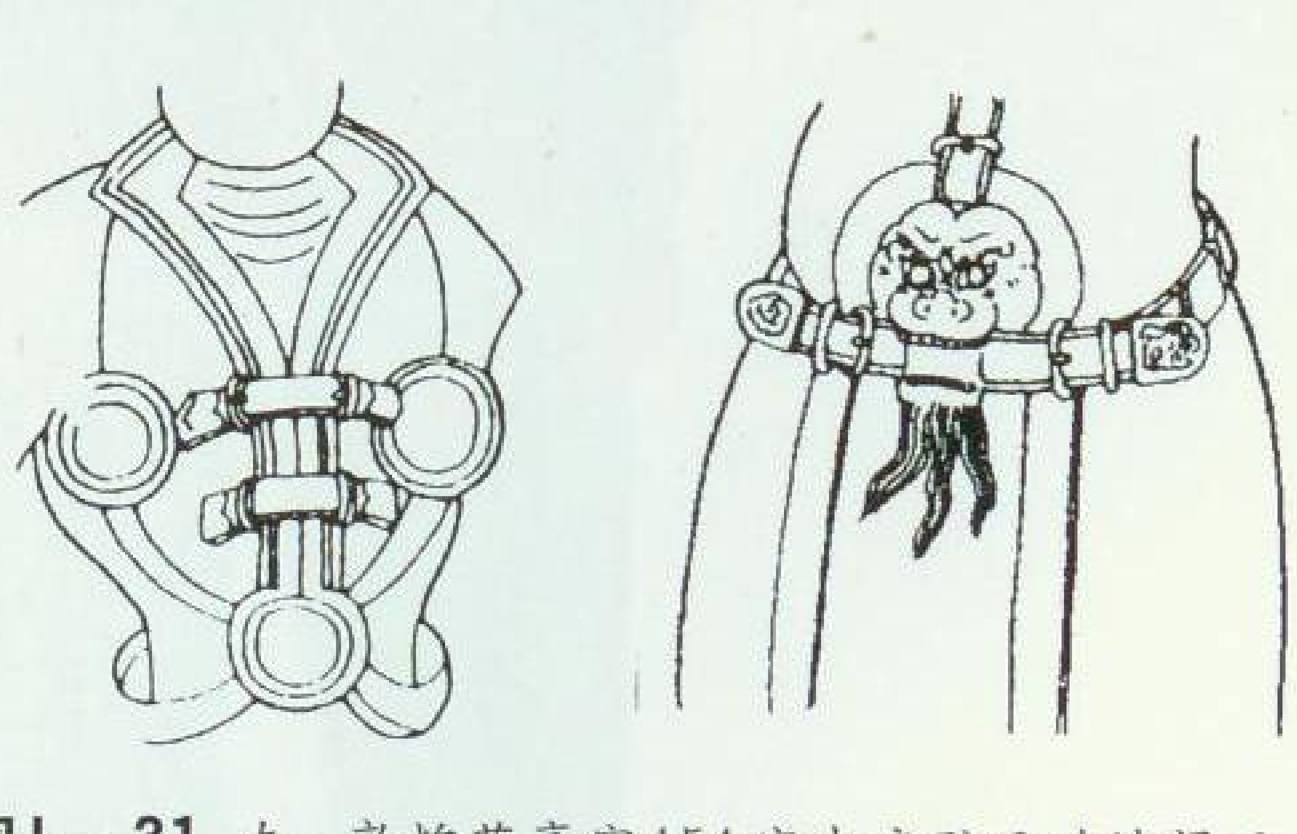
图I—30 左：陕西乾县李贤墓壁画上佩鱼袋的武士
右：敦煌莫高窟156窟晚唐壁画中佩鱼袋的官员

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同上）开元时期，“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旧唐书·舆服志》）。后来还把鱼袋作为褒奖军功的赏赐，因此下级校尉佩鱼袋也很多。鱼袋的形象可参考图I—30。

唐代带銙的制作材料也有严格规定，《新唐书·车服志》载：“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革带的带面称鞓，鞓有时用锦帛包裹，有时髹油漆，初中期为黑鞓，唐末至五代改用红鞓。革带垂头的插法仍按隋制。

唐末，还出现了双带扣、双铊尾的革带，这种革带由长短两条腰带组成，最初只用于勒束铠甲，五代以后袍服外也开始束用（图I—31，彩图I—34）。

唐代戎服的色彩，前文已多涉及，一般以黑、红、白、紫为主；盛唐时期的绢甲则五彩斑斓，色彩鲜艳华丽。武官的常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以后因深青色乱紫，改为八、九品着碧。黄色在唐高宗乾封年以前的历朝服饰中，并不是皇帝的专用色，从总章元年起，才禁止官民一律不许穿黄。铠甲则以金、银、黑色为主，这可以从很多贴金涂银的彩绘俑（包括敦煌等地的唐代彩塑）上得到证实。唐代的鎏金、贴金、包金等金属装饰工艺闻名遐迩，这种工艺如用于装饰铠甲应是绰绰有余的。



图I—31 左：敦煌莫高窟154窟中唐壁画毗沙门天王像中的双带扣、双铊尾带。右：日本教王护国寺毗沙门天王像上的双带扣、双铊尾腰带。

唐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郑仁泰墓、洛阳等地出土陶俑、三彩墓俑以及敦煌、炳灵寺彩塑天王像复原、设计；胄根据黑龙江宁安县出土实物复原；戎服根据陕西三原唐李寿墓壁画形象复原；革带根据辽宁朝阳唐墓出土实物复原；佩剑采用日本正仓院藏唐样大刀实物形象。

五代时期武士复原图

甲胄根据成都王建墓石刻银饰片上的形象复原；戎服根据福建王审知墓出土陶俑、敦煌壁画上的形象复原；革带根据王建墓出土实物、参照该墓石刻和敦煌壁画上的形象复原；兵器根据敦煌壁画和王建墓出土的银饰片上的形象复原。

图 J—1 四川成都前蜀王建墓石棺周围的石刻力士像　上：玄武，石棺西面第三尊　中：天后，石棺西面第一尊　下：同中，为天后的背面　石棺四周一共有十二尊石像，均为半身，成都王建墓博物馆藏。

五代十国

（公元 907 年—公元 960 年）

五代十国从朱温灭唐建立后梁起，前后约五十年，这期间政权更迭，朝令夕改。绝大部分朝代是唐皇朝派驻各地的封疆大吏建立的，因此在服饰等方面基本沿袭唐末制度。

铠甲方面，形象资料比较集中的是四川、南京、福建等地区出土的文物和敦煌壁画，三地当时分属前蜀、南唐、闽等国，铠甲的式样都基本相同。

明光甲这时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铠甲重又全用甲片编制，形制上变成两件套装。从前蜀王建墓石棺周围的石雕像上可以看出，披膊与护肩连成一件，像嵌肩一样套在肩上；胸背甲与腿裙连成另一件，以两根肩带前后系接，套于披膊护肩之上。这种两件套甲衣，使胸背要害部位具有两层防护，披膊护肩一件的胸背部分如用铁甲片编制，外套一件的胸背甲则用皮革或布帛制作，反之，胸背甲仍用铁甲片编制（图 J—1、2）。有时内外二件会全用甲片编成，王建墓出土的宝盝盖上有四件武士像银饰片，武士的铠甲就是如此（图 J—3）。这种两件套形制的铠甲，是晚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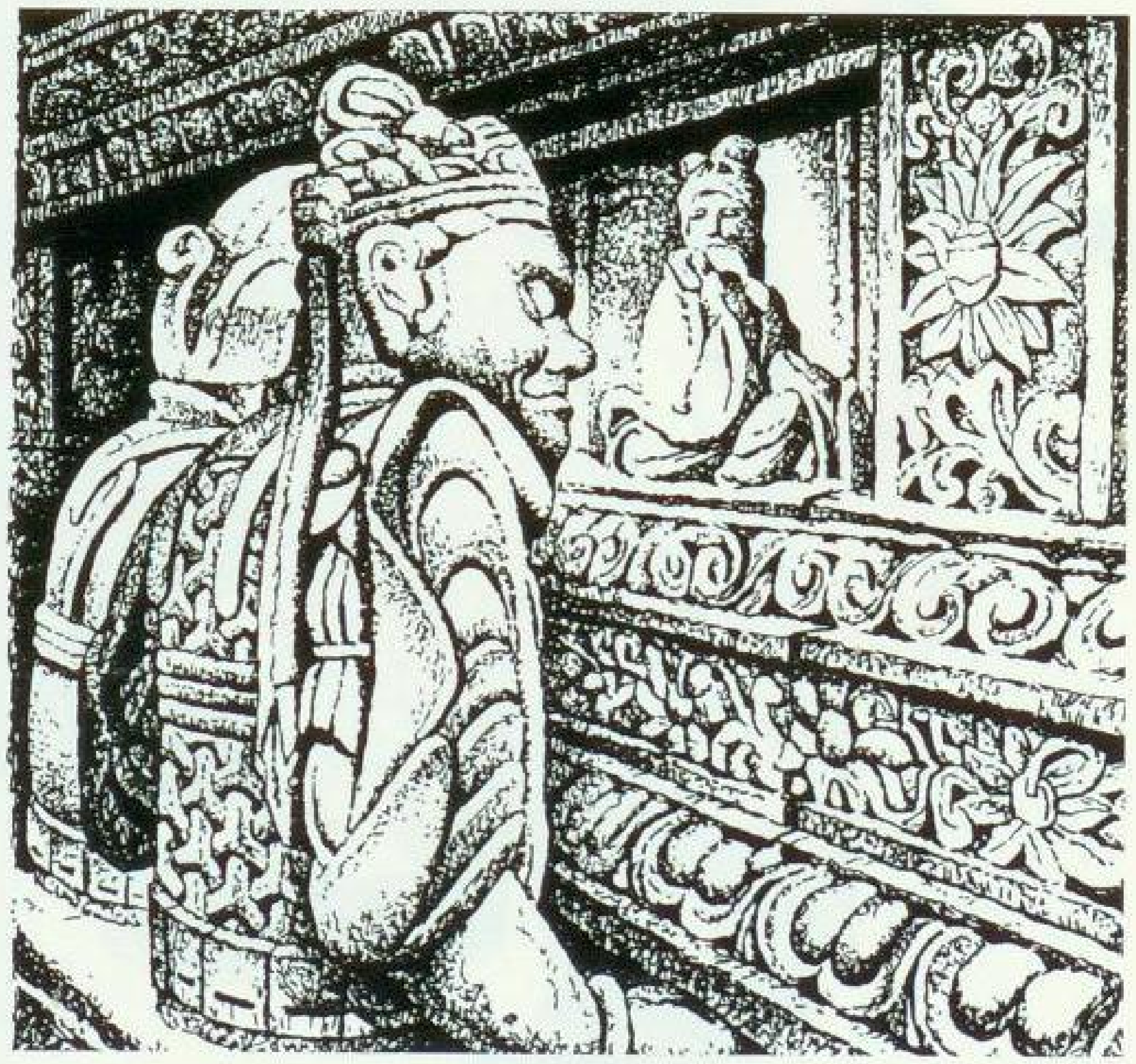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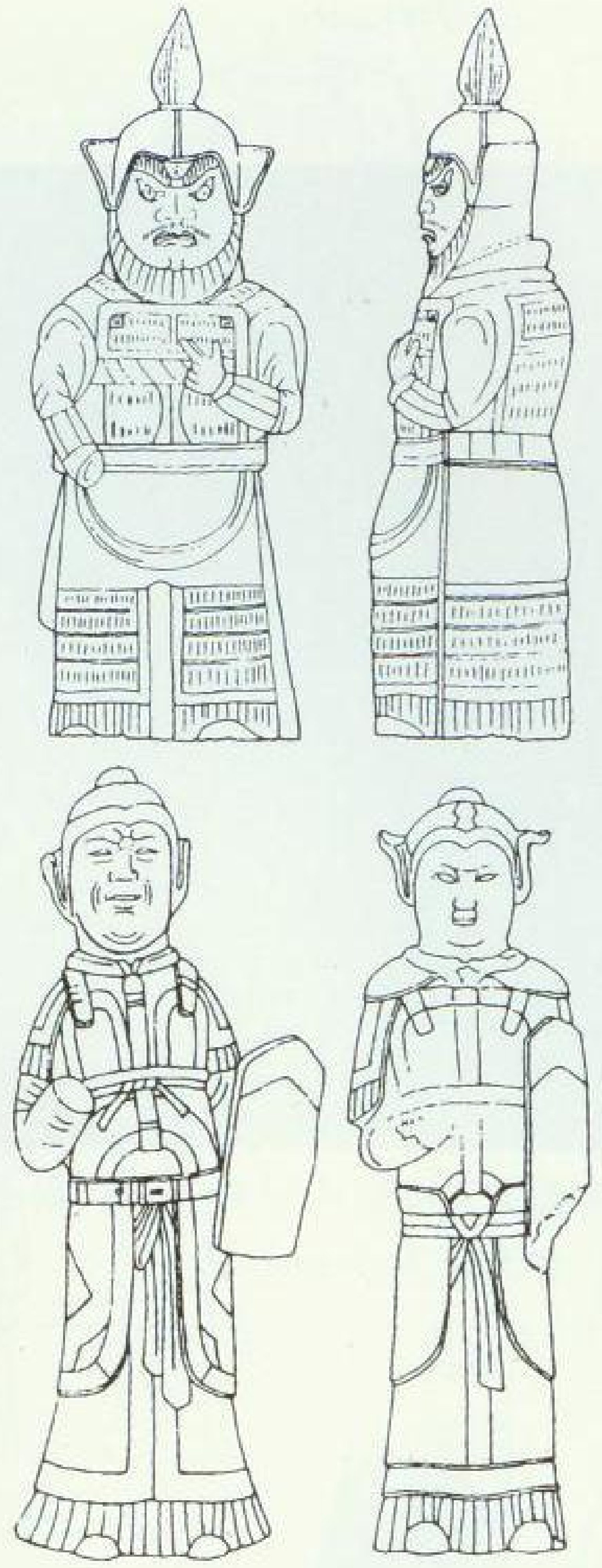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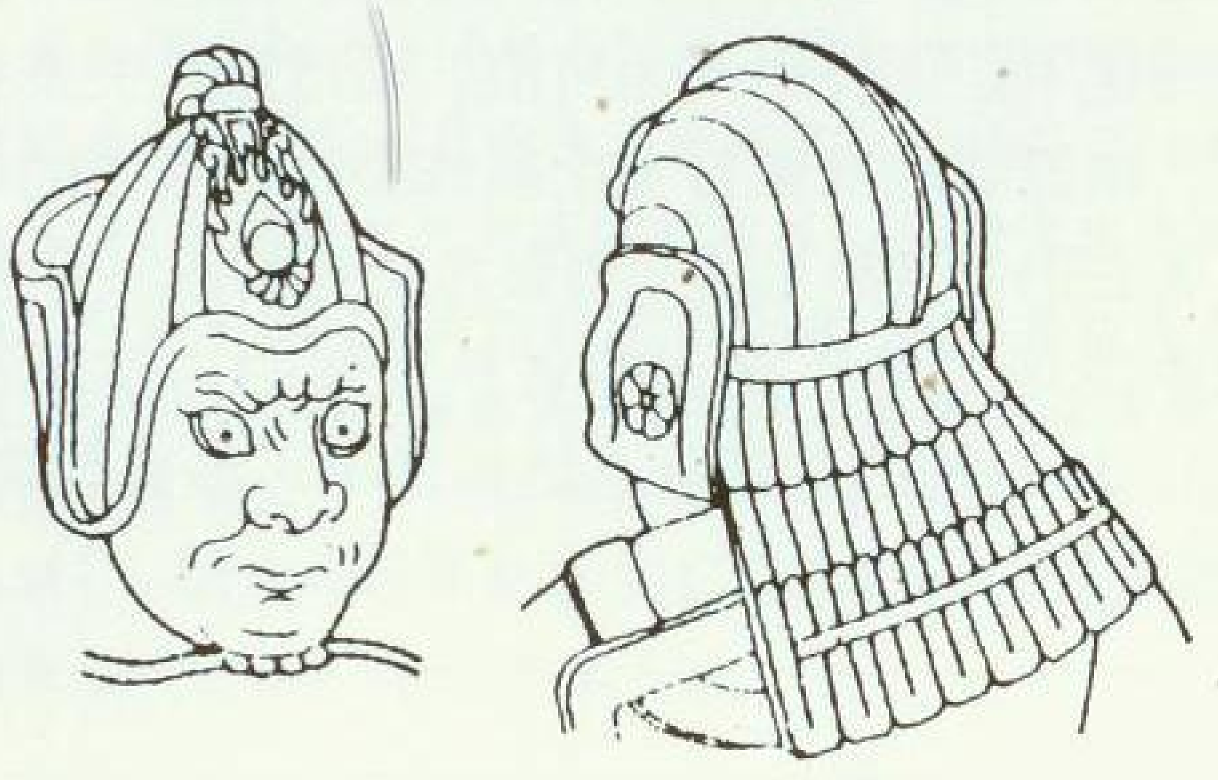
图 J—2 石雕力士像与石棺床的情况

来出现的又一种新式样。保护腹部的圆腹甲，有的钉缀在外件甲衣上，有的用皮带另外束上（参见图J—3）。腿裙与初、盛唐时期相比已明显加长，一般要掩至膝下，因前后开衩而成为左、右两片。腿裙的这种形制一直到铠甲被废除之前，也没有再改变。铠甲的甲片除了长方形之外，主要是山纹和细麟形。纵向勒甲索已不使用，而改为在胸部用丝或帛带横束（参见图J—3、4）。

唐末以来，引起铠甲腿裙加长的直接原因是马具的进一步完善后，骑兵的战斗能力加强了，从而对骑兵的保护要求，也更高了。自魏晋时期出现全副马具以后，经过隋唐的不断改进，马鞍的结构已日趋完美，马镫也早已成为双镫，战士骑在马上可以脚踩双镫，不仅容易保持身体平衡，而且能脱出双手，左右开弓、随心所欲地使



图J—4 上：福建闽王王审知夫妇墓出土武士俑，此俑身上的铠甲已与后来宋代的铠甲基本上完全相同了。录自《文物》1991年第5期。下：江苏江宁南唐李昇墓出土陶武士俑，左一俑的胸甲好像还保留着唐代明光甲的式样，录自《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



图J—5 王建墓石刻像头盔细部图

图J—3 左：成都王建墓出土的宝盝，用于收藏唐朝册封蜀王的谥宝，分内外二层，图上外层的宝盝盖已去掉没有画上，武士银饰片即是钉在盝盖上的，内、外层各二枚。中：内层宝盝盖银武士饰片右：外层宝盝盖银武士饰片

J—1 敦煌莫高窟 346 窟南壁射手图，射手腰带前的圆型带銙，曾有隋代实物出土。

用兵器。这样一来，敌我双方都能骑着马进行比较复杂的战斗，在马上使用兵器的武术也就迅速发展起来。作战方法的改变，使身体的任何暴露部分都可能受到伤害，于是要求铠甲尽可能地扩大遮盖面积，事实上不仅是腿裙，披膊也加宽加长了不少。

五代时期也继续使用皮甲，从敦煌 261 窟彩塑的形象来看,皮甲好像都是用大块的皮革制成。这种大块的皮甲与初唐时期 322 窟彩塑天王像的甲很相似（参见唐代彩图 I—15），但大块的皮甲与出土的唐代小而精致的皮甲片不仅不能吻合，而且相去甚远。敦煌彩塑的塑造手法都很写实，若是小甲片，一定会一一塑造出来（同是 322 窟的天王像，兜鍪和护项的甲片就刻划得很清楚），因此大甲片也可作另外的解释,即根本不是皮甲，而是绢甲或绢皮合甲。相对而言，把镇国寺天王像的铠甲定为皮甲更为可信，虽然据有关资料证实，镇国寺的佛像曾多次被修整过，原来的风貌已失去很多（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1 期莫涛等《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一文），但服饰的各部分大结构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所以它仍具有参考的价值（彩图 J—2、3）。

J—2 敦煌莫高窟 261 窟彩塑天王像

J—3 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彩塑天王像

图J—6①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壁画“五台山图”：河东道山门西南“巡道军士”图。②敦煌220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③福建闽王王审知墓出土残仆俑（因是侍从俑，原来手中可能还持有兵器）。④同墓出土的仆俑。此俑身上的缺胯衫好像是短袖。⑤同墓出土的仆俑，此俑上身残，好像是赤膊，手上捧的好像是靴。上衣脱下折起后，用双袖系在腰间，衣身前后摆一兜住裆下，一披在臂后，其穿衣方法甚为奇特。③④⑤俑均录自《文物》1991年第5期。

兜鍪、盔也沿袭盛唐以后的形制，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晚唐时期顿项向上翻卷的式样（有的只有两侧护耳翻起），另一种是顿项披垂的式样。披垂的顿项有时分成三片，左右两片较窄，后面一片较宽；有时只有脑后一片，披垂的顿项都是用甲片编制的（参见图J—1、3、4、5）。彩图J—2的顿项则属于个别现象，看上去完全像纺纺品，这或许更能旁证其身上的绢甲。兜鍪、盔的正面沿口，出现比较宽的盔檐，中间部位镶以各种饰品，眉心处仍像唐代一样伸出保护眉心的锐角。顶上一般饰以红缨（或其他颜色），缨有二种装法：一种竖直向上，另一种披垂于脑后，有的还保留着隋代的盔脊和唐初的半圆形胄顶（参见图J—1、4、5；彩图J—4）。

五代时期的戎服也一如唐制，武官和士兵一般都戴幞头，服缺胯衫。士兵的缺胯衫比唐代的

J—4 江苏江宁南唐李昇墓墓门石刻守陵武士像

稍短，武官的仍保持了唐中期的长度，衣衫的下摆后面比前面稍长一截，与唐代短后衣正相反。袖有宽窄两种，以窄袖为多；领也分为盘领、交领；两侧的衣衩开到腰际，特意露出一截内衬的短衫作为装饰。侍从或士兵为便于行动，有时还将前衣摆提起，掖在腰带内。下穿裤，裤口较小，接近于现代的直统裤。足穿长靿靴或履，靴头有的平圆，有的尖而起翘（参见图J—6①、②、③、④）。除缺胯衫外，还有一种交领短袖衫，是否属缺胯衫的一种，尚不能最后肯定。穿这种短袖衫时，前衣下摆要兜住裆下，服用这种服饰的可能是最底层的侍役、杂务人员（参见图J—6⑤）。

五代时期变化最多的是幞头的脚。《幙府燕闲录》说：

> 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脚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至刘汉祖始任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宋）不改其制。

这里所说的都是幞脚的造型。朝天幞头脚始于唐末（参见图J—7⑤），合抱于前者辽、金时仍使用，而马希范所创，后来成了宋代皇帝的常服冠（参见图J—7④；彩图J—5）。据记载，这时期的幞脚往往还镶嵌珠宝作为装饰，武将所戴亦如此。

不仅是幞脚，幞头的造型也有变化。唐后期的开元内样，顶与巾子两部分的区别已不甚明显，幞头像一顶圆锥形高帽。晚唐起两部分差别重又明显起来，至五代，往往习惯用桐木等把幞头的正面撑得有楞有角，在幞顶和巾子之间，用带，有时还裹上小木棍（或其他材料的小棒），紧紧压住幞顶，使隆起的巾子垂直向上。这样的幞头从正、侧面看，都是方方正正的了（参见图J—7①、②、③）。

抱肚在这时广泛流行起来，但一般仍束于铠甲外，戎服外还不使用。抱肚很长，大都要垂至膝下，外形也有所改变，唐代ꕥ形缘已经过时，方形圆角开始流行（参见图J—4、8；彩图J—1）。

唐末，铠甲的护项逐渐被取消，继而代之的是在颈间系肩巾。五代开始大量使用肩巾，一般以锦帛为之。系肩巾除了能使颈部保暖防尘外，主要可能还是为了装饰。这种装饰，在宋元明等朝更为流行（图J—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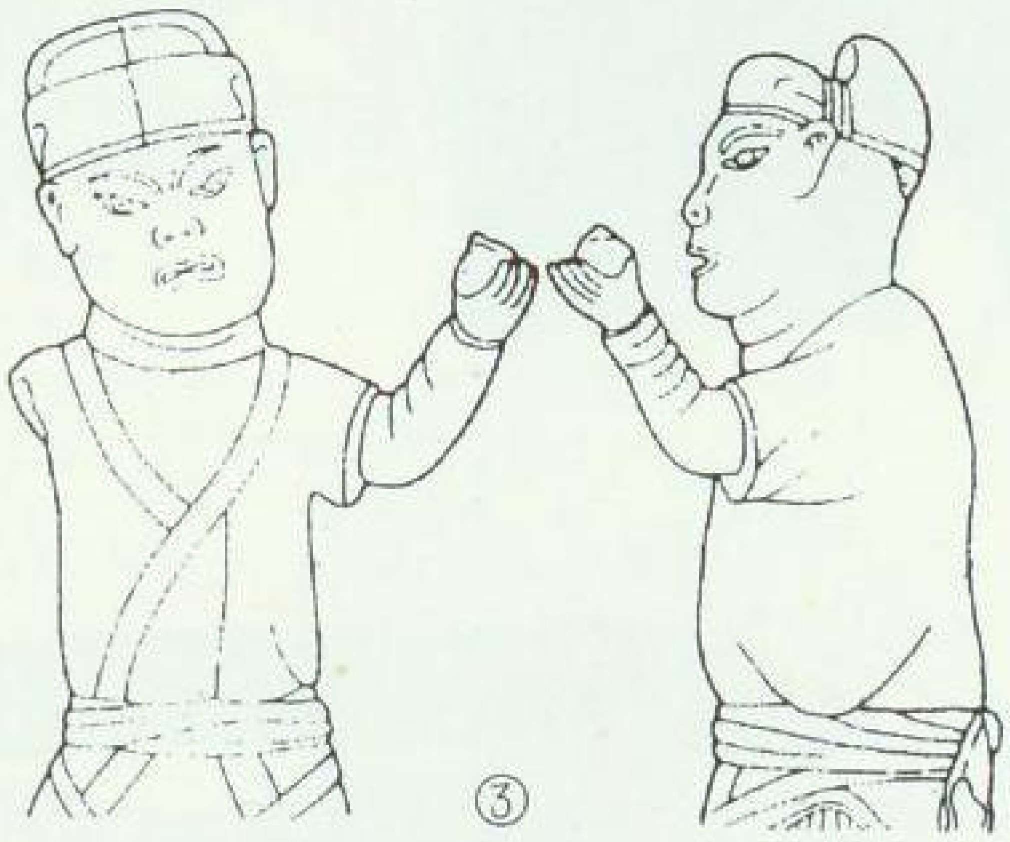
五代时期使用最普遍的腰带有两种：一种是唐末出现的双带扣、双铊尾腰带；另一种是双带扣、单铊尾腰带。王建墓出土的一条玉大带，就是此类型的腰带，在当时似乎是帝王勋贵使用的。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上的供养人像，好像都束这种带（参见图J—6②），它的最大优点是不用插带尾。王建墓的玉大带曾由专家进行复原并制作了复制品，这件复制腰带如束于腰间，带銙

J—5 托西大王曹议金供养像，见《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四川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 6 月出版。曹议金的幞头直脚中间细、两头宽，角圆形，不同于宋代的粗细一致、方头，两侍从的幞头为合抱于前的式样。

①

②

④



③

⑤

图 J—7①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的王建石刻像（据照片绘制），王建墓博物馆藏。②王建石像头部的侧俯、侧背面形象。③福建闽王王审知墓出土陶俑，幞头形象与王建像基本相同，录自《文物》1991 年第5期。④宋嘉定年间刻本《天竺灵签》木刻插图，人物所戴为直脚幞头。⑤《斗鸡图》中人物，顾闳中作，头上所戴为冲天幞头。

都在背后，这与墓内石棺旁的石雕力士和王建石像所系腰带的情况相符（参见彩图J—7；图J—2）。但从敦煌壁画上的形象来看，有的带銙装饰在腰带正面（彩图J—1），有的则在左右两侧和后背，空出腹部中间一段不装带銙(参见图J—6②；图J—9)。据此，笔者设计出一种新的复原方法，供参考和讨论（图J—10）。

图 J—8 江苏江宁南唐李昪墓出土武士俑

图 J—9 左：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供养像，张大千临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像腰间佩挂的饰物，可能是鱼袋。从唐至宋代的鱼袋实物至今没有发表过，判定为是鱼袋的形象都是根据文字资料推测的，这幅像中的鱼袋，很可能是唐宋之间的一种新式样。右：敦煌第146窟窟顶壁画，中西北角北方天王旁持伞力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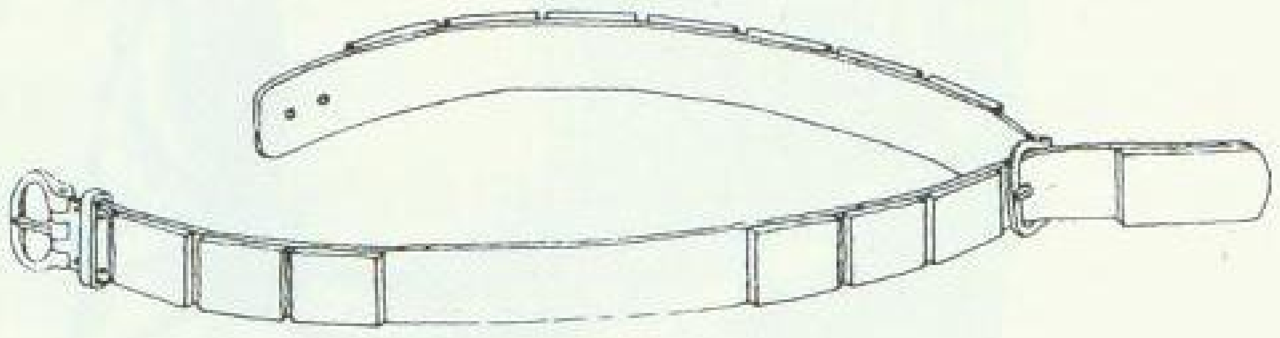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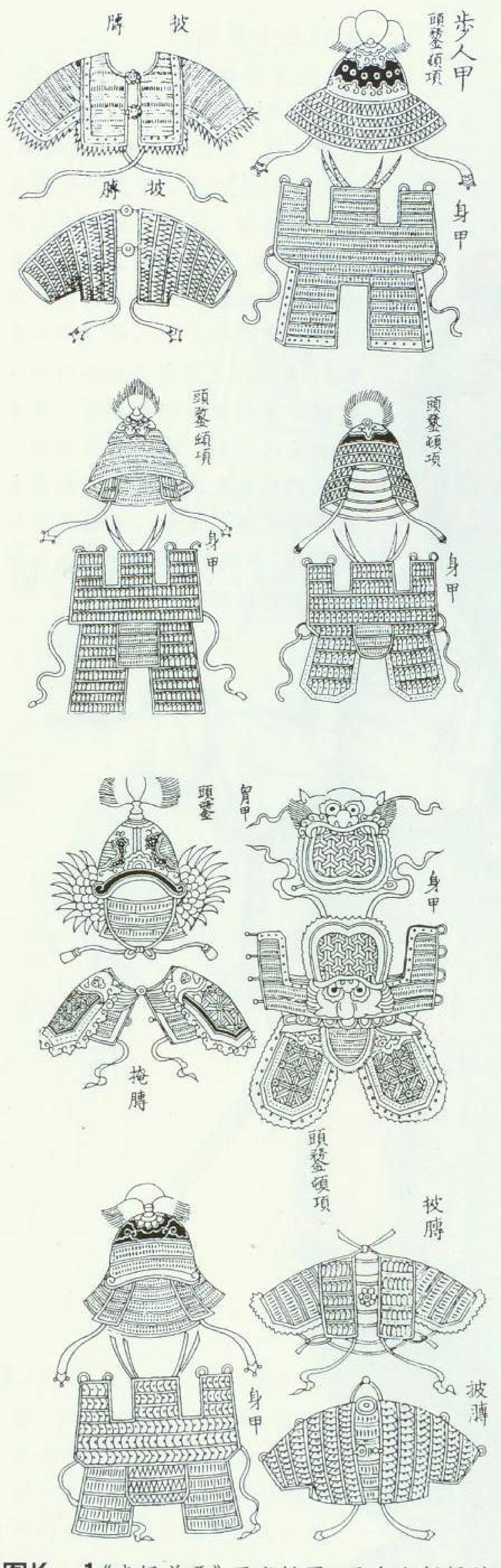
图 J—10 带銙在后背、双带扣在腰两侧的单铊尾腰带复原图。

J—6 王建墓出土玉大带铊尾，王建墓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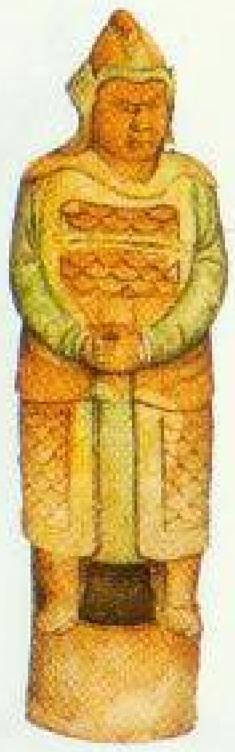
J—7 王建墓出土玉大带复原制品

宋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河南巩县宋陵石刻、山西运城关帝庙石刻、四川广元宋墓石刻、山西太原晋祠铁铸像、四川彭山虞公著墓壁画等形象复原；胄根据山东郯城宋墓出土实物和《武经总要》上的插图形象复原；戎服根据河北定县静志寺出土鎏金天王像、宋人绘《薛仁贵像》、四川广元宋墓石刻和四川安定毗卢寺石刻等形象复原；革带根据宋人石刻、嵩山中岳庙铁铸像上的形象和江苏武进等地宋墓出土带具实物复原；兵器采用传世实物"李纲锏"和杭州岳王庙陈列兵器实物形象。



图K—1《武经总要》甲胄插图，录自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



宋代

（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后周大将赵匡胤利用柴世宗早逝、率军出征的良机，发动陈桥驿兵变，建立了北宋皇朝。出于统一战争的需要，他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和军备生产。他的“旬课”措施（每十日一次亲自校阅首都皇家南、北作坊制造的各种军事装备），极大地促进了铠甲等兵器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北宋初年的“戎具精劲，近古未有”（《文献通考》卷一六一）。但晚唐以来武将骄横日滋、拥兵割据的弊病和宋太祖自己夺取皇位的事实，促使宋皇朝制定出一整套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奉为宋室治军的家法而代代相传，一开始颇有实效，但经过后来几位庸帝的滥意发挥，使北宋军队出现了冗兵、积弱和对外战争每战必败的严重局面。公元1127年，北宋皇朝终于蒙受“靖康之难”而被迫逃亡。

南渡以后，南宋小朝廷也一直处于孱弱状态，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抱着偏安一隅的心理，极力阻挠军队和人民的抗金斗争，甚至不惜纳币称臣，以杀害岳飞和解除主要抗金将领的兵权为交换条件，与金签订屈辱的和约。因此南宋一朝根本无心顾及军备生产，铠甲制造处于落后停滞状态。

造成铠甲生产停滞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火器的发明。北宋初炼丹家发明的火药，很快被制成火器开始用于战争，虽然这些火器的杀伤力在当时还很有限，但却使军事家们看到了它的发展前景。经过不断改进，南宋时火器威力已有很大提高，这就使人们认识到铠甲在战争中的防御作用已越来越小，尽管以后还使用了数百年，但它已不像从前那样受到重视了。

有关宋代的铠甲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史料书籍的文字记载，也有很多形象资料，但实物资料却几乎没有。

北宋初年的铠甲，据《宋史·兵志》记载，有金装甲、长短齐头甲、连锁甲、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铁甲、明光细网甲等多种铁甲；还有一种以皮革作甲片，上附薄铜或铁片制成的重量较轻的软甲。当时专门从事铠甲制造的东、西作坊把

铠甲制造的过程分成五十一道工序，对铠甲各个部件的甲片叶数、重量都有明确规定，使铠甲生产走向规范化。正因为如此，目前全国各地发现的宋代文物上的铠甲形制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成书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武经总要》，是我国一部记述有关军事组织、制度、战略战术和武器制造等情况的重要军事著作，其中刊录的五领铠甲的插图，是宋代铠甲形制的第一手资料（图K—1）。

这五领甲胄中，第一领看来是将帅用甲，另四领为一般军官和士兵用甲。从图上可以明显看出，甲身的胸、腹甲和腿裙、鹘尾连成一体，展开时形成一个平面，背甲分成左右两片，在中间用纽扣或布带束扣。胸甲上缘有两根肩带以连接背甲，这是五代以来的两件套铠甲，披膊和护肩作为另一件的形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清楚和容易理解。

立体形象资料首推河南巩县宋陵石刻，巩县宋陵葬有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个皇帝，每座陵前都有数量相同的石刻造像，原神门前的镇陵武士全都是顶盔贯甲，手持金钺，雕刻手法传神、写实。彩图K—1、2、3分别是永熙陵（太

K—2 河南巩县回郭镇陵区永裕陵镇陵将军像

K—1 河南巩县西村陵区永熙陵镇陵将军像

K—3 河南巩县孝义陵区永昭陵镇陵将军像

图K—2 山西太原市晋祠北宋铸铁像（据实物写生）

宗赵光义墓）、永昭陵（仁宗赵祯墓）、永裕陵（神宗赵顼墓）前的镇陵将军，这些石刻成于公元997年——1085年。从这些石像身上的铠甲可以看出，在前后约90年的时间里，形制没有什么变化，与五代时期相对照，永熙陵武士的兜鍪、前额的装饰、顶上红缨的装法与王建墓力士像的基本相同（参见五代图J—1）。只有顿项的式样不同，永熙陵、永裕陵顿项的护颊、护项连成一体，披垂下来后覆盖了整个肩部，用带在颔下系结，这种顿项起到了护项和护肩的双重作用。披膊披挂于身甲之外，胸甲有的是大块甲片的（彩图K—1），也有用与身甲相同的小甲片编成的，背甲则一律是小甲片编成（彩图K—2、3）。

永昭陵、永裕陵镇陵将军的兜鍪两侧还出现了凤翅形的装饰，缨饰向上竖起，胸甲前有兽面铁护。这些石像的年代与《武经总要》成书的年代较近，如果把石像与插图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很多的相同之处。与《武经总要》的插图更接近的是运城关帝庙的石刻像和山西晋祠的铁铸像

K—4 山西运城关帝陵石刻半身武士像（据照片绘制），关帝陵博物馆藏。

K—5 成都东郊三〇八厂出土三彩武士俑（据实物写生），成都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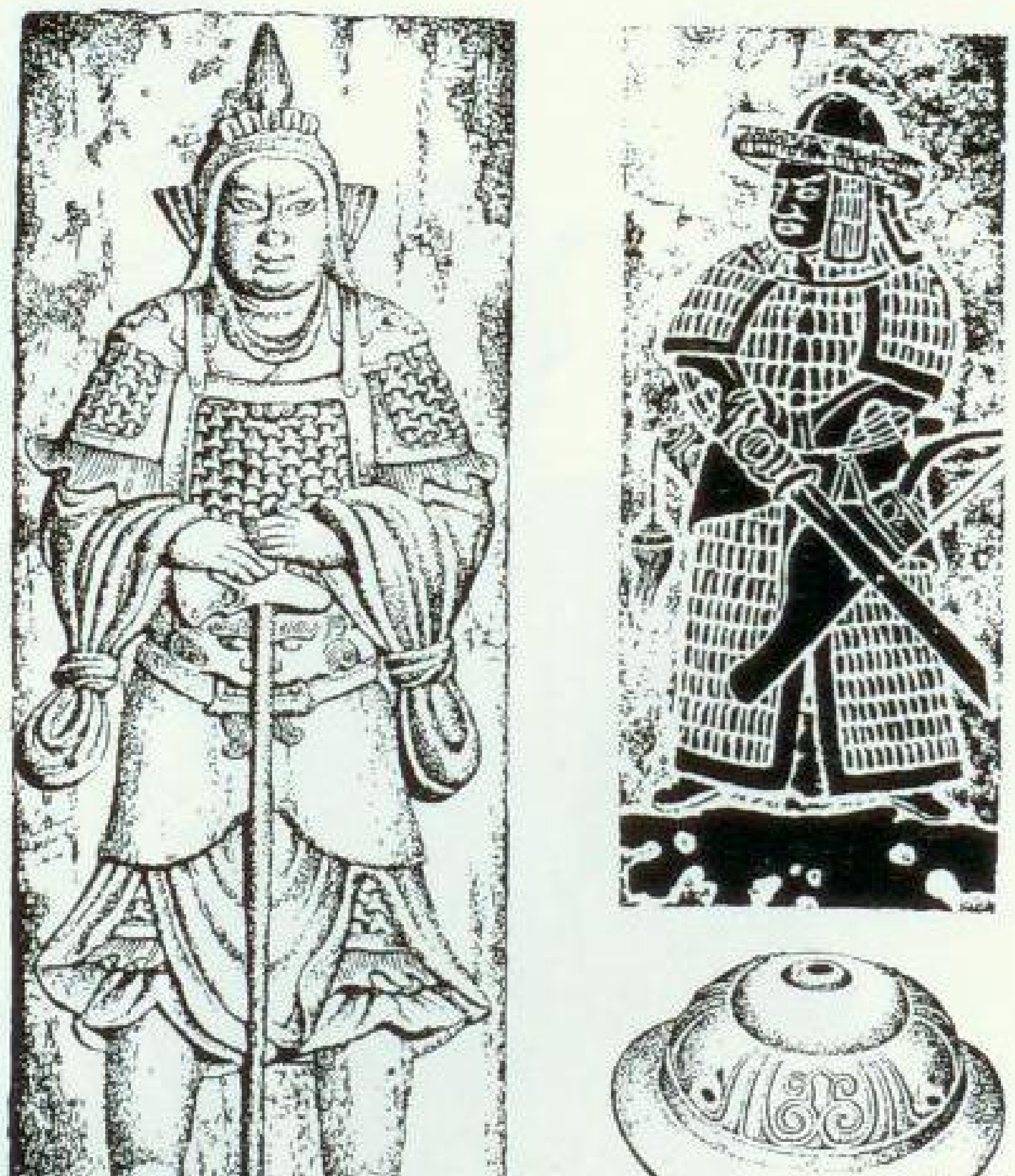
（彩图K—4、图K—2），虽然一是半身，一有残缺，但留存的铠甲部分塑造得都十分细致，使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出各个部分的结构。处于北宋后期的永昭陵镇陵将军的铠甲，除了兜鍪的顿项变小，正面不再合拢系束颔下外，其余各部结构一如旧制。

综合上述石刻、铸像，加上成都东郊、勉县老道寺出土的两件陶俑的铠甲形象（彩图K—5、6）可以发现，北宋铠甲基本沿袭了五代时的形制。只有披膊的结构和穿戴方法有时略有不同。至于束甲，除了少数仍用皮带外（参见彩图K—1），一般都如五代时期，用丝带或帛带横束。

南宋时的铠甲也还是上述形制（图K—3①②；彩图K—7），首铠出现了形如凉帽的盔，山东郯城曾出土了一件铜制的，式样与虞公著墓壁画的武士头盔很接近（图K—3③）。从此时盔还用铜铸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出南宋时期铠甲生产的落后和不受重视。

K—6 陕西勉县老道寺出土红陶武士俑（据实物写生），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K—7 成都龙泉驿西河公社南宋墓出土三彩武士俑（据实物写生），成都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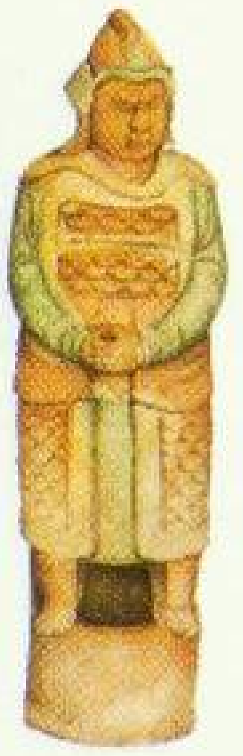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图K—3 ①贵州遵义永安乡南宋杨粲墓墓门石刻武士像，《中国美术全集》雕刻专集。②四川彭山虞公著墓壁画，录自《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③山东郯城出土南宋铜盔，铜盔檐口铸有“宝祐四年吉日置”七字铭文，“宝祐”系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宝祐四年为公元1256年。

K—8 北宋石刻天王像（据实物写生），上海博物馆藏。

K—9 敦煌55窟佛坛南侧天王彩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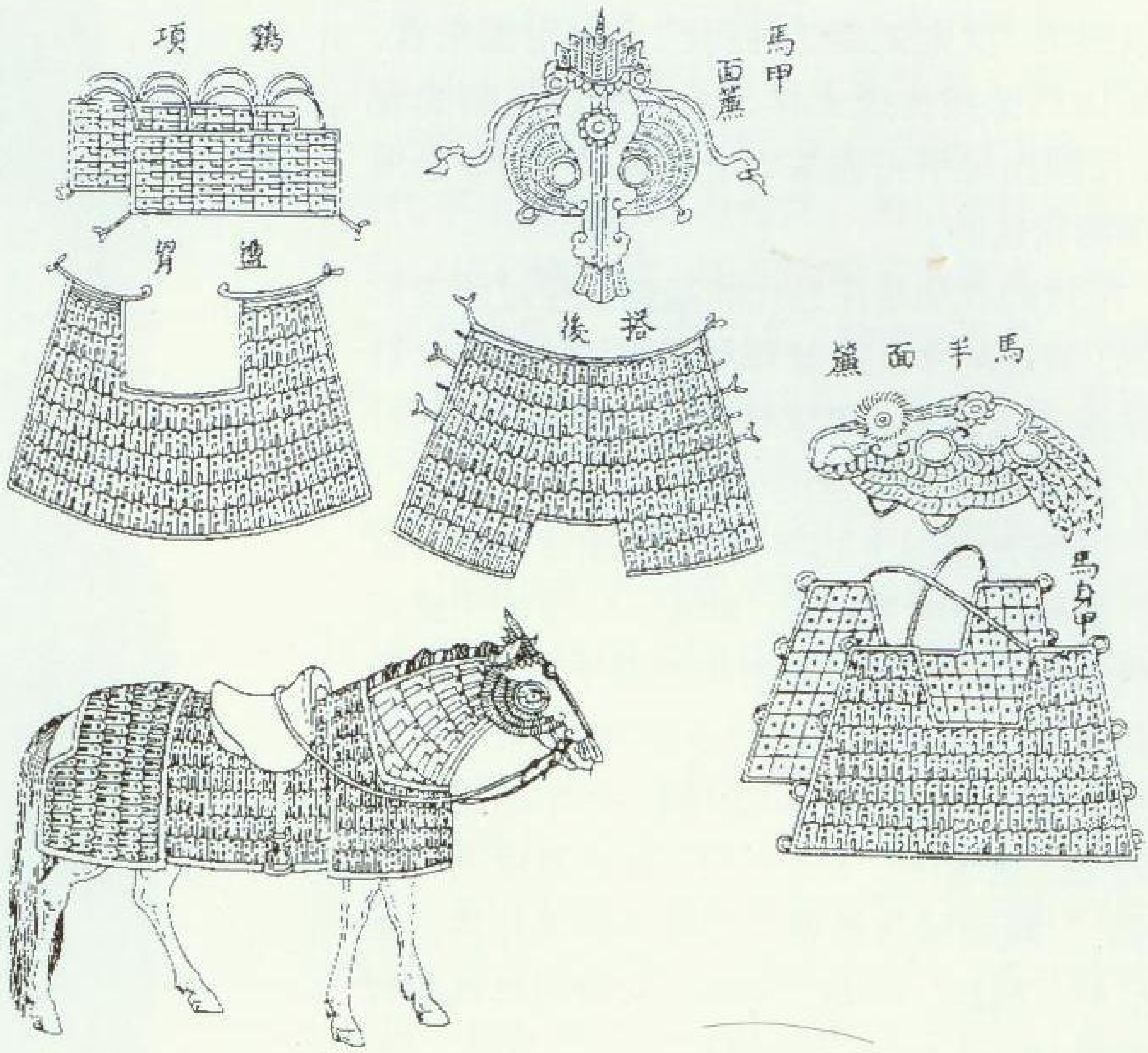


宋代也仍然使用皮甲，这在《武经总要》中也有记载。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座真人大小的石刻天王，身上的铠甲、披膊用的是山纹铁甲片，身甲的大部分可能是革制（胸、腹部的圆护甲应是铁制）。束甲仍使用唐代时那种纵横十字形方法，带为双带扣双铊尾革带，其中自颔下垂直向下连接腹部圆护甲的皮带，在其他雕像上也出现过（参见彩图K—8）。这根皮带使人联想到护腹甲好像不是固定在身甲上，而是垂挂于铠甲外，用腰带和横向束甲带将其固定的（彩图K—4），但是这在《武经总要》的插图里没有反映。

宋代也有仪仗用甲，称作“五色介胄”，“甲以布为里，黄绝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纹），红锦缘，青绝为下帬，绛韦为络，金铜铁，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自背连膺，缠以锦腾蛇（锦带）”（《宋史·仪卫志六》），外表装饰十分华丽。敦煌55窟的彩塑天王身上的铠甲，看上去与上面的描述十分相似（彩图K—9）。绢甲的甲片用颜色涂画可能不只是宋代的事，唐代就已经这样做了。

宋代出了不少女将军，如小说中的穆桂英和实有其人的梁红玉等。她们所穿铠甲与男用甲有何不同，四川广元宋墓石刻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形象参考。此墓是夫妻分室合葬墓，确切年代为南宋庆元元年（1195）。西室为女主人墓室，东西两壁上有两幅石刻女武士像。女武士的铠甲、戎服都一样，头戴束发冠，用带系结颌下，身披铁甲（没有披膊），内衬宽袖戎服，肩系肩巾，腰间束袍肚，脚上穿靴（图K—4，详见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铠甲除了腿裙中间的间隔、保护下腹的鹘尾比男用甲的宽大之外，其余好像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头上未戴胄，但如戴的话，可能也不会有新的、变化很大的式样。

宋代也使用纸甲和马甲。据《宋史》记载，仁宗康定元年曾“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副”，《涌幢小品》记述了当时纸甲的造法：“用无性极柔之纸，加以锤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卷十二）马甲在《武经总要》里有记录和附图（图K—5），文字注释说：“裹马装则并以皮，或如列铁，或如笏头，上



图K—5 上:《武经总要》马甲插图,录自《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下:根据《武经总要》马甲插图所作的宋代马甲复原图(供参考)。

图K—4 四川广元宋墓墓室石刻 左:西室西壁女武士像 右:西室东壁女武士像 录自《文物》1982年第6期。(根据照片绘制)

者以银饰，次则朱漆二种而已。”从附图来看，形制依然保持传统式样，而一概以皮制的现象，反映出马甲可能基本上像唐代一样，是用于卤簿仪仗的。

宋代的戎服是在五代的基础上经过改变形成的。宋朝的军队有禁军和厢军两大部分，禁军是皇家正规军，厢军是地方州县军，这两种军队的戎服具有一定的差别。

禁军九品以上的将校军官，通常有三种服饰：朝服、公服和时服。朝服、公服的用途与唐代相同，时服是皇帝每年按照季节不同，赏赐给近侍、文武官员的时令服饰。《宋史·舆服志》载：“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以时服，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赐服通常是朝、公服中的某几件，如袍、衫、抱肚、勒帛、裤等，一般用有鸟兽纹样的织锦，制作比较考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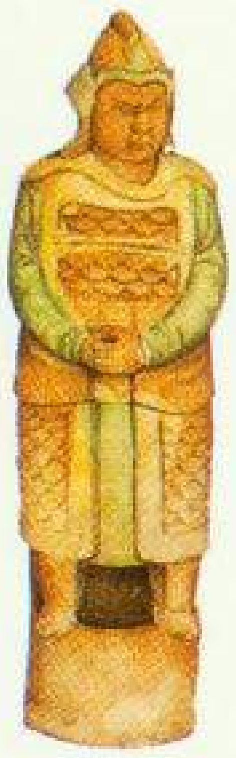
朝服按其性质是法服，不属于戎服范围，但它是九品以上的武官必不可少的服饰，因此必须涉及一二。宋代武官的朝服、公服与文官相同，这是因为宋代实行的是以文制武的政策，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几乎都由文官担任，各州县、地方的厢军指挥权也集中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所以宋代武官的政治地位较低，反映在服饰上就是武随文服，高级将帅更是如此。

比较准确的朝服形象资料也是巩县宋陵的石刻，彩图K—10至13的四件石像，分别是永昌陵（赵匡胤墓，公元976年）、永定陵（赵恒墓，公元1022年）、永昭陵和永裕陵神道旁的石刻。经过观察可以发现，从宋初至中期，朝服在形制上具有如下一些变化。

首先是戴的冠，称为进贤冠。“进贤冠，古缁布遗像也，斯盖文儒者之服。”（《晋书·舆服志》）冠用漆布做成，前额上有冠饰，冠后有一豁口，称作“纳言”（参见彩图K—10、13）。初期的冠饰、纳言都比较大，冠饰几乎覆盖整个正面，以后逐渐变小。冠的顶上有梁，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宋初只有二、三、五梁三等，一品、二品五梁冠，三、四、五品

K—10 河南巩县西村陵区永昌陵神道武官石刻像

K—11 河南巩县芝田陵区永定陵神道武官石刻像



三梁冠，六品以下二梁冠。元丰后改为七、六、五、四、三、二梁七等。七梁冠为二品官所戴，一品的冠梁数不再增加，而是在冠上加笼巾（与唐代平巾帻外加笼巾相同，参见唐代彩图Ⅰ—25）。从石像上看，宋初的梁不很突出，所以不容易看出梁数，中期以后，梁逐渐升高，梁数就能一望而知了（参见彩图K—11、12）。戴进贤冠时，上用簪穿过发髻固定（簪一般用玳瑁、犀角做成），下用罗缨系于颔下，冠体涂以金银。

加笼巾的进贤冠又称貂蝉冠，冠上除原有的装饰外还加插立笔、附蝉、额花，其形象参见彩图K—14。

袍服则是：上身穿绯衣，右衽立领，广袖，衣长至膝下，内衬白色中单（衬袍），下穿朱裳（裙），垂至脚背，身后佩有锦绶（锦绶如周代的佩绶，是品官法服上必佩的饰件）。这种绶的佩法前后也有变化，宋初用带横束于腋下（参见彩图K—10），以后则佩于腰带上。朝服的领上还佩有一件饰品，称作“方心曲领”，据记载是从隋代开始使用的，但隋唐五代的形象资料上都

K—12 河南巩县回郭镇陵区永裕陵神道武官石刻像

K—14 宋范仲淹像　明人（佚名）作，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K—13 河南巩县回郭镇陵区永昭陵神道武官石刻像

图K—6 永定陵神道武官石刻像，河南巩县芝田陵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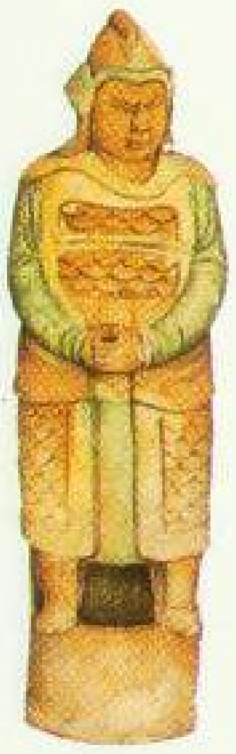
没有发现这件饰品。这种曲领是用硬质材料制成，套在领间用于压住衣领不使隆起的。穿朝服时，脚上则穿舄，形制与隋唐时基本相同（参见彩图K—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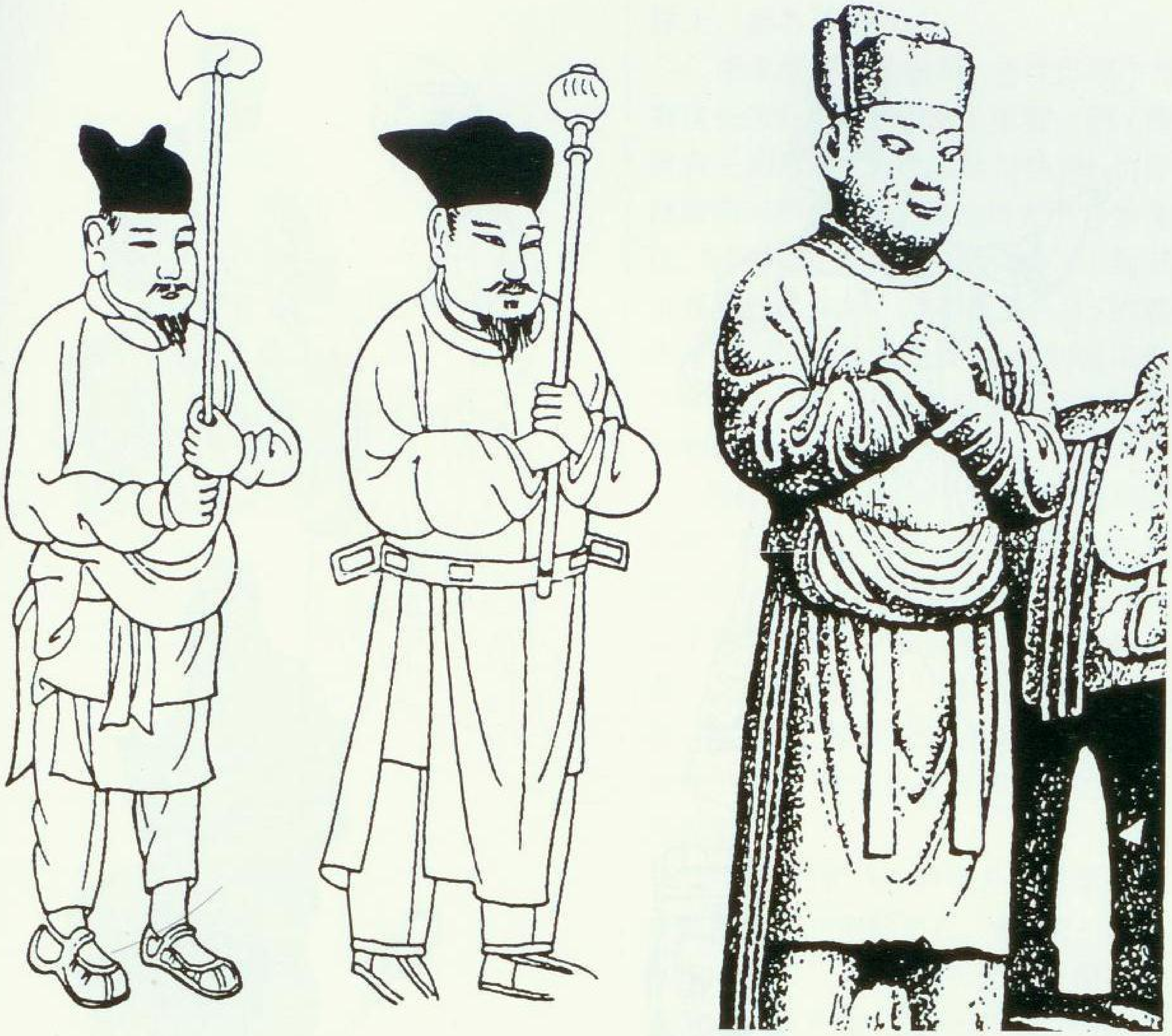
公服是武官的戎服之一，为交领、盘领袍，大袖，一侧开衩，袍的下缘膝盖下有横襕，袍长至脚背（图K—6）。

武官还服用一种一般军校都用的戎服窄袍，窄袍即缺胯袍，小袖，两侧开衩，盘领，其长短时有变化，长的至脚背，短的不过膝，一般则在膝下离地一尺。通常如在军中，袍服外还束抱肚，这种袍服“便坐视事则服之”（《宋史·舆服志》），为平时使用最多的服饰。裤为小口裤，足穿皮靴或履，靴头圆而平直，大部分不起翘，头上“皆皂纱折上巾”（同上，图K—7）。

士兵的戎服也是缺胯袍，袍的形制与武官的窄袍基本相同，两侧衣衩像五代时那样开得很高，有时也将衣袍下摆提起塞入腰带内，穿小口裤，脚上一般都穿履或草鞋，头上也戴幞头（图K—8）。

图K—7 左：江西乐平县北宋壁画墓壁画仪卫武士图，录自《文物》1989年第10期。中、右：南宋绘画《中兴四将图》中侍卫将校，《中国美术全集》两宋绘画专集。





图K—8 左：福建尤溪宋代墓壁画“持钺仪卫”，录自《考古》1991年第4期。中：河南安阳天禧镇宋墓壁画“持骨朵仪卫”，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右：永昌陵神道控马、仗马官，河南巩县西村陵区。三人服饰中，右的服饰可能代表皇城禁军军士服饰，左的服饰可能是厢军士兵服饰。

唐代的短后衣宋代也继续使用，宋代短后衣的形制在太原晋祠、嵩山中岳庙的铁人，河南方城出土的石雕和《却坐图》中侍卫人物的服饰上有所反映。与唐代短后衣相比较，它的领、袖有所不同：领为交领，袖有宽、窄两种，宽袖则习惯把袖口打结，成为一种装饰（图K—9）。穿短后衣时一般还要缚裤，而裤可能也是大口裤。形象资料表明，宋代的短后衣不仅衬于铠甲内，还直接穿于外表。

宋代戎服中也有背子，但形制上已有较大改变。开封朱仙镇岳王庙的岳飞铜像，在窄袍的外面罩了一件短袖、交直领、右衽、两侧开衩的罩袍，这件罩袍应就是宋代的戎服背子（图K—10），从资料上看有长短两种。宋代的背子除了军人穿以外，帝王显贵、文人学士、男女老少都可服用，是一种流行的服饰。当然，各种身份的人所服用的背子在衣料、装饰、式

图K—9①山西太原晋祠铁人铸像。②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③河南方城宋墓出土施彩石雕俑(据照片绘制),《中国美术全集》历代雕塑专集。④宋画《却坐图》中侍卫。

图K—10上、中：河南开封朱仙镇岳王庙岳飞铜像，此像据当地人说，铸于南宋时期，如果属实，当也在岳飞平反之后。下：宋画《文姬归汉图》中服短背子的侍卫，录自《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

样上，都各不相同。

南北朝时期的帔风，唐代已很少使用，只有在长乐公主墓的壁画上见到一例又像帔风又像背子的形象。唐代不使用帔风，也许是大量使用明光甲的缘故，因为明光甲外如有衣服罩住，就不能发挥其反光的作用了。到宋代帔风又重新开始使用，从彩图K—15的鎏金天王像所披帔风的形象来看，宋代的帔风已更接近于现代的式样，这可能是受了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图K—11）。

同样受少数民族服饰影响而出现的还有一种称“貉袖”的短袄，《同话录》说：“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瑗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著，以其便于控驭。”图K—12的人物身上所服，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应就是貉袖。貉袖与背子一样，在宋代是各种身份的人都可服用的衣服。

宋代的武将在铠甲外还常罩一种形制和貉袖很相似的宽袖短衫，《宋史·仪卫志》中称作“绣衫”。这种绣衫无扣，用衣襟下缘的垂带在胸前系结（图K–13），绣衫上有绣纹，绣纹是区分各军的标志：“金吾卫以辟邪，左右卫以瑞马，骁骑以雕虎，屯卫以赤豹，武卫以瑞鹰，领军卫以白泽，监门卫以师（狮）子，千牛卫以犀牛，六军以孔雀，……”（《宋史·仪卫志》），绣纹的位置应在后背。

铠甲外罩绣衫的穿法称作“衷甲”制，据文字记载唐代时已有这种穿法，但没有发现其形象资料，而在宋代的绘画、雕刻作品里却常常出现。南宋时，衷甲制的绣衫变成广袖、大翻领、右衽、长及脚背、无带扣、以腰带系束的宽大长袍，成为军中高级将帅一种类似公服的服饰（彩图K—16、17）。

宋代的戎服以交领为多，交领很容易因人的活动而拥起，使衣服看上去凌乱，因此需要用布带勒束，这种布带称作勒帛。“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石林燕语》卷十）。中岳庙、晋祠的铁人、河南方城宋墓

图K—11永定陵客省使石刻像，河南巩县芝田陵区。

图K—13《凌烟阁功臣图·薛仁贵像》，宋人绘，画中虽是唐代人物，但服饰都用宋制。

图K—12《骑射图》中人物，宋人绘，录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K—15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地宫出土铜鎏金天王像，见《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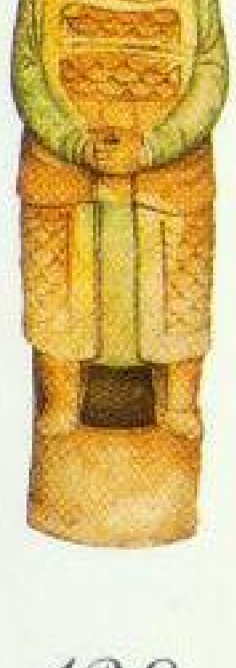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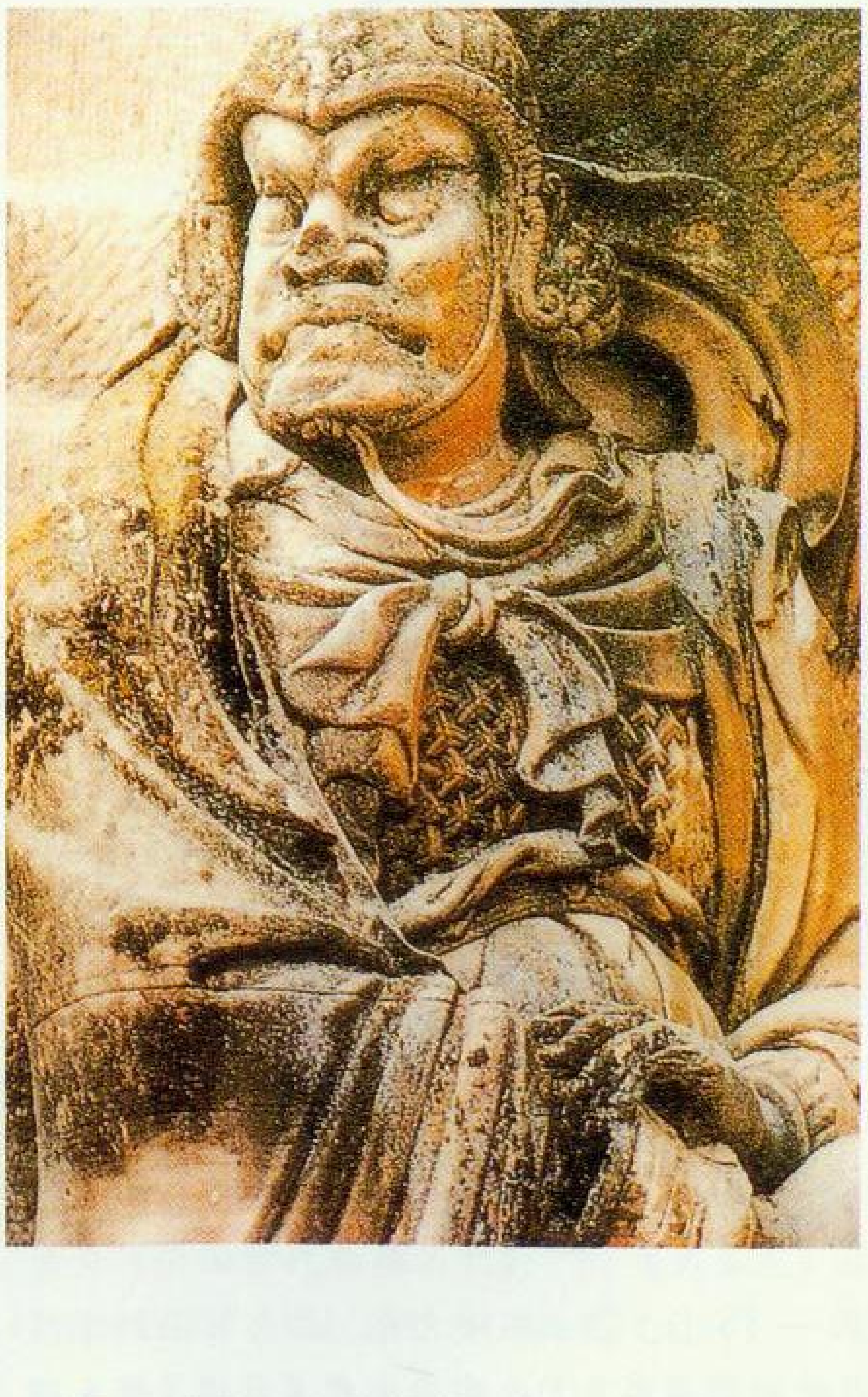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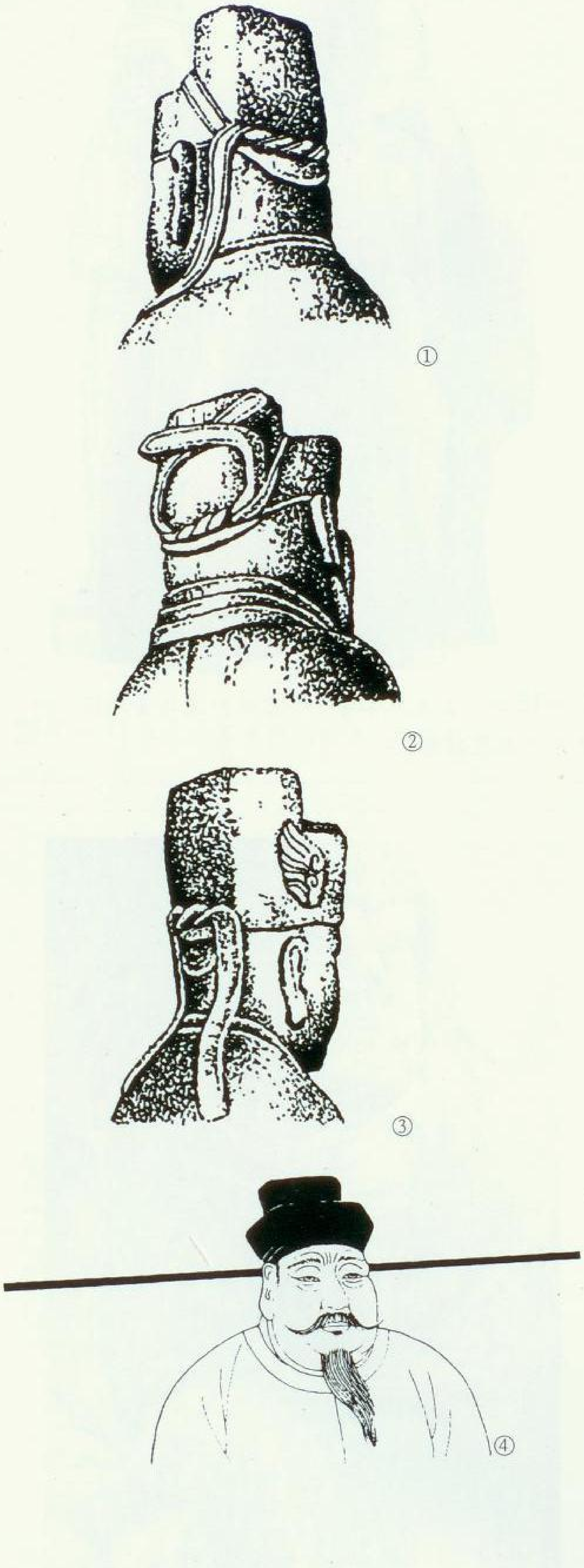
图 K — 14 左：山西太原晋祠铁人铸像　右：嵩山中岳庙兵库前铁人铸像

K — 16 四川大足机山茅140窟毗卢道场金刚像，洞窟开于南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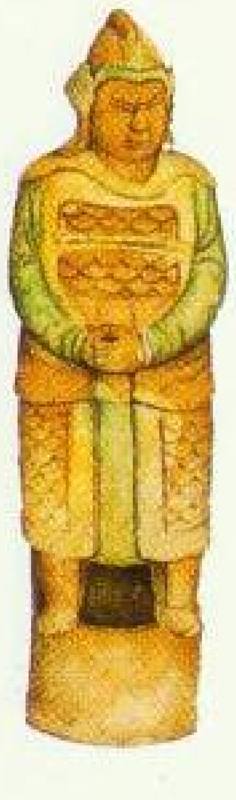
图 K — 15 两件均为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另两件铁人像见图K—9①、②。



K — 17 四川安定毗卢洞第六号龛天王像



图K—16 ①、②永熙陵文吏、控马官石刻像幞头及幞脚的式样。③永昭陵文吏石刻像，幞头两侧有凤翅装饰。④宋太祖赵匡胤像，头上是硬裹直脚幞头。



的石雕俑和《却坐图》中侍卫的胸前都有勒帛束衣，值得注意的是，中岳庙、晋祠的六件铁人身上的勒帛一律都横过胸背，从腋下反折向上包裹肩部后，有的在后背，有的在胸前打结（参见图K—9①②、14、15）。这种束法很特别，有可能是“时服”的一种专门束法（因勒帛也是赐服中的一项）。勒帛除了勒束衣领外，还用于束腰。束腰时往往在腹前打结后垂下一段作为飘带（参见图K—9），元、明二朝这种束法十分流行。

冠饰方面使用最普遍的仍是幞头。宋代的幞头式样很多，从隋末的平头小样到五代的硬裹幞头都使用，幞脚的变化也层出不穷，五代时马希范所创的直脚幞头在宋代是帝王百官的公服冠，直脚用铁做骨，在北宋中期变得如马希范初创时那样，伸得十分长，以至有碍人的行动。军中则多用软脚幞头，有的在脑后打结垂于两肩，有的反折向上。幞头的两侧有时还饰以凤翅（参见图K—16），卫士戴黑漆无脚幞头（参见图K—8）。硬裹幞头则形如帽子，用藤或草编成巾子做衬里，外表用纱做面，涂以黑漆，用时只需戴上便可。

宋代的武士也常戴抹额，《东京梦华录》卷七记皇帝驾幸射殿射弓时说：“驾诣射殿射弓，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余人，皆长脚幞头，紫绣抹额……”将帅则学汉代常戴幅巾，朱仙镇的岳飞铜像，头上戴的就是幅巾，与汉魏时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宋代幅巾像幞头一样要包裹头顶，用两脚收拢顶部在发髻上系结，长出的巾脚垂于两侧（图K—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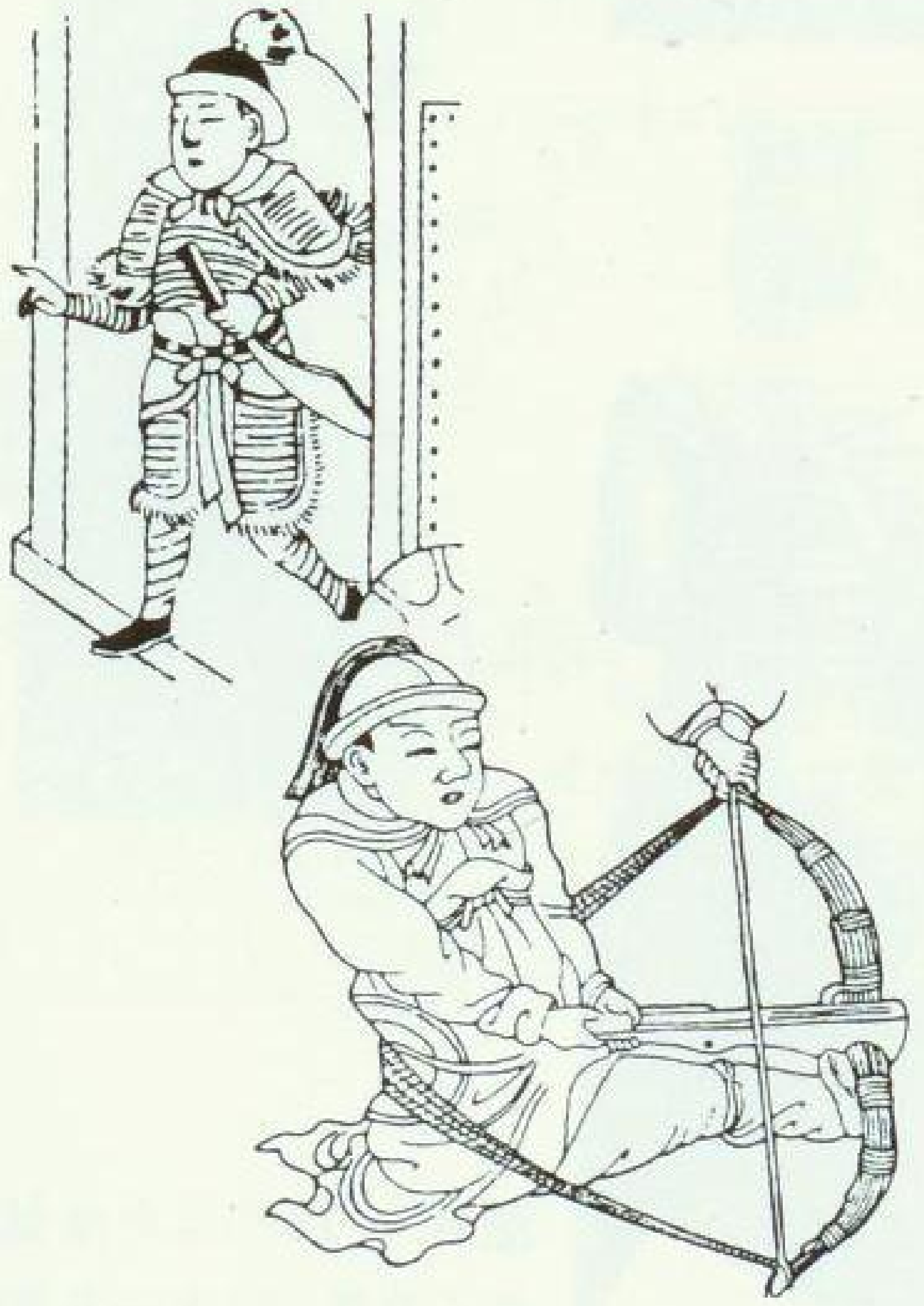
宋代的武士还时兴戴束发冠，这种冠一般用金、银、玉等材料制成，戴时用笄横贯发髻后，再用冠缨系于颔下。戴小冠时还常常在冠上加巾帽，《石林燕语》卷十说：“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却坐图》中侍卫武士戴的头巾，与河南方城石雕俑头上小冠的外形很相似，前者很可能是在小冠上再束头巾才形成这种形象的（参见图K—9、14、15）。武士戴束发冠的习俗由来已久，洛阳出土的一件西周的铜车辖，上面

图K—17 上左：宋画《文会图》中戴抹额人物。上右：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出土戴幅巾陶俑，录自《文物》1980年第3期。中下：河南朱仙镇岳王庙岳飞铜铸像。

的人形冠饰就是一种束发冠（参见西周彩图B—3）。南北朝时的平巾帻也属于这种冠，盛唐时武士常用一种类似今天女士所用的发卡卡髻，也是束发冠的变异（参见唐代彩图I—21）。宋代的束发冠恢复了南北朝时期的体积和戴法，这种小冠很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宋徽宗就常戴栗玉并桃冠，他的作品《听琴图》中，弹琴者（即他本人）戴的就是此冠。在元明两朝，束发冠一直是公子皇孙、勇武之士偏爱的冠饰。着短后衣、戴束发冠在宋代还是宫廷侍卫的服饰，军队中的将士没有这种装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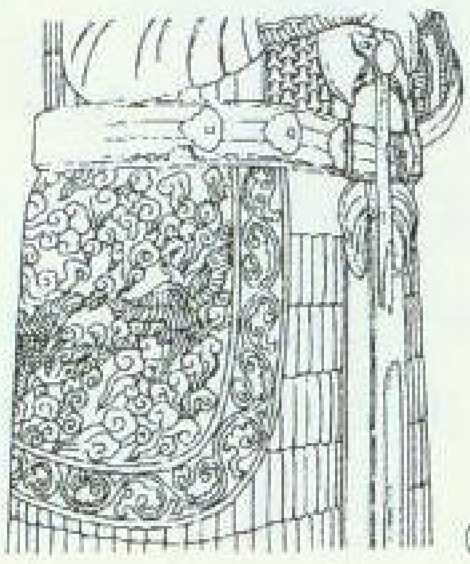
宋代军队的普通士兵作战时只有衣甲而无兜鍪，头上戴的是皮笠子，《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顶朱漆金装笠子”。这种皮笠子一用于挡风避雨，二用于保护头部，其形制在《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书插图中有所描绘（图K—18），与宋人画的唐代名将薛仁贵像头上戴的极为相似（图K—13）。

唐末五代时的抱肚在宋代称作袍肚，不仅铠甲，袍服外也服用，皇帝每年颁赐的时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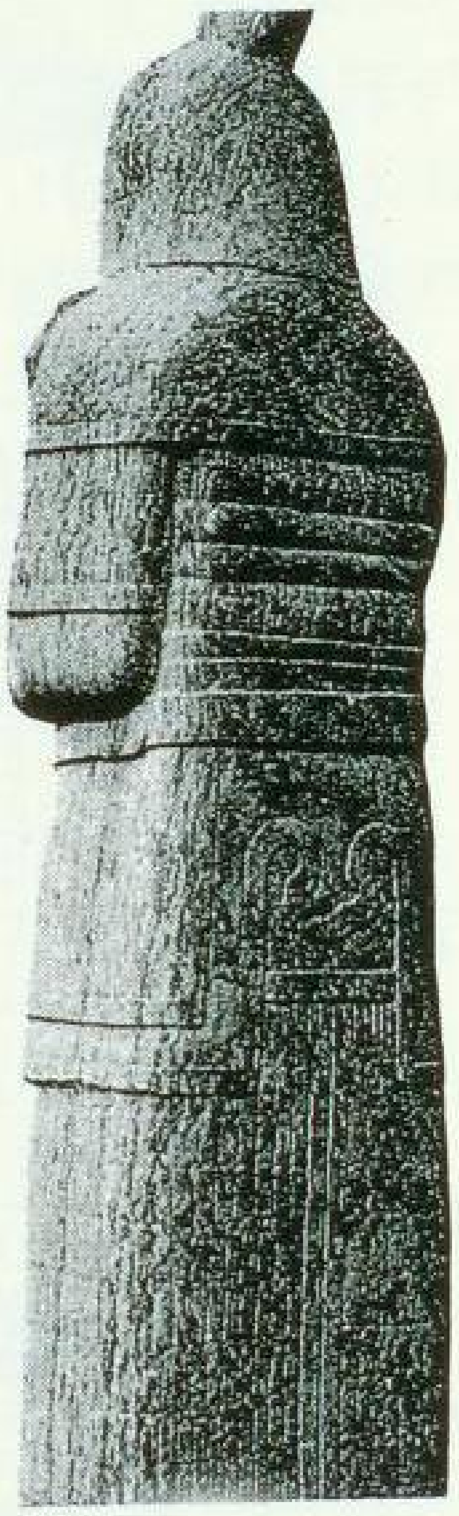


图K—18 上：《武经总要》攻城器械插图中宋军士兵，录自《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下：《武备志》插图“腰绊上弩弦图”中士兵形象，录自《文物》1985年第5期。（《武备志》为明代兵书，其中插图的人物服饰大都是明式，此图中士兵的笠与图左的笠在外形上基本相同，故收入）

③


④

①


①

②

图 K — 19 ①永定陵镇陵将军石刻像，河南巩县芝田陵区。②河南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③、④永熙陵镇陵将军袍肚图案（据实物写生）。

袍肚是重要的一项。宋代的袍肚，初期尚沿袭唐末五代之制，一般垂于腰带之下，以后系束部位逐渐升高，外形也多种多样，其制作材料多采用图案绚丽的织锦（图 K — 19）。

宋代使用的腰带，基本都是双铊尾、双带扣，称作“笏头带”，五代时期的单铊尾、双带扣带已很少出现。带銙装饰也不同于五代，带面的前后都有带銙，一般正面装饰桃形或梅花形带銙，背后装饰方形带銙，这些带銙都有出土实物。(图 K —20) 正面装饰小型带銙是便于皮带穿过带扣。腰两侧的铊尾仍像五代时一样，拖长一小段垂于后背。这种双垂铊尾比单垂看起来更对称、美观。拖垂的这一段后来如直脚幞头一样越来越长，经过明代的演变，逐渐被引用于戏曲服饰，成为一件很有特色的道具。

同时唐代的单带扣、单铊尾带宋代也继续使用，其铊尾插法也仍用隋制，鞢韄带则主要是少数民族使用，中原地区汉族已不再流行，但是带銙上用于装鞢韄的古眼仍一直保留着（图 K — 21）。

带銙除了有古眼的素面带銙以外，大部分表面开始铸刻装饰图案，图案的内容据《宋史 · 舆服志》的记载有：金毬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天王、八仙、犀牛、宝瓶、双鹿、行虎、胡荽、凤子、宝相花、戏童、野马等约二十种，制作带銙的材料在宋初以犀角为第一等，装饰犀角带銙的腰带称作“通犀带”，一般“非特旨皆禁”（《宋史 · 舆服志》），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宋太宗即位后认为金最贵重，《清虚杂著 · 补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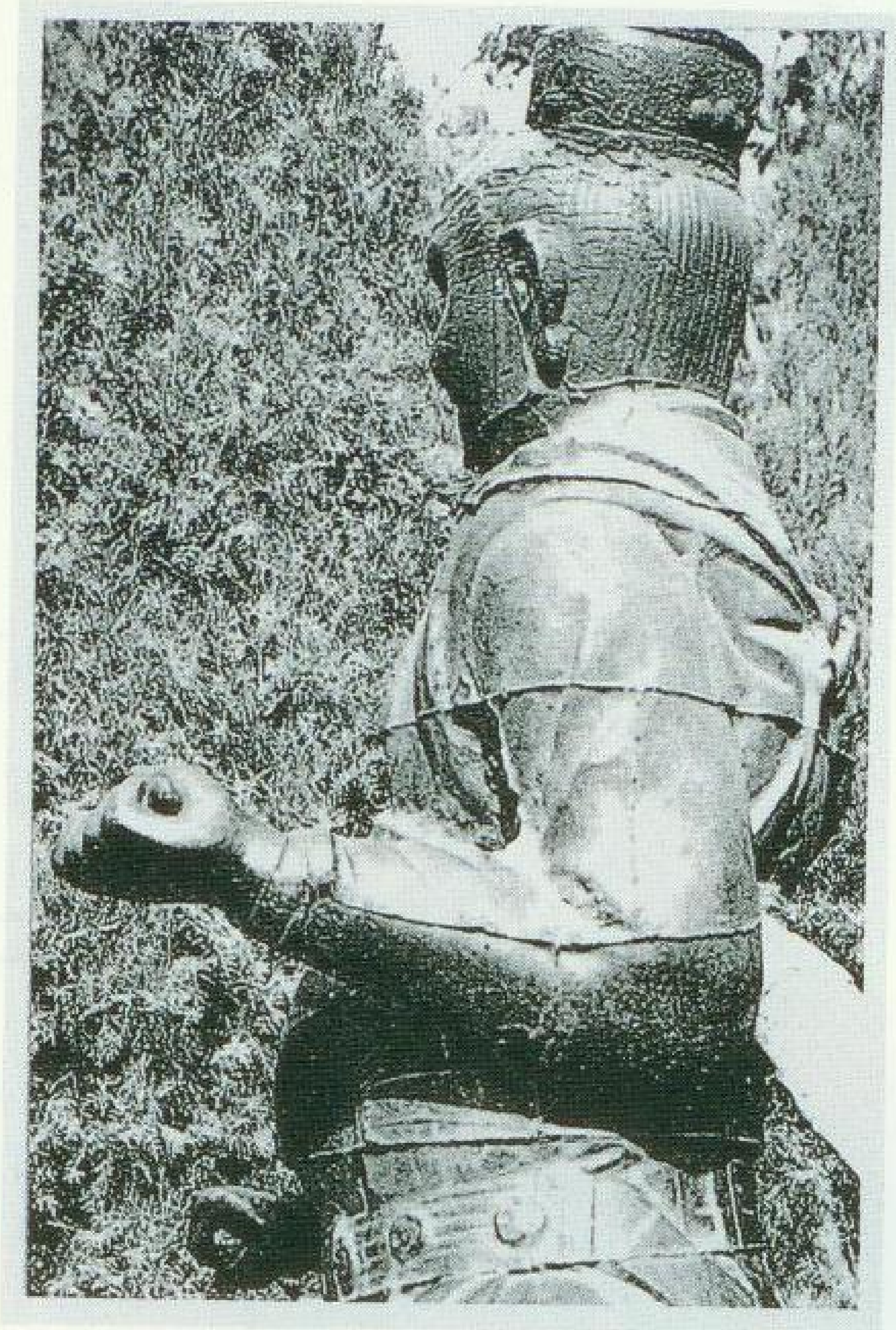
> 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从官等第赐带。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炼不变，真宝也，遂作笏头带以赐辅臣。

用黄金镌刻御仙花（即荔枝）图案的带銙腰带，当时只有三品以上将相才能服用，称作“横金”，是一种身份十分显赫的象征。太平兴国七年（982）又重新作了规定，改玉带为第一等（参见图 K — 22 ①、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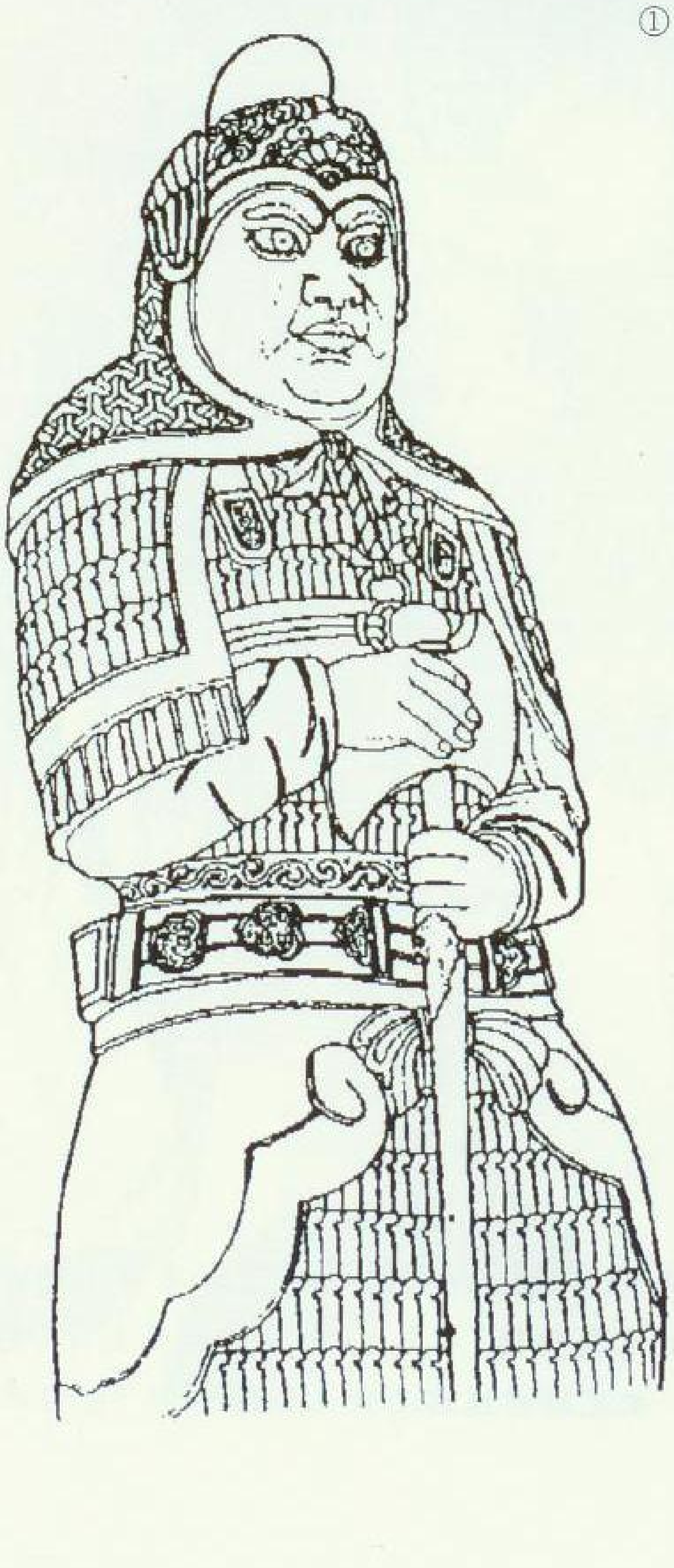
宋代也有佩鱼制度，“其制自唐始……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宋史 · 舆服志》）。文武官员“凡服紫者，

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佩”（同上）。这种佩鱼在辽墓中曾有实物出土（参见辽代部分），宋陵石刻中也有可以参考的形象（图K—22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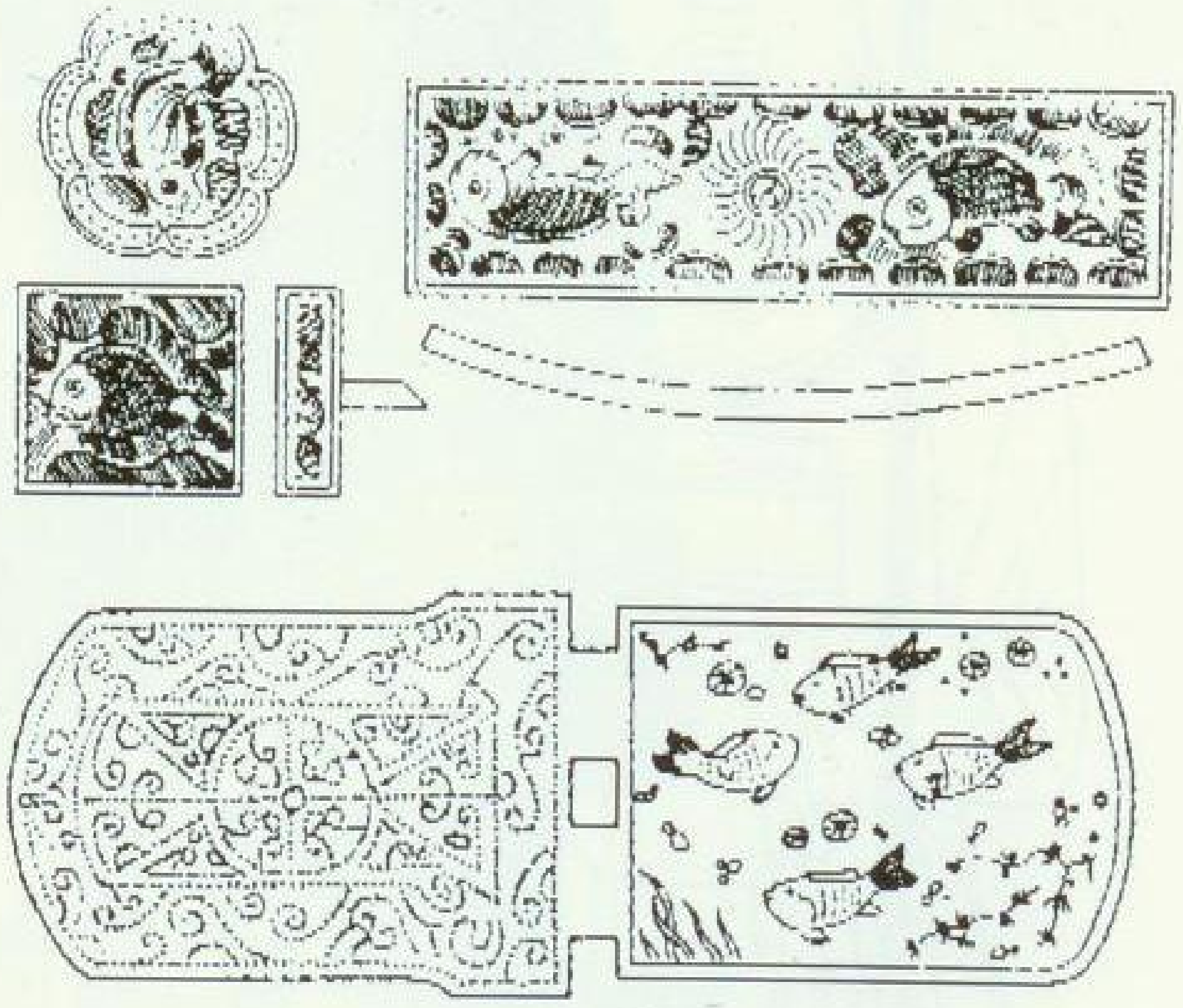
宋代铠甲的颜色，据《宋史·仪卫志》记载，有黄、青、朱、白、黑、金、银等色，至于仪仗用的绢甲，色彩如唐代，可能更加丰富。将帅的朝、公服，初期照搬唐代的制度，元丰后公服改为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时服则是用各种不同的织锦来区分品级的，而且经常有变化。至于普通将士的服饰，因为要区分禁厢两军、各方面军、不同兵种和下级军官的级别，颜色可能很多。除了九品制官服颜色不可直接使用外，其余各色都能使用，而以青、白、朱、黑、黄（淡黄色不能用）为主要色彩。腰带的带鞓只有饰金、玉带銙时才能用红色，一般都用黑色。当然也有不分级别都可使用的服饰和颜色，如《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红上团花背子、紫上杂色小花绣衫、锦绣袍肚等，就是例子。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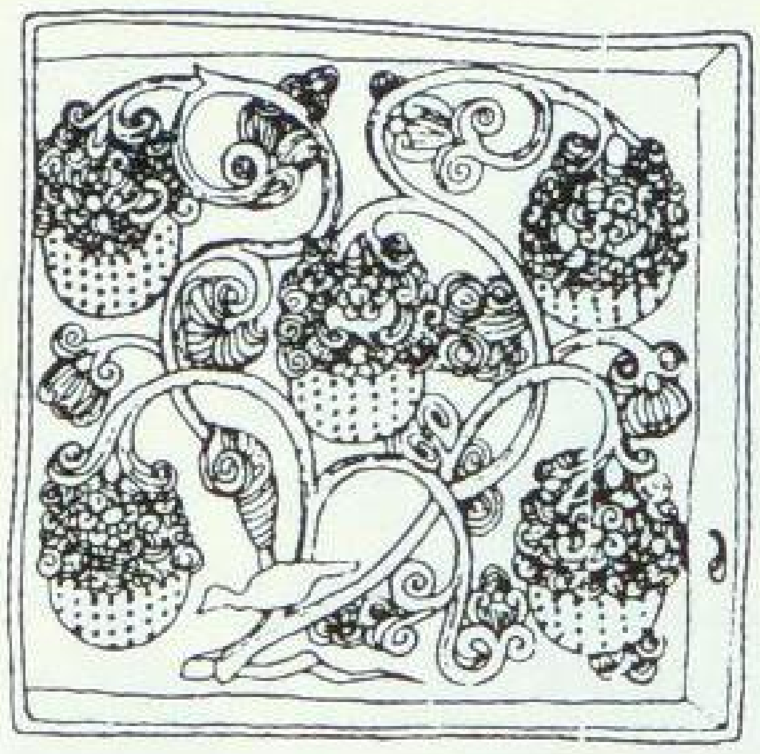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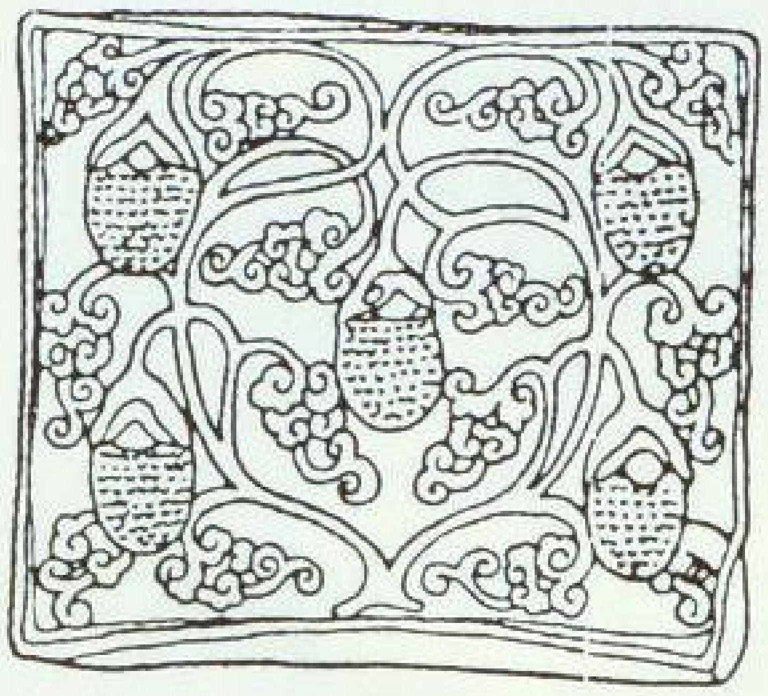


③

图K—20①：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腰带上可见前后两种带銙）。②：永裕陵镇陵将军石像（正面为桃形带銙）。③：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银带銙、铊尾，南京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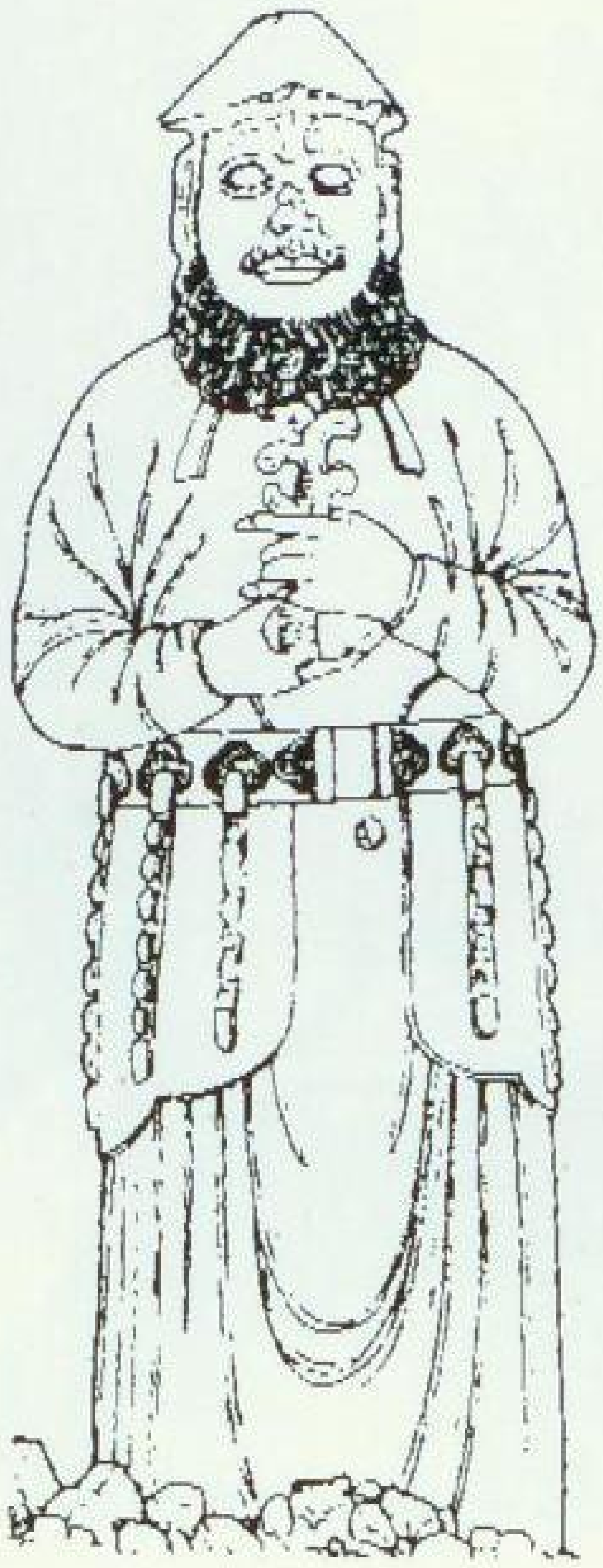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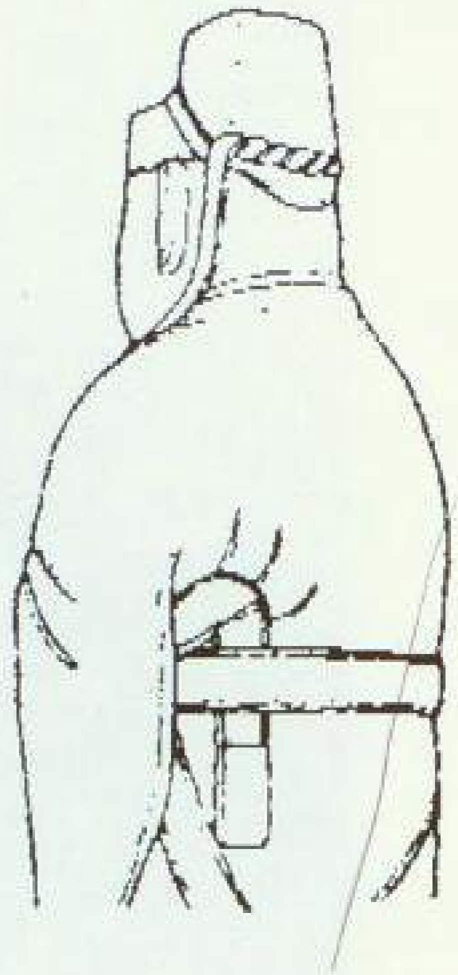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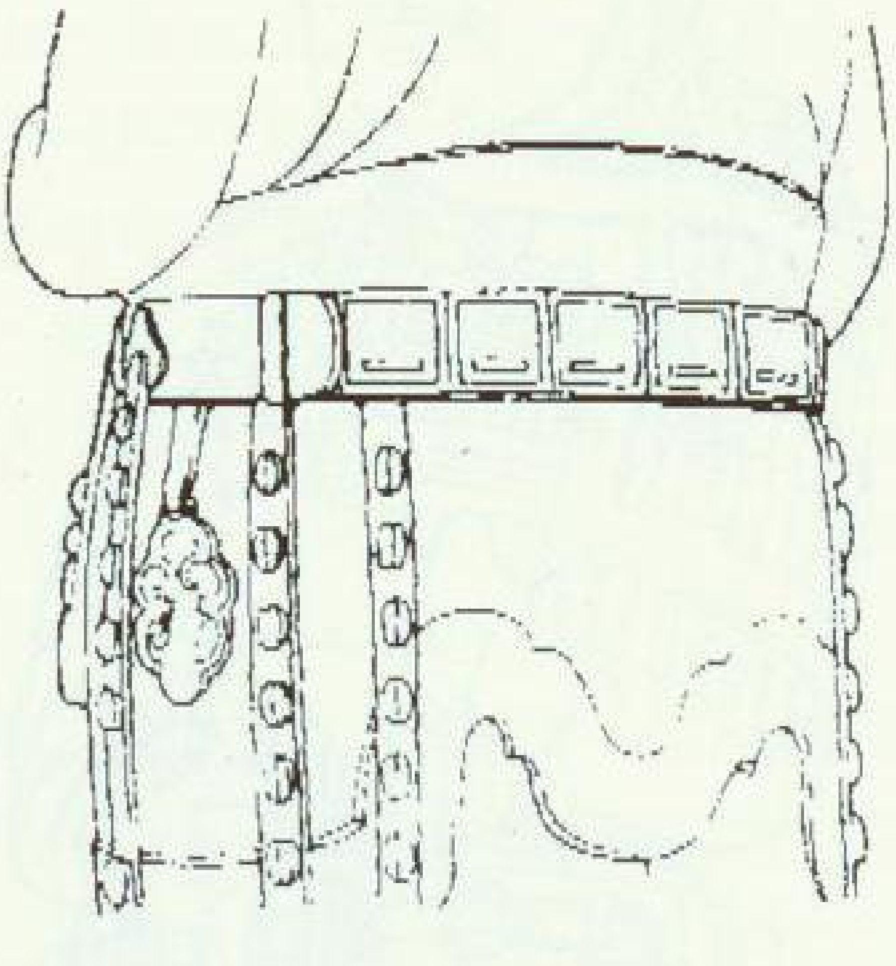
②

③

图K—22 ①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金荔枝纹带銙，南京博物院藏。②（美）波士顿美术馆藏鎏金铜荔枝纹带銙。③永定陵客省使石像上佩鱼形象，与《舆服志》说的“垂于后”情况不符。







图K—21 左上：永裕陵神道客省使石刻像，河南巩县回郭镇陵区。右上：永裕陵文吏石刻像（铊尾插法）。下：永定陵神道客省使石刻像背部（有古眼的带铊）。

辽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山西大同观音堂彩塑天王像、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壁画等形象复原；胄根据内蒙古赤峰市辽墓出土实物复原；戎服根据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壁画、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等形象复原；革带根据内蒙古奈曼旗、通辽县二林场等地辽墓出土实物复原；兵器采用辽宁建昌龟山辽墓出土实物与杭州岳王庙陈列兵器实物形象。

L—1 山西大同观音堂辽代彩塑天王像（据照片绘制），此像的盔上原有凤翅装饰，已毁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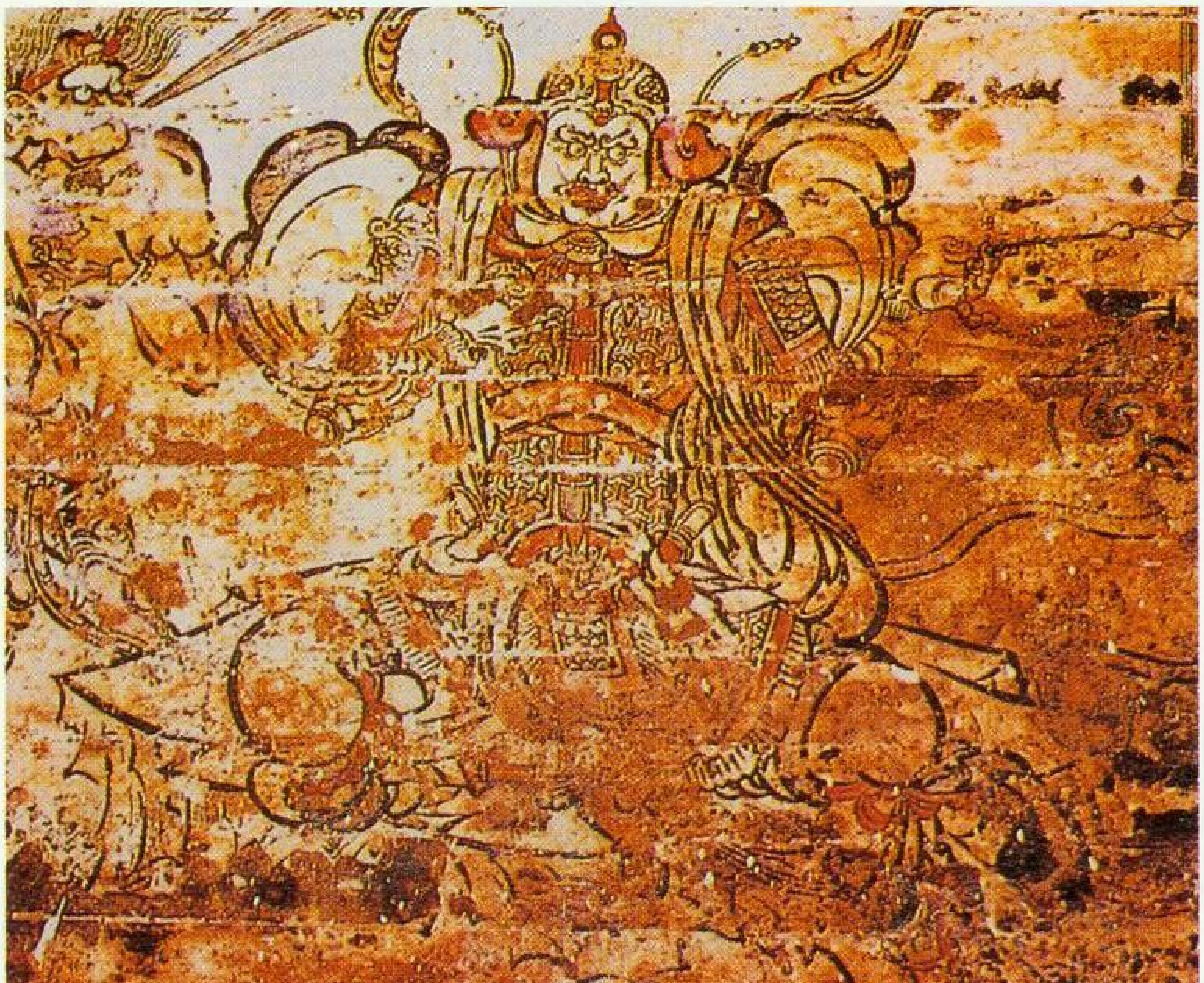
辽

（公元 907 年——公元 11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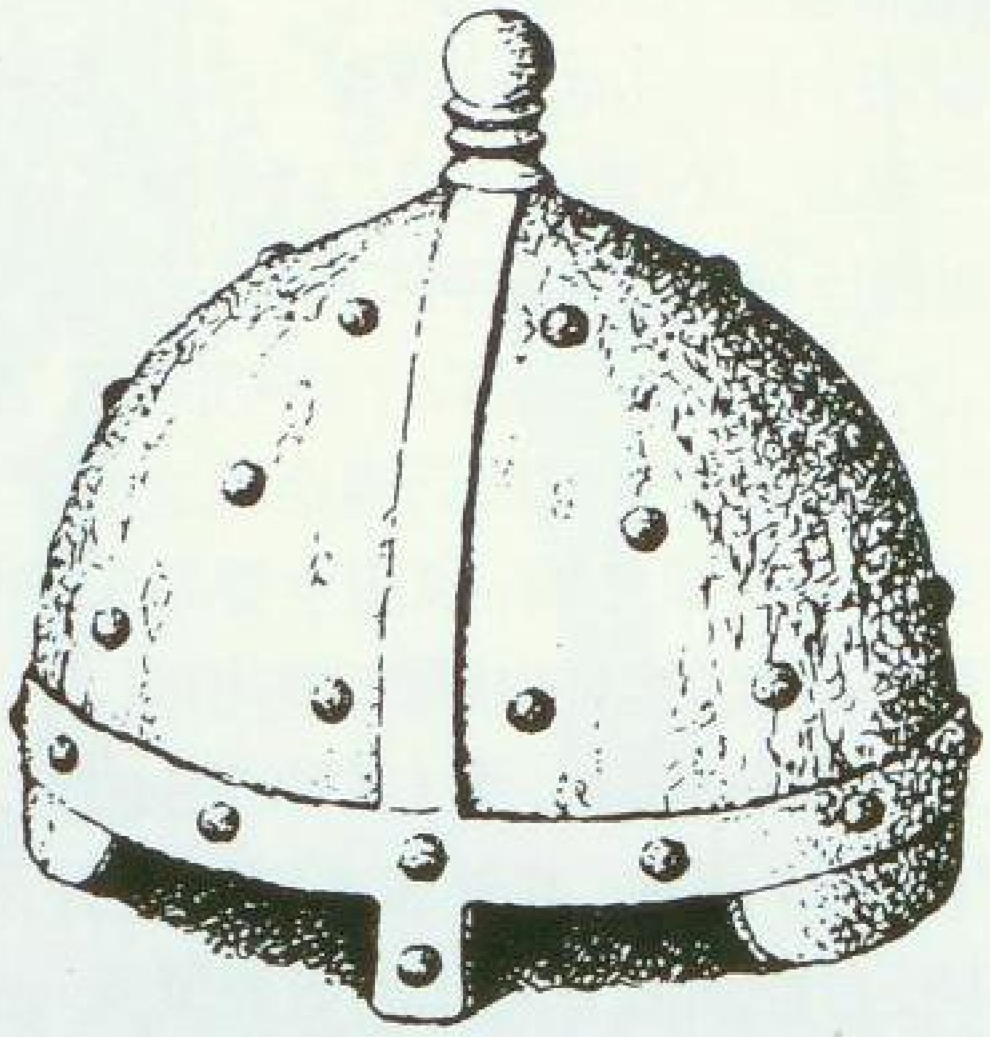
辽是由契丹贵族耶律氏建立的，契丹为东胡后裔，属鲜卑的一个部落，世居今天的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以畜牧射猎为生。五世纪中叶起，通过与中原互市，开始“务稼穑、种桑麻、习织组”（《辽史·仪卫志》），开矿冶铁，制造铁器。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利用中原混战之机，自立为帝，建立起契丹国。公元936年，应后晋石敬塘之请，出兵相助，实力从此大增，并于946年攻灭后晋，次年改国号为辽，与北宋长期对峙。后因统治残暴，境内反抗不断，最终为金所灭。

契丹在短时期内很快强盛，主要是吸收采纳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其中自然也包括军戎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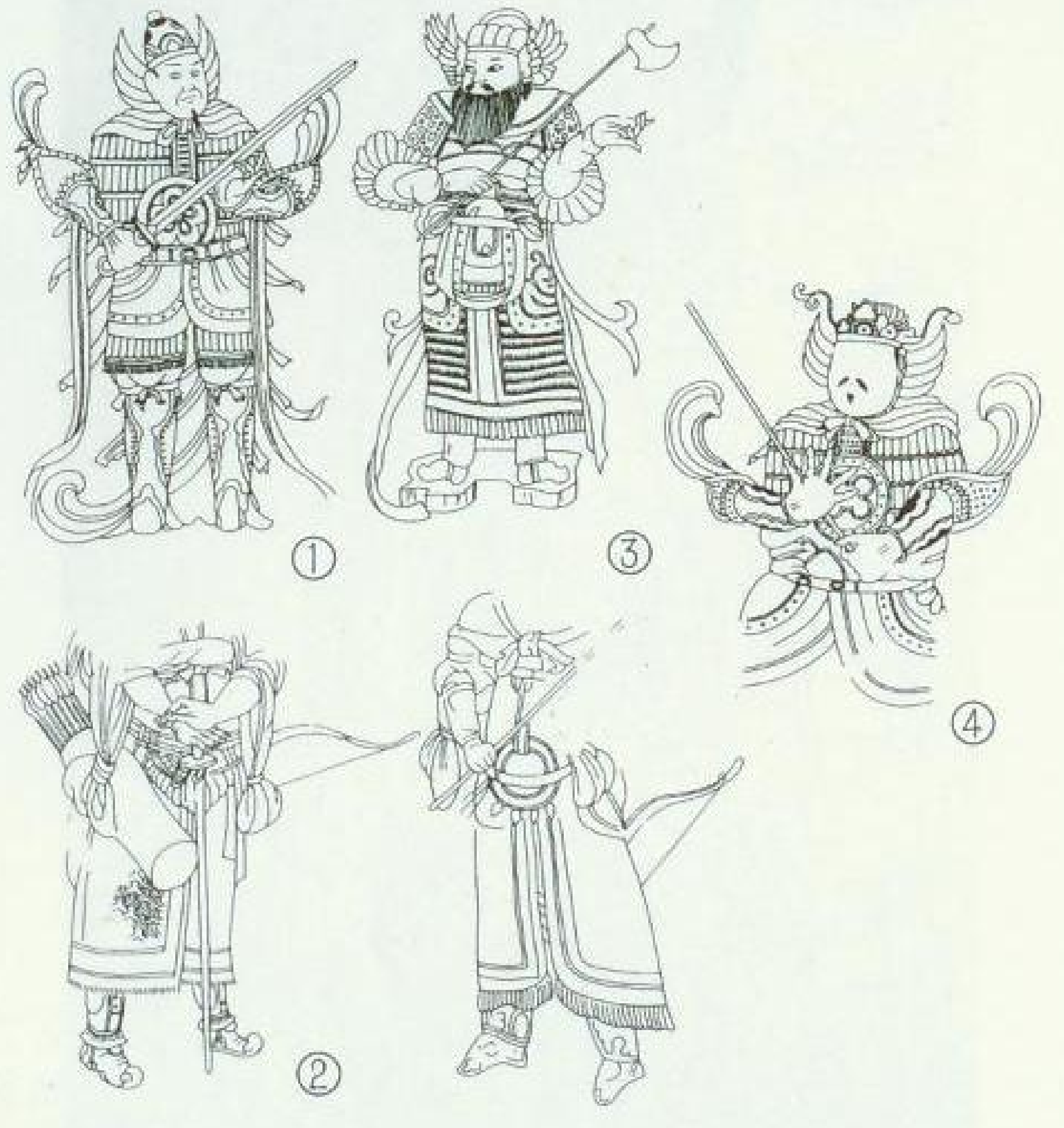
铠甲方面，据《辽史》记载，还在契丹国时，军队已都使用铁甲，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唐末五代和宋的式样，以宋为主，比



L—2 沈阳市天拓净光舍利塔地宫南壁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图L—2 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铁盔，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L—1 ①、④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摹制。②内蒙古白彦尔灯辽墓壁画。③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壁画，录自《考古》1989年第9期。

较典型的是大同市郊观音堂的辽代彩塑（彩图L—1）。其铠甲的上部分结构，与北宋中期的完全相同，只有腿裙明显地比宋代的短，前后两块方形的鹘尾甲覆盖于腿裙之上，则保持了唐末五代的特点，而足背上的护甲，在中原地区要到明代才广泛使用。彩图L—2、图L—1的几种铠甲，形制上都具有唐末五代的特点，时间上好像要比观音堂彩塑早一些。

辽朝铠甲护腹的圆护好像都用皮带吊挂在腹前（参见彩图L—1；图L—1），然后用腰带固定的，这一点与宋代的皮甲是相同的（参见宋代彩图K—8），而胸前正中的大型圆护，则是辽朝特有的。盔与兜鍪的两侧都有凤翅形的装饰，顿项有的像五代时那样向上翻起，有的像宋代那样披垂于后。铁盔在内蒙赤峰曾有实物出土（图L—2），出土实物与观音堂彩塑、天坫净光舍利塔地宫壁画上的盔在外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参见彩图L—1、2）。

辽朝除铁甲外也使用皮甲，山西大同下华岩寺的辽代彩塑天王像，身上披的铠甲去掉飘带等装饰品以后，可以看出其唐末形制的特征（如双铊尾腰带，横向束甲皮带，胸前的明光甲圆护等）。根据铠甲上没有塑出甲片和腿裙极短的现象，可以基本判断是皮甲，但在肩、胸、腹等主要部位配备了铁制部件，这种皮甲在大同观音堂的另一尊彩塑像身上也可见到（彩图L

L—3 山西大同观音堂辽代彩塑天王像

L—4沈阳市博物馆藏辽墓壁画残片（据实物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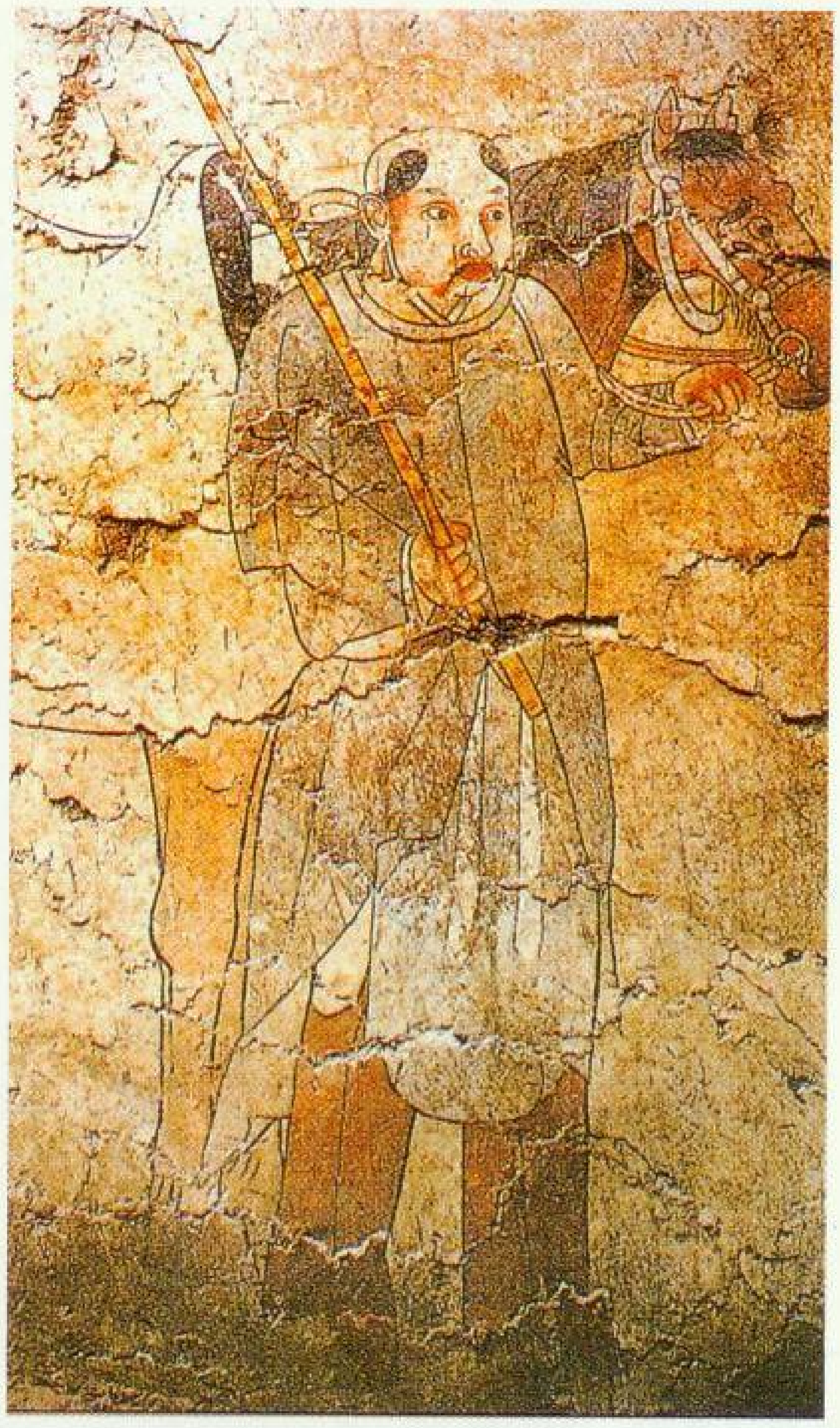
—3、5)。

辽朝也有衷甲制，《辽史·仪卫志》说："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朝服衷甲，以备非常"，但这方面的形象资料没有发现。

辽朝的服饰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契丹服，一类为汉服，戎服亦如此，这种现象从契丹国建立时就已形成。《辽史·仪卫志》载："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从墓室壁画等形象资料来看，汉服主要是宋朝服饰，契丹服则与唐代的盘领戎服窄袍相似。

武官的契丹服分公服（又称"展裹"）、常服（又称"盘裹"）两种，其外表式样好像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可能后者只是比前者更紧身一些。这两种服饰都可以作戎服，其形制可参考沈阳市博物馆收藏的辽墓壁画残片上的形象。彩图L—4壁画上武士身穿的盘领、窄袖、前开襟（衣襟

L—5山西大同市下华岩寺辽代彩塑天王像



L—6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南侧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图L—3 内蒙古库伦旗二号辽墓墓道北壁壁画，录自《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图L—4 上：辽宁北票莲花山辽墓壁画。下：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辽墓壁画，录自《考古》1984年第11期。两像的冠部分正好都剥落损坏，所以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参考。

略偏左，因此《辽史》上说“衣皆左衽”）长袍，就是此类“国服”。契丹袍长至膝下，一般两侧不开衣衩，内衬交领缺胯袍，骑马时将外层袍服前摆像宋朝一样提起掖入腰带。下着直统裤，脚穿高统靴，皮靴内衬统袜，统袜高出靴统一截（图L—3），这种习惯直到今天在很多草原民族中仍然保持着。

普通士兵的契丹戎服也是这身打扮（彩图L—6）。事实上，当时国中的契丹族男子可能差不多都穿一样的服饰，因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建立一支以契丹人为骨干的比较强大的军队。而契丹族人口有限，因此不得不把能够上阵的男子全数征兵，如此一来，戎服就成了男服，这种现象在当时几个小国家（如西夏）内都存在。

穿契丹戎服时，品级较高的侍卫武官一般戴毡冠或纱冠，“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或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掠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辽史·仪卫志》）。图L—4的侍卫、武士头上所戴的可能就是这两种冠中的一种，因不见额前的金花或带上的缀珠等特征，所以无法判断究竟属哪一种，如从外形上看，是纱冠的可能性似乎大些。

下级军士和普通士兵穿契丹戎服时，在多数情况下是髡发妆束。契丹人髡发的习俗由来已久，《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就曾提到：“乌桓者，本东胡也。……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以髡发为轻便。”辽朝军士髡发在《宋史》中也有记载：“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宋琪传》）图L—5是出现在辽墓壁画上的几种髡发发型。

髡发以外也可以戴巾，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有很多侍卫，头上就戴着类似平头小样幞头的巾，巾的顶上还饰有一块桃形的饰物。这种巾和饰物在其他地方和《辽史》的记载中还未发现，可能是很少使用的冠饰（图L—6）。

汉式戎服的上衣是缺胯窄袖袍，袍一如宋制，内衬交领短衫，为便于骑马，像契丹戎服

图L—5 契丹人髡发发型①②辽东陵壁画的髡发发式。③④内蒙古库伦旗前勿力布格6号辽墓壁画的髡发发式。⑤⑥“契丹人骑马出猎图”中髡发发式。

L—7河北宣化下公里张世卿墓前室西壁壁画（出处同L—5）

图L—6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壁画“仪卫人物”图，录自《文物》1992年第6期。

一样，将袍前下摆提起掖在腰间，露出内衬短衫和束腰带的两根垂带，下穿直统裤，脚上穿履，与北宋皇陵前的石刻控马仗马官装束完全相同。头上戴硬裹幞头，幞头两脚交叉向上，有的露出幞顶一段形如燕尾，只这一点与宋朝略有差别。（图L—7、彩图L—7）至于武官的汉服，也分朝服和常服两种，常服又称“穿执”，早期采用五代石晋的服饰，中后期则用宋制。

辽朝用于束衣的腰带也分汉与契丹二式，文武官员穿汉服时束双带扣单铊尾或双带扣双铊尾腰带，穿契丹服时束鞢韄带。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出土了三条用银皮代替革鞓、保存完好的腰带，三条中两条为鞢韄带，一条为单铊尾双带扣带（图L—8）。这条腰带由长短两根组成，据专家论证，短的一根是专为衣服加厚时使腰带加长而备用的，平时则是一条完整的单带扣单铊尾腰带。（详见李逸友《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文物》1987年第11期）

此墓内还发现有双带扣、双铊尾带的带銙、带扣和铊尾实物，这种实物在内蒙 古通辽县辽墓中也出土过。考古工作者根据现场的丝质、皮革带腐烂的痕迹进行了复原，复原后的形象参见图L—9。（详见张柏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文物》1985年第3期）

鞢韄带的带銙、带扣出土实物更多（图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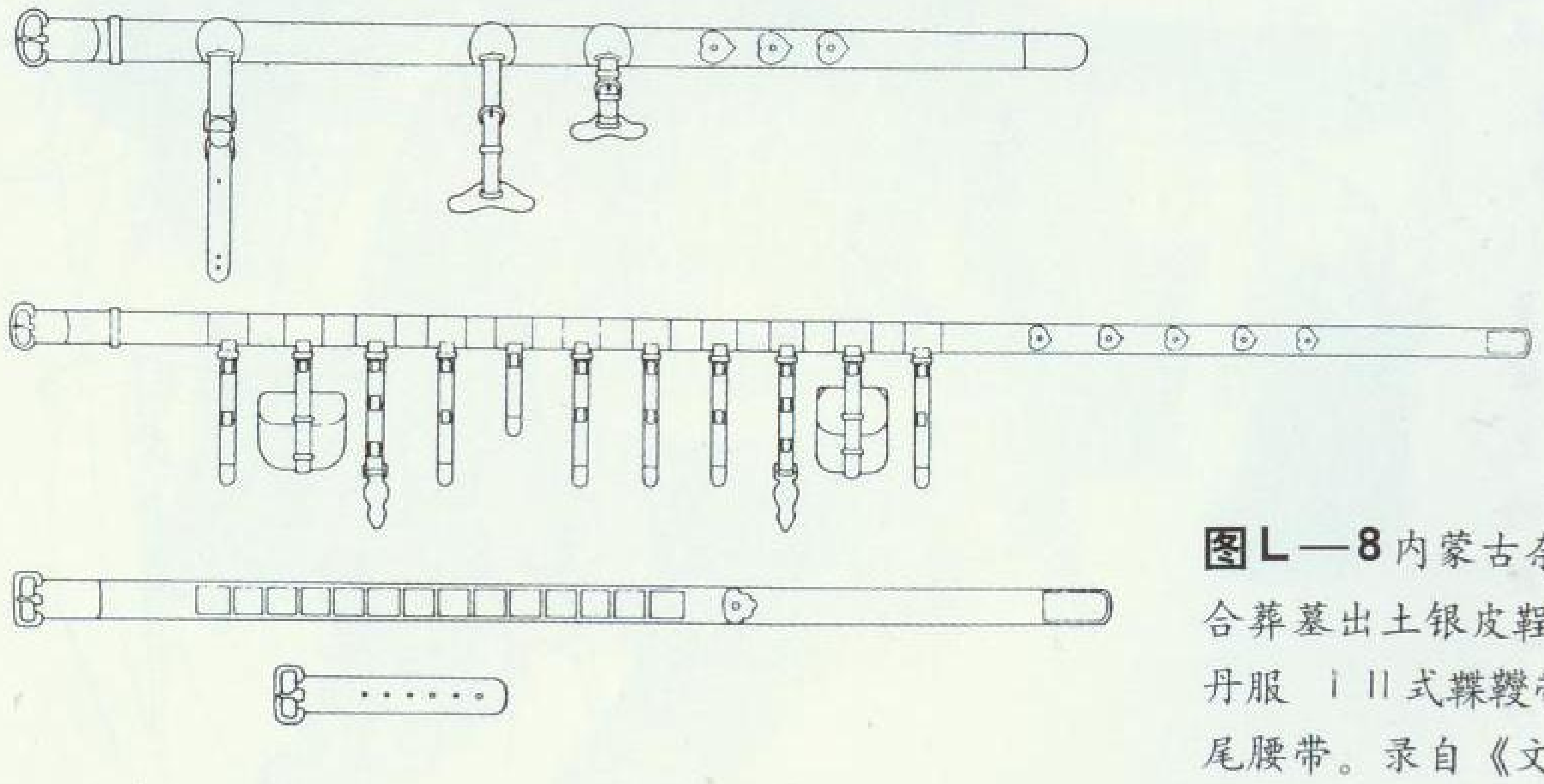
10)，从这些出土实物上可以看出，辽朝的腰带装饰十分考究华丽。鞢韄带的小带用来佩挂随身物件如刀子、锦囊等饰物，这在唐代部分已经说明，辽驸马墓的带鞢韄带上还装着把手式饰件（参见图L—8)，这些饰件则是用来佩挂较大型的物件（如猎物等）的。

有的汉式带也装有很少的鞢韄，这可能是便于系束者佩挂如佩鱼等表明身份的饰物。吉林省扶余县辽墓出土的一套玉带銙、玉铊尾和金带扣、金饰件就属这种情况，玉带銙中只有两块有装鞢韄的古眼，说明这根带只装两根鞢韄小带，这两根小带正好用来佩挂金饰件。长春市博物馆曾对这条带进行了复原，并制成复制品展出，复制品的形象参见图L—11①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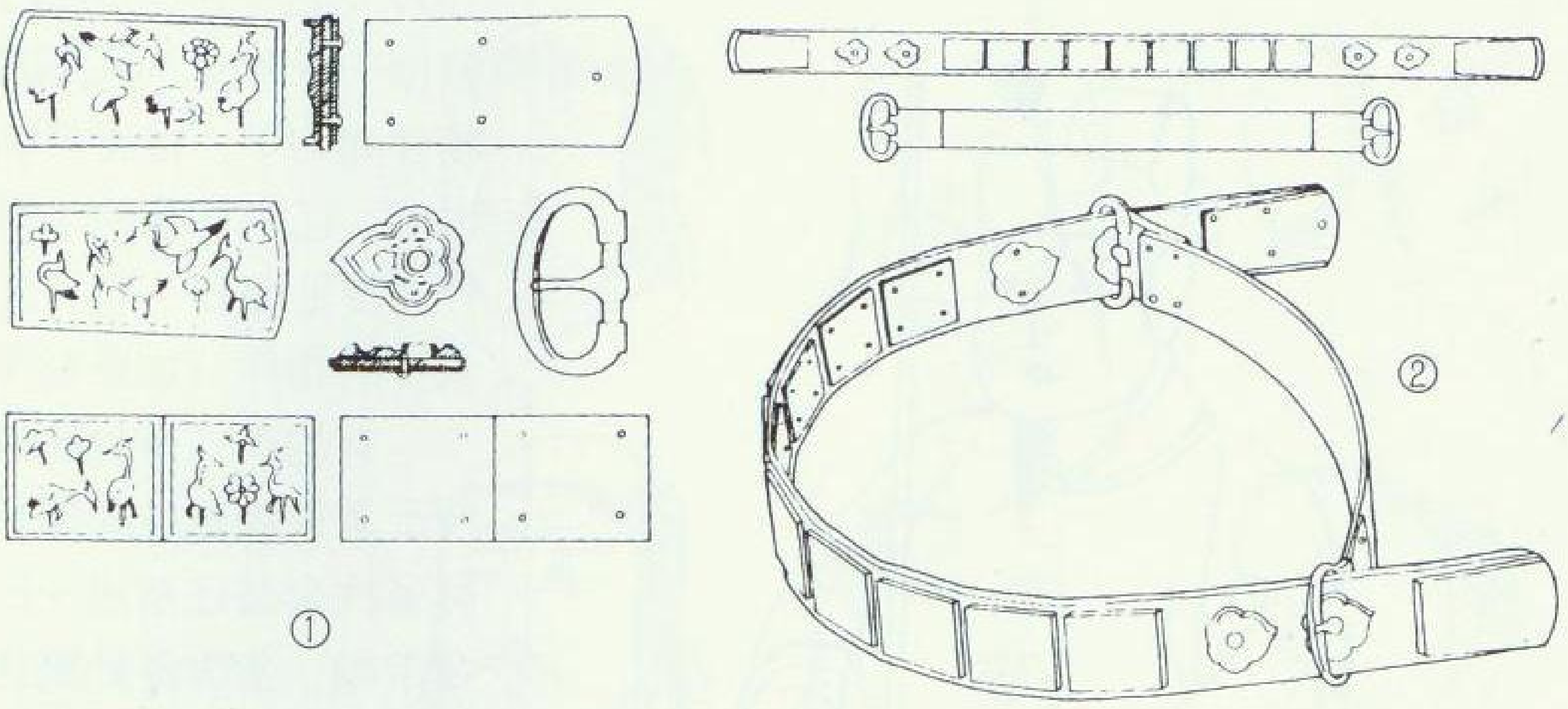
辽朝的佩鱼不同于宋代，皇帝的大祀服上也有悬鱼一项。佩鱼不仅是百官的品级标志，也是一种尊贵的象征。佩鱼实物参见图L—11③。

辽朝戎服的颜色，无论契丹、汉式，都以紫色为最高等级。连貂裘等毛皮服饰，也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一般五品以上方能服用，六品以下用绯色，八品以下绿色，下级军士则多用白、蓝、褐黄等其他杂色。铠甲中铁甲多为金、银色，《辽史》中曾多处记述辽主阿保机有金镀、银镀铁甲，除此之外是用红、黑等色漆髹甲。腰带一般以黄、红色绦裹革为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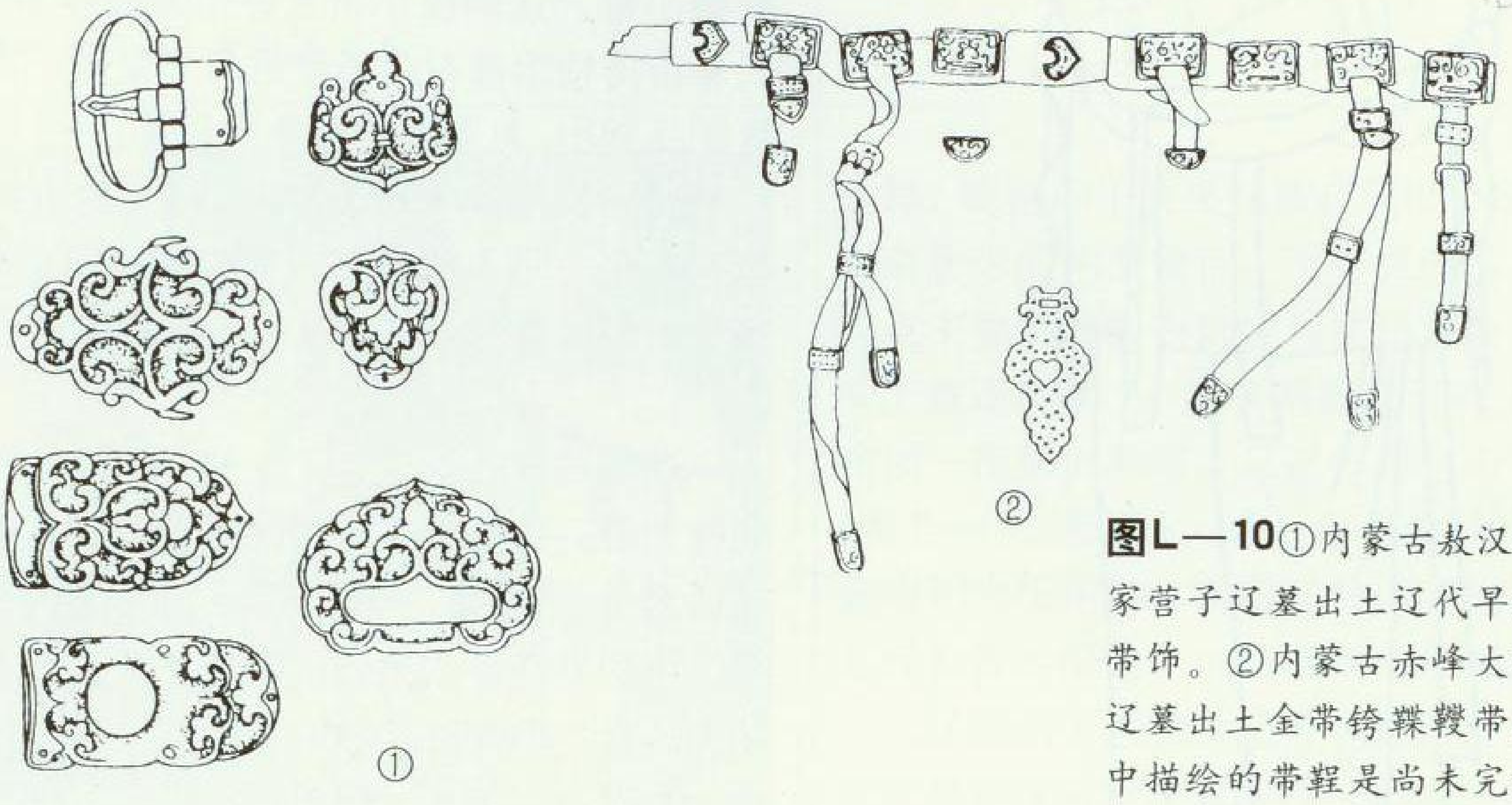
图L—7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持杖门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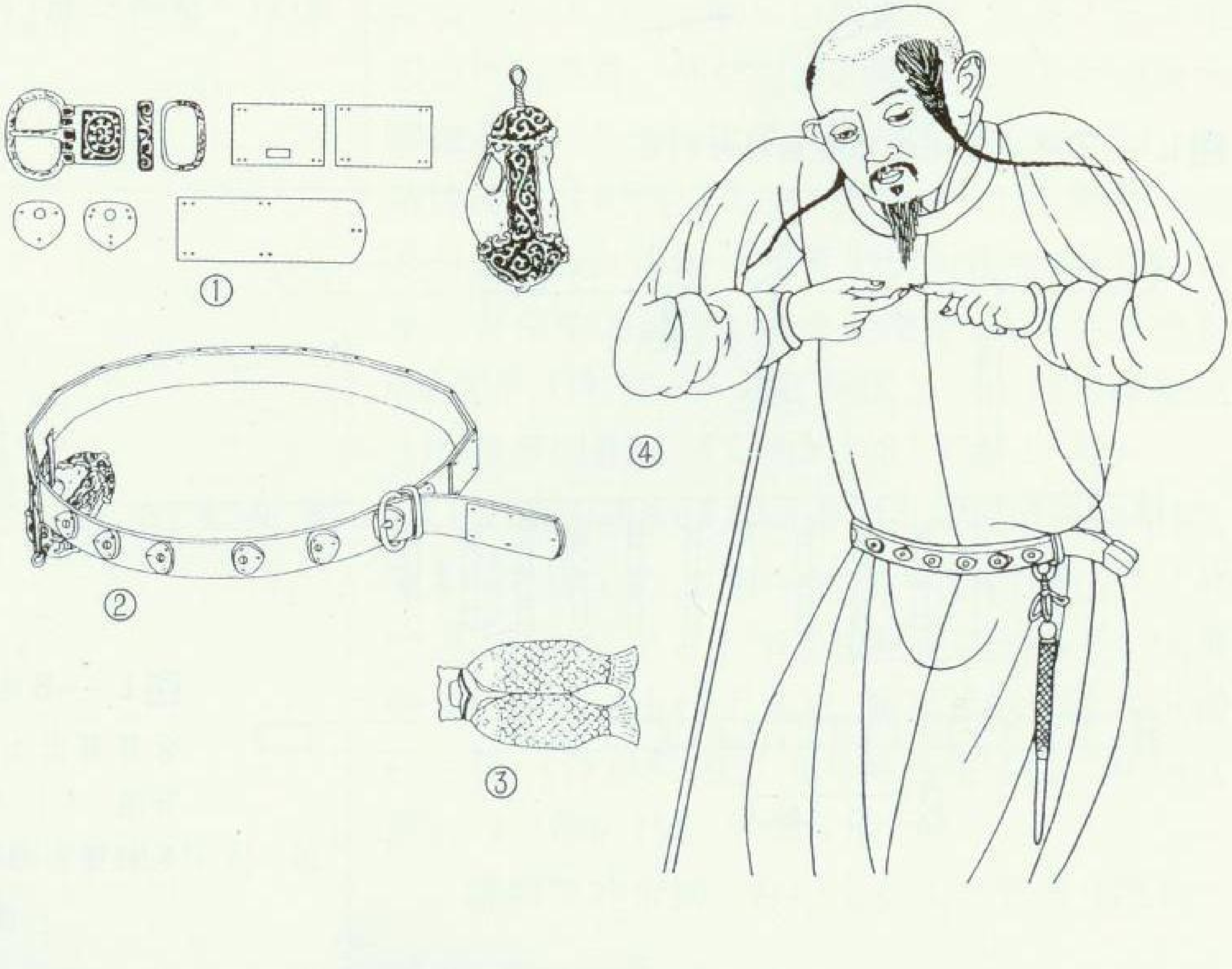
图L—8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银皮鞓金带銙腰带。上、中：契丹服 Ⅰ Ⅱ式鞢韄带。下：汉服双带扣单铊尾腰带。录自《文物》1987年第11期。



图L—9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出土双带扣、双铊尾腰带的带銙、带扣和铊尾实物（铜质），录自《文物》1985年第3期。②双带扣、双铊尾腰带复原图



图L—10①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出土辽代早期金带饰。②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墓出土金带銙鞢韄带，图中描绘的带鞓是尚未完全腐烂的部分。



图L—11①吉林省扶余县辽金墓出土玉銙、玉铊尾、金带扣、金带环和金饰件，录自《考古》1963年第11期。②根据长春市博物馆复制品绘制的复原图。③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出土鎏金铜鱼，这是目前发现的并已发表的唯一一件佩鱼实物。④内蒙古库伦旗6号墓墓道东壁壁画上穿契丹服、束汉式带的侍卫形象。

金代武士复原图

甲胄根据山西稷山马村、襄汾金墓砖雕、吉林金丞相完颜公墓石刻形象复原；戎服根据山西闻喜寺金墓壁画、山西汾阳金墓砖雕与《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等形象复原；革带参照辽、宋实物复原；兵器根据黑龙江宾县金墓出土实物复原设计。

M—1 山西侯马金董明墓出土彩绘砖雕武士像，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金

（公元 1115 年——公元 1234 年）

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女真原名黑水靺鞨，五、六世纪时，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过着捕鱼射猎的原始生活。大约在八、九世纪时，移居今阿什河一带的完颜部开始种植五谷和炼铁，日益强大起来。十一世纪中叶起，将势力扩张到松花江外呼兰河沿岸，吉林宁古塔、敦化和延边一带，并“建立官属，以统诸部”。

辽后期对女真的严重压榨使各部落都暗中依附完颜酋长阿骨打，阿骨打遂于1114年宣布起兵，次年攻占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境）等重镇，正式称帝，建立金国。灭辽后又乘胜南下，于1126年攻克北宋都城汴梁（开封），迫使宋室南渡。以后便与南宋对峙了百年左右，终于被成吉思汗所灭。

女真早期只有兵器而无甲胄，后来从辽的叛兵那里得到五百具铁甲，从此开始有了铠甲装备。早期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在山西襄汾曾出土了两件陶俑，下身均不见腿

图M—1 左：山西省襄汾县荆树沟上庄村金墓出土陶武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右：金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墓石刻镇墓将军像，吉林省博物馆藏。（均据实物写生）

图M—2①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出土砖雕。②山西襄汾金墓出土砖雕（浮雕）。③山西长治石哲金墓壁画。

裙，只在膝以上腿部塑造了四排甲片表示甲衣，这很可能就是护膝（图M—1左）。他们的头盔很坚固，《三朝北盟会编》说：“金贼兜鍪极坚，止露面目。”襄汾出土的陶武士俑和金完颜公墓前石刻像上的头盔，应就是这种“止露面目”的兜鍪，从其形制来看，还是北宋的式样（图M—1）。

中期前后，铠甲很快趋于完备，山西金墓壁画和砖雕上的铠甲都有长而宽大的腿裙，其防护面积已与宋朝的相差无异，形制上也受到北宋铠甲的影响。在这些砖雕壁画中，尤以稷山马村金墓的刻划最为精细，其身甲的小型方甲片、腿裙上稍大的长方形甲片和编缀甲片的绳索，全都清晰可见（图M—2；彩图M—1）。

女真的骑兵部队这时候还继续装备马铠，金兀术的“拐子马”就是装备马铠的重装骑兵，后为岳飞设计所破，从此马铠在古代战场上永远消失了。金的马铠在《中兴祯应图》中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形象，只能看出大致的外形，可供参考（图M—3）。

女真在立国之前，臣属于辽近二百年，早期服饰大都采用契丹服。后来入主中原，各方面吸收汉族的文化习俗，服饰也逐渐汉化，特别是官服和戎服，基本上采用宋制，但外形上“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皆极宽大”（《北辕录》）。

武官的服饰分朝服和公服两类，公服可作为戎服使用，其形制是盘领、窄袖、衣长至脚背。据《金史》记载，衣襟都是左衽，但有的形象资料上看不清楚，衣袍好像也不开衩。(图M—4) 戎服袍还可以作为罩袍穿在铠甲外面，这种穿法应是金朝的衷甲制（图M—5）。

士兵的戎服是裤褶制，上穿盘领窄袖短衣，下穿裤，腿上可以缚裤，也可以用行缠（参见图M—2①、6、7）。

头上所戴则有幞头、毡笠、巾、帽等。

幞头有贴金双凤翅幞头、间金花交脚幞头、金花幞头、拳脚幞头、素幞头等，基本是在宋和唐制的基础上变化而成。图M—4（左）的仪卫戴的硬裹幞头与辽朝完全相同，应是交脚幞头。河南焦作金墓壁画中的人物戴的是双凤翅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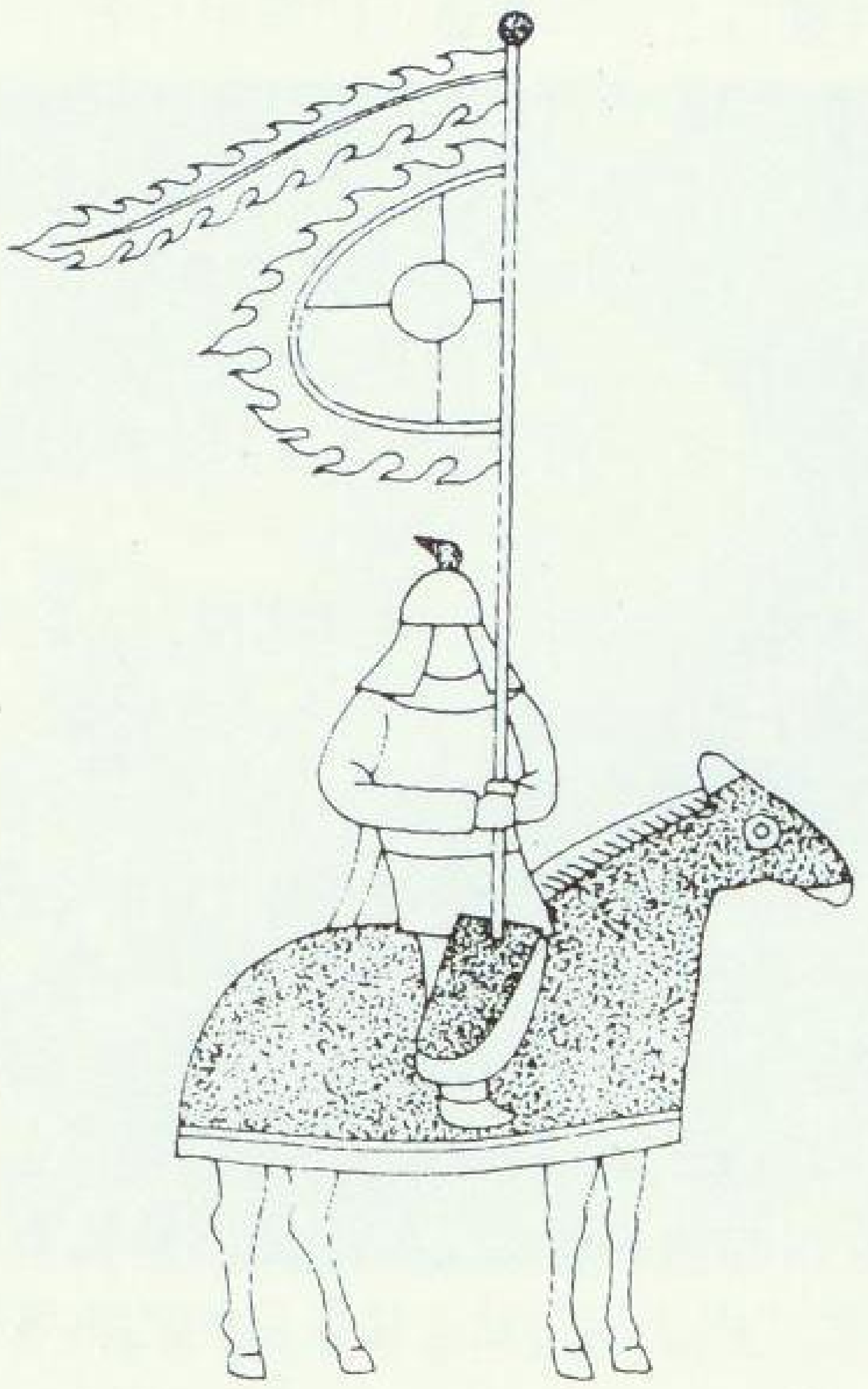


图 M—3《中兴祯应图》中金人马铠

(图 M—4 右)，稷山马村金墓的砖雕上，将军身后站立的两个士兵，头上戴的幞头在左额处结有一个大圆球，很可能是拳脚幞头（图 M—6)。而图 M—4（中）的幞顶像双乳，则又是一种不知名称的幞头。上述几种除交脚幞头外，都是软裹幞头，但幞头里面可能都加巾子。

毡笠与宋军士兵一样，不仅平时，战时也戴，这种实情见于《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建炎三年，……时金人自滕县以五千骑趋临淮，皆金装白毡笠子。"（卷一〇三）图 M—8 为几种不同的毡笠式样，其中第一种可能不是用于军戎服饰。

金代的巾称作"蹋鸱"，"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径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上，或为一缩襴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带旁各络珠结绶，长半带，垂之，……"（《金史 · 舆

图 M—4 左：山西长治市金墓壁画。中：山西闻喜寺底金墓壁画。画中人物均为仪卫。右：河南焦作金墓壁画，此像疑为女着男装。

图M—5 上：山西汾阳金墓出土砖雕，录自《文物》1991年第12期。下：山西长治金墓壁画，此处的罩袍好像是短袖。

服志》下）从文字上看，这种巾和它的戴法很像隋唐时的平头小样幞头，只是多了一些装饰，其式样因没有比较能肯定的形象资料，只能参考图M—7左侧的士兵和图M—6左侧将军头上所戴头巾。

据《金史·仪卫志》记载，仪卫军人还常戴平巾帻，山西马村金墓出土的砖雕上，武将头上戴的冠从外形上看，很像隋唐时期的平巾帻，也可能就是金朝的平巾帻（参见图M—2①）。

帽有鞑帽、貂帽，一般都用毛皮制作。女真原居北方寒冷地带，入秋以后就开始穿毛皮袍服、皮裤，连袜子也用毛皮制作。图M—9是三种皮帽的形象。

与宋、辽一样，金的戎服外也使用袍肚，有一种袍肚做成筒形，包裹在袍服或铠甲之外，更有宽的上及胸部，用勒帛和腰带上下系束（宋朝也有这种袍肚），在元代时称作“捍腰”，元明两朝十分流行（参见图M—1上、2②、6）。项间一般都围肩巾。

女真族“无贵贱，皆着尖头靴”（《北辕录》）。不仅是军人，多数人都习惯穿靴。与契丹人一样，也有髡发习俗，其发式与契丹人略有不同，

图M—6 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墓室砖雕，《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图M—7 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墓室砖雕

图 M—8 左：河南焦作金墓出土陶俑。中：山西沁源正中村金墓壁画。右：山西长治金墓壁画。

图 M—9 左、中：金张瑀作《文姬归汉图》中之貂帽形象。此画虽是描绘汉代故事，但人物身上衣服全是金人服饰。右：宋佚名《明妃出塞图》中鞑帽形象，录自《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

髡后余发一般都要编成发辫（参见图M—10）。金军占领河北等地后，曾下令强制汉人剃头辫发，结果激起强烈反抗，最后只得作罢。

用于束衣的腰带称为“吐鹘”，基本沿用辽宋式样，但带后所垂的笏头好像比宋朝的要长（参见图M—4中）。带饰材料“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铊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金史·舆服志》下）。金朝的武官没有佩鱼制度。

金朝武官的官服一律为紫色，以服装面料上的花纹大小来区分品级，品级越高，花纹越大。戎服颜色有紫、绯、朱、黑等色，以朱为主，普通士兵的戎服用白色的比较多，将校军官的袍服上，胸前、肩袖处还用金线绣上花纹，卫士亲军一般都穿团花锦袍。腰带的带鞓用红、白、金、银等色。铠甲则以金、银色为主，穿联铁甲的丝带或皮条染成紫、黄、青等色，称作“紫茸”、“青茸”、“黄茸”，装备这种彩色组带编缀的铁甲军队，称“紫茸军”、“黄茸军”，是女真部队的主力。

①

②

③

图M—10①：金张瑀作《文姬归汉图》中髡发形象，画家没有明确画出发辫的细节，但如不是辫子的话，就不可能分成如此两条，而应完全披散开来。②：宋佚名画《明妃出塞图》中金朝官员像，此像的发辫情况比右上图清楚。③：河南焦作金墓出土陶俑，此俑的发辫表现很清楚，但俑塑造的是儿童，可供参考。

西夏武士复原图

甲胄根据甘肃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木板画上形象复原；戎服根据敦煌莫高窟409、418窟壁画上的形象，参照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义勇武安王关羽图》中的人物服饰进行复原；革带根据银川西夏陵出土实物，参照敦煌壁画、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舞乐图》等形象复原；兵器复原的参考资料同前。

N—1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二号墓室出土彩绘木板画，甘肃武威地区博物馆藏。

西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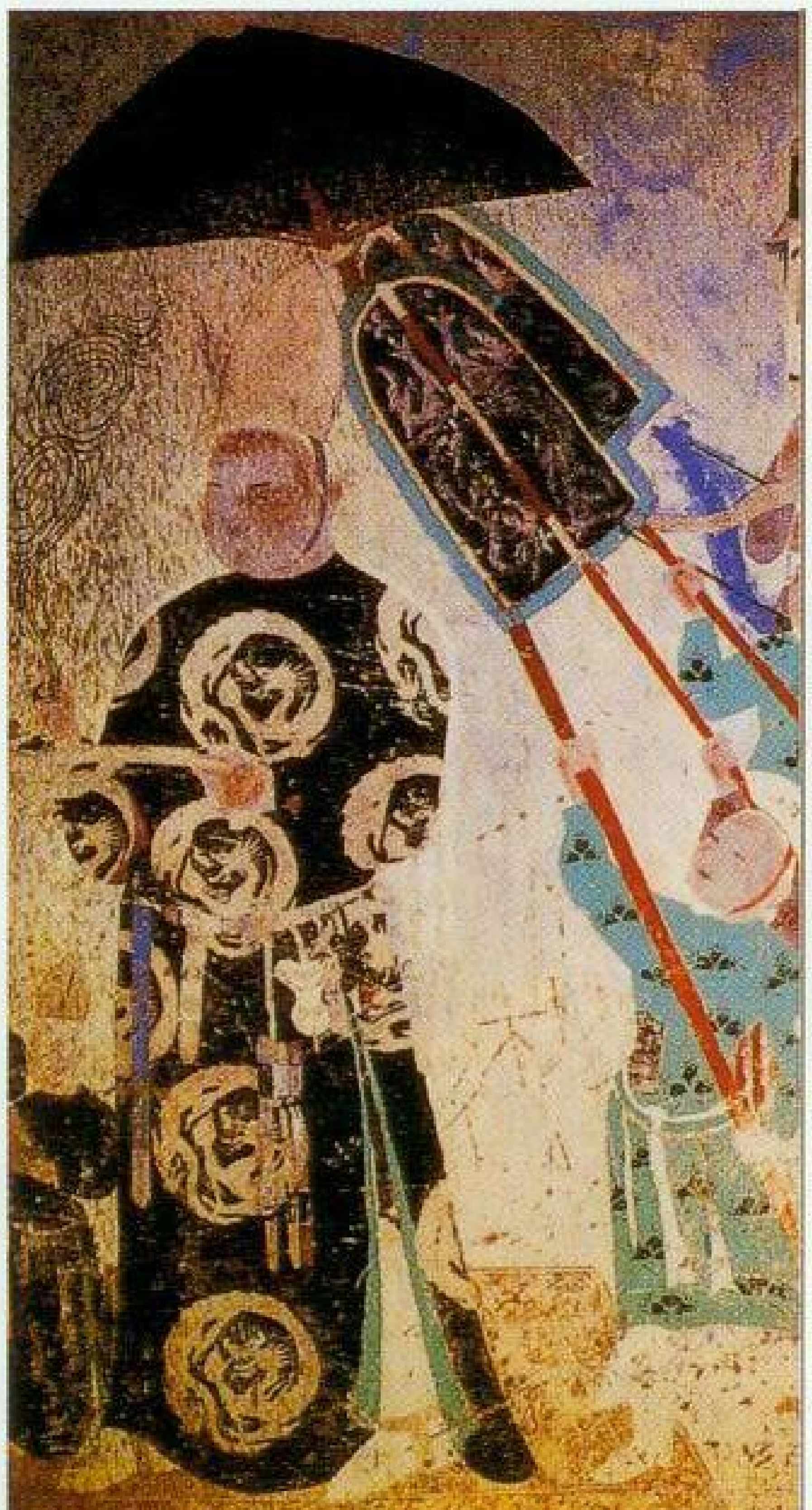
（公元1032年——公元1227年）

西夏是由党项羌贵族拓跋氏建立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西夏。党项原居今四川省西部边界，八、九世纪时逐渐向甘肃、宁夏和陕西一带迁移。唐末，移居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的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围剿黄巢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姓李。北宋初，因与宋发生矛盾转而臣事辽，首领李继迁被册封为夏国王。

1032年，继迁子李元昊继立。他大肆扩张领土，于1038年称皇，定国号为大夏，并仿效北宋建立官制、兵制和官民服制，1227年为成吉思汗的西征军所灭。西夏的众多文物典籍均毁于这次战火，因此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西夏文物与文字资料极为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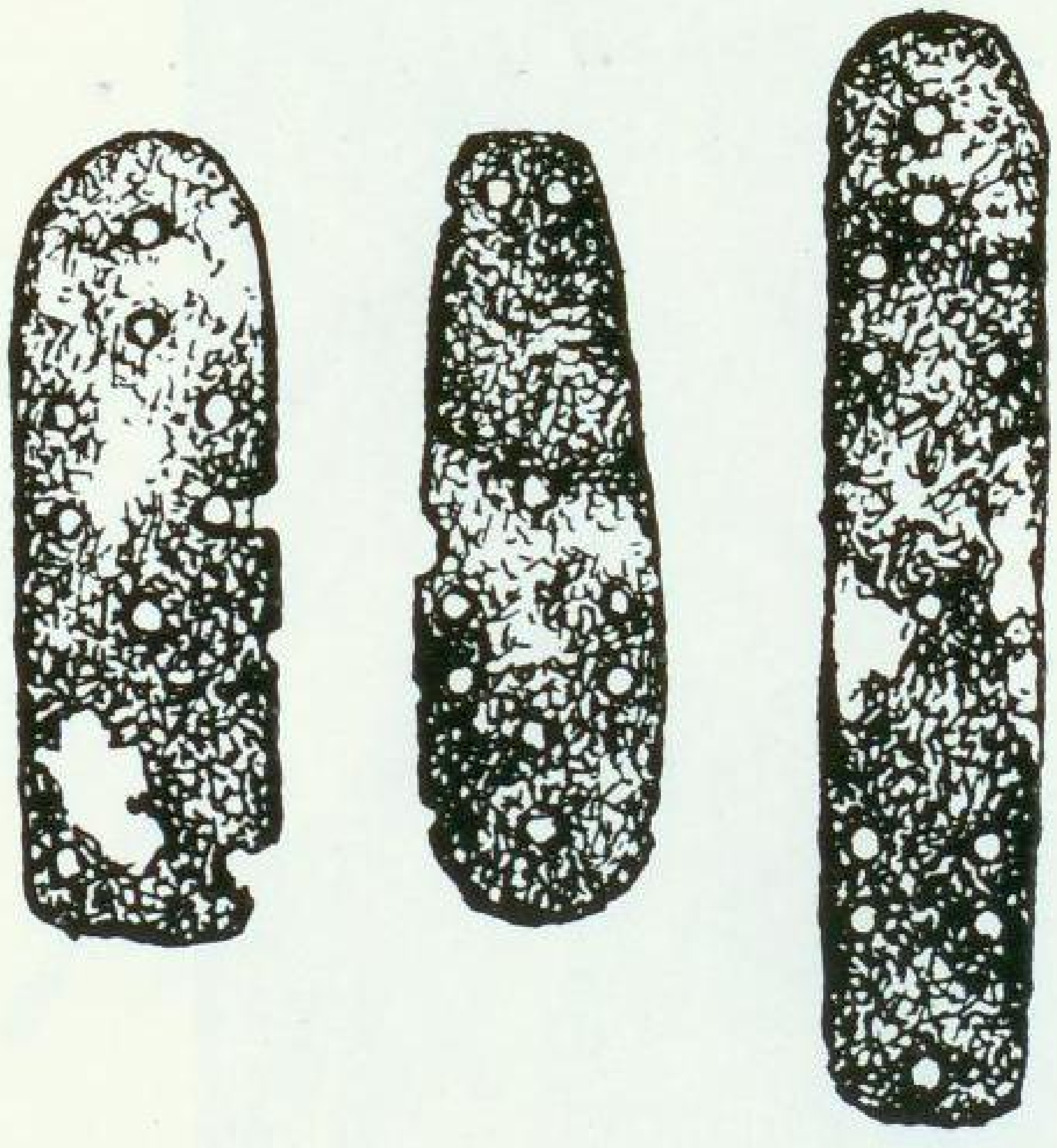
元昊称帝后，在其都城兴州（今银川市）设置了“铁冶务”，专门制造甲胄兵器，其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矢不可入”（田

N—2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回鹘人供养像。



N—3 敦煌莫高窟409窟西夏王供养像。

图N—1 义勇武安王关羽图（版画局部），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现藏俄罗斯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这幅版画据考证认为是经金国，从中原地区流入西夏的，但观察人物服饰，关羽身穿的显然是唐代的戎服，而靴和高出靴统的统袜，完全与辽代的相同。左侧一将铠甲外罩的短衫，则又与宋代一样。关羽背后右侧和右前侧三人的幞头上的装饰，是辽、金、宋朝都没有的。综合这些特征，要说明图中人物的服饰倾向于宋或金朝，好像都不合适。因此，是西夏服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还有右侧二将身上的铠甲也可作一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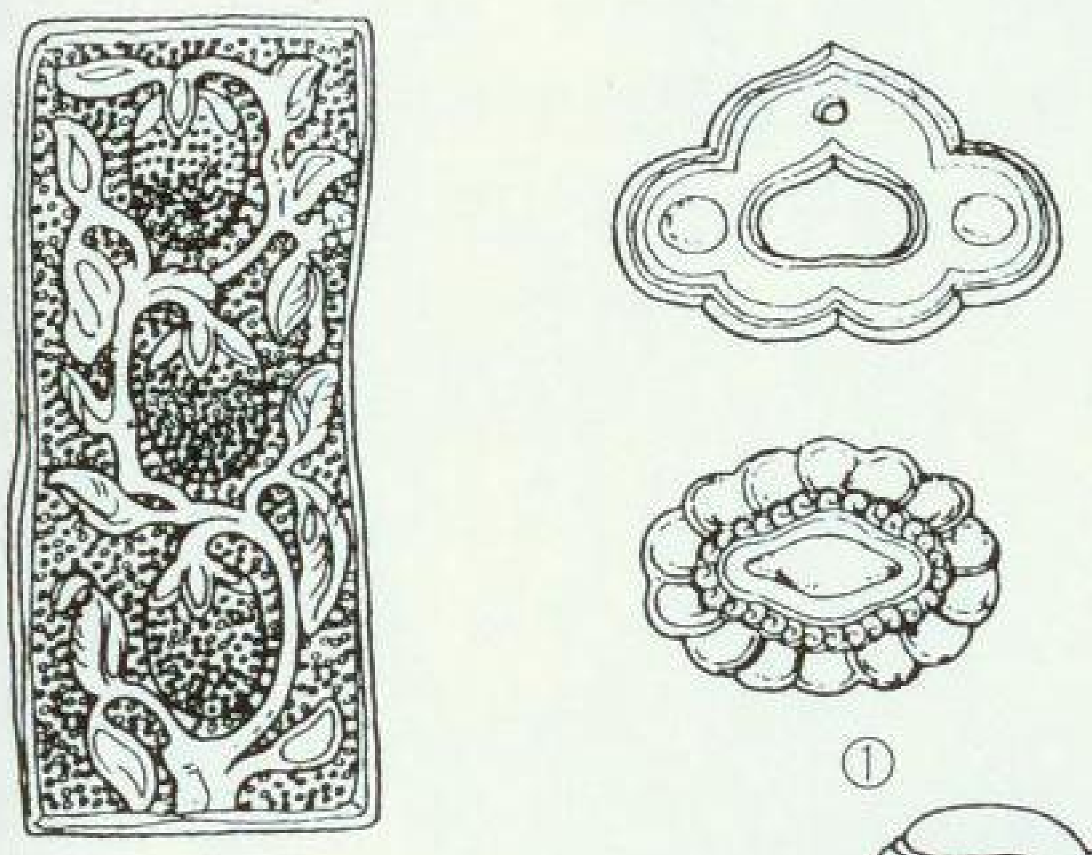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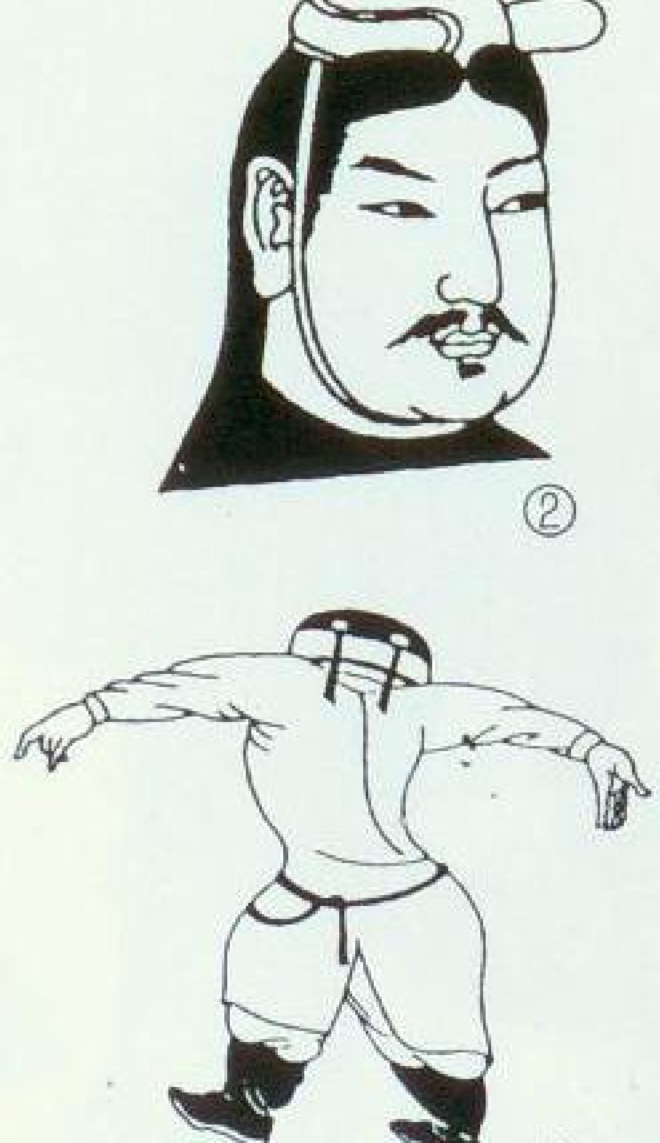
图N—2 宁夏银川西夏陵区8号墓室出土铜甲片，短的长5.8厘米，长的有9.9厘米，比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甲片还要长。图中白色部分为鎏金残片。（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

况《兵策十四事》）。西夏的铠甲，可以从甘肃武威出土的彩绘木板画上看出基本形制。画中的武士全身披挂，盔、披膊与宋代完全相同，身甲好像是两当甲，长及膝上，左右两侧是否相连无法断定，但两边胯间开有分衩却明白无疑。无腿裙，肩上有护肩，但不像是甲片制成，可能是皮制的（彩图N—1）。这种木板画一共有两块，两块的画像完全相同。在另一幅关羽图中，右侧一兵一将也穿着与木板画上完全相同的铠甲，左侧一将的铠甲虽有长及膝下的腿裙，但因被遮掉一部分，仍然不能看出它的全部形制（图N—1）。同时期的辽宋铠甲，覆盖面积都已遍及全身，而西夏还是以短甲为主，说明铠甲制造毕竟比中原地区落后些，这一点从1974年在银川西夏陵区墓室中出土的铜质甲片的尺寸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图N—2）。

西夏的官民服饰，制定于元昊称帝以后。据《宋史·夏国传》记载：“……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紫色左大襟长袍），金涂银束带，垂蹀躞……

图N—3 敦煌莫高窟418窟西夏供养人像





图N—4①银川西夏八号陵出土的金荔枝纹带銙、金桃形、银质鎏金花瓣形带銙饰，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②莫高窟148窟南壁西夏供养人头像。③1909年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舞乐图》中西夏跳舞男子像，俄罗斯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便服则紫皁(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襕，束带。”记载上说的旋襕，是党项羌的民族服饰，从敦煌壁画上可以看出，式样上掺糅了唐代服饰的因素，其形象可参考西夏王供养像右侧的侍卫人物、莫高窟418窟的供养人像和张大千临摹的回鹘人供养像身上的服饰（图N—3、彩图N—2、3）。这些人都穿的是窄袖、盘领、紧身窄袍，袍有长短两种，短的在膝上膝下之间，长的垂至脚背。头上戴的是形如果盆或像倒扣的小盘似的冠，这两种冠属于《宋史》记载中的哪一种已很难确定。从冠后有披垂之物、对照“毡冠红果顶，冠顶后垂红结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的记载来看，可以知道这两种冠为毡制，冠以带系颔下。（参见图N—3、彩图N—2、3；图N—4②），下穿裤，足穿靴，腰间一般系两条腰带，里层是帛带，外层是鞢韄带，带的铊尾拖长一段垂于腹前，有的亦采用反插垂头的方法，带銙的图案、式样大多采用宋制（图N—4①③）。

西夏的上述服饰，既可作官服，亦可作戎服，如辽的契丹服一样，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由于西夏社会的封建程度还不是很深，人与人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平等，如元人余阙在《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中就记有“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的情况，因此服饰上的等级观念也不是那么强烈。军队中的官兵，至少是党项羌人的戎服基本上是一种式样，这从彩图N—2的供养像上也可看出端倪。像中主人、侍从的人物比例虽然相差很大，但服饰还是一样的（冠除外），只有袍服上的图案告诉人们，其衣料要比侍从贵重、华丽。

李元昊的父亲和他的子孙辈中间，有好几位是汉族文化的崇拜者，他们虽然经常与中原皇朝为敌，但却十分迷恋汉族的生活方式。因此汉族服饰在西夏国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汉式戎服也肯定存在。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的木板画上，驭马人身上的服饰可能就是汉式戎服。从外形上看，很像宋代的交领缺胯袍，参照关羽图中将士的服饰，可以大致了解到：穿

图N—5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二号墓出土的彩绘木板画《驭马图》，甘肃武威地区博物馆藏。

图N—6 上：《舞乐图》中髡发形象。下：安西榆林窟第29窟西壁北侧男供养人像中髡发形象。

铠甲和汉式戎服时，腰束袍肚，颈间系肩巾，腿裹行缠，穿履或靴都可，头上戴幞头。幞头好像是平头小样，里面不加巾子，幞头外有时也系抹额。将帅的铠甲外也罩与北宋一样形制的绣衫，说明也有衷甲制服饰（参见图N—1、5）。

党项羌人早年披发蓬首，并没有髡发习俗。李元昊称帝以后，为了表明自己是鲜卑贵族后裔，要恢复鲜卑人故俗，强迫国人在三日之内秃发，如有违抗一律处死，于是“民争秃发，耳垂重环”（《辽史·西夏外纪》）。羌人的髡发发式，与契丹人比较接近，也是后脑与头顶剃光，前额留一排刘海，有的两侧还留一络长发（图N—6）。

羌语西夏国名称作“邦泥定”，译成汉语为“白上国”，上，尚也，白上即尚白的意思，可见西夏国是以白色为贵的。西夏是信仰佛教之国，佛教教义认为白是净行善业，尚白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但从形象资料上看，服装上红、绿、黄、紫等色都有，唯独白色很少出现，而李元昊制定的官服也以紫色为贵，可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铠甲则以金、银色为主，出土的铜甲片上就残留有鎏金。

元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沁水县元墓武士俑、日本画《蒙古袭来绘词》中元军形象复原；胄根据日本博多元寇纪念馆收藏实物复原；戎服根据乌鲁木齐盐湖古墓出土实物、陕西宝鸡元墓出土武士俑、山西汶水北峪口、内蒙古赤峰等地元墓壁画形象复原；革带根据山西永乐宫壁画形象复原；兵器根据盐湖古墓出土实物、山西汾阳五岳庙壁画、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上的形象复原。

O—1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大将军黄幡豹尾白虎金神青羊乌鸡众》中穿元代铠甲的将军图像

元代

（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

12世纪初，当南宋与金因“绍兴和议”而暂罢刀兵、隔水（淮水）对峙时，北方草原上又一个少数民族正在崛起，这就是产生伟大统帅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原是蒙兀部落的名称，唐代称“蒙兀室韦”，蒙古草原统一以后，才成为各部落的通称。

大约在12世纪时，蒙古族通过辽金政权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从事农业并使用铁器。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落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位后，在1218年至1258年的四十年间，数次率军远征，先后攻灭西辽、花剌子模、金等国，攻陷巴格达和达（大）马士革等城，使蒙古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汗国。从1236年起，蒙古开始对南宋发起进攻。这期间，忽必烈于1271年即帝位，改国号为元。在灭了大理、吐蕃等国以后，再次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了南宋。嗣后又出兵日本、安南、缅甸、占城和爪哇，兵锋遍及东南亚。

O—2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地府五道将军等众》，前右一将军为明代衣甲，后三人为元代衣甲，兵士脚上穿的履与居庸关云台元代石刻上的士兵所穿的履完全相同。

O—3青海省西宁市郊塔尔寺壁画吐蕃武士像

元朝之所以能东征西讨，依靠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主力军“怯薛”军全部是骑兵，作战时每人配备战马数匹，用于昼夜驰骋时轮流坐骑。这支军队不但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而且还配有火器。在精良的装备中，尤为突出的是甲胄。

在今俄罗斯彼得堡宫中，收藏有一领当年元远征军留下的铠甲。据描述，甲身全用网甲（连环锁子甲）制成，外表用铜铁丝缀满甲片，内层以牛皮为衬，制作十分精巧。遗憾的是没有这领铠甲的照片，不能了解它的形制如何。能反映元代铠甲样式的是宝宁寺水陆画上的形象（彩图o—1），从图上可以看出，其腿裙很宽大，披膊用皮带交叉套束于身上，十分便于两臂运动。甲片很细小，这种小甲片好像很难用丝绳组编，而更易于用铜铁丝缀连，前臂甲也用同样的小甲片编制而成，整领铠甲的防护面十分大。

出现这种防护面积很大、以铁网为骨、内外附甲片的铠甲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火器，特别是爆炸型火器出现后的产物。防护面积大，

O—4新疆维吾尔吉木萨尔县北庭回鹘佛寺遗址南部配殿群东北角105配殿西壁壁画《分舍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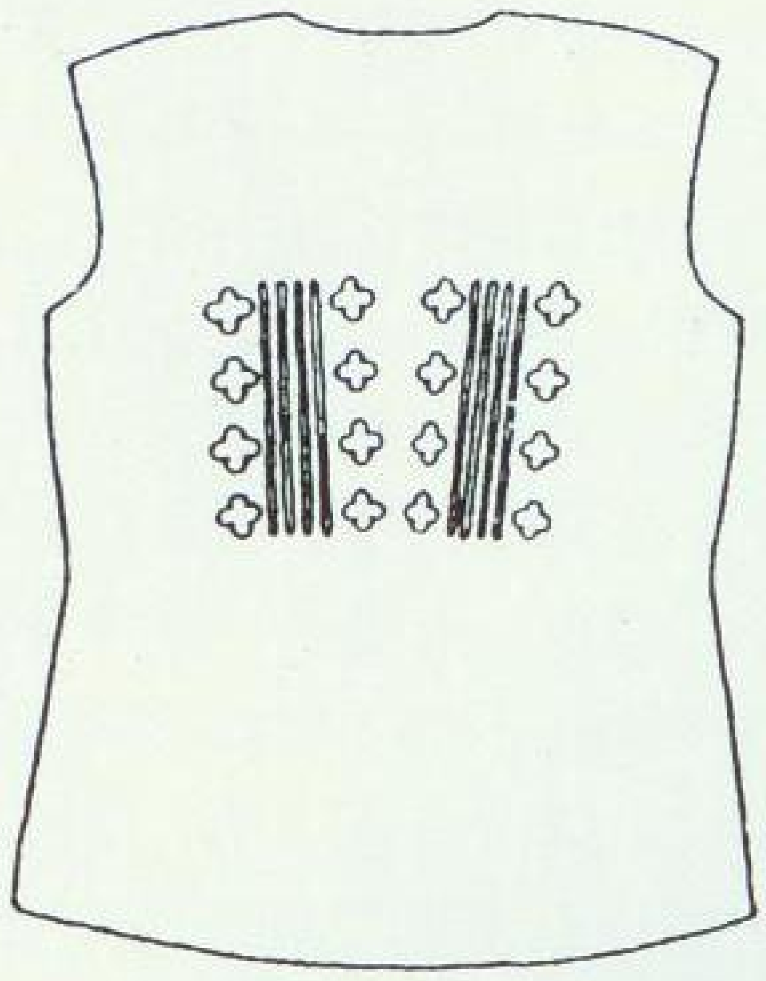


图 O—1 皮胸铠，厚块漆皮制成，内联以钢丝，前胸部表面镶嵌银丝和花片，高640厘米，重6公斤，摘自《中国兵器史稿》。

可以抵御因炸弹碎片飞溅而造成的伤害，内外附甲片则因为当时的炸弹洞穿力还较弱，一般还不能连续击穿多层防护的缘故。

元代的铠甲从另外几幅水陆画上反映出长短两种，士兵好像都穿短甲，有的还无披膊。披膊去掉后可以看出胸背甲像两当铠一样，是在肩部用皮带系连的（彩图o—2）。元代铠甲的形成可能也受到过被征服民族的影响，塔尔寺的壁画和新疆维吾尔回鹘佛寺的壁画上，吐蕃与回鹘武士的铠甲都与元代有相同之处。史料也反映了蒙古初期的很多方面是从畏兀（回鹘）人那里学来的（彩图o—3、4）。

除上述这几种之外也有身甲与腿裙分为两截、腿裙较小、披膊披在肩上的铠甲，在披膊上还罩有皮革制成的、称作“贾哈”的披领（彩图o—6）。同时也采用南宋铠甲的形制，四川华阳出土的武士俑，从头上的盔到身上的甲，基本上都是宋朝样式（彩图o—7）。

元代也使用皮甲。山西沁水县出土的一件彩绘骑马武士俑，很清楚地塑造出元代皮甲的形制（彩图o—5），这件皮甲全部用大块皮革制成，身甲像一件皮背心（在周纬的遗著《中国兵器史稿》中也记录了这种皮胸铠，图O—1），披膊穿于身甲之内。最为特别的是甲裙，左侧一片并无异样，右侧一片呈⌐形，伸出的三

O—5 山西沁水县出土彩绘武士俑（据实物写生），山西省博物馆藏。

O—6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善恶二部牛头阿傍诸官众》中穿元铠甲将军像

O—7 四川华阳保和乡第五号元墓出土釉彩陶武士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O—3 元代的胄和盔①②③：铁胄。①的眉庇下有面罩。上述三种胄原藏日本博多元寇纪念馆。④：皮胄。胄顶铜管用于装缨饰。日本福冈市元寇纪念馆藏。①—⑤录自（日）原田淑人等《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⑤⑥：铁胄。⑤为士兵胄。摘自《中国兵器史稿》。

角正好作为前下腹的护甲。如果这件陶俑的彩绘没有剥落，我们也许能够发现更多的东西。

元代还出现了布面甲，日本福冈元寇纪念馆收藏了一领实物，日本画《蒙古袭来绘词》中也描绘出了它的形象（图O—2）。布面甲用布帛做表里，面上钉甲泡，内衬铁甲片（在要害部位）。这是一种比较轻便的软甲，其形制完全像一件上衣下裳或连成一体的长袍。这是我国甲胄史上最后一代铠甲，明后期与清代基本上都采用这种甲衣。

元代还使用过蹄筋翎根铠。《涌幢小品》说：

> 元太宗攻金，怀孟人李威从军，患世之甲胄不坚，得其妇兄杜坤密法，创蹄筋翎根别之。太宗亲射不能入，宠以金符，威每战先登，不避矢石。（卷十二）

这种铠一定很轻软、坚韧，但是如何制造，形制怎样，现均已无任何资料可供查证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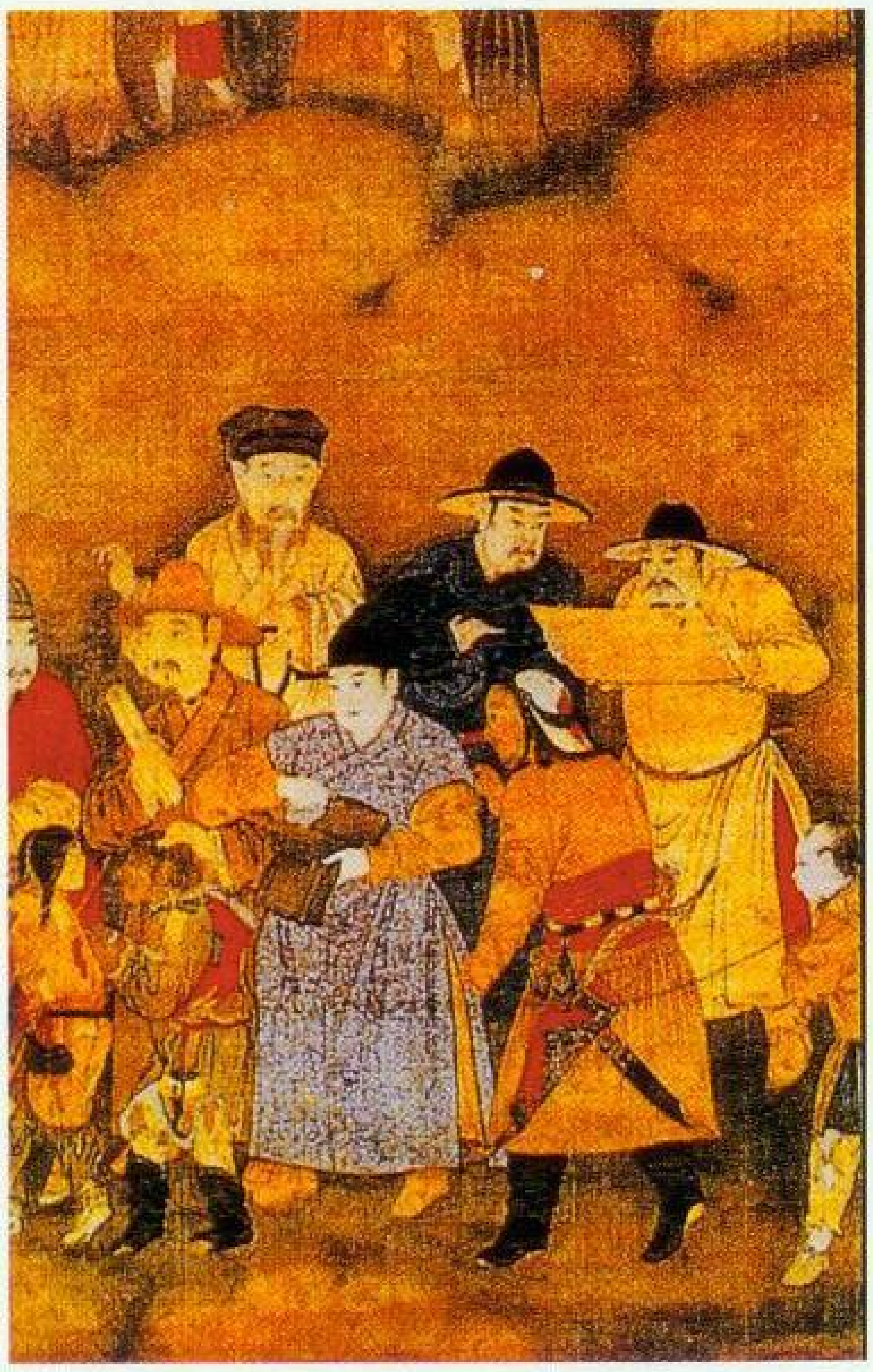
元代的胄和盔，在日本保存有很多实物，都是用铁和皮革制成。将帅用的皮、铁胄，都用金银丝镶嵌出华丽的花纹图案，胄的前檐装有眉庇，

图O—2②日本画《蒙古袭来绘词》中元军士兵，录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此画为日本古代画家竹奇季长所作，他当年曾参加了与元军的战斗，图中所绘都是他亲眼所见，所以很有参考价值。

图O—2① 日本福冈元冠纪念馆收藏的元代布面甲。

眉庇下有的还装有面罩。面罩就是唐代的面铠，外形与唐代之前的已不相同，保护部位主要集中在脸的上半部。胄脑后的顿项有两种式样：一种分为三片，纯用绢布做面里，或在面里间衬以铁网，表面钉上甲泡做成。一种护耳护项连成一体，用甲片编成（参见图O—3）。同时也使用宋代的凤翅盔和唐代的兽头盔（参见彩图O—1、7），兽头盔上的兽头已明显变小，差不多变成了盔顶的装饰。布面甲的胄的顿项，护耳下端于下颔处合拢，遮住了整个喉项部位（参见图O—2），此式顿项后来为清代所采用。

元代的戎服，在建国之初无论将帅士兵（实际是无论皇帝和百官），只有一种本民族的服饰——质孙服。《元史·舆服志》载："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粗细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它是紧身窄袖的袍服，有交领和方领、长和短两种，长的至膝下，短的仅及膝。方领式在腰间裁开，裁开处打有很多襞积收腰，交领式则一通到底。两式袍服的两侧均不开衩，



O—8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往古雇典婢妈弃离妻子孤魂众》中穿有细褶的质孙服的元人形象

图O—4①：西安南郊出土男立俑，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②：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旗墓出土方领质孙服，甘肃省博物馆藏。③：元太宗窝阔台像身上所服即方领质孙服，故宫博物院藏。

O—9 河北石家庄市郊上京村毗卢寺后殿南壁壁画《三界诸神图》中元朝差吏头上戴的是草或藤帽，袍服外披的是“比肩”。

但下摆都很宽大，以衣料和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品级。两式袍服在甘肃漳县和内蒙古集宁市都有实物出土，在元代的墓室壁画、陶俑和绘画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参见图O—4；彩图O—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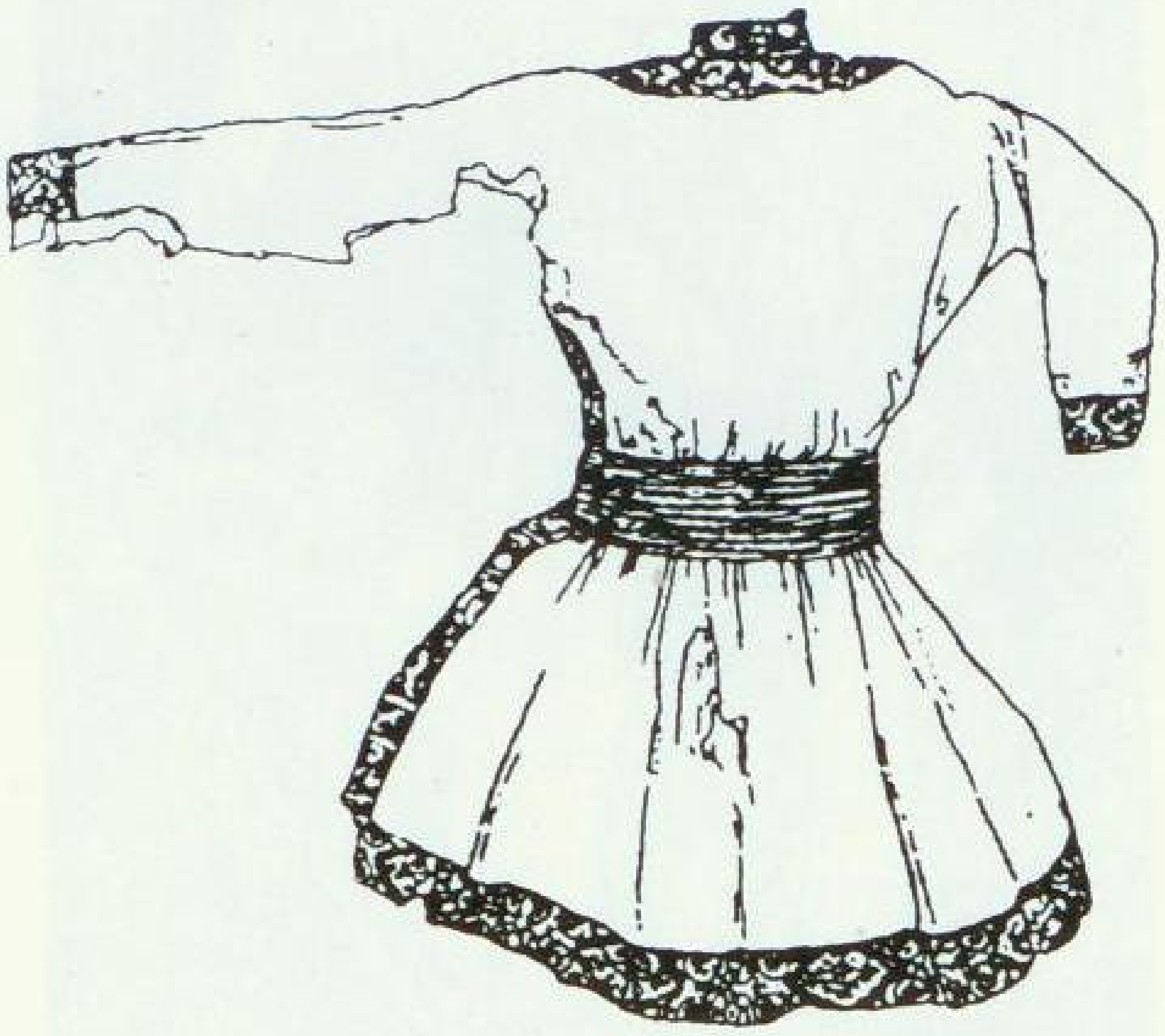
另有一种式样与质孙服完全相同，但在腰部细褶上钉有密密的横向装饰用辫线的袍服，称作“辫线袄”。辫线袄也有出土实物，可惜这件实物的前襟已朽烂，无法了解衣襟的开法和衣领的式样（图O—5），但墓室壁画的形象弥补了这一缺憾（见彩图O—10）。辫线袄在《元史·舆服志》中多处提到，如：“羽林将军二人，……领宿卫骑士二十人，皆弓角金凤翅幞头，紫袖细褶辫线袄”、“宫内导从……佩宝刀十人，分左右行，冠凤翅唐巾（即凤翅幞头），服紫罗辫线袄”等，是元代的蒙古式戎服，军队的将校和宫廷的侍卫、武士都可以服用。

元式戎服中还有一种称作“比肩”的无袖毛皮衣，蒙语是“襻子答忽”，其式样与唐、宋时代的背子基本相同，为帝王和职位较高的官

O—10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区永营子沙子梁元墓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内壁画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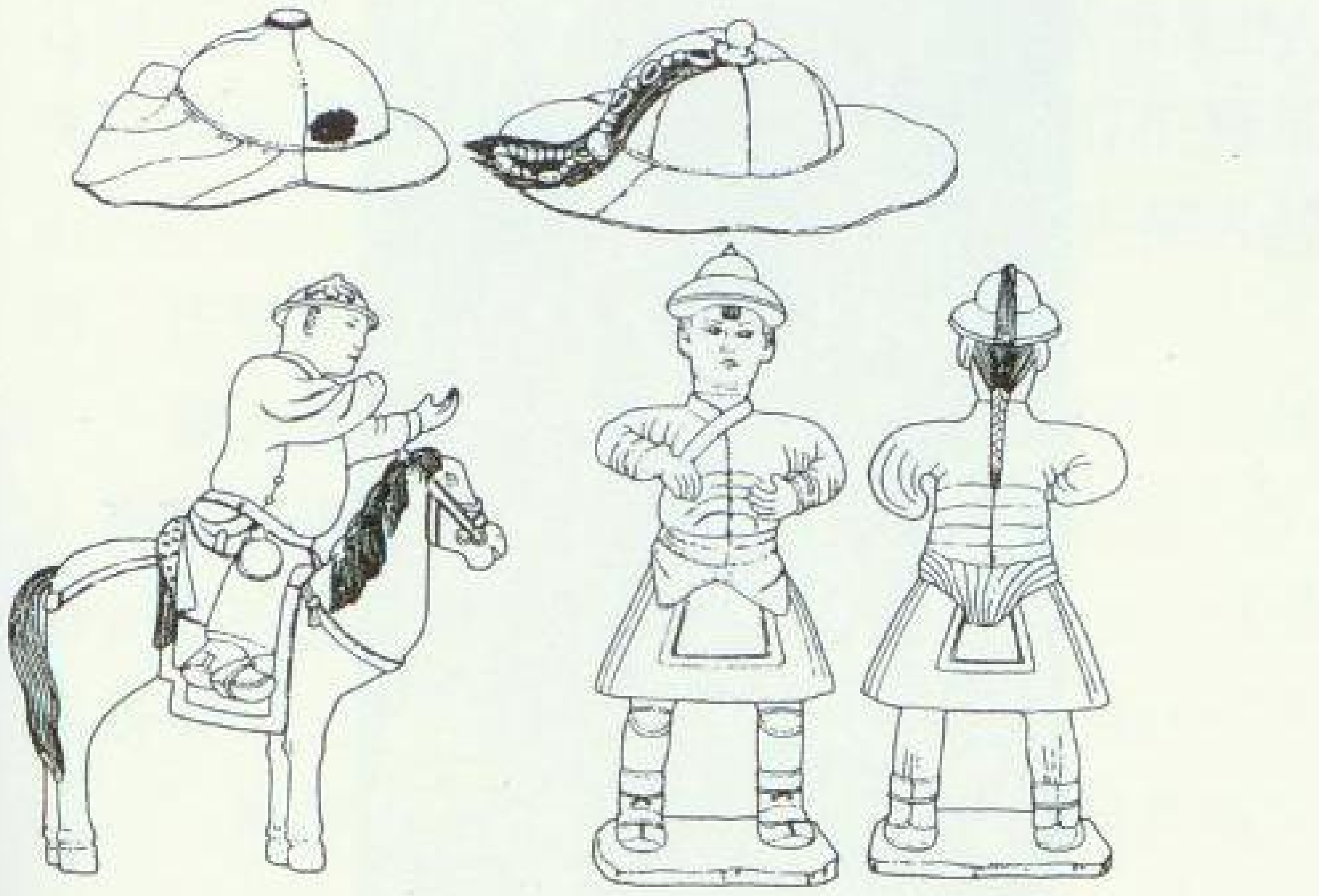
O—11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往古文武官僚宰辅众》中穿元式戎装和官服的人物

图O—7 ①元世祖忽必烈像，头上戴的是金答子暖帽。故宫博物院藏。②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王青墓出土藤、草帽，大同市博物馆藏。③元代刻本《事林广记》插图，此图中人物头上所戴即是冯道真墓出土的藤草帽。④⑤太原市小井峪元代墓壁画，图中人物头上所戴均为毡帽。



图O—5新疆乌鲁木齐盐湖古墓出土的黄色油绢织金锦边袄子（背面），腰部钉有三十道辫线，共宽9.5厘米。辫线用数股丝线扭结而成，在腰的右侧，每两根辫线合并成一根，上面装有一细纽。由于腰部并不开衩，所以辫线、细纽都只是装饰。录自《文物》1973年第10期。

图O—6佩剑骑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



图O—8 上左：前檐帽，棕丝编制，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前檐帽见《元史·世祖昭睿顺皇后传》记载："旧制帽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因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上右：凉帽，丝织材料缝制，顶上饰有串珠。出土、收藏地点同上，彩图O—8后面两人即戴此帽。下左：山西沁水出土元骑马俑，头上所戴即饰有红纬的笠，山西省博物馆藏。下右：陕西省宝鸡市元墓出土陶武士俑，头上所戴为鬃笠，录自《文物》1992年第2期。

员所服，一般罩于质孙服的外面（彩图O—9）。

宋代的貉袖元代也继续使用，貉袖这时已变成小方领、中长袖、前襟用衣扣的短褂，这种短褂是清代马褂的前身（图O—6）。

蒙古式戎服的冠饰是帽和笠。穿质孙服时，冬服戴暖帽，夏服戴笠和凉帽，笠和帽的颜色要与袍服的颜色相近、相配。穿辫线袄时，戴汉式幞头或元式笠、帽都可，比较随意。

暖帽有金答子暖帽、貂皮暖帽、毡帽、鞑帽等几种，凉帽有草帽、藤草帽、檐帽等几种。草帽和藤草帽的式样很奇特，帽顶是正方形或六角形的（图O—7；彩图O—9）。檐帽有前檐帽和大檐帽两种，前檐帽用棕丝编成，额前有帽檐，脑后为软檐披于后。大檐帽如今天的草帽，用丝织材料缝制，这四种凉帽都有出土实物（图O—8上左、右）。笠有鬃笠和顶上饰有红纬的笠两种。鬃笠的外形像锣鼓器乐中的钹，所以又称钹笠。顶上饰红纬的笠在清代称作"红纬帽"，是百官的官帽（图O—8下左、右）。

蒙古贵族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政权，争取汉族上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各方面都"遵行汉法"。定都北京后，朝廷制定百官的礼服、公服，"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元史·舆服志》），大都采用汉制。

武官的公服与宋代完全相同。只有腰带的带尾像金朝，拖得较长，下级武职人员的公服则采用辽金的服饰，头上戴无脚硬裹幞头（彩图O—11、13）。

侍卫武士的汉式戎服是唐宋形制的短后衣，身上束两层袍肚，内层是金的式样。元代称为"捍腰"；外层是宋的式样。头上都戴辽的交脚硬裹幞头，幞头上一般都系扎各种颜色的抹额（彩图O—12）。

宋辽时期罩于铠甲外的短绣衫，元代也仍然使用，其式样也没有任何变化。（图O—9）

据《元史·舆服志》记载，元代的仪卫服饰有交角幞头制、凤翅幞头制、锦帽制、平巾帻制、巾制、兜鍪制、衬甲制、云肩制、裲裆制、衬袍制、辫线袄制、士卒袍制等三十三种服饰。在穿戴时，一般以其中的一种冠或袍服为主，配以其他的服饰。根据元代的各种形象资料，现综合出如下一些仪卫服饰的穿戴方法，供读者参考：

1、戴交角幞头、凤翅幞头时，身上所服为缺胯袍、辫线袄两种，袍服外要系袍肚、捍腰，足穿靴（参见图O—10①、②、③）。

2、戴锦帽、鬃笠时，身上穿交领或方领质孙衣，有时腰间要束带系汗巾，前腹后臀上垂有皮质的蔽前蔽后，足穿靴或鞝靴（参见图O—10④、8下右）。

3、戴巾时可穿方领质孙衣或短后衣。穿质孙衣时，腰间要束带系巾。穿短后衣时，要束袍肚、胫甲和臂甲（参见图O—10⑤、⑥）。

4、戴平巾帻时，身上所服为盘领窄袍，袍袖盖手，腰间也要束带系巾，垂蔽前蔽后，足穿鞝靴（图O—11左）。

5、戴兜鍪或毡笠时，身穿裲裆甲，有的甲外罩绣衫，为衷甲制。铠甲一般只穿身甲，披膊和腿裙都不用，铠甲内衬短后衣，有时还系肩巾（图O—11中、右，12左）。

6、戴交角幞头时，也可穿短后衣。腰束捍腰与袍肚，短后衣外罩绣衫，这种穿法是为衬袍制（图O—12右）。第5、6两种的穿法中，腿上均要束胫甲，缚裤，有时还要束臂甲，脚上穿靴或履都可以，视其身份不同而定。

上述介绍的各种服饰的穿法中，除少数几种采用蒙古服以外，大部分都是汉式衣冠。

蒙古人因惯于骑马，平时一般都穿靴。靴的种类很多，有鹅顶靴、毡靴、鹄嘴靴、云靴、皮靴、鞥靴、高丽式靴等，这些靴有的已无法根据形象资料来辨认，只有鹅顶靴、鞥靴、云头靴等几种比较容易识别。普通士卒则有穿鞋袜的，鞋袜用麻制成（图O—13）。

元代的腰带也有汉式与蒙古式两种。汉式基本上是宋辽金的腰带，没有变化。带銙以玉

O—12 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朝元图》中天丁力士形象。前二人肩上都背了一条用战国式带扣的锦带，不知何用，可能不只是一种装饰。

O—13 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西壁壁画《王重阳》中穿元代官服和侍卫服饰的人物，官服与O—11中的完全相同。

为一品，分素面和镌图案二种；花犀为二品，一般是素面；黄金为三、四品，用荔枝图案；五品以下用乌犀，銙数只能是八銙，带鞓为朱色。蒙古式则是一根一头有环的皮条，围在腰部后，另一头打结穿入环中，伸出的带头掖入腰带，其形象与系法参见图〇—14。

蒙古族男子皆髡发，“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蒙鞑备录》）。正中一搭长至眉间的，蒙语称作“不狼儿”，两侧两搭余发可编成辫发，也可扎成发髻（图〇—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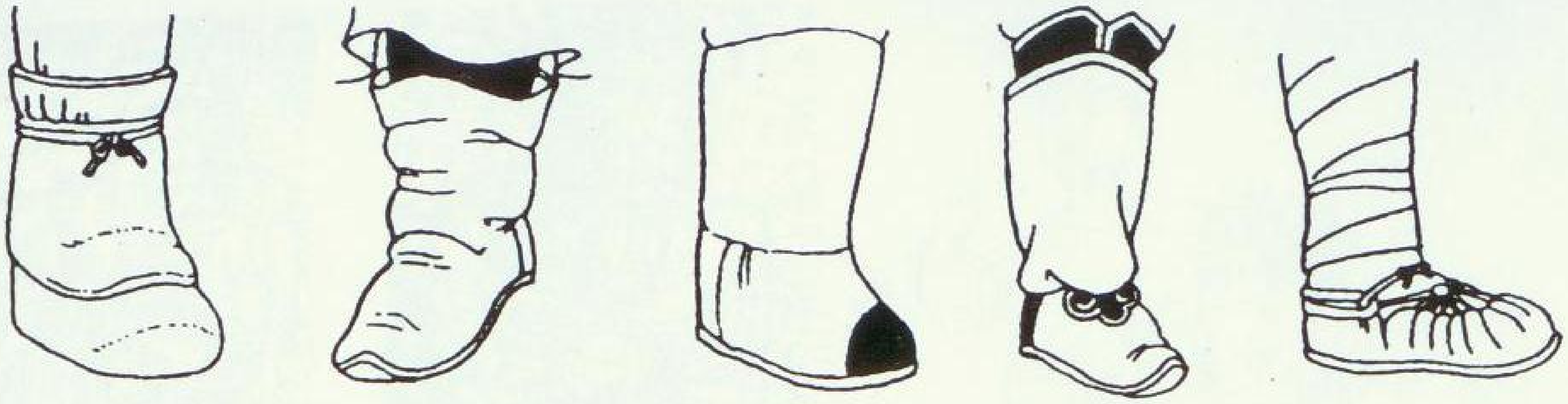
元代铠甲一般都是金、银黑色，衬于铠甲内的袍服也以白色为主，掺杂以绯、青、黑等色。公服一至四品为紫色，六、七品为绯色，以衣料上花纹直径的大小来区别，八、九品用绿色，为无花纹的罗。质孙服的品级颜色很多，冬服九等，夏服十四等，以制衣锦缎的优劣、名贵程度来区分等级，颜色大致有大红、桃红、紫、蓝、绿、白、黄、鸦青、银褐、枣褐、茜红等多种颜色。

图〇—9 元佚名《搜山图》中鬼神形象，短绣衫的袖口比宋辽时期的要小。故宫博物院藏。

图 O—10 ①山西汾阳五岳庙水仙殿元代壁画。②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墓壁画，二图中的人物头上戴的都是凤翅幞头。③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壁画，左侧一人戴的是交脚幞头。④内蒙古赤峰三眼井元墓壁画，前一执鞭人物头上戴的是锦帽，参见元太宗窝阔台像（图0—5右下）。⑤山西汾阳五岳庙五岳殿南壁西侧门神（曾经清代重画）。⑥故宫博物院藏元卫士俑，俑头上戴的巾可能是宋代的硬裹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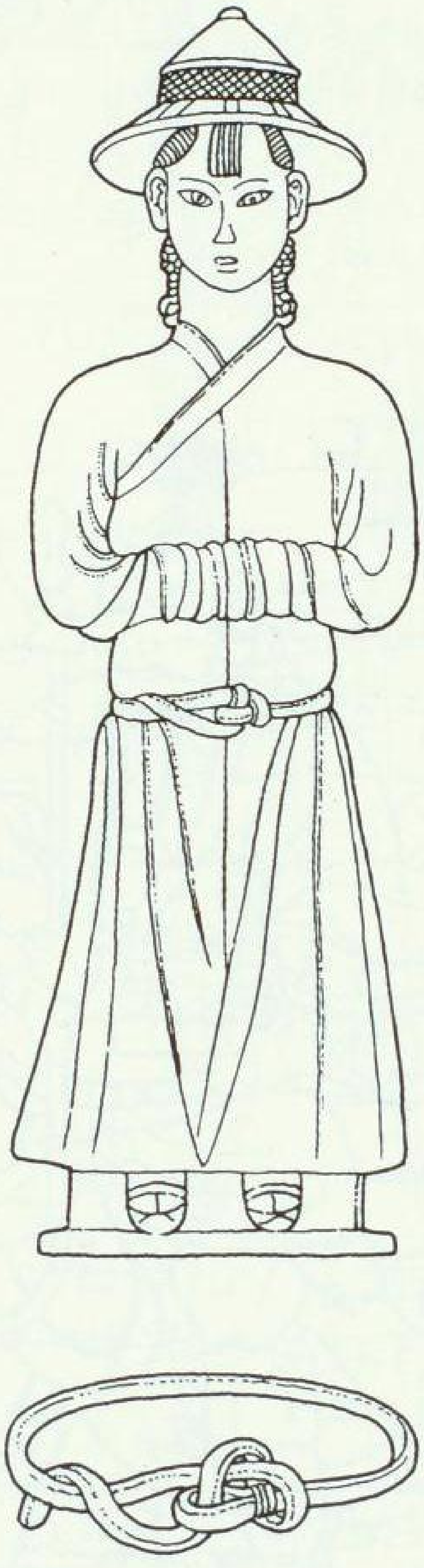
图O—11 左：陕西户县元贺氏墓出土兵士俑，头上戴的可能是平巾帻。《元史·舆服志》曰："平巾帻制，黑纱革为之，形如进贤冠，以皮加黑漆，雌黄为缘。"此俑的冠与记载基本相符。中、右：北京市昌平县居庸关云台元代石刻（局部）。

图O—12 左：山东济南千佛山元墓壁画。右：宝宁寺水陆画《日月年时四直功曹使者》。



图O—13 元代的各种靴和履。从左至右：鞡靴、皮靴、鹅顶靴、云靴、鞋袜。

图O—15 上：元成宗像，故宫博物院藏。下左：元刻本《事林广记》插图中剃婆焦头人物。下右：陕西宝鸡元墓出土戴笠俑，为两种余发的编束样式。



图O—14 上：陕西宝鸡元墓出土的陶俑。下：蒙式腰带系扎法示意图。

明代武士复原图

甲胄根据敦煌市、山西省博物馆收藏实物，十三陵石刻与出土实物，山西浑源粟疏美墓石刻复原；戎服根据《王琼事迹图》、《义烈传》插图、湖北武当山金顶殿铜像、山西平遥镇国寺壁画等形象复原；革带根据江苏南京、辽宁鞍山倪家台等地明墓出土实物复原；兵器采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戚继光钢刀、李自成起义军用铁刀，成都凤凰山明墓出土铁刀、铁弓，日本有马成甫藏铜手铳，参照《乡约》、《练兵纪实》等书插图复原、设计。

P—1 北京昌平十三陵神道石刻镇陵将军像

P—2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上寺飞虹塔琉璃像

明代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使元朝的统治走向了崩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参加了起义军，经过几年奋斗，很快从一个下级指挥官成为据有今南京、皖南、浙江东南等地的大军阀。1360年脱离起义军后，就以未来帝王的身份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次年八月，北伐军攻进元大都（北京），元朝灭亡。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在南京登基，建立了明朝。

明皇朝建立之初，北有元的残余势力，南有夏等割据政权，沿海各地的倭患也很严重。这些都促使明皇朝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军工生产，提高火器和铠甲制造的水平，不断加强国防力量。

据《明会典》记载，明代的甲胄绝大多数是用钢铁制造的，技术十分先进，种类有齐腰甲、柳叶甲、长身甲、鱼鳞甲、曳撒甲、圆领甲等。铠甲的各部件都有严格的重量规定，在形制和式样方面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众多的资料表明，明初的铠甲基本上是北宋的形制，有些还采用了唐、五代时期的式样。比较典型的形象是北京昌平十三陵神道上的武将石刻（彩图P—1），身上的甲胄除顿项以外，各种形制一如宋制，连袍肚、胸前束甲的丝绳打结也与宋陵石刻上的方法一样（参见宋代彩图K—2）。唯一不同的是前胸正中增加了护心镜，这是从辽朝的铠甲中吸收来的。与这件石刻相同的铠甲形象是广胜寺飞虹塔上琉璃雕像和抚顺市元帅府的石刻武将像（彩图P—2、3），后一雕像的两片腿裙中间，出现了长长的鹘尾，这种三角形的鹘尾是明代特有的。

在山西浑源栗疏美墓神道上，有一尊保存很完好的大理石武将雕刻像。甲胄服饰等各部细节刻划十分细致，是很好的参考形象（彩图P—4）。

这尊石像表现的是明中期的甲胄形象，虽然仍保持了明初的基本风格和样式，但很多地方已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兜鍪，已不再是宋代的凤翅盔，盔檐两侧的装饰像卷云。顿项为

P—3 辽宁省抚顺市元帅府明代石刻武将像

三片式，但不同于五代时期的外形和安装方法，横长条的甲片可能是皮革制成的，上面钉有甲泡，系于颔下的系带平时则系结脑后。护心镜用绳束另束于胸前，这一点与十三陵和抚顺元帅府的石刻像明显不同。袍肚的式样则像南宋时期，腹部有兽头护腹甲（护腹甲被两手挡住，只露出双耳），垂于腹下的鹘尾，与抚顺元帅府的相同。从下缘处翻卷的形象来看，有可能是以绢布或薄皮为底，上缀甲片而成，比较轻软。两侧的腿裙十分厚重，腿裙的上下缘处各有一个兽头装饰，中间有皮带相连，皮带的一头装有带扣，这是为了吊挂腿裙而设的装置，在披膊上也有这种连接臂甲与披膊的装置。臂甲和保护臀部与后腿的上下两片甲，很像是用皮革制成的。细节刻划上不够明确的是胸背甲，在方形甲片的上面还有如意头的卷云纹图案，图案上又钉有甲泡，这或许是雕刻师加上去的装饰。

P—4 山西省浑源县清粟疏美墓神道上大理石武将雕刻像

P—5 山西太原崇善寺明代彩塑天王像（据实物写生参照照片绘制）

P—6 山西平遥双林寺明代彩塑"韦驮"像

P—7 湖北省锺祥县明显陵神道石刻武官像

粟疏美为清朝河东河道总督，但墓前神道上的石雕文武官员像全都是明式衣冠，而又得到清政府的默许得以保留至今，其中是有历史原因的（详见清代部分）。

与粟疏美墓这尊石像铠甲基本相同而塑造更明确的是太原崇善寺的彩塑，这尊彩塑应该说比石刻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铠甲的真实面目，其腿裙上虽然没有吊挂装置，但中间折起的形象却表明了吊挂装置原来可能是存在的（后来在修整时被毁去了，彩图P—5）。最能清楚地表现这一装置的是山西平遥双林寺的明塑韦驮像，这尊佛像为明代杰出的雕塑作品，塑像的腿裙上装了一根小链勾吊住折起的部分（彩图P—6）。

北宋开始，腿裙逐渐加宽加长，《宋史·兵志》中记录了南宋的腿裙差不多有20斤左右的重量。经由元代的发展，至明中期，有的长度已快要覆盖住脚背。腿裙长不会妨碍骑马，但会影响人上马和走路，装了吊挂装置，上马前步行时将腿裙收起，骑上马后将腿裙放下，可谓能长能短，伸缩自如，不能不说是一种发明。

韦驮像的兽头盔塑造得很真实，盔下的帽衬清晰可见，是同类形象资料中表现最合理的。兽头盔始于唐代，宋元时仍在使用，至明代出现于这尊像上恐怕是属于宗教艺术、抄袭前代的，这时候实际上已不再使用这种盔了。这种盔虽然以后不复出现，但究竟如何定名尚是一个问题。《宋史》中曾提到韩世忠有连锁甲、狻猊鍪，狻猊亦作"狻麑"，见于《穆天子传》："狻猊野马，走五百里"。《尔雅·释兽》曰："狻猊……食虎豹。"郭璞注："狻猊，师（狮）子。"由此看来，狻猊是古人对狮子的一种称呼，狮子在古代经过人们的夸张处理，一直是象征威猛的似是而非的动物，我们见到的这种盔上的兽头又像虎又像狮，很可能就是狻猊盔。

韦驮像的铠甲集唐、宋、明的形制于一身，很多部分（如腹甲、胫甲等）已有明显的艺术夸张痕迹。这一现象在明代佛教艺术品上是很突出的，在参考这方面资料时，必须剔除这些因素进行观察。彩图P—8、9的两幅佛像就是典型的例子，去掉两像身上繁缛华丽的装饰、附加物，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稷益庙天王像为典型的宋初铠甲，与湖北明显陵石刻像的甲胄完全一样。(彩图P—7) 而宝宁寺水陆画的神将铠甲则与五代王建墓宝篆盖上武将银饰片的铠甲相同，特别是束于腹部的圆形护甲如出一辙。塑造比较写实的是平遥清凉观的两座神像，除了腿裙膝部的兽头比较夸张外，其余各部分都属合理，这二式铠甲是明中期的典型形制（图P—1)。

仔细观察太原崇善寺、平遥双林寺和清凉观的彩塑像，可以发现明代铠甲的甲片出现不少新的变化：甲片已不再是薄平片，而成为有棱有角的、中间突起的甲泡，这种甲泡不仅增加了甲片的强度，也改变了甲的编缀方法。铠甲的表面已看不出编甲片的绳索，甲片可能都是用甲钉钉在甲衬上的，所以明代的甲片看上去都很小。

明代中期火器制造得到进一步发展，欧洲的佛朗机和红夷大炮也相继传入。这些近代兵器的出现，将旧式铠甲无情地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新式铠甲主要是锁子甲和布面甲，特点是

P—8 山西省新绛县稷益庙正殿东壁壁画

P—9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守斋护戒诸龙神众》中穿明式铠甲的神将

P—10 明崇祯山西总兵周遇吉所属宁武路静乐营二队鸟枪手守长赵勇所穿盔甲实物，山西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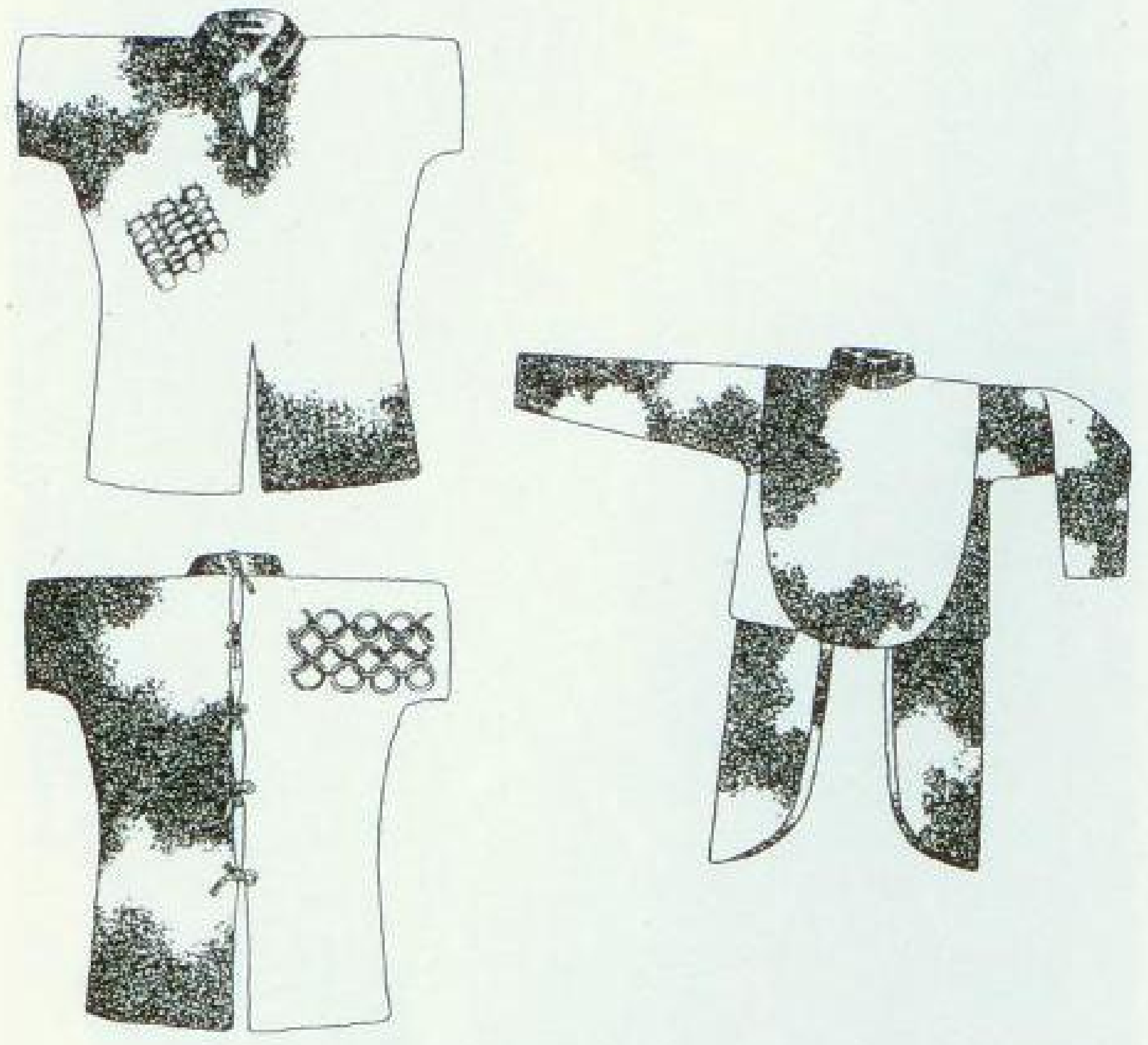


图 P—2 左：明代短袖锁子铁甲，敦煌市博物馆藏。右：明御林军使用的长袖、有腿裙的锁子铁甲，山西省博物馆藏。

轻便、结构简单而遮盖面大。

锁子甲在汉唐时称环锁甲，是以小铁环相互套连编成的铠甲，当时还属于十分贵重的稀珍物品，元代时使用已较普遍。但元代的锁子甲外表缀有铁甲片，可能铁环也比较大。到明代时，锁子甲都用直径一厘米左右的铁圈编连，也不再缀甲片配内衬了，直接套于戎服之外。明代的锁子甲各地博物馆保存的实物很多，大部分都是半身的，少数也配有腿裙。这种锁子甲与旧式铠甲相比，同样是钢铁制造，但是要轻便多了（图 P—2）。

布面甲是从元代继承而来的，制造方法分两种，一种仍像元代那样，以布为面里，中间缀铁甲片，表面钉甲钉（彩图 P—10）。另一种称绵甲，“绵甲以棉花七斤，用布缝如夹袄，两臂过肩五寸，下长掩膝，粗线逐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起，铺地，用脚踹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鬒不尽，鸟铳不能大伤”（《涌幢小品》卷十二）。这两种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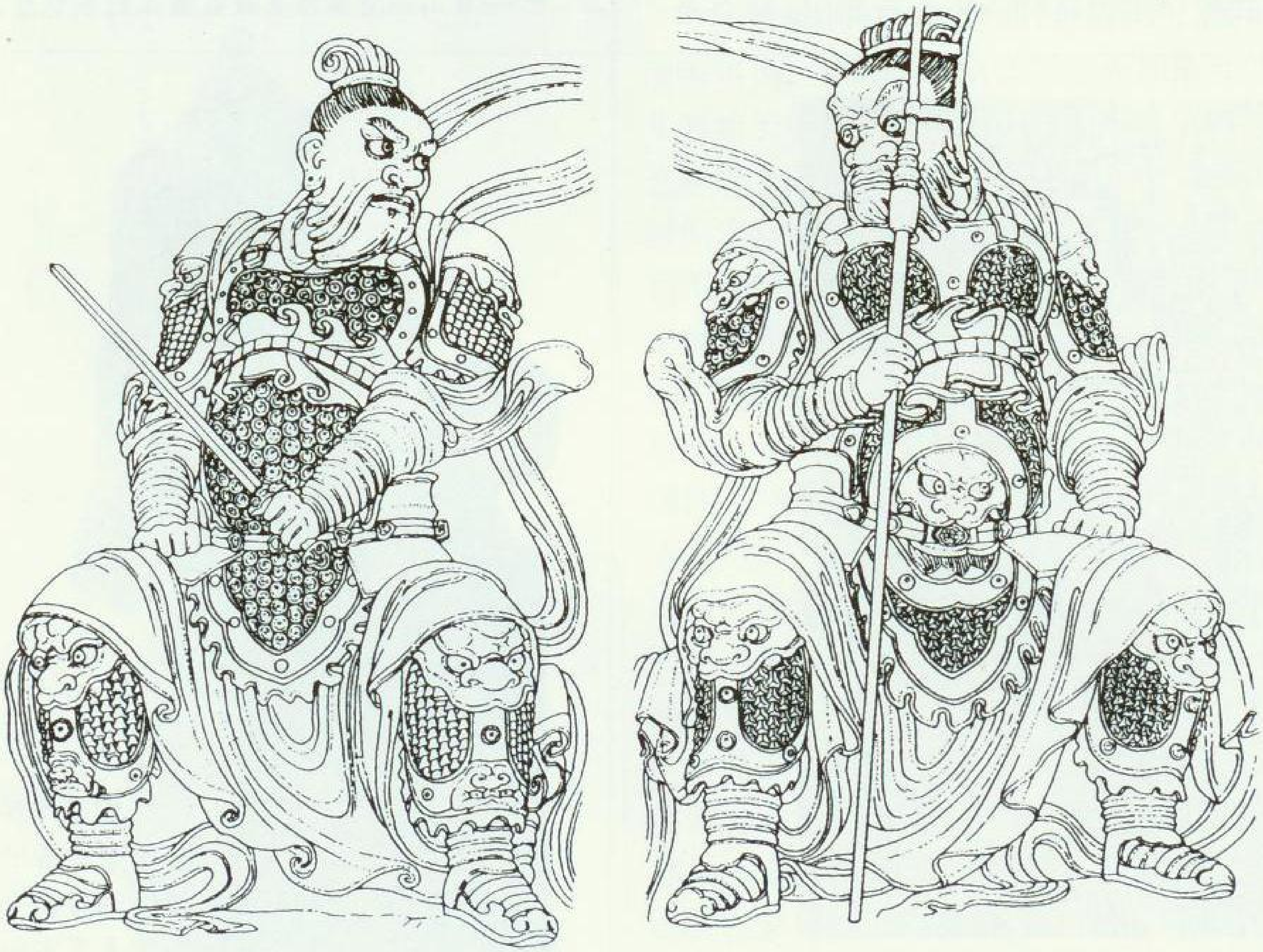


图 P—1 山西平遥清凉观明塑护观神将（据照片绘制）。

甲是专门用来对付管形火器的，这些软甲在明后期大量使用的事实，实际上宣告了铠甲的历史使命行将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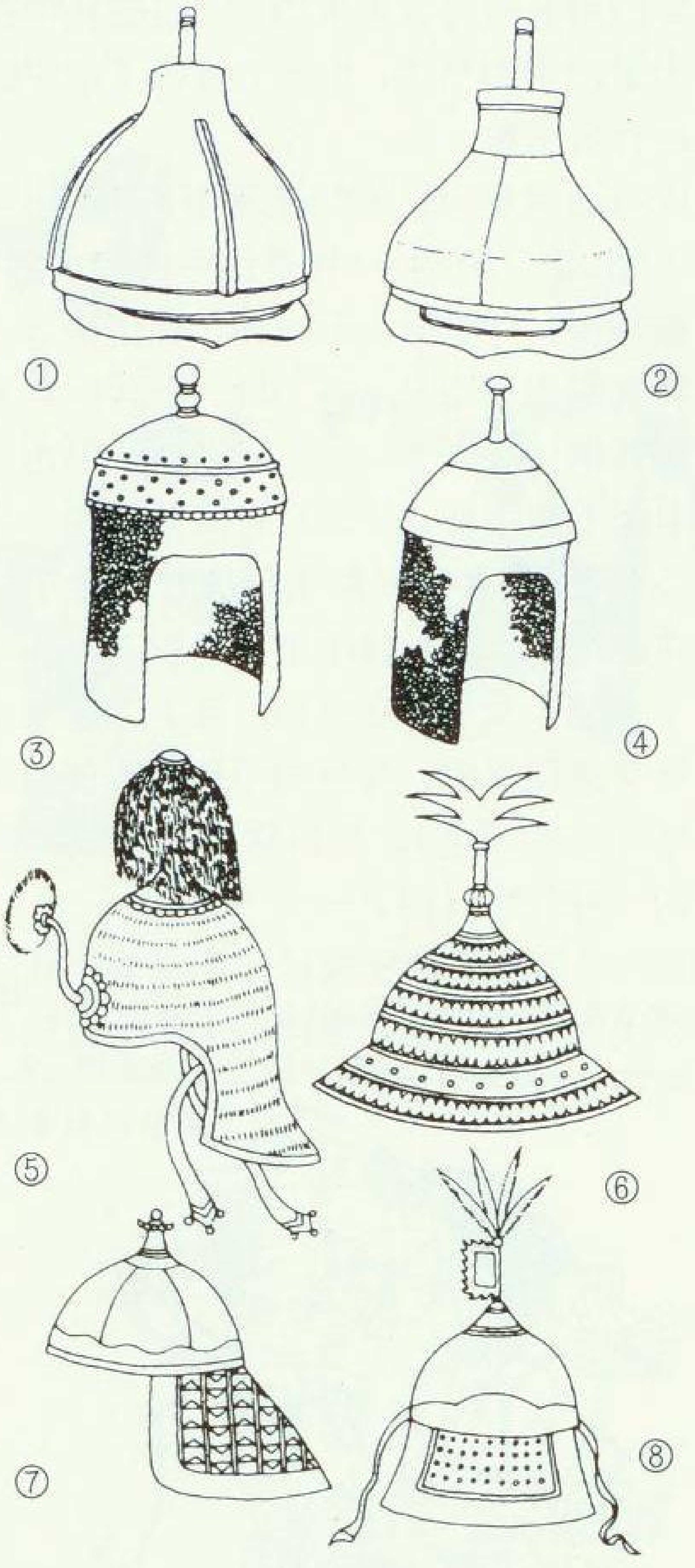
比布面甲更为轻便的是罩甲，罩甲出现于正德年间，也分两种：一种是用甲片编成的，形如对襟短褂，有腿裙而无披膊，有腿裙者一般都为将官服用（图P—3、4），士兵则穿无腿裙的短罩甲（图P—5上）。另一种纯用布为面里，中间不敷甲片，开始只有军队使用，到后来王公显贵、市井平民都争相仿效，“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明史·舆服志》）。朝廷只得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下令禁止军民人等穿紫花罩甲，其余的颜色则听便（当然不包括龙袍的颜色），所以罩甲后来成为明代百姓的一种时装（图P—5下）。

明代沿海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嘉靖年间出现过很多民间武装，这是在倭寇大举入侵时，为

图P—3 明皇陵石刻镇陵将军像，洛阳市关林石刻陈列馆藏。

图P—4 明人绘《王琼事迹图》中穿罩甲提督　此图罩甲内穿的是蟒服，《明史·舆服志》载：“……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图中的袍服图案与上述记载相一致。蟒服应属公服一类，此图可以证明公服有时亦可做为戎服穿于铠甲之内。

图P—5 上：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穿短罩甲的明军士兵。下左：明万历刻本《元曲选》插图中穿布罩甲的将士下右：明刻本《义烈传》插图中穿布罩甲的吏卒



图P—7明代的各种盔①②铁盔，此式应是沿袭元代。③④御林军用铁盔，按《明会典》记载，应称为水磨锁子护项头盔。此四图录自《中国兵器史稿》。⑤一块铁铁盔。⑥四明盔，可能即四瓣明铁盔。⑦六叶盔，可能即六瓣明铁盔。⑧皮穿柳叶盔。此四图录自《武备志》。

图P—8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的足护甲形象

保卫家乡而自发组织的。这些民间武装就地取材，曾使用皮革、牛角片、藤等材料制甲。《武备志》等书对这些特殊的甲胄都做了记录（图P—6），其中的皮甲在今天的凉山彝族地区还收藏有很多实物。其传统的制甲技术到解放初期也仍在使用，制造出的皮甲曾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这些皮甲反映出古代制甲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彩图P—11）。

明代后期的铠甲虽然日趋轻便简单，但保护头部的盔却相反变得越来越坚固、考究，这可能是身体轻便灵活，躲避较为方便后，头部常常成为主要攻击目标的缘故。

据《明会典》记载，明代的盔有铁帽、头盔、锁子护项头盔、抹金凤翅盔、六瓣明铁盔、八瓣黄铜明铁盔、四瓣明铁盔、摆锡尖顶铁盔、水磨铁帽及头盔、水磨锁子护项头盔等十八种盔，《武备志》中记录了六种并有附图。（图P—7下面四种）《中国兵器史稿》中也收录了一些，其绘制的插图也比较准确（图P—7上面四种）。从盔的名称来看，基本上都是钢铁制造的。从式样来看，有的明显是沿袭元代的，余如凤翅盔等，应是仿照宋代的，铁帽的形象则可参考彩图P—10。

图P—6上：《武备志》书中记录的粤兵盔甲，左为铁制盔帽，右为甲衣，披膊是用牛角片制成，身甲为革制。下：《筹海图编》记录的赤藤甲，左为甲衣，右为盔笠（正、俯图），制作方法，将藤浸晒后编成，外涂桐油，轻坚利便。

P—11 明代彝族皮甲盔由三块圆甲片组成，头顶一块，两耳处各一片，中间用皮线连系。身甲的腰以上由十块大甲片组成胸、背、肋甲，甲裙由四排小甲片编成。编缀用的都是皮绳。臂甲和膝甲都用厚皮块制成。甲的表面髹漆，上面绘有精美的彩绘，有的还镶嵌了银饰。肋甲的边上都注有制作年代，有时还写上一些表示吉利的赞语。

P—12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穿朝服（左二人）、公服（右一人）的明代官员形象

P—13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的貂蝉冠形象

保护足部的卫足正式见于记载是在明代，一种是用铁网制成的甲靴，另一种如辽金时期的护甲。护甲以皮或厚毡裹于胫部，或连接在胫甲上，用带在踝骨处束紧，伸出的部分覆盖住脚的背面，形如元代的鞥靴。护甲也可能用铁网制作，或在皮衬上钉缀甲片制成（图P—8、9）。

明代的武官制度是历史上最完备的，而军戎服饰的等级差别也最明显。朱元璋登基后，采取了多种手段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其中包括制订一整套十分周密的官制和复杂的礼仪服饰制度。从洪武三年至二十六年，朝廷曾七次下诏规定文武百官、将校军士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服饰，简直是样样都有定制，不可随便逾越、违背。

武官九品以上有四种官服：朝服、公服、常服和赐服。这四种服饰中，公服和常服在明初是合二为一的，中期开始分开，除常服使用较普遍以外，其余三种都属宫廷服饰，不属戎服范围。

彩图P—12、13为朝服和公服形象，朝服为唐宋以来的传统样式，除了梁冠的外形、各品级服饰颜色有小的变化以外，其余没有什么不同。公、侯、驸马品级的官员，在朝服梁冠上要戴笼巾，有笼巾的梁冠也称貂蝉冠，外形与宋代基本相同。

公服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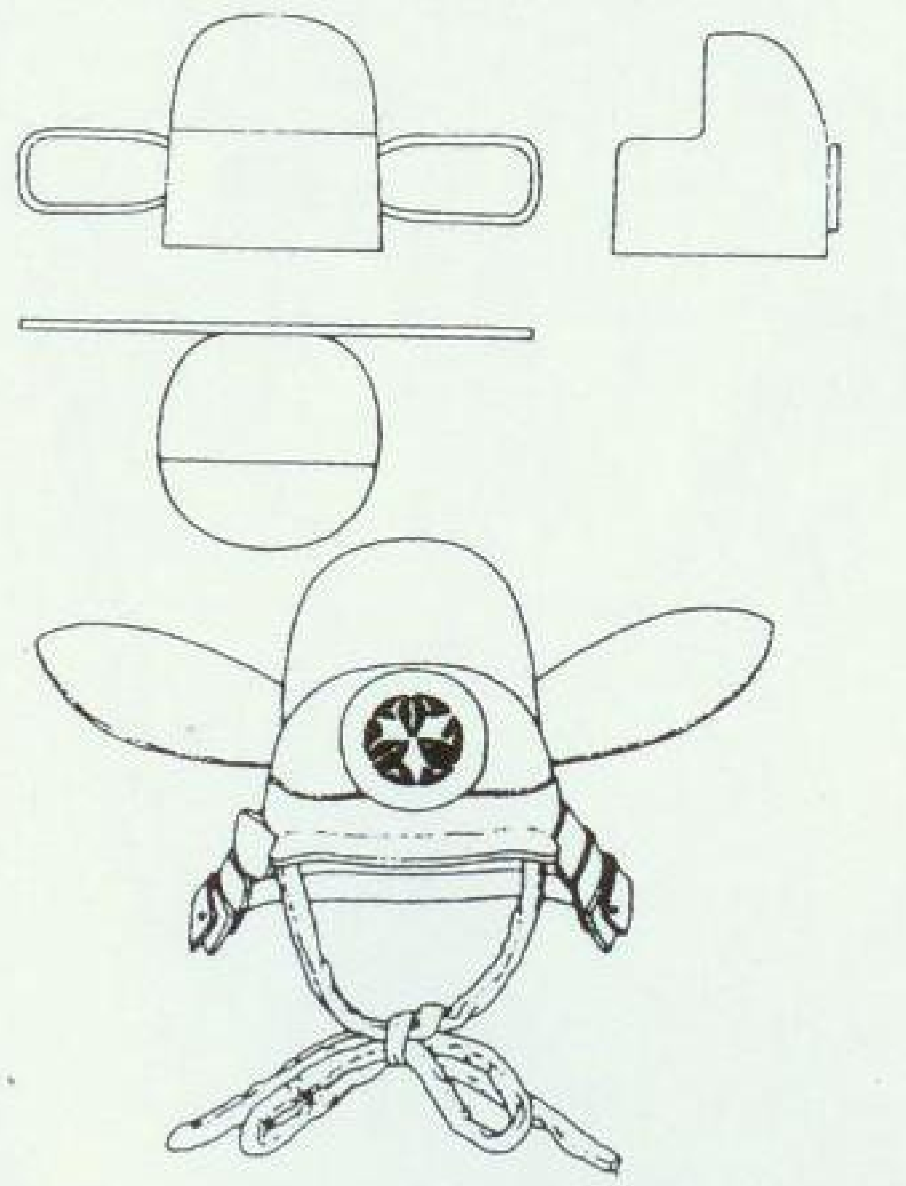
图P—9 四川成都凤凰山明朱悦爜墓出土陶武士俑，此俑的靴上覆盖有护甲，护甲可能与胫甲相连在一起。

外文武官，每日公事服之”(《明史·舆服志》三)。这也是宋制，除幞头的展角尖微有变化外，其余都基本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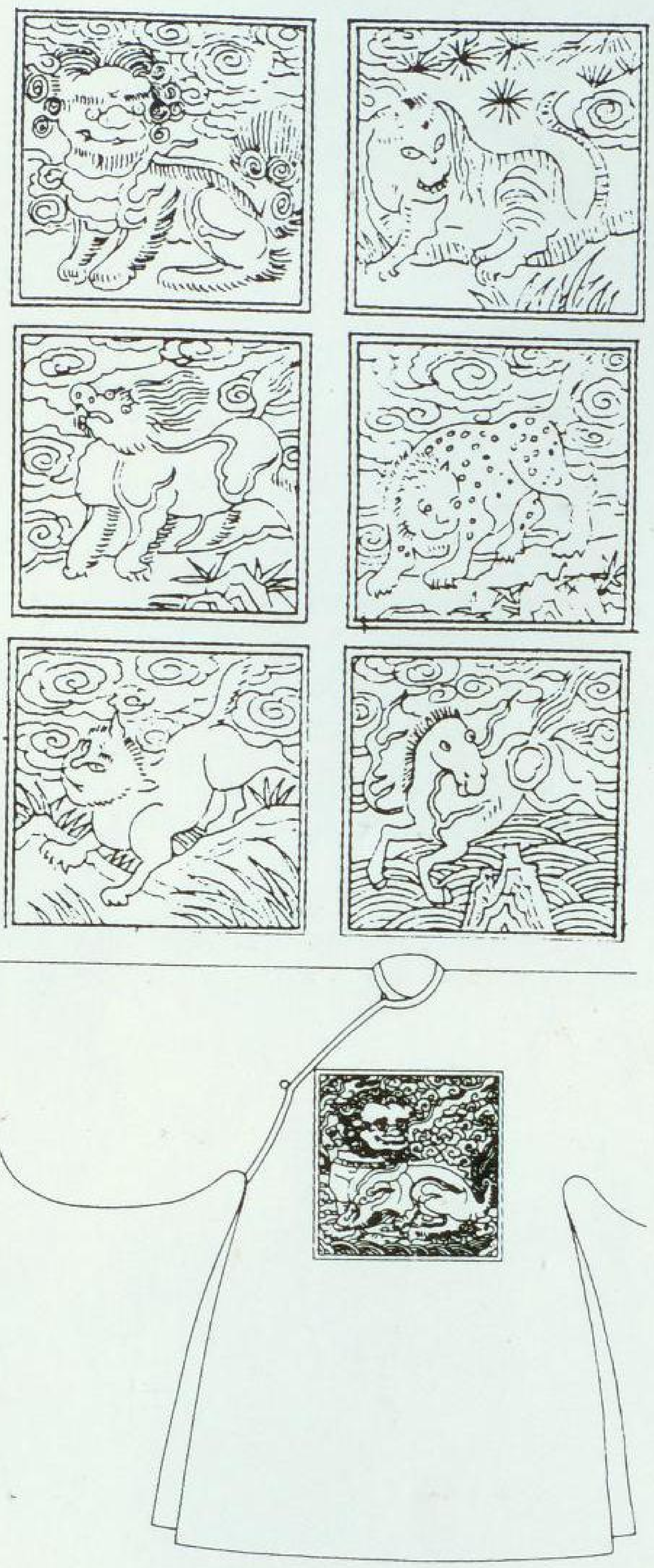
常服定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是文武官员“常朝视事”的制服，使用场合较多，在没有制定公服制之前，它实际上就是公服。袍服的形制与公服相同，以胸背上的补子和袍服颜色区分品级。常服在江苏泰州明刘湘墓中有实物出土，各品级的补子在《三才图会》书中有图录(图P—10)。

穿常服时要戴乌纱帽，乌纱帽在上海卢湾区发现过实物（图P—11上），据记载隋文帝时就使用过这种官帽，唐高宗时一度也使用过。可能因为使用的时间都较短，所以在隋唐时期的形象资料中，至今没有发现过戴乌纱帽的人物。这种乌纱帽还流传到日本，被制成日本武士的一种头盔（图P—11下）。

明代的赐服与宋代的时服性质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所赐服饰只有公服常服形制的袍服一种，而且专指品级未到而皇帝特许穿的官服。最贵重的有三品：一品蟒服、二品飞鱼服、三品斗牛服(正德十三年曾变更为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至嘉靖元年又重新改回)，以胸前



图P—11 上：上海卢湾区出土的明潘氏墓出土乌纱帽（三视图），上海博物馆藏。下：［日］斋藤直成收藏鎏金唐冠形兜鍪，录自《日本甲胄图解辞典》。



图P—10 上：武官九品补子一、二品：狮子补，三品：虎补，四品：豹补，五品：熊罴补，六、七品：彪补，八、九品：海马补。录自《三才图会》。下：织狮补服，南京博物院藏。

P—14 王鏊写真像明佚名画。《明史 · 舆服志》载："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当膝处横织细云蟒……"此服应为单蟒服。

P—15 山西省太原市关帝庙彩塑关羽像

的绣纹图案来命名。蟒、飞鱼、斗牛外形均像龙。蟒为四爪（比龙少一爪），飞鱼龙首、鱼尾、身上有鱼翅。斗牛也是龙首，但牛角、鱼尾，飞鱼服在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实物，蟒、斗牛的形象可参考明李邦镇、王鏊画像（彩图P—14、图P—12 ①②③④）。

常服和赐服虽也不属于戎服范围，但常服作为武官的品级制服经常要穿戴。明皇朝继承宋的衣钵，在政治上以各种方法抑制将帅，武将如要获得较高的官职，都要经过文试才能进入仕途，重文轻武的风气影响整个社会。因此，武职人员除了作战和必须穿戎服、铠甲的场合以外，平时都穿常服（文武官相同）和士大夫的服饰。为了比较明显地区分文武官的制服，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规定："文官衣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武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明史 · 舆服志》三），普通军人衣长则要离地七寸（《明会典》）。明后期由于绵甲已变成与袍服一样的形制，武官的常服，甚至赐服此时也经常作为戎服衬于布面甲、罩甲之内（参见图P—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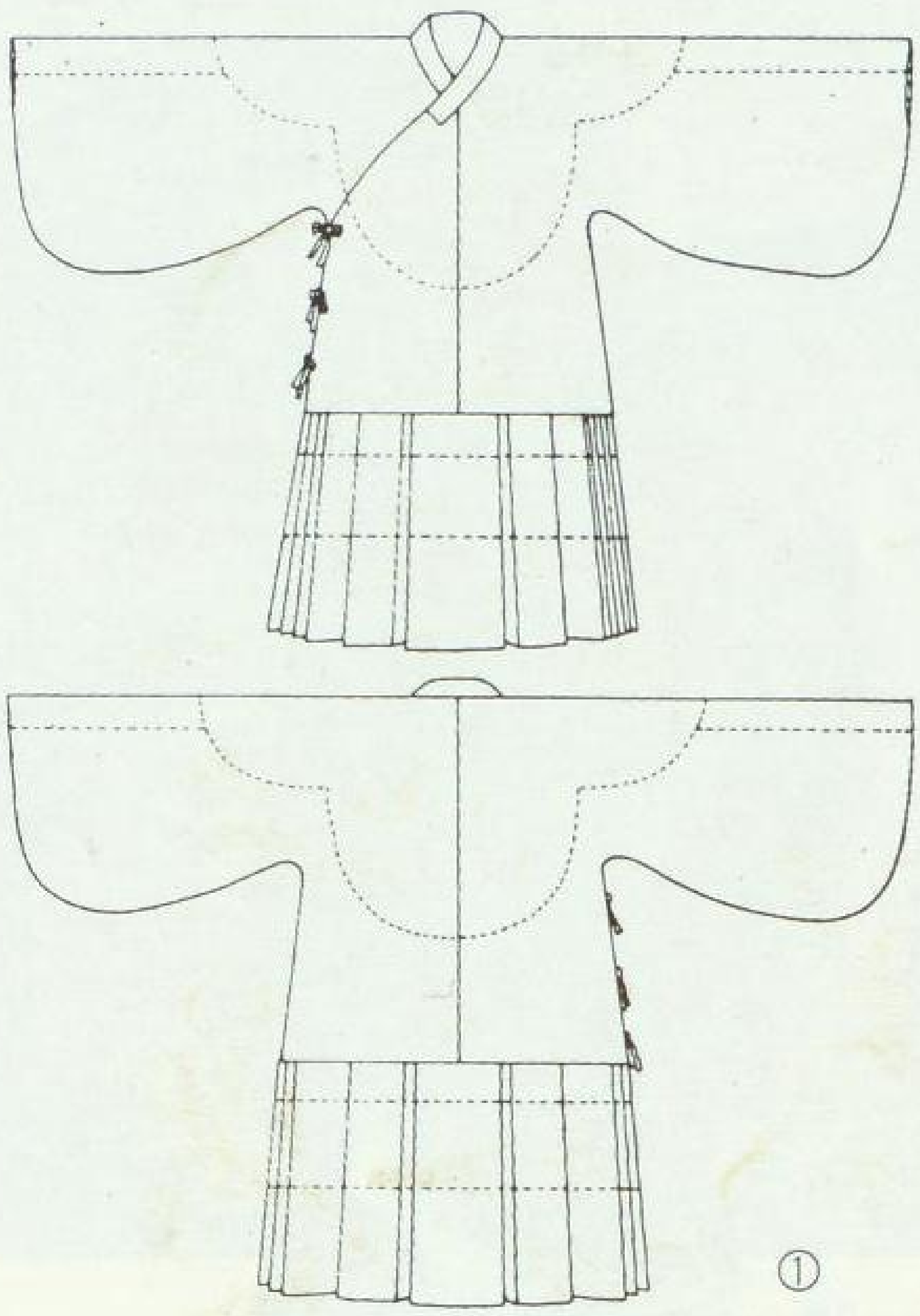
明代前期，属于武官戎服的有如下几式：一式形制如唐代的窄袖宽袍，这种袍无领、无扣，右衽，裹襟与外襟在前身重叠时大幅交叉，以勒帛和腰带在胸部和腰部系束。一般都穿在铠甲外，常见的有两种穿法：一种是袒露右臂，右侧衣袖掖入背后腰带（有的袍服根本就没有右衣袖）。一种是穿上双袖，敞开前胸，露出内衬衣甲，其形象参见图P—13、彩图P—15、17。这种戎服袍为品级较高的将帅服用，穿此袍服时，一般都戴巾或幞头。

另二式是唐宋时的短后衣和缺胯袍，在明初穿法与宋元时期相同，既穿在外表，也衬于铠甲内。这两种穿法同时又是军队和宫廷内的侍卫、仪仗服饰。服短后衣穿铠甲时，一般只穿身甲和腿裙。短后衣或缺胯袍穿在外面时，则像元代时束两层袍肚，肩系四垂巾，这两种仪卫服饰在明代很盛行。与这些服饰相配的冠也比较随便，可以是凤翅盔，可以是幞头，也可以戴巾和小冠（参见图P—14、彩图P—16、

图 P—13 湖北武当山金顶殿真武大帝像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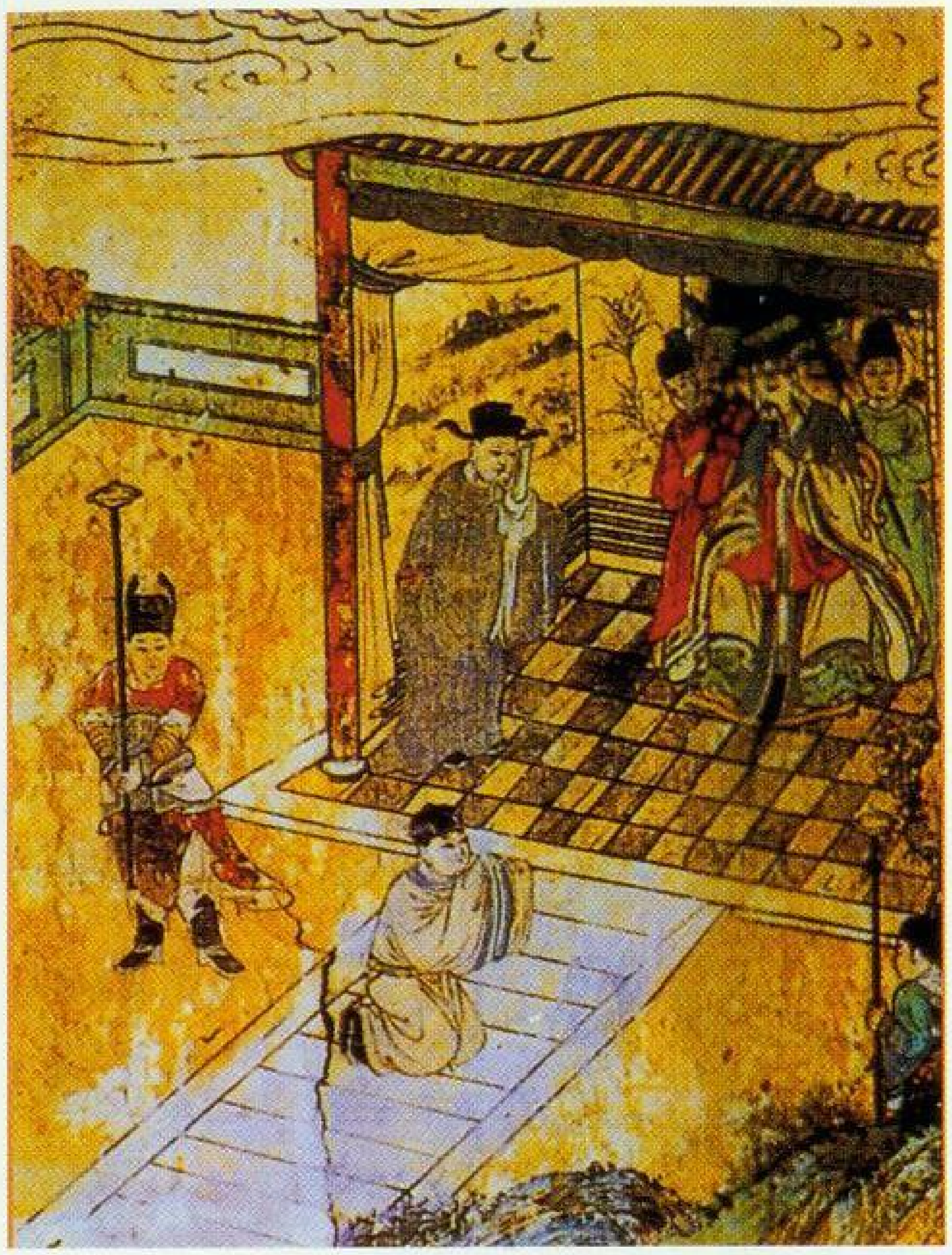
③



①

④

图 P—12 ①山西省博物馆藏明代飞鱼服实物上　为袍服正面，下为背面，虚线是图案所布位置，下裳折裥，正面右侧五折，左侧七折，背面左右两侧均为四折。②背部飞鱼纹图案③膝裥处飞鱼纹图案④临淮侯李邦镇画像，录自《歧阳世家文物图像册》身上所服为斗牛服。《名义考》曰“斗牛如龙而牛角”，此像上的斗牛图案与南京出土的带铐上的图案完全相同（参见图 P—21）。



P—16 山西平遥镇国寺明代壁画

P—17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关羽（左第一人）和兰陵王（右白衣人，即南北朝戴假面作战者）像，两人的宽袍穿法均与真武大帝像相同。

19、20、22）。

宋代罩于铠甲外的绣衫，明代也继续使用，其式样完全恢复了宋制（参见彩图P—18、21）。衷甲制在明代可能止存在于中期之前，后期因铠甲形制的完全改变而不复使用。

明代的戎服还吸收了元代的质孙衣，《明史·舆服志》载："（洪武）六年令校尉衣质孙"。后改名曰"曳撒"，永乐以后，曳撒服成为宫廷宦官和皇帝随侍文武官员的燕闲之服，曳撒上如绣有蟒纹，为很显贵的赐服，"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明史·舆服志》三）。山东邹县出

图P—14 上：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明蜀僖王墓出土武士俑，成都市博物馆藏。下：四川平武县明王玺家族墓墓室内浮雕

P—18 明画《关羽擒将图》，关羽穿的是窄袖右袒宽袍，周仓、关平则在铠甲外罩绣衫。

P—22 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神道石刻像

P—19 成都市郊保和乡出土明仪卫俑，成都市博物馆藏。此俑的腿部好像有大块皮革做成的腿裙。

P—20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仪卫人物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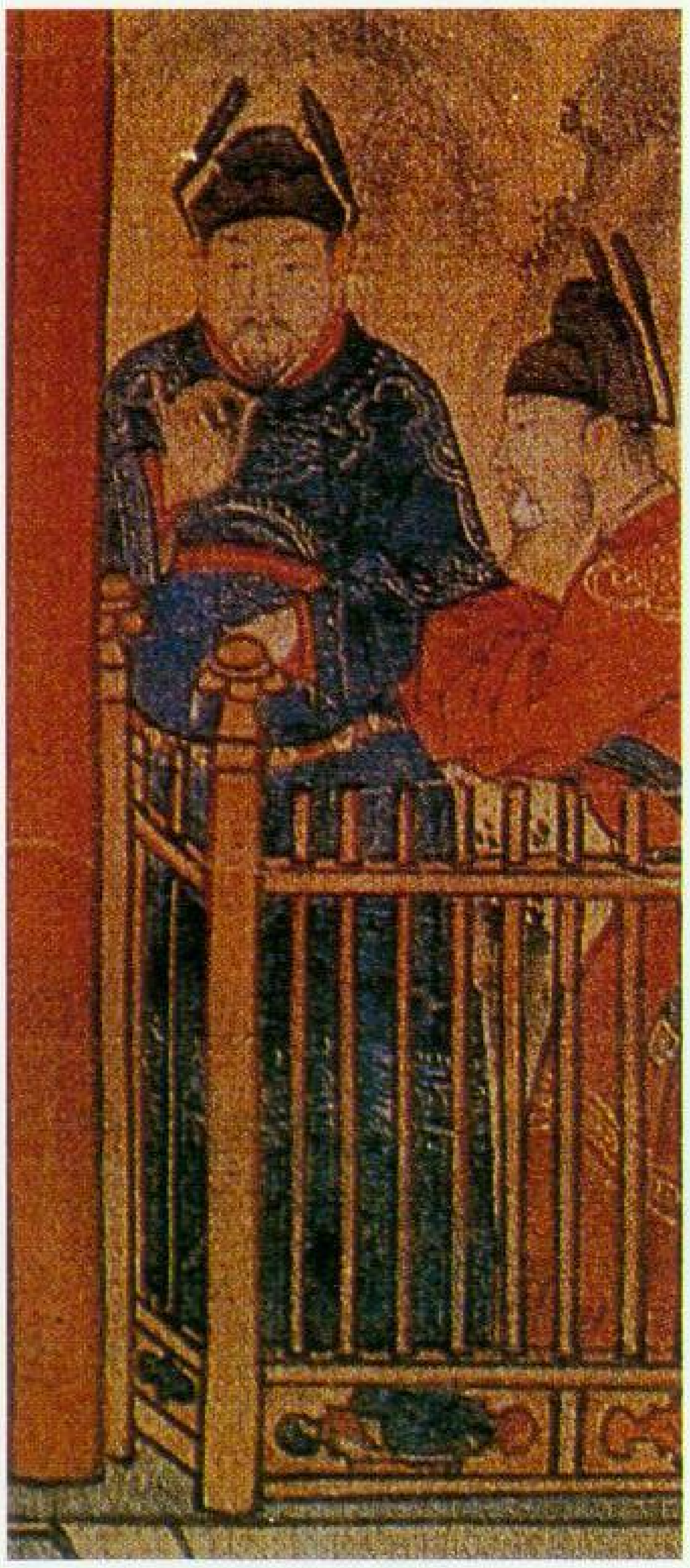
P—21 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大门两侧外墙壁画，人物的短衫好像罩在袍服外面。

士的织金缎蟒纹袍，就属于这种曳撒（图P—15）。

明代军人在穿戎服时，既可戴盔胄（其中一部分盔是用布仿铁盔制成，专为穿仪仗戎服时戴用），又可戴巾、帽、冠，这一点在前面曾提到过。明代的巾名目繁多，其中有一些是幞头的变名（如折上巾），大部分巾各式人等都可戴用，无明显界限。明后期的军人基本上都戴巾，特别是水军将士。这些军人戴的巾大多如隋唐时的平头小样幞头，当然也有加巾子的硬裹巾（参见彩图P—23、24；图P—16）。

帽为红笠军帽，与宋代一样为普通士兵所戴，一般用毡制成，其式样、外型与宋金时相差无几。（图P—17左）还有一种形如软帽的“襕脑”，为将军、力士、校尉、旗军所戴。《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二年）令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常戴头巾或襕脑。”其形象参见图P—17右、彩图P—25。

图P—15 织金缎蟒纹曳撒袍，山东邹县明朱檀墓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P—23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穿公服、戴折上巾的官员形象

图P—16 四川平武县明王玺家族墓墓室内浮雕侍卫像，头上所戴应是硬裹幞头。

P—24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戴巾的士兵和戴榼脑的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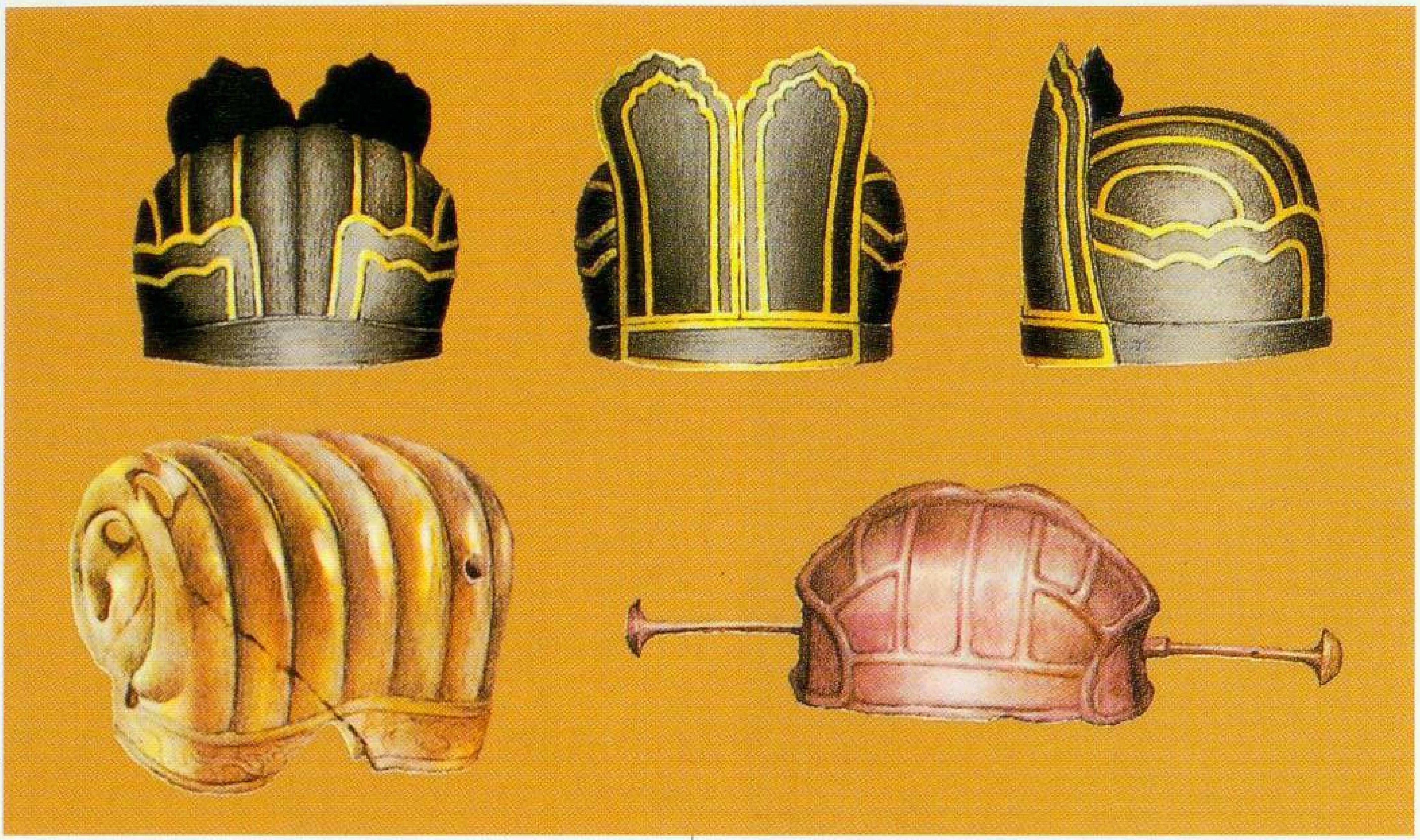
P—25 山西平遥镇国寺壁画，左面持双剑、穿红衣者，头上戴的是榼脑。

冠有忠静冠、小冠等。“忠静冠，冠匡如制，以乌纱冒之，两山俱列于后。冠顶仍方中徽起，三梁各压以金线，边以金缘之。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忠静”其名，“庶几乎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焉。……武官止都督以上，其余不许滥服”（《明史·舆服志》三）。忠静冠在苏州枫桥明墓中曾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实物，其形制、颜色均与《明史》记载吻合。（彩图P—27上）小冠就是宋代的束发罩冠，明代的武将也经常使用，崇善寺的明代彩塑天王，头上戴的就是小冠（彩图P—26），小冠也有很多出土实物，其形象参见彩图P—27下。

据《明史》记载，正德十一年（1516）时“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飘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明史·舆服志》三）。这则记载很明白地证实了在冠顶上插翎羽的制度并非始于清代，而在明代时就已经出现了，宝宁寺水陆画和《邢玠抗日援朝战迹图》上还能见到插翎羽的形象描绘（图P—18上左、右）。

从《武备志》插图和《邢玠战迹图》上还可以看出，有时盔顶还插小旗（图P—18下左、右），小旗有时又与翎羽同时插在一起（参见图P—7⑧）。盔顶插小旗不见于文字记载，但《武备志》

图P—17 左：明万历刻本《水浒全传》插图，戴红笠军帽、穿罩甲的军士。右：明琉璃俑，录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此俑出处不详，头上所戴为榼脑。



P—27 上：苏州枫桥明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静冠（据实物写生），苏州市博物馆藏。下（1）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浉钥墓出土玛瑙七梁小冠（高3.5厘米，据照片绘制），江西省博物馆藏。(2) 南京市明徐俌墓出土琥珀发冠，南京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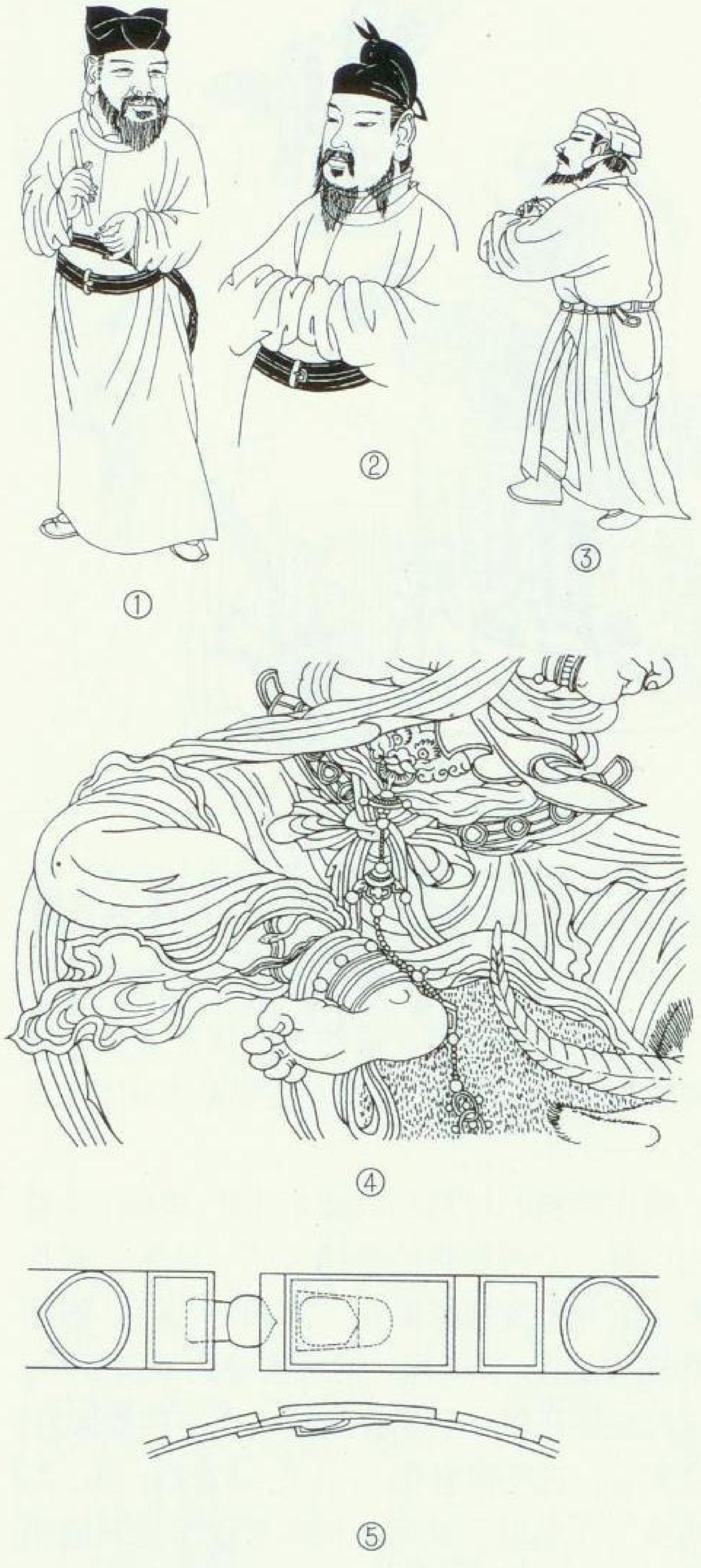
P—26 山西太原崇善寺的明代彩塑

和《战迹图》都是明代所作，可靠性应比较大，小旗与翎羽后来是否同属于英，尚有待日后发现新资料予以证实。

明代的下级军人一般只能穿履，而不能穿靴。穿履时腿上要裹行缠。靴大部分为短靿(筒)靴，有用皮革制的，也有用缎制的，出土与传世的实物很多。靴和履一般都是薄底、翘尖，少数也有平、圆头的（图P—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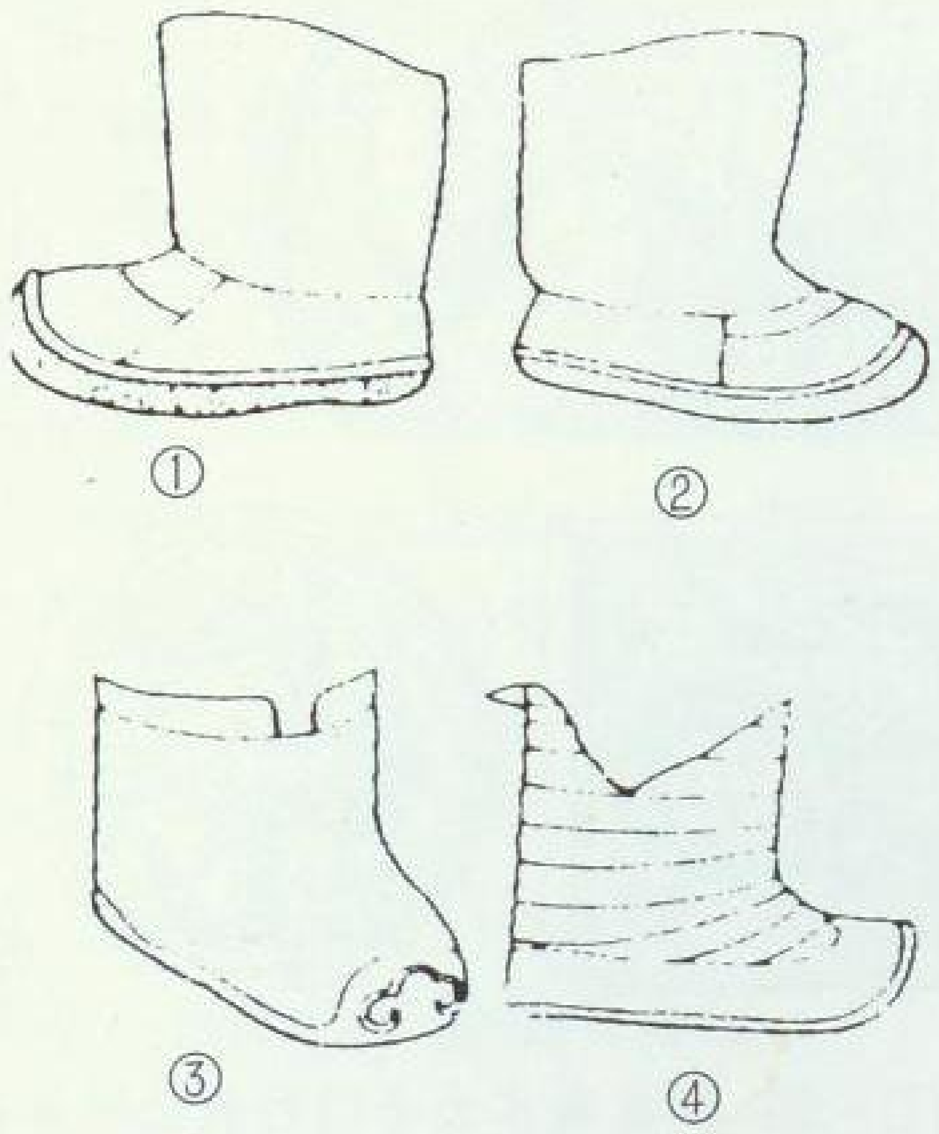
明代的腰带有双带扣和单带扣两种，双带扣、双铊尾带大都用来束甲，其结构、式样保持了北宋时期的形象。单带扣带改变比较大，有的开始用卡簧系接，束带卡簧是明代的一种发明，其制作工艺十分精巧（参见图P—20⑤）。用卡簧束带无形中去掉了带尾，带銙中的铊尾失去了原来所处的位置，这时变成为带銙的一部分排列在腰带的左右两侧（参见图P—21）。而用单带扣系束的腰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插带尾，而是把带尾穿过带銙后反折入腰带的里面，表面上不露出多余部分来，因此这时期的带扣上用于穿过皮带的空隙很窄（参见图P—20②、21）。

腰带的带銙装饰也具有明代特点，正面的中间位于带扣处为三方銙，正中一大方銙，两侧两小方銙，合称“三台”，三台两侧各排三枚桃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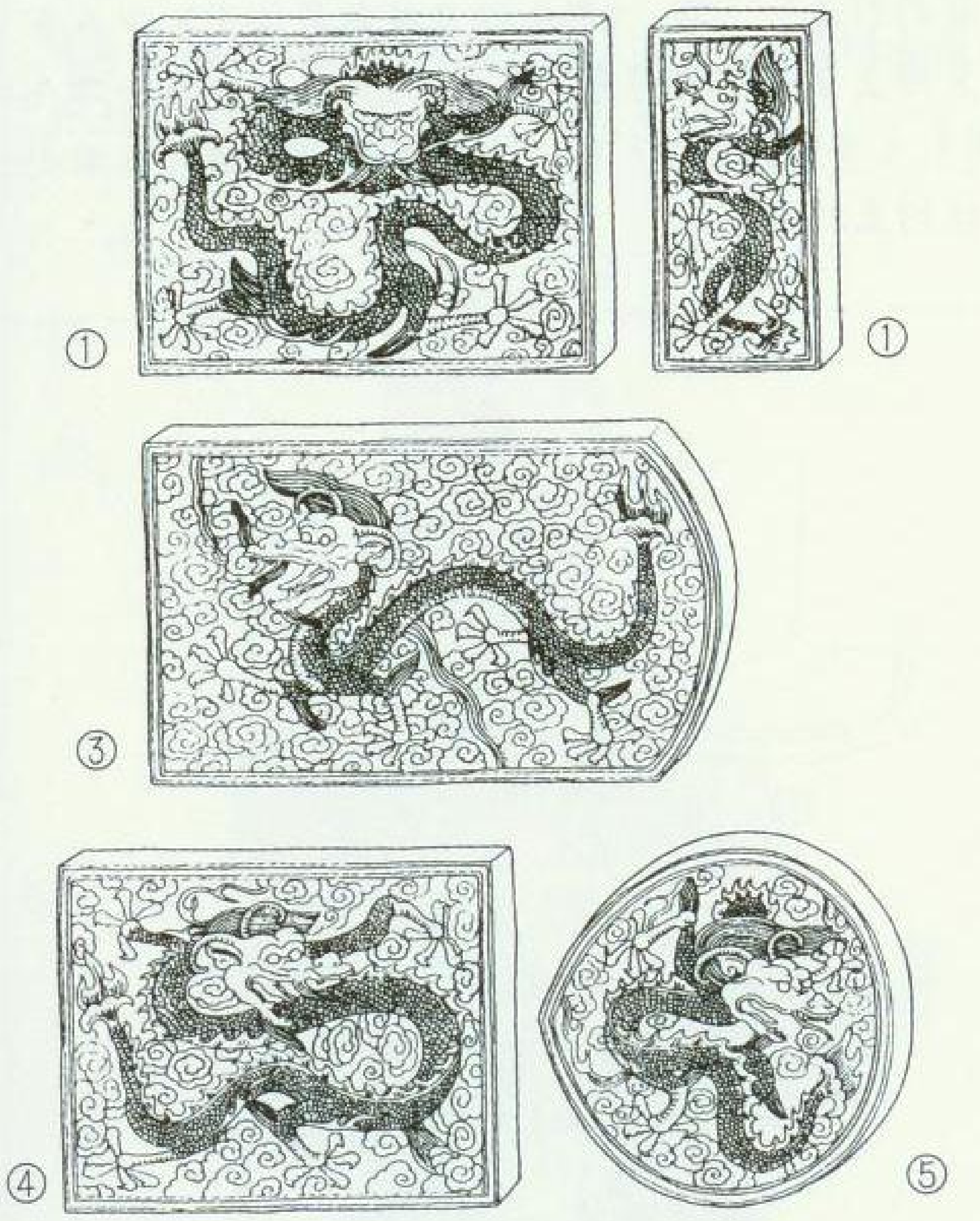


图P—20①—④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各种腰带的形象：①②单带扣腰带；③④双带扣、双铊尾腰带。⑤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中出土的鎏金錾花银革带带卡簧的细部结构图，录自《文物》1978年第11期。

图P—18上左：宝宁寺水陆画中戴簪花幞头插翎羽的形象。上右：《邢玠抗日援朝战迹图》中在军笠帽上插翎羽的形象。下左：《武备志》卷一二九《木火兽》插图。下右：《战迹图》中戴插有三面小旗的盔的军官。



图P—19明代的靴、履。①短勒靴，上海市宝山县出土，上海博物馆藏。②朝靴，山东曲阜孔府藏传世实物。③明代瓷俑上的云纹靴头短勒靴，四川省博物馆藏。④明琉璃俑上的履，出土、收藏地点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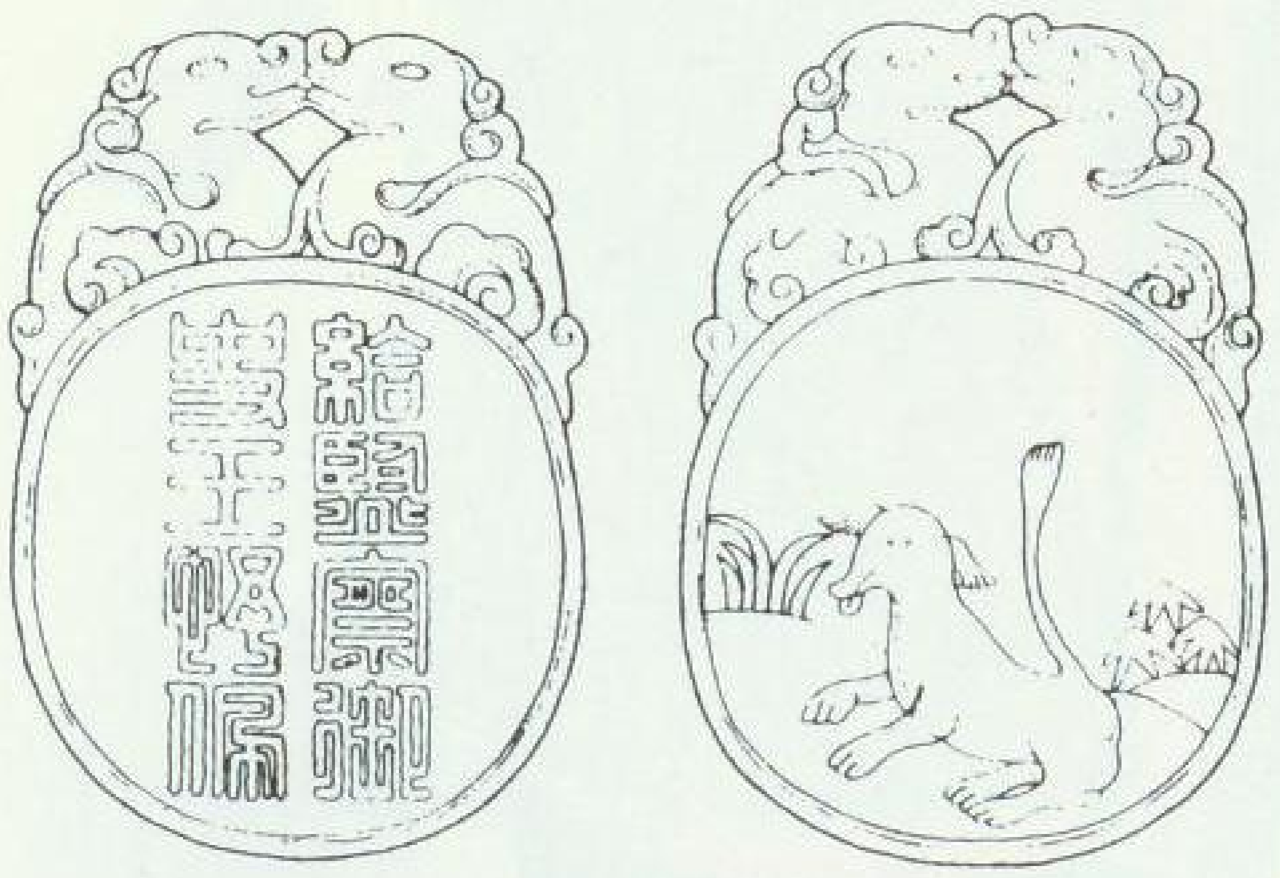
图P—21①－⑤：江苏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明墓出土黄金带銙，南京市博物馆藏。这组带銙的图案全部为斗牛纹饰，有可能是一条赐带，带銙的图案镌刻十分精美（据实物写生）。⑥：斗牛纹带銙排列分布图。⑦－⑨：辽宁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出土鎏金錾花银带銙、带扣，录自《文物》1978年第11期。

銙，一枚小方銙、一枚铊尾，其后为七方銙。全国各地出土的明代带銙实物，如南京发现的斗牛纹饰的黄金銙，辽宁鞍山倪家台崔源族墓发现的银鎏金、玉带銙，虽然外形微有变化，但带銙数量、大小形制、排列方法都基本相同（参见图P—21）。

制作带銙的材料品级按《明史·舆服志》卷三的记载，公服腰带的带銙："一品玉，或花或素（指有无镌刻图案）；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常服腰带的带銙："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扈花（指一种图案）；四品素金；五品银扈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九品以下武职人员和普通军士只能用铜銙，仪卫人员则用涂金、涂银带銙。

明代官服外的腰带，都束而不着体，用细纽扣住腰带垂悬于腰间，作为象征身份显贵的装饰。只有用于戎服和铠甲外时才真正系束。从不少形象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服的腰带上一般还要再系一条装饰带，它悬于胸前，带的左右两头插垂于腰带下，这条装饰带是明代特有的，象征着周代前后衮冕服中的大带。古代

图P—22 左：宝宁寺水陆画中穿公服束两条腰带的形象。右：江西吉州窟遗址出土官吏残身像瓷塑，录自《文物》1982年第12期。



图P—23 明王杼所佩象牙腰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帝王的衮冕服，要束革带、大带两条腰带，革带在里，大带在外，明代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恢复了这一古制。这条装饰带用锦绮制成，表面无带铐装饰，只在带头缀有二个铊尾，在出土的整套带铐中都有两个铊尾（而带扣大都只有一个），这两个铊尾也很可能是用于这条带上的（参见图P—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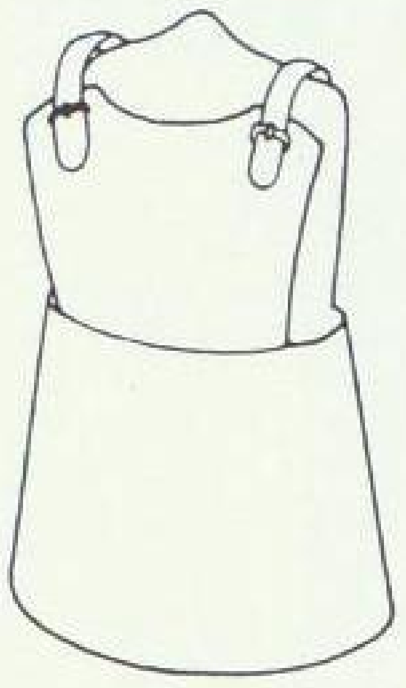
明代虽无佩鱼制度，但却有悬带金牌之制，《明史·舆服志》四载："其武臣悬带金牌，则洪武四年所造。阔二寸，长一尺，上扈双龙，下扈二伏虎，牌首尾为圆窍，贯以红丝绦。指挥佩金牌，双鱼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百户素云银牌符。太祖亲为文扈之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抚。威加华夏，实凭虎臣。赐尔金符，永传后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以后又创制了金字银牌和牙牌制度，颁发给卫军、锦衣卫和百官佩带，以作为出入皇城、宫殿的凭信，牙牌的形象参见图P—23。

明代的铠甲以金、银、黑色为主，后期的绵甲因为以缎布为面，所以色彩较多，有青布甲、黄罩甲、青白绵布甲等。盔、巾的颜色也多种多样，幞头仍是黑色。皮靴有黄、黑二色，缎面靴则有棕、紫黑、黑等色，靴面有时还用红、蓝、白、黑等色材料缘边，镶拼。戎服则因"武事尚威烈，故色纯用赤"（《明史·舆服志》），间以紫、青、黄、白等做为配色。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还使用一种"表里异色"的军士服，谓之"鸳鸯战袄"，这是为了便于军队改换服色。武官的公服、常服，一至四品为绯色，五至七品为青色，八、九品为绿色。在同一色彩中，以衣料花纹直径的大小来区分等级，如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以下依次递减，这一点与元代相同。腰带的带鞓则有赤、青等色，官服外一般都用青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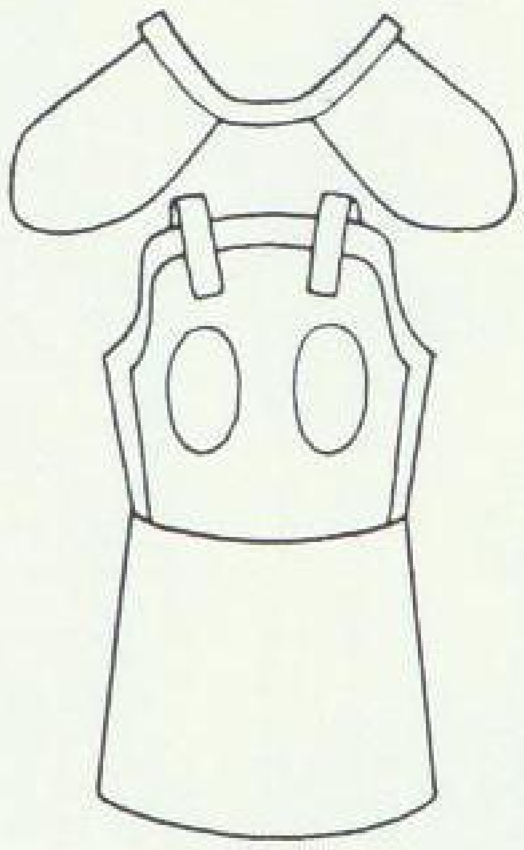
附录一

历代铠甲形制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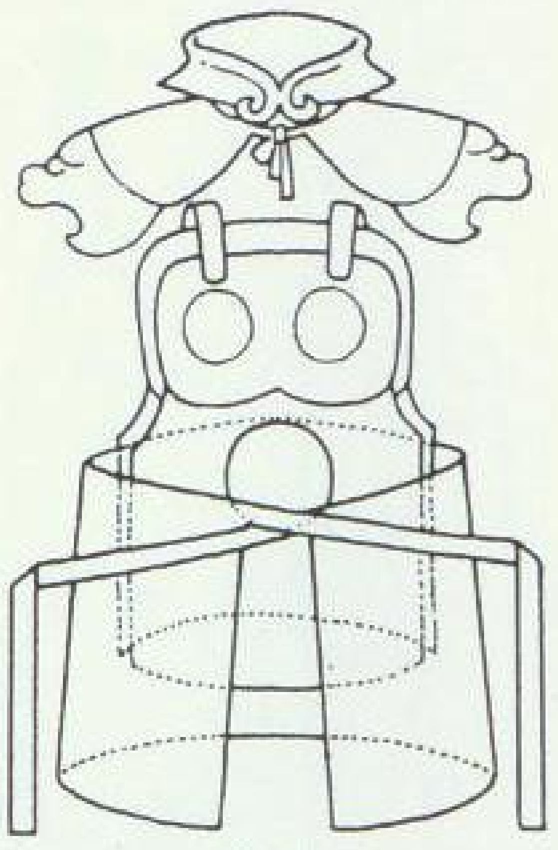
披挂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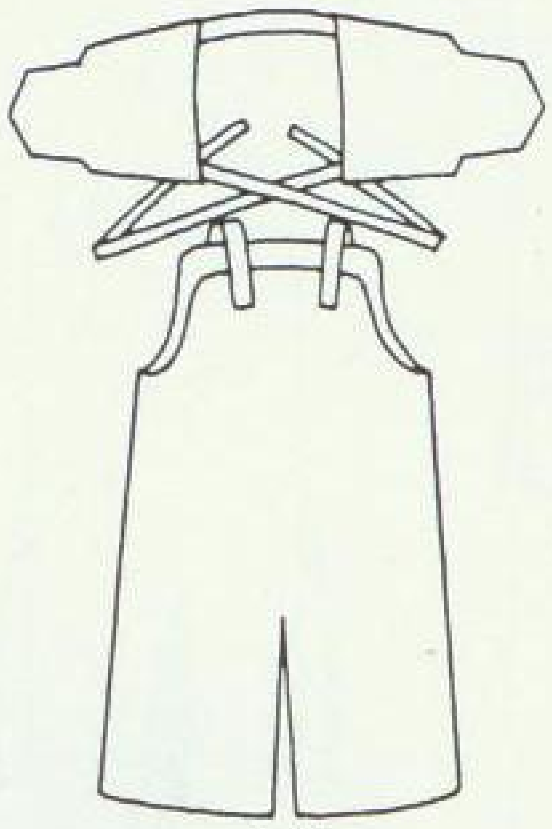
北魏



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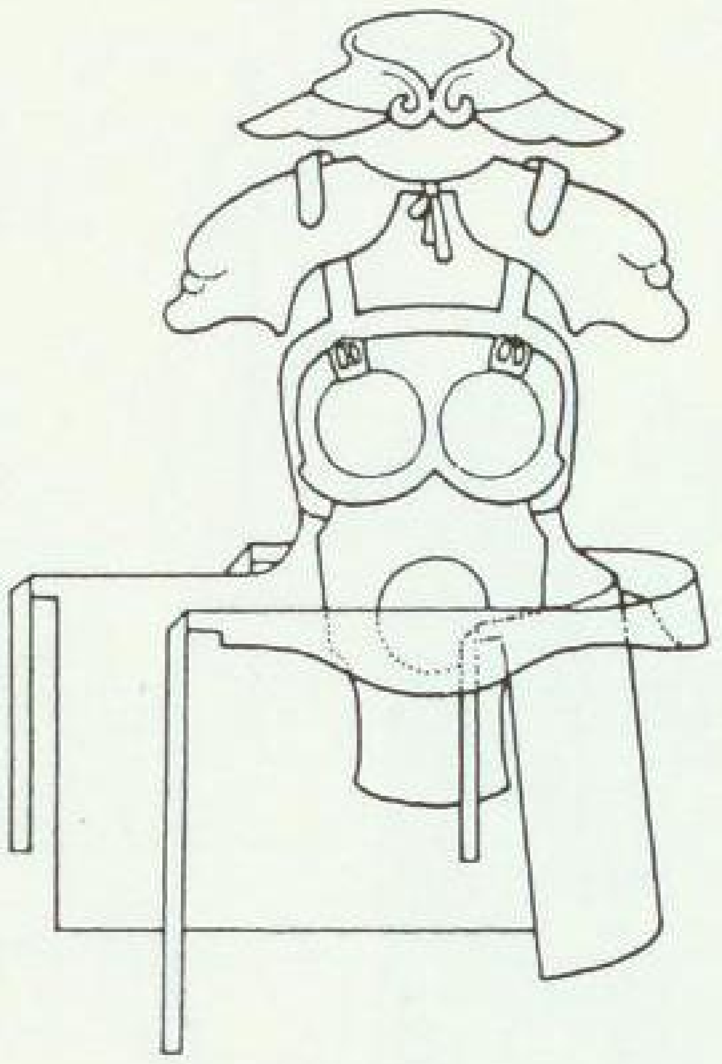


唐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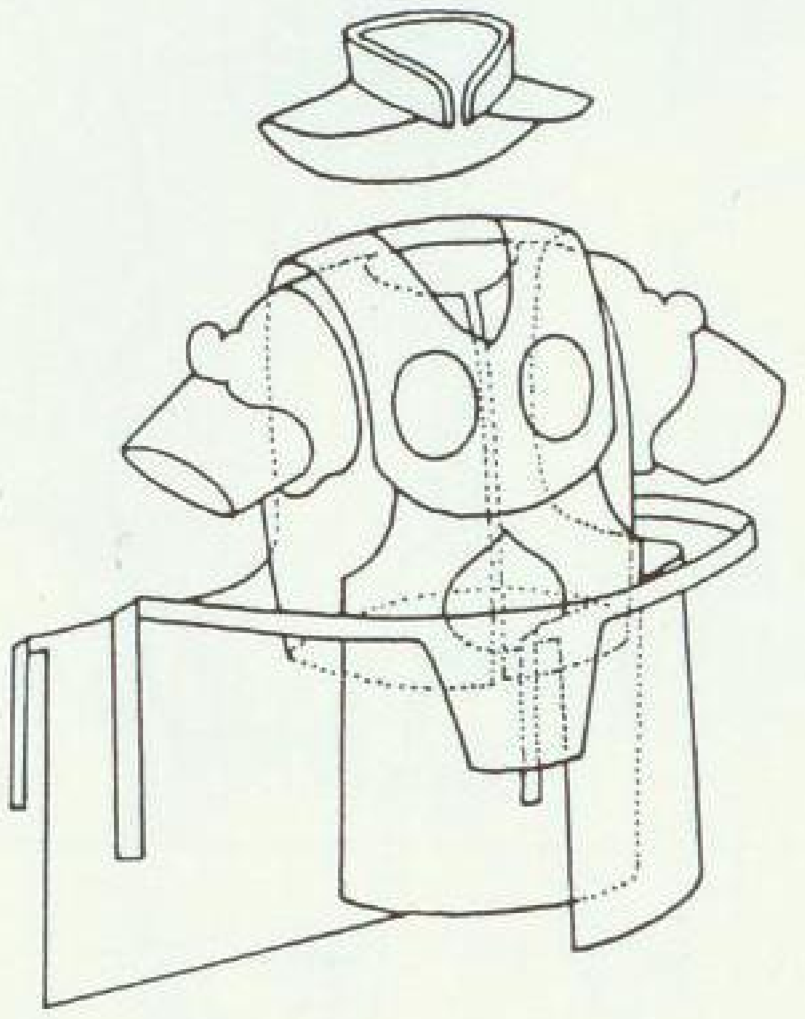


元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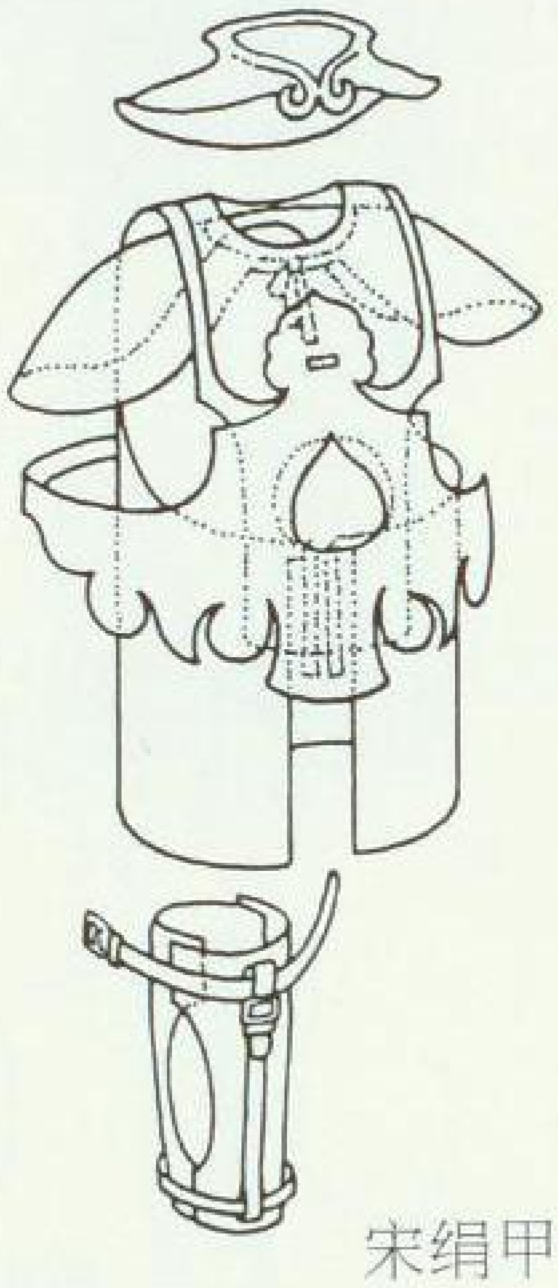
披裹式



唐明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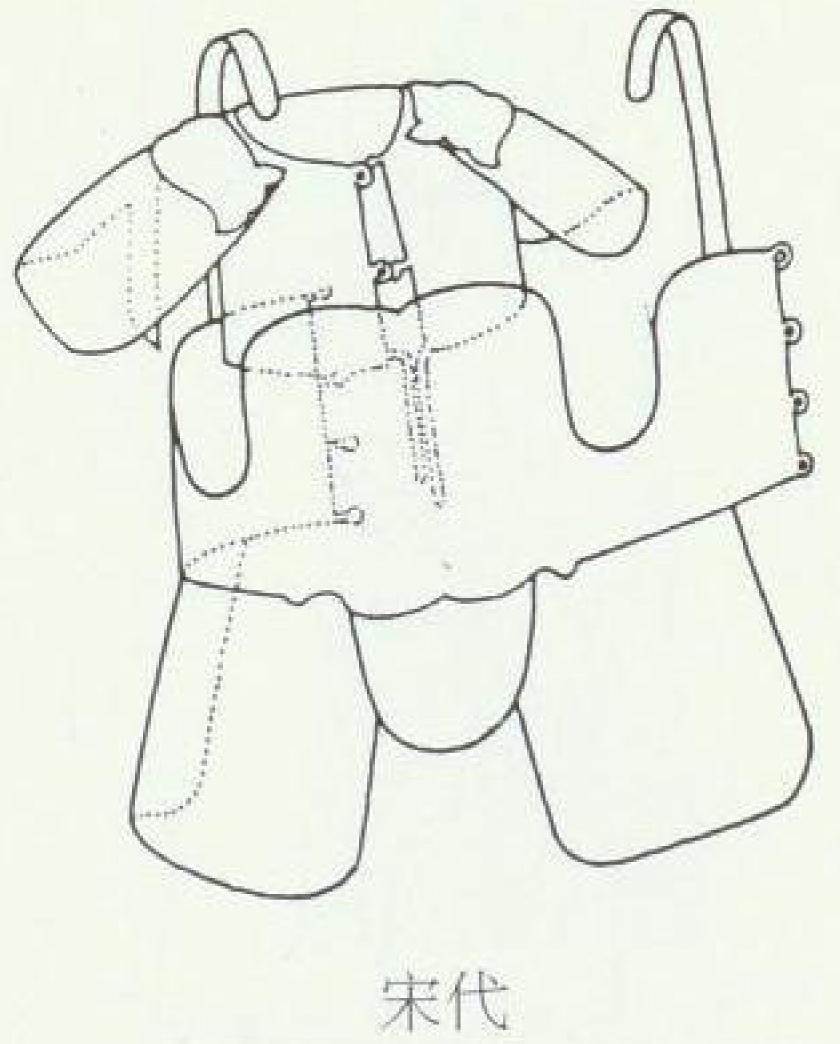


唐绢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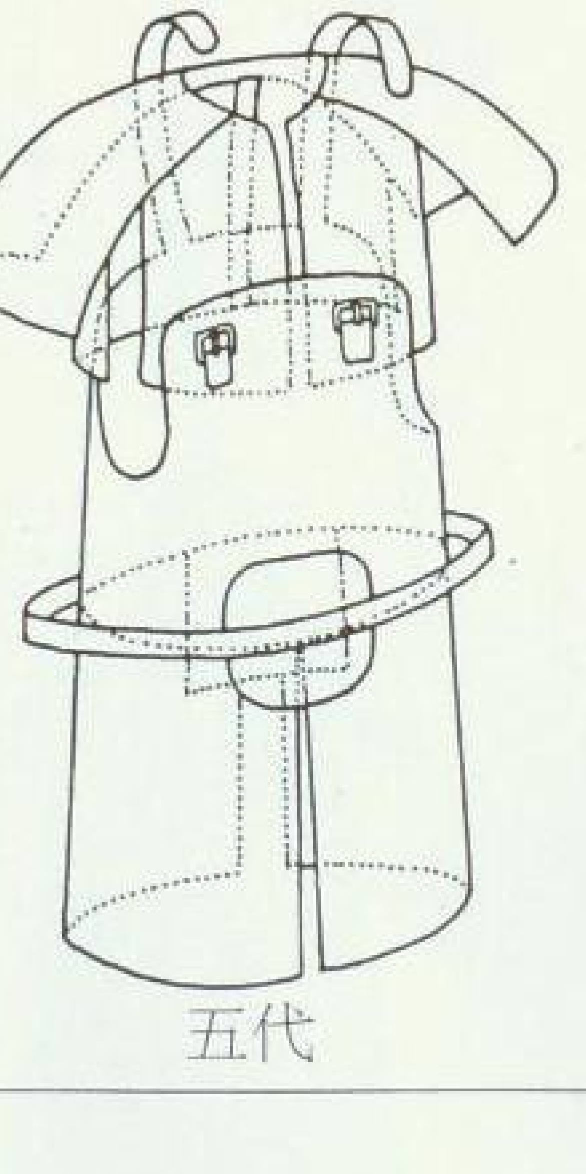


宋绢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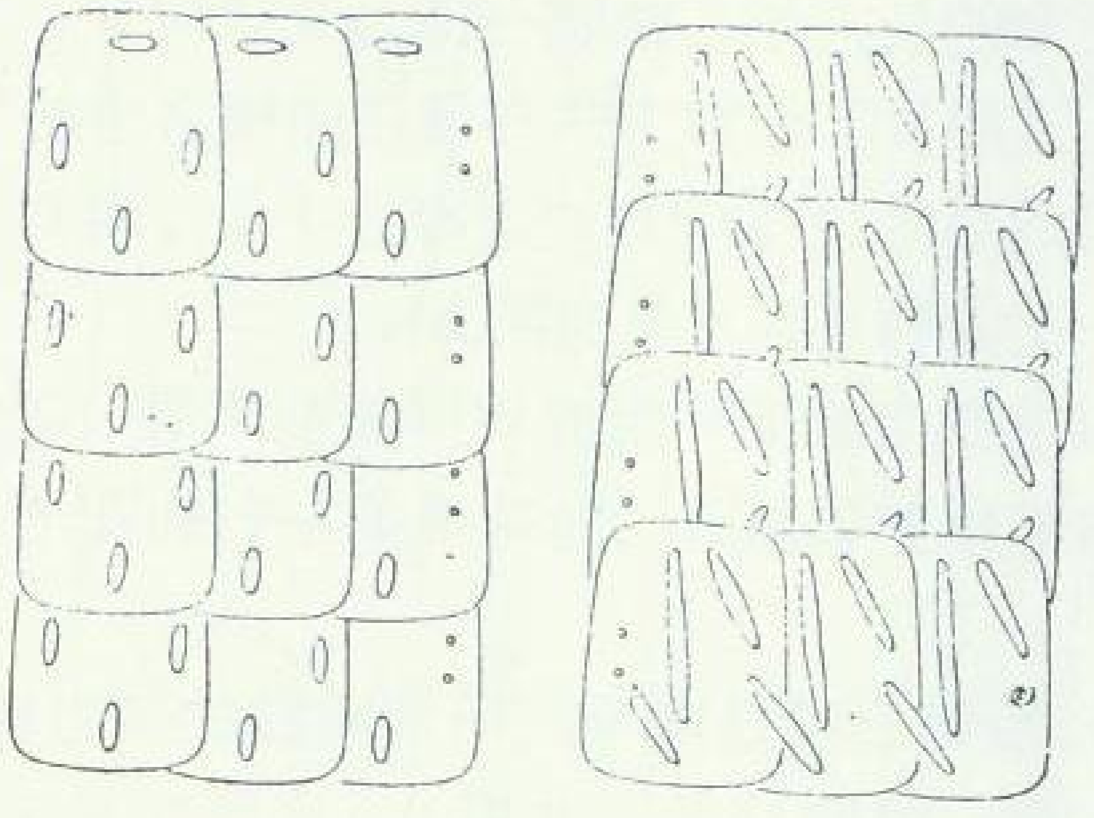
二件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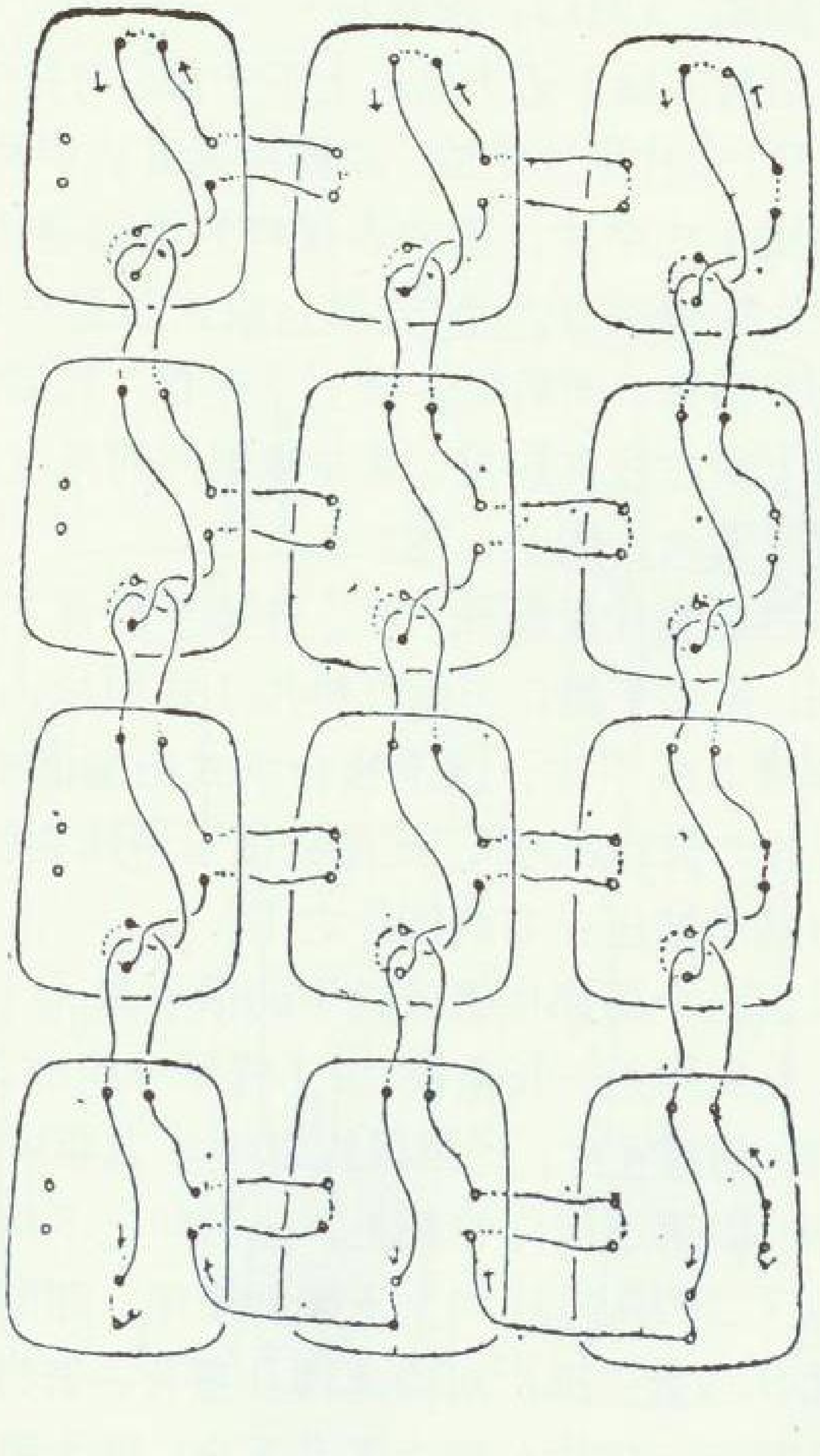
宋代



五代



上段甲片编联 左：正面 右：背面



上段甲片组编方法示意图

附录二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铁铠甲的复原（节录）

甲片的组合材料均以丝带为之。

（三）铠甲各部位的组编方式

以零散甲片组成一件铠甲，在各个不同部位的排列次序，都是具有特定规律的。在这件没有伸缩结构的铠甲上，纵向排与排间的甲片一律都是自上而下依次叠压的，上排片的底孔与下排片的顶孔重合组编；各横排上的甲片则是前胸居中的一片在最上，分别依次从两侧向后叠压，直到后背之正中，共同压在最中的一片上，片与片间是利用各片相邻的侧边上一对孔重合组编。

1.胸片是由Ⅰ式甲片组成的长方块，上下共五排，每排16片，计用80片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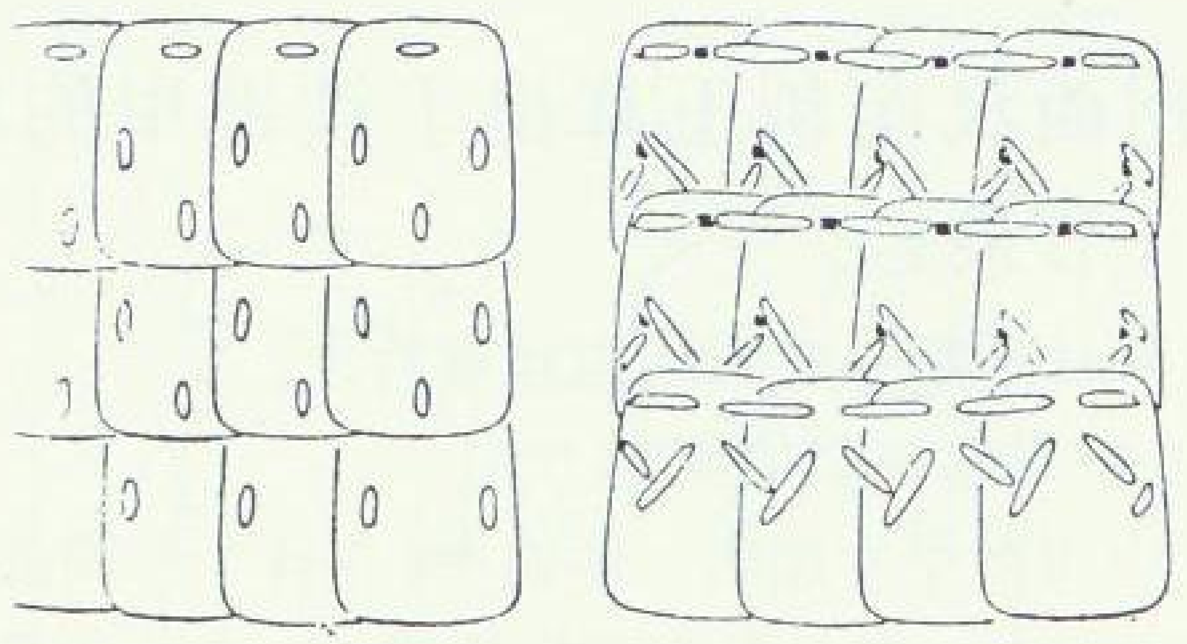
胸部甲片的组编痕迹，因被卷在筒形之中层，故未能见到，参考后背上段甲片的组编痕迹，推测其不是一一编起横排后再纵向连成块的，而很可能是先编出纵列的五片为一侧，然后向另一侧推进，每纵排甲片逐片累加，直达终端为止。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组编方式，我们称之为“纵横向累加式”。

2.腹片是由Ⅰ、Ⅱ两式甲片组成的长方块，自上而下十排，底下一片为Ⅱ式片，以上九排均为Ⅰ式片，每横排各由16片组成，计用甲片160片，排列形式与胸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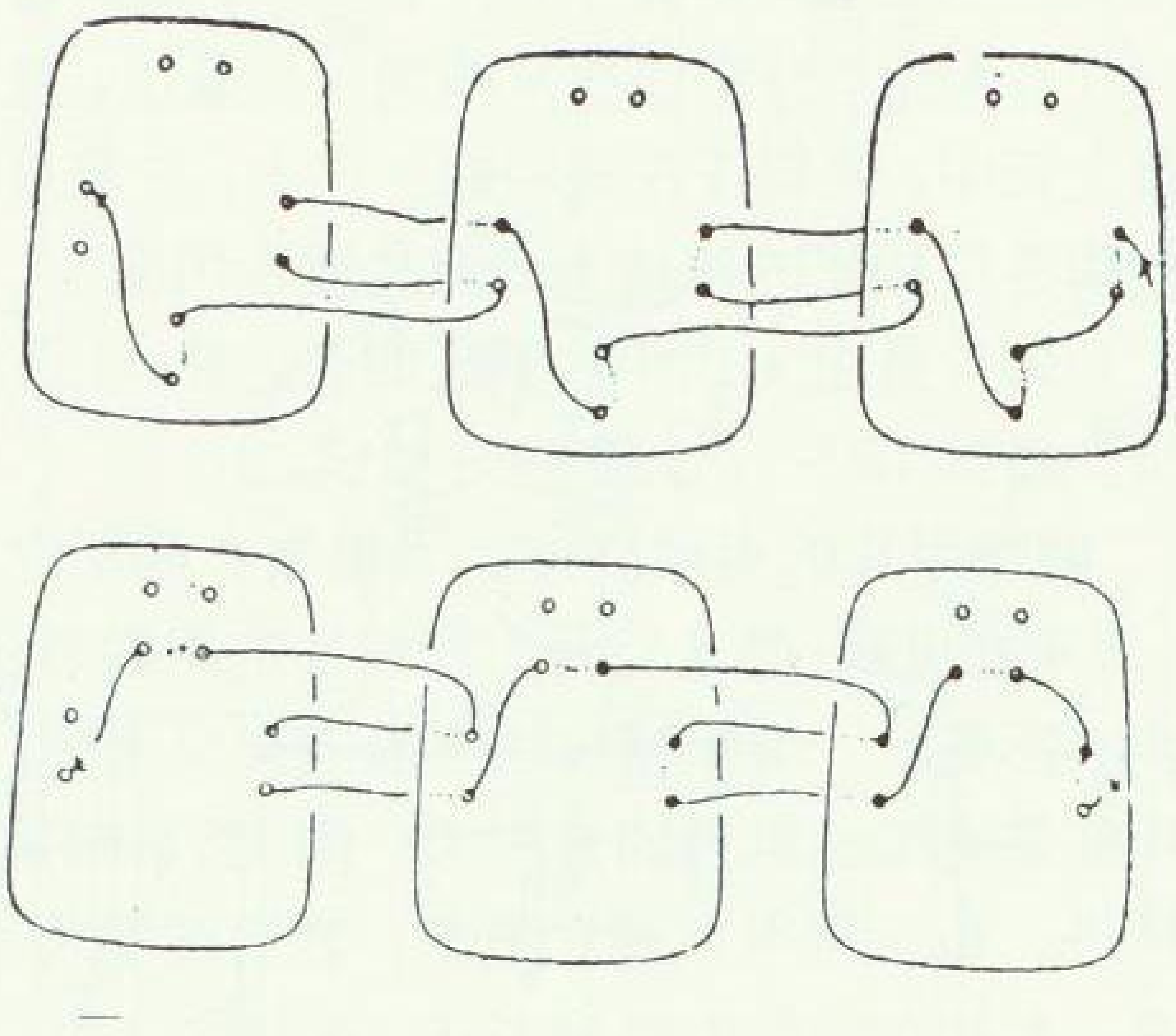
此部位甲片的编联方式与胸块不同，上面九排是先编出单个横排，然后再纵向组合。这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编联方式，我们称之为“连横合纵式”；最底下一排是利用两侧孔和上端四孔中的下两孔，因为属Ⅱ式甲片，下端无孔，上端4孔，故横排编出，上端的另外两上孔则与上排片底端的一对纵孔组合。

腹片之顶排片与胸片之底排片相连贯，从正面看并没有任何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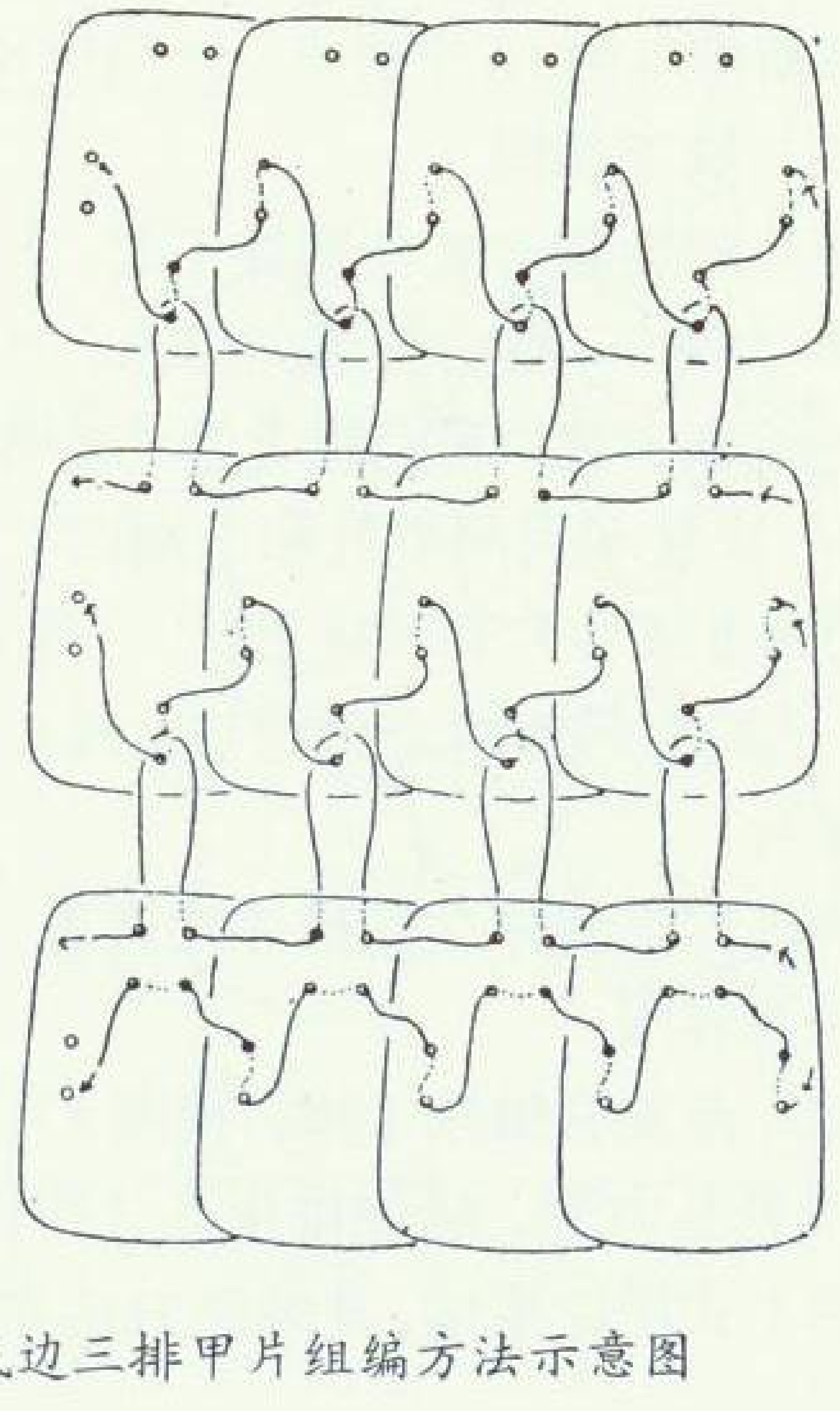
3.右前侧片此部分纵向十排，横向8片，由80片甲片组成竖长方形，除底排用Ⅱ式甲片外，其余九排均用Ⅰ式甲片组编。其编联方式亦如腹



下段底边三排编联



下段横排甲片组编方法示意图上：底缘以上诸排下：底排



下段底边三排甲片组编方法示意图

片，属"连横合纵式"。右前侧片处于甲体的右肋部位，一侧与腹片连接，和前后身右半边及右肩片之间构成一个可为右臂出入的孔洞。另一侧边穿着时则搭接于后背之下段边际之上。

4.左侧片位于甲体左肋部位，与右前侧块基本对称，纵向十排，每排4片，由40片甲片组成更窄的长方形，最底一排为Ⅱ式甲片，其余为Ⅰ式甲片，编联方式亦属"连横合纵法"。两侧与前后身之相应侧边连接，并与左肩共同构成一个左臂可以出入的孔洞。

以上四个局部片组成铠甲的前半身，在作战中除能保护胸腹外，尚有维护左右肋安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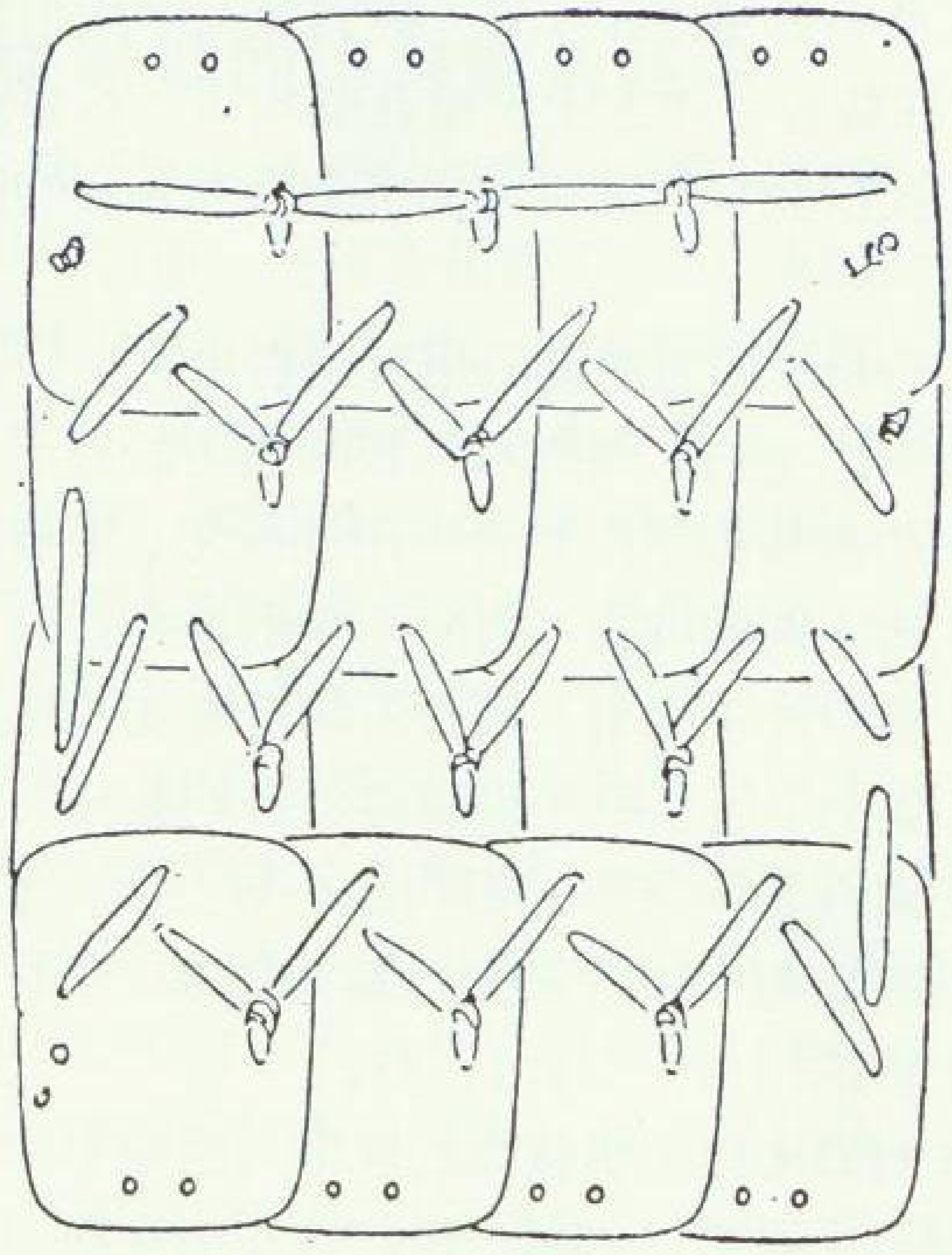
5.后背上段是由Ⅰ式甲片组成的长方块，上下七排，每排15片，共用105片甲片。各排当中一片被叠压在最下面。因每排片均为单数，故左右两半片数对称。根据内面保留下来的组编痕迹，判明甲片之编联方式是从侧边一个纵列开始，而后一片片逐行累加，亦称为"纵横向累加式"（图四；图五）。

6.后背下段形近方块，上下十排，每排15片，计用150片甲片组成。底排片为Ⅱ式甲片，其余均属Ⅰ式甲片。据内表保存的组编痕迹，复原甲片的编联方式为"连横合纵式"，即先编出一个个横排，而后将各排上下连贯。其顶排与后背上段之底排连接，其左侧则与前身左侧片连接（图六；图七；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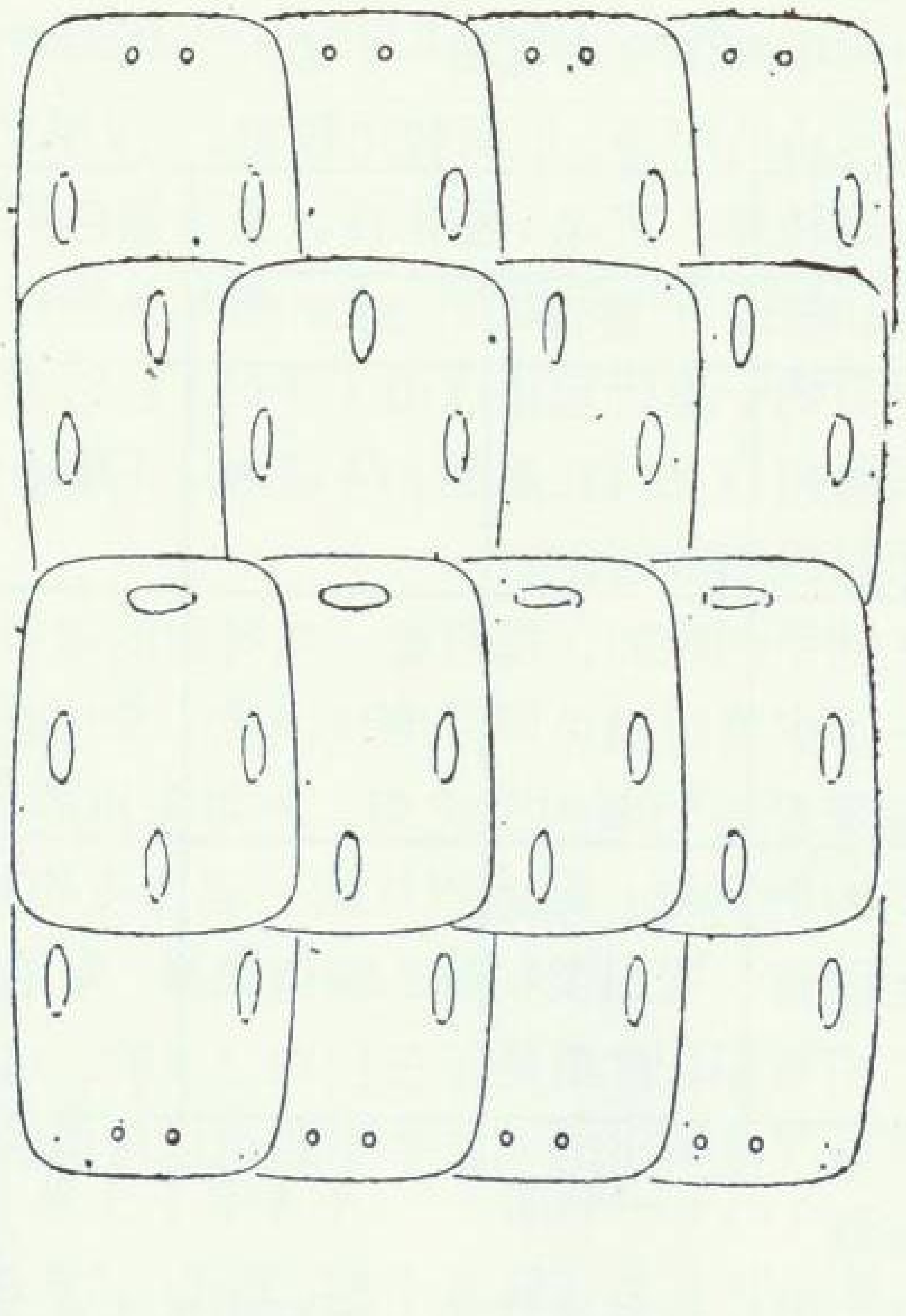
7.右后侧片呈纵长方形，连接于后背下段之右侧，纵列十排，上面九排用Ⅰ式甲片，底下一排用Ⅱ式甲片，以连横合纵式组编而成，每排5片，合计50片。此部分位于甲体右肋，穿着时基本被压在右前侧片之下。

以上三个局部片组成铠甲的后半身。

8.左肩片为一长条块，以Ⅰ式甲片组成，纵列五排，每排4片，计用甲片20片。其纵向排列次序，以第三排片在最上，分别向上下两端叠压，且二四两排片均上下颠倒使用，即第二排片顶孔与第三排片对应之顶孔重合，第四排片底孔与第三排片对应之底孔重合；继之第二第一两排片之对应底孔重合，而第四排与第五



右肩片局部正面编联



右肩片背面局部编联

排之顶孔重合。

组编此部位甲片的过程，均以本横排片的组合为主，同时兼及相临下排各片，我们将此编连方式称之为“连横兼纵式”。各横排甲片叠压顺序是自右向左，即肩部自内向外，左肩片总体呈桥形，上下两端与前后身片编连固定，内侧形成领口之左边，外侧边则靠近左肩头。

9.右肩片大致形状及所用甲片均与左肩同。差别在于结构上纵列为六排，每排仍为4片，计用甲片24片。其纵向排与排的叠压次序与左肩片略同。第六排与后背右上缘编连固定，而第一排则与右胸片相叠压呈开放式，穿着时以丝带系定。横排上甲片的排列有一些片并非是按规整顺序依次叠压，可能是组编时疏忽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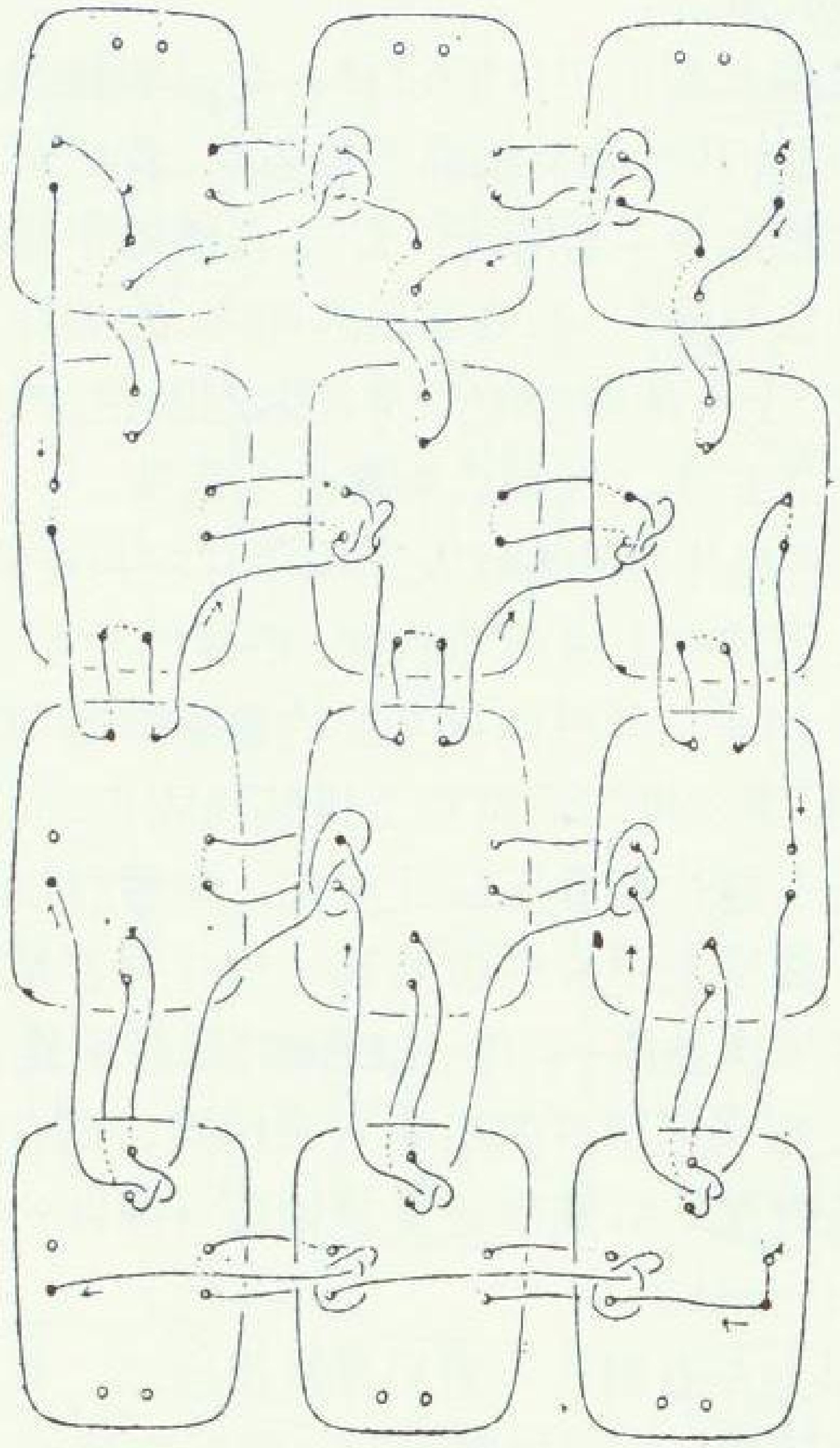
左右肩片甲片的组编方式相同，据右肩局部残块背面的编联痕迹复原如图（图九；图一〇；图一一）。

以上左右肩片与前后身片组合后，其间形成一个领口，领口横宽约15、前后空档为1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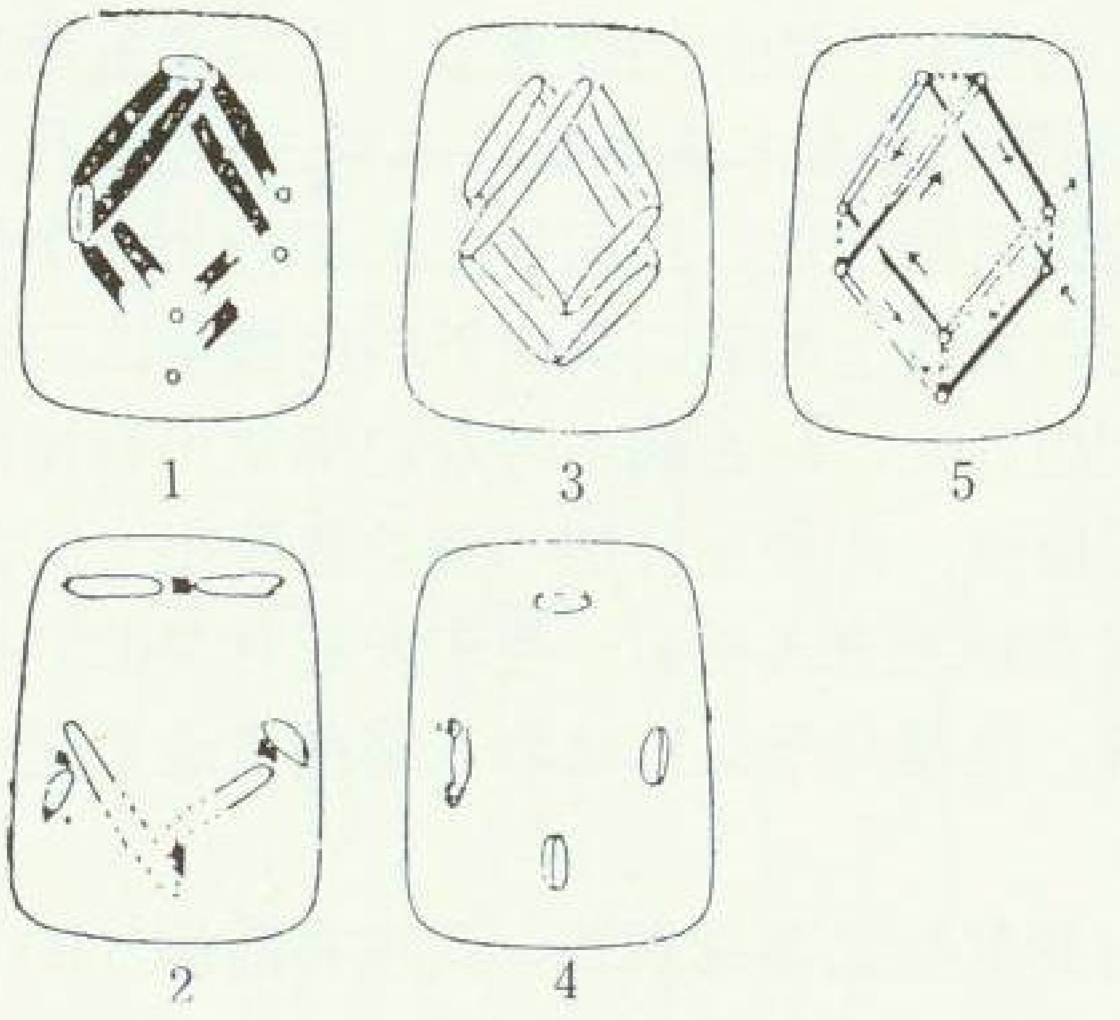
（四）铠甲右胸及右肋部位的系带

甲体在结横上有两个开合点，即右胸与右肩部位和右肋部位，穿着时需要打开，穿上后则以丝带系住。在原标本右肩片前数第二排中间两甲片的两对外侧孔的位置上，残存着系带的痕迹。丝带的拴合方法是自孔中穿过，在临孔之上下两面打结卡住，正面长出的部分为一个带扣。在右胸片上的第二排由外向内数第二三片之外侧边孔处，与右肩系带对应部位也有相同的丝带痕迹。此种系合法与秦始皇陵出土的着甲武俑右胸之方式相似，但未发现有类似的柱状别棍，推测只是以打结形式将两者连系起来的。

右肋部位之系结痕迹，仅在右前侧片的下数第三排向内第三片之下端孔上有一些残存，至于右后侧片上的系带，因被卷在最里层而难以观察到，据测算右肋部位的系带应有二至三对。从复原模型的穿着系结得知：右胸带着甲者尚可自系，而右肋部位之系带偏后，本人系结不便，在穿着或脱卸时当以他人协助为宜。



图一一 右肩片组编方法示意图



图一二 甲片上的丝带装饰示意图1、2：原状正背面3、4：复原后正背面的装饰部分5：丝带编饰方法

（五）甲片表面的装饰

在此领铁甲之下半部，除底缘及侧缘包边部位外，在数百甲片之上于组合前均以丝带穿过甲片上的孔眼而于正面编饰出三个相互套合的菱形图案。

经分析，编饰图案所用丝带在甲片正面四对孔眼间均为空白。而四对孔眼间透出的带子，位于侧边的是横排甲片组合所用的丝带，顶端和底端孔间者，则属纵排连贯时所用的丝带。以上的情况，从甲片正面看。因丝带均已退变为棕褐色而难以区分，但从甲片表面各丝带的叠压关系——从四对孔眼间透出的带均压在最上面，这就明确地反映出每个甲片是先行编饰图案，而后才组编成甲体的（图一二，1、2）。

推测原来作图案装饰的丝带与组编甲片的丝带在颜色上是有区别的。我们曾仔细观察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陶俑（简报见《文物》1966年第3期），有些铠甲甲片上装饰有菱纹图案，在施彩上有红白两色可证。

根据甲片表面的组成菱形图案的丝带重叠情况（排除了甲片间组合的丝带）复原其编饰方法如图（图一二，3、4、5）。

（六）铠甲的包边与衬里

在铠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正面包边较宽，约2厘米，背面一般则较窄，宽仅1厘米许，至于颜色则难以辨别了。包边皆压于编带之上，显然是整件铠甲编出之后统一施行包边这道工序的。包边方法应是在正面将线反折在里面，将织物从正面折向甲片背面而以细线缝定。

在铠甲的内面，残留着一些衬里的痕迹，其作用在于穿着时避免甲片磨伤内衣，同时遮盖内面的编带形迹而增加了美观。衬里所用的材料，以右肩为例可知，贴近甲片的一层为皮质材料，在其上则是一层绢类织物，颜色难辨。从右肩片痕迹还可看出，衬里是压在包边之下的。这些情况与满城汉墓所出的刘胜铁甲的包边衬里的情况大致相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载《考古》1987年第9期）

附录三

唐宋时期的甲胄制造技术

唐宋时期生产的铠甲，主要是铁甲。一副铁甲的制造，是相当花费工时的，制造时，大约需要以下几道工疗，首先要把铁制成甲札（甲片），再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并裁札、错棱、精磨等工序。将甲札制好以后，再用皮革条编缀成整领铠甲。铠甲里面还要挂衬里，以防止磨损披铠战士的肌体。因此造成一领铠甲，往往需要几十天乃至上百天才能完成。由于工艺繁杂，所以，在北宋东、西作坊中共分五十一作，其中与制造铁甲有关的有铁甲作、钉钗作、铁身作、纲甲作、柔甲作、错磨作、鳞子作、钉头牟作、磨头牟作等，加上制造马甲及皮甲等的马甲作、马甲生叶作、漆衣甲作、马甲造熟作、皮甲作，以及打线作、打磨麻线作等，占了很大的比例。因系手工操作，而一领铠甲又包括几百片或多到千余片甲片，制成后的重量往往有差别，以致于在战士领取了铠甲以后，要清数铁甲叶的数量和称量铠甲的重量，然后分别进行登记。

关于铠甲的型号，据《唐书·马燧传》，当时制造的铠甲，是根据士卒的高矮，分别规定了大、中、小三种尺寸不同的型号，以区别不同对象，按体分型发给，以利于进趋战斗。又因为铠甲重量较大，所以选兵时先要注意到是不是能够“胜举衣甲”，过分尩弱的则予以淘汰。

关于宋代的铁甲仅《宋史·兵志》中保存一些南宋时期的资料。据《宋史·兵志》，绍兴四年（1134年）规定全装甲的总重量是45—50斤，不得超过50斤。甲叶共计1825片，要求内外磨锃，每个部分的甲叶数、分重和每叶甲叶的重量如下：

披膊：504叶，每叶重0.26两，共重8斤3两4分

甲身：332叶，每叶重0.47两，共重9斤12两4分

腿裙鹘尾：679叶，每叶重0.45两，共重19斤1两5钱5分

兜鍪帘叶：310叶，每叶重0.25两，共重4斤13两5钱

又，兜鍪子眉子重1斤1两，皮线结头等重5斤12两5钱，以上合起来总重据纪录为49斤12两（实际是48斤11两6钱5分）。稍迟至乾道年间，各部分甲叶的重量都有所减轻，但甲叶的数目则有所增加，这就使铠甲更加精工和细密，并且按不同的兵种设计了铠甲的重量。乾道四年（1168年）三月十五日王琪进三色甲，分别

	甲身		披膊		头牟		总量
	甲叶数	重量	甲叶数	重量	甲叶数	重量	
枪手甲	1610—1810	31斤4两 | 36斤14两	1028—1298	10斤9两4钱 | 14斤	507—674	9斤 10斤12两	53斤8两 | 58斤1两
弓箭手甲	1812—1818	31斤12两 | 36斤12两	646—850	7斤12两 | 10斤	349—420	6斤10 8斤8两	47斤12两 | 55斤
弩手甲	1178—1326	22斤10两 | 25斤18两	630—836	7斤8两 | 9斤8两	355—420	6斤12两 9斤	37斤10两 | 45斤8两

按：原文弓箭手甲，“甲身叶一千八百一十八斤”，斤为“片”字之误。弩手甲“头牟叶三百五十五斤”，斤为“片”之误。又弓箭手甲，甲身的甲叶数“一千八百十八斤至一斤百百一十二片”，斤为“片”字之误，而一千百百一十二片，似为一千六百一十二片之误，因三十六斤十二两作一千八百一十八片，每片约三钱二分重，则三十一斤十二两，应作一千六百余片较合适。

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和弩手甲三种，现将有关数字列表如下：

以上这些甲，都是“皮线穿举”。由这一材料，可以知道当时制造的铠甲，根据不同的部位，甲叶的重量是甲身的最重，头牟的次之，披膊的最轻。如以枪手甲为例，甲身每叶约重0.31—0.32两，披膊每叶约重0.17两，头牟每叶约重0.28两，比绍兴四年的全装甲的甲身叶和披膊叶轻得多，仅头牟叶的重量稍重一点。

制造铠甲的工数和费用，据《宋史·兵志》：“绍兴三年（1133年）提举制造军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装甲一，又长齐头甲每一甲工百四十一，短齐头甲用工七十四。”又朱熹《与曾左司事目札子》讲到了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的用工和费用：“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一年以三百日为期，两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毕，申乞迟发继准枢密院札子，检坐元降指挥只令如法椿收，窃缘上件铁甲计用皮铁匠一万八千，工钱五千二百余贯，……”可知每副铁甲需用皮铁匠工一百二十，工钱约三贯半左右。建炎三年（1129年）江东漕臣褚宗谔造“明举甲”三千，每副工费“八十缗有奇”。足见当时制造一副铁甲所需的工时和工费是相当可观的。

（摘自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刘永华著；—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2006.6重印）
ISBN7-5325-3536-3

Ⅰ.中… Ⅱ.①中… ②刘… Ⅲ.军服-中国-古代
Ⅳ.E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7478号

责任编辑 曹明纲
美术编辑 何 陽
技术编辑 陈文彪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作　　者 刘永华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瑞金二路272号）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　　版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承　　印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24开 9 1/6印张
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2006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3,101-4,900
书　　号 ISBN7—5325—3536—3/K·509
定　　价 5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Ancient Chinese Armou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K·509 定价：55.00元

ISBN 7-5325-3536-3

9 787532 535361 >